

震旦大學史學研究所

第一冊

利瑪竇司鐸和
當代中國社會

裴化行著
王昌社譯

震旦大學史學研究所

第一冊

利瑪竇司鐸和
當代中國社會

裴化行著
王昌社譯

P. Henri BERNARD, S. J.

Le Père Matthieu RICCI
et la
Société Chinoise de son temps
(1552—1610)



Tome I

准 惠 教 主 海 上

印 館 書 印 灣 山 土 滙 家 徐 海 上

利瑪竇傳目錄卷一

上編

第一章	在中國社會的邊緣上	一
第二章	青年時代的回憶	五
第三章	諾比利開教前的葡屬印度	二八
第四章	中國文化的發見	四七
第五章	步武羅明堅司鐸後塵	六五
第六章	西方科學和文化的流入	八六
第七章	從肇慶遷往韶州	一〇六
第八章	中國的文教	一二五
	歐洲人研究漢學的開始時期	一四六
	西洋儒士	一六七
	在中國顯官蔭庇下	一七〇
第一章	人文薈萃的南昌	一八七
第二章	西學堂	二〇四
第三章	北上曾京的初次嘗試	二二三
第四章	重到舊都漸入佳境	二四二
第五章	進入中國思想界的中心	二五七
第六章	南京城中福音的酵母	二七四
第七章	二次進京和太監馬堂的威脅	二九一
第八章		

下編



Déjà paru :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XVI^e siècle

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 334 pages

利瑪竇司鐸和當代中國社會（一五五二—一六一〇年）

序

作者寫這部書，是以使本書成爲利瑪竇司鐸的一種有批評性的傳記爲第一要義，讀者們披閱之餘無疑的要引爲詫異，以爲本書撰成問世未免過早吧？其實，當舉行這位中華傳教事業創始人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時，本書所有最重要的材料差不多都已由文多利司鐸（於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間）發表刊行，且加註釋了；他用心的精細是無可比擬的。不過事實上，十二年前我們雖已擬定了計劃，從事編纂利公的行實，可是那時，誰都還不會着手利用這些慣見的文件和這部「關於中國的雜記」那是憑着一種那麼信實，那麼可靠的大學問來編輯的。我們就這位著稱的先進人物的著作，於每一頁中多所援引，却竭力保存他的原質。我們又竭力設法，就中國目前所有對人對事種種經驗之所得，以作增益。再則十六世紀末葉所播下的福音種子，既然已經長發了，成爲我們今日所詭羨的，這棵中華聖教的喬木，那麼，目前的事實，說是我們所藉以洞燭已往的光明，這也何足爲奇？

這部新作品，可以說得無非是我們在三年半前便已公諸當世的那一組書籍，或是散文的續編，和集成罷了。有了一本包括着各種分析目錄的補篇，合着一種有方法的對照，便可以說明這全部書籍的一貫條理。給這書作介紹的是一天主教十六世紀中在華傳教誌」一書。我們在這部書裏，曾經討論過，也應用過，轉譯的原則，現在我們也不準備放棄這些

原則。有幾件事情，如果在個人的列傳中隨便列入，未免過嫌突兀，要是丟開不錄吧，却又頗為重要，未便擱置一邊。因此我們另外發刊了三種單行本：（一）「鄂木篤傳」又名「新羅回族風土紀」（一六〇三至一六〇七年）（二）「大柵欄公墓的緣起」一名「欽賜利公葬地記」（一六一〇至一六一一年）（三）「利瑪竇來華灌輸西學誌」。在這些不同的作品中，也和我們所有其他著述中一般，（尤其是關於利公的文集）讀者們可以看出我們小心翼翼，追蹤着這位義籍耶穌會士的一舉一動，並非只為好奇心所驅使，而我們却要請他們認清這一層，就是我們對於利公，雖則竭誠崇敬，却絕不因此而有妨我們率直的批評。我們所寫的是利公的正史，不是稗官野乘，所需要的惟有真實。我們唯一關心的要務，便是在可能範圍內，盡量搜集事實，照錄原文，不加更易，藉以保存他的本質和他固有的本色，使每一讀者，都能樹立信心。這樣，雖則本書絕不是衛護聖道的著述，可是將來也許要從這部傳記中獲得衛護聖道的價值。

在我們眼裏看來，中華傳教的歷史，決不是一部道德大革新的歷史，也不是一種但憑臆測，以致利公逝世四五年後，引起了中國禮儀爭議的歷史。這是一部宗教史，這就是說一種精神生活；因為這是完全看不出的生活，所以當然有受人攻擊的可能。傳佈真理的成效如何，也並沒有一定，却總不失其為真實的生活。寫這種史記的作家總該記取，務使他所傳述的事蹟，不至為人所不欲聽聞。我們講這時代中天主教在華發展的情形，原不必採錄一五五〇年以前所有的史料，這已由摩勒氏在他所著「一五五〇年以前的中華基督教徒」一書中，搜羅殆盡了，而我們也早已把他公諸當世，發刊了「元代鄂爾多斯帖斯多畧派蒙古人的新發現，和遠東基督教義的古蹟」一書。此外，我們更特別注意到這件史事所佔的時間和空間，論時間，這便是作者所以刊行「中國人的智德，和天主教哲理」一書的宗旨，這是一篇性質很廣泛的論

文；論空間，作者在「中國大羣島中的斐利濱列島，論遠東精神征服」（一五七一—一六四一年）一書中曾悉心研究過比較的傳教學術。這兩部初步的作品，旨在使人對於卓越的靈蹟，能有嚴正深切的了解，比較容易一點；比方，天主降生爲人，死而復活，在聖教會裏生活着，行動着，因而憑藉一種亘久不輟的宰制，亭毒着宇宙間，四面入方，天地萬物的自然界，西方如此，遠東何獨不然。

現在外面的輪廓，差不多已經完全劃定了，我們只須把中央的凸出部份，削平一下，就行了。但是正因教士們所傳達的宗教和一切人事密切相連，那由宗教史引起的反響史，就牽涉到種種視線的集中點，這些集中點不妨說是漫無止境的，這層，利公早已講過了，（一五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他說「假使我們要敘述我們所經歷過的種種不同的事情，這還不是慣見文件的問題，却是一件有關年鑑的事。換一句說，就利公和他的後繼人本身說，是歐洲和遠東一對面相逢，」說得再切實點「相擁抱。」

這題目太大了。假使我們走得進耶穌在華查教士們先後撰著的五六千冊的書庫，而不禁稱奇納罕，那麼，討論起來，我們更不知從何着墨啦。現在呢，好在我們手裏已經抓到了東西兩世界文化密切溝通的憑証，往往是日期，有時候還劃過押的憑証，因此，我們對於這兩文化世界四百年來互相交換的情形，也就不至毫無標的，而發不符實際的議論了。從此以後，不管是利瑪竇司鐸的雜記，或者是湯若望神父的親筆記錄，或者是南懷仁神父沒有刊佈的函牘，——還有許多關於修德立功和記敘新奇的親筆書信，不必說——我們在此詮解尋繹的汪洋大海中，總已有了定向的南針，使我們不致迷途失道啦。我個提及這幾位作家，並不想掩飾我們確曾利用過他人作品，而利用得不少，不過我們參考過的書籍，既然

多得不可勝數，如果一一提出，只怕讀者們感覺厭煩，還是免了吧。

此外我們跟着利瑪竇神父踏進明末的中華，便體驗到，如果我們要把這過渡時代研究一下，這位傳教士，至今還稱得最好的指導人物。我們在歐西的編年史家和傳記家的著述中，慣常找得到種種啟迪，可是那些用華文寫成的歷史作品，實在都不足以供人玩索，尤其是因十六世紀末葉中，清帝乾隆大興文字獄的結果，把明末清初所有幾千部很有趣味的書籍，藉口書中有仇視滿族侵略者的文詞，便毫不顧恤的銷燬了一大部份；這些書籍便是現代新中國青年們懷着一片熱忱，所欲竭力搜集的，（目下搜集的還不多大概還不到幾百部）因而證實了我們從歐洲方面得來的許多史料，證明利瑪竇司鐸和他最後後繼人，當時會做着東林黨所由產生的中心人物；他們的言論行動，在當代思想學術界，大放光明，而在明代萬曆以後，東林黨是佔着那麼重要地位。因此，我們從這已往的陳跡，悉心注意到現在所能獲得的資料，希望能為考據家稍盡綿薄，協助他們，不論在歐洲的檔案室內，或者在中國至今還沒有開發的藏書樓裏，從事搜集史料以期獲有新發現。這便是我們所以用意義更廣泛的字樣，把本書改稱「利瑪竇司鐸和當代中國社會」的緣起。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作者序於徐家匯神學院

引言

近三十餘年來，研究聖教創始時代的史家，只知着眼於這古世界中傳播福音各方面的外觀，便自感滿足，他們雖會再三加以分析，要窮究基多教義本質的原委，却還相差很遠呢。可是在十六世紀中，却輪着那由於反革新運動而復興的公教教義，在一個比古羅馬帝國還廣大的領域中作深入的嘗試，而獲得部分的成功。

這種嘗試的企圖，環境也許比耶穌基多降生後五十年前後時代還要複雜。那時聖教會正在猶太民族中萌芽着。這猶太小民族又聚居在地中海的周圍地帶。因此，這位出身異教國的宗徒聖保祿，播散基多教會的種子，簡直走一步散一步，不過基多所訓示的理想，還可以在口頭傳說中找到，在罕有的著作中，也已有了定論。

至於那幾位最先到遠東來傳教的葡萄牙教士們，尤其是那一位聖方濟各沙勿畧，一到了這閉關自守，別有天地的中國，却到處碰壁，障礙重重，進門好不容易；進了門一路走去，既投不到可以過宿的逆旅，又找不到替換坐馬的驛站。然而他們帶來的福音，不只是一個加列勒漁夫的口訊，却是基多教會奇妙的展開，有傳教司鐸，也有教務議會，有宗教的基本信條，也有他的學府；這個教會剛從「尾大不掉」最可怕的危機中擺脫出來，是一個經過肅清以後，回復了青春，團結集中的教會，是一個密切參加控制過文明世界的命運之後，在征服了以後擴張的道路上，看得出和全歐洲完全同化了的教會。

把這基多教會所有全部的本質，移花接本似的，接到那中國文化的老樹幹上的第一人，當然是利瑪竇司鐸，這是無

可爭辯的。利公的確是個很聰明的適應環境的典型人物，他在這一種差不多已經毫無希望的企圖中，憑着他精細靈敏，堅忍不拔的意志，竟告成功的確比他先來的，未始沒有，可是他可以跟他學得的，無非是失敗罷了。然而他可是成功的，便是他死了之後，萬曆帝還是那麼尊重他，欽賜他一塊葬地。

中國人的思想既然最是牢不可破，中國又是全世界那麼閉關自守，海禁森嚴的國家，那麼，利瑪竇究竟憑着怎樣奇妙的方法，來適應這種環境呢？這便是我們所要討論的，當前的妙題哪。當時許多和利公敵對的人們，尤其是陽森派人的謗議，把利公講得和奸細陰險小人一般，憑着巧妙的奸詐手段，打通門路，見到了中國皇帝。這件事，非到利公死後，大家不得明白；這真是一篇可惡的野話，現代讀者當然不是這等樣人，而且凡是知道原委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對他表示感謝的。一般自稱和利公作朋友的人，想在他陳列出來，使人驚奇納罕的世界輿圖，和自鳴鐘等這些東西裏邊，尋求他能力的秘密。還有幾個竟把他當作飄洋賣貨的客商，可是真正的讀書人，決不會不懂得利公所以獲得成功，主要原因，全在他有高尙的道德，和精密的修身功夫，才能使人欽仰敬慕。也有些人竟會把他列在「調和宗教信仰」的頭等專家之一；這種人的用心，尤其是陰險可惡。利公的本旨，不過使公教中嚴峻的正宗派採取稍爲溫和一點的態度，寬容中國人的迷信習慣罷了。只是我們和我們極親愛的朋友們分離了以後，無論我們覺得怎樣抱歉，爲求歷史不失真實起見，我們不得不承認利公率真而且整個的，是個虔誠的傳教士，一個熱情的耶穌會士。

假使我們要明白利公本人對於自己的傳教任務，懷着怎樣的感想，那真是非常容易的事。當他的任務快要終了，在他逝世前只有幾個月的時候，他曾直捷爽快，明明白白說過了。他在他筆記的序文裏（註一）寫着道，後世對於現代所

有種種偉大的經營，和種種已成就的事業，往往懂得不得這些事業，是怎樣做起的。我對於這種現象的原因雖會一再加以研究，却總找不出理由來。否則但看一切事情，便是那些經過無限發展而獲得結果的事情，開始時候，根本都是那麼脆弱，那麼細微，似乎將來決不會發揚光大的。創業者對於這個原因，大都漠不關心，不加注意，也不會用筆記錄下來。至少我們要說這一類事業，開創的時候，便有那麼許多繁劇的困難，把他包圍着；創業者拿出全副精神，一心辦事忙得不得開交，就一沒有興味，二沒有工夫，把辦事情形記錄下來啦。

這種失錯是缺憾，爲預防這種缺憾計，他就拿起筆來，從頭到底，分門別類地，記着他所搜集的，有關本題的一切。他說：「大部份的事情，是我親手經過的，或者接到過極準確的報告的；因此，如果天主聖意喜歡教那麼微小的一顆種籽，發育滋長，使他的聖教會，得到些好收穫，那麼比我們後來的虔誠的信友們，便能知道，應該從那裏起始，感謝天主的大恩給人講述天主怎樣在這最近幾世紀中，在相距遼遠的民衆間顯示過許多玄妙的奇蹟。假使天主不許一開花就結果，那麼我至少已經給後來的讀者們留下了一種證據，使後人知道我們耶穌會諸同仁，爲了要打開這條道路，在開闢這崎嶇的山林，創業的時候，怎樣受盡了一切的艱難和困苦。」

而且利公在這篇記載中還避免着一切文章的雕琢，他說：「既然大家不能懷疑這件引導人靈，使他們皈依天主正教的大事業，完全出於天主親自料理的結果，這件事我們講述起來，就絕對不必用修飾的詞令。對熱心敬主的人們講述種種事情，惟有說得準準確確的老實話，才可以使他們最稱心最悅耳。」利瑪竇神父所承諾的，他果然實踐了。他的寫作，一點也不矯飾，也看不出經過甚麼雕琢，具有一種自然美，和一種不可抗的雅韻，他用明體的文調將各種對象予以闡明，繪

上彩色，使他們生動活躍。他在遍遊中國內地，研究各處風土人情，間來再加深思，熟慮之後，便已獲得了一種稀有的學問。能把那麼遼遠的境界中所有這一切情形，放在我們眼簾前；他的記述，也就成了活躍的大觀，使讀者感覺興趣。他一生忙碌，當然沒有餘暇來修飾他的文字，却有一種善於想像的天才，這種天才，不但為詩人所需要，史家也同樣少不得，少了就什麼也看不上。他有透闢的精神，辦事必求澈底；但他憑這種精神去辦事，儘管輕描淡寫，却總諸事繁榮，他的本性傾向慈善，可是他對待個人却力求一乘至公不肯過分寬縱。

末了，作者得聲明這部史記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在講天主吸引他靈魂使他歸向自己的神工；天主怎樣但憑溫柔的寵愛，全不用暴烈的方法，先安排他度極卑賤，極窮乏，極冷靜的生活，然後加給他神力，使他懷着堅忍謙下之心，去幹那艱而巨的傳教大事業，這種事業，在許多人看來，簡直是一種妄想，他在華度了三十年超人的辛苦生活，却仍不失雍容閒雅的风度，一路有人慕名款接，願作主人，還有許多孔門儒士，也對他深表景仰。

作者寫這部傳記時，效法這位典型人物，依照最嚴格的標準，處處留心，力求翔實，因此，字裏行間，不得不審慎推敲，讀者如果感覺深切的趣味，作者便已獲得報酬了。這部書中描寫的地方不多，在結構的實際上所需的描寫也很少；精神方面的紀錄，除利公自己的記敘外，也不多，或者，竟沒有。但是到處可以見得到隨機應變的智謀，洞明事理的光照，內心的平衡，以及這倫理的和基多信徒的美德意識，這種意識給利瑪竇司鐸的一生常保持着一種氛圍，出了這氛圍以外，他的生活，就會變成一種難以索解的隱謎，大家也就可以各自隨着一時的衝動來解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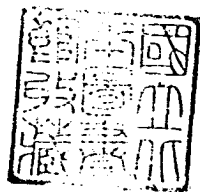
（註一）利瑪竇傳卷一，一至二頁，作者逐譯這一節原文，根據李萬蒲（Riquelme）的著作一至三頁，不過已經更加刪節了。

卷一 上編

在中國社會的邊緣上

利瑪竇司鐸在他所著的「中華雜紀」中，描寫儒釋道三教所有的各種特色，怎樣冶於一爐，成為中國民衆的宗教之後，便稍稍提高了他的嗓子，拉起他文章的腔調，來描寫基多的教會，怎樣傳到了這中華帝國。（註一）他說：我們耶穌會同人依着成立本會的宗旨，梯山航海，到這麼遼遠的地方來，做耶穌的勇兵，替他上陣作戰，來征討這崇拜偶像的中國的三頭巨魔，好援救無數不幸的人靈，脫於永禍；這個巨魔，比那雷納的三頭烟突兒（*Hyale*）還要嚇人。三千年來他憑着專制淫威，壓迫萬萬生靈墮下地獄，陷入萬丈深淵，從沒有人加以禁阻。我們耶穌會同人，依靠天主的仁慈，和所許的恩佑，不怕危機四伏，障礙重重，不許他們走進這閉關自守，海禁森嚴，還充滿着這麼許多人掩護自己短處的國家。其實，這是徒然！凡是耶穌的神國，聖十字架的兵器所到之處，世界上，或是地獄裏，有甚麼武力能够抵抗呢？

對於一個文藝復興時代的薛舍羅派人，這種稍爲過分一點的文字上的鋪張揚厲，是要請大家加以原諒的。他的拉丁文譯本，和法文的譯者，給他作品加上的標題：「耶穌會諸鐸對於中國基多教義的征討史」（註二）還要誇張咧。這「征討」兩字如果在人家眼光裏，並不把這種戰爭的比喻，看作一種武力侵略，而作爲和平自由的同化，那麼，這句話可



算是正當的，即使用「征服」（征服人心）二字也不算過分誇張。無論如何，我們一讀到開頭幾句話，便知道利瑪竇神父素來傾向着的寬縱態度，一點也沒牽動他去苟同他人的意見，恰是相反，他却毅然決然追隨着他的先輩聖沙勿略的芳踪，邁步前進。

他講：（註三）「發動這精神戰爭，開始建立神國的第一人，便是本會的真福方濟各沙勿略神父，他把天主教傳入印度和摩六甲羣島，建立了教會之後，最後就到日本去宣化開教，一如人們對他宗徒精神所有的期望而獲得成功……這位真福神父，深知日本所有一切的法律和禮教，都從中國得來，便想他如果能先使中國歸化，那麼不但給這聲名文物之邦的倍大中華，做了一件好事，而且這一下，也就容易使日本皈依了，真是一舉兩得的事……無奈這中華帝國獲罪上主，不合得到這麼一位大宗徒，使他棄邪歸正的主動人，而且這位真福神父一生辛勤傳教建立了許多神聖的大事業，這當兒，他去世升天，去領受賞報的時候，也已來到了；因此，他所有來華傳教的一切計劃，完全沒有實現。然而我們相信，假使他在世時候，曾求天主賜他能進中國，却沒有得到這個恩典，他到了天堂上，想必也為同會諸人，求過這個恩典，而得到了；但看他逝世三十年後，耶穌會諸鐸出乎一切人的意料之外，竟走進中國門戶，深入了中國內地。」接着利公便寫幾節，敘述幾個在他以前的先進人物。他說「沙勿略以後，又來了幾個給天主服務有勇氣的人，想設法走進中國內地，特別是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的幾位傳教士，有幾個是從東印度（臥亞和摩拉加）方面來，有幾個是取道西印度（墨西哥和斐列濱羣島）來的，但是那些專心從事傳教事業，把這種事業，當做真福沙勿略留下的遺產一般看待的人，便是耶穌會的諸位司鐸。他們帶着滿懷神火，和葡萄牙商人結伴而來，來了以後，又持着絕大恆心，在中國門戶的通商口岸上，造下了住院

一輩子住着。

「這種冒險事業經過了節節阻撓之後，種種障礙，一天比一天增加着，已到了半絕望的地步；那時，從衰萎中，使他復趨興盛，從瀕於滅亡的環境中使他回復生氣，這位着手成春的大人物便是在華耶穌會會長范禮安司鐸，」通常稱他 *Vaiguani* 他的親筆簽名是這樣，（註伍）「他決計派幾位司鐸在澳門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庶幾有一天他們找到了門路，走進內地，就可以有備無虞。他打定了主意，就不顧幾個已經上了年紀，有過閱歷，以為這種企圖在中國是萬難實現的司鐸們，表示反對，寫信給駐臥亞的省會長，申請派遣一位適當的神父，到澳門來，擔負這種任務，」他手下這種人才一個也沒有，臥亞的省會長，就給他派來了一位羅明堅神父。（*P. Michel Ruffieri*）

羅神父來了以後，還得襄助澳門的諸鐸，給葡萄牙信友們施行聖事，這就使他本身的任務，就是研究中國語言文字。這件要事大受妨礙。此外，他獨自一人，不能兼做澳門廣州兩處的事務，讀書也不容易專心。那時范會長還在日本視察，得到了報告以後，便設法把利瑪竇神父從印度召來。」

利公這幾句話，就直捷爽快的，把自己來華傳教的任務，介紹給讀者了。從此以後，他的記述，便是現着我們所稱爲「澈底澄清」始終一貫的特徵，是一種既不得謂之誇大，也不當目爲含混的衷誠，一種率真淳樸，和意旨正直，見不得人家口是心非，或是言詞閃爍，好像眼睛裏安不得一點飛塵一樣。自此以後，他絕不再談政治，不提私人利益，……一切悉聽天主上智安排，擯去一切對於肉身世務的關心，殫精竭力，盡務擴張天主的神國。當他徜徉於「中國社會的邊緣」的時候，他要忍受，而且還要樂受他來華後那極沈沈的最先幾年，中，所有一切的艱難困苦；不這樣，當然不行哪！

(註一) 利傳一冊一〇三頁；這裏我們照錄李萬浦(Ruanebourg)的舊譯文，不過把古書法改作現代書法罷了。

(註二) 據金尼各司鐸(P. Trigault)說：這題目原文是“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 Societate Jesu.”
利瑪竇神父只在他手抄本的書面上寫着：“耶穌瑪利亞”聖號 JHS MARIA 走進關口“De l'entrée.” “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esu e Christianita nella Cina”(利傳一冊六十九章)。

(註三) 利傳一冊一〇三至一〇五頁；不消說得，利公只在德齊辣和范禮安兩司鐸，清楚豐富的傳說中，認識了沙勿畧。那時兼多 Mendez Pinto 和其他諸鐸的正傳，還沒有出現（司古哈目著「沙勿畧方濟各傳」 Schurhammer, Xaveriusfor schunung) 四三頁以後。

(註四) 利傳一冊，一〇五至一〇六頁；這該加入奧斯定的會士們。關於這些記述。可參閱作者另著：“傳教士”一〇三至一〇六頁。又「斐列濱書局」四至三三頁。

(註五) 德禮賢著(D'Elia, Clero) 一三三頁註一。

第一章 青年時代的回憶

我們在蒙宜郎培 (Montalembert) 的「西方隱修士」中，讀到他以熱烈柔綿的情緒，描寫「隱修院裏的友愛」的幾頁，(註一)不禁悠然神往。這是一種取之不竭的親愛的衷情，一種內心的欣躍，足使那耐心稽查既往生活的修道之士，爲之心懷嚮慕，使他枯寂的餘生復得生機。一般爲了天主，爲了聖教會，甘心自願離別家鄉，拋棄了最親愛的父母親友，遠涉重洋，傳教異國的教士們，所有寫給他們父母親友們的函牘，也似一束可喜可愛的鮮花，使受書人歡欣雀躍。

我們讀了利瑪竇神父的函牘彙編，只覺得他青年時代的情景，躍然紙上，好像在體貼入微的親愛氛圍中，微微陶醉了一般，每年一次，或是兩次，利公握管作書，那時候，他便有幾分光陰，一心嚮往着久別的親友。(註二)一天他對人說道：(註三)「你且想想，我們在這地方，正如自願被流放了一般，不但遠離了和我們晨夕相共的父母，兄弟和親戚們，還拋下了奉教的同胞，和我們的祖國；有時我們居住的地方十年二十年，竟見不到一個歐洲人。」

這些書信，可惜有許多竟中途遺失了！一封信即使同時寄兩份，一份取道葡屬東印度（這是第一路）另一份取道斐利濱羣島，（這是第二路）却也徒然，往往或因疏忽，或因遇險，或遭盜劫，而致中途遺失的次數太多了，「這班海盜中尤其是那自稱英國人的盜匪，專門劫掠從印度裝貨回歐的船隻，（註四）」而且要得到一封回信，得經過多大耽擱啊！一五九五那一年，利公終接到一封回信了；可是這封回信是一五九三年寄出的，說他一五八六年所寫的一封信剛才接到了，又一五九五那一年中，他得到了一個虛假的惡消息，便相信他的父親已經去世了，後來經過了十一年以外，才獲悉

他的父親是到了一六〇四年才亡故的。(註五)

再則這些最寶貴的音訊，一到了他的手裏，使他對於往事的記憶，突然在他腦海中復活起來；那時候，他的心裏，要覺得多麼甘飴，多麼欣慰啊！這當兒，他先要回想到他父母方面的一羣「我的家裏」(Mia Casa)，他家裏開着一家配藥和製藥的藥房(Spetaria)，這一家從前是從貝加梅(Berame)搬來的。(註六)隨後他又想到他的一個好朋友，高斯大神父(P. Costa)，請他來代替自己。(註七)他的母親盎奇與勒利氏(Giovanna Angiolini)在煩惱中過着日子，大概因為她有許多孩子，費了一世的心血，照料他們，所以已經有點衰老了，她却是「真正有德行」對於耶穌會，特別有誠心，那好姑母辣利亞(Laria)也不住予以贊助。(註八)利瑪竇曾有關於這位姑母的記載，說：「我一起起我小時候，她待我怎樣慈愛，就總忘不了她許多的好處；她教訓過我好幾時，像第二母親一樣，我受她多大的恩惠啊！」(註九)他的父親利喬伐尼(Giovanni Ricci)利公稱他為「我十分榮譽的父親」，是一個有良好意識的人，商業以外，還經營着在羅馬教宗轄境內，和其他各處的產業。(註十)當他將近去世的時候，這位在華傳教的耶穌會司鐸，曾寫信給他，說明關於大黃、葡萄酒，和天鵝絨等，這些商品的情形，因而乘機婉轉勸告他，一番說：「我從母親方面聽說她時常到我們的聖堂裏，不知道你是否也能是這樣；照我看來，現在正是接近天主的時候了，這條路却已不遠了……要是吾主願意，希望我們大家在天堂相見吧！……我不知道你要在甚麼地方接到這封信，在天堂上呢，還是在世界上。」(註十一)

真是巧合之至——後來大家才明白是出於天主上智的安排，而歡欣踴躍。(註十二)當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三日的夜間)，聖沙勿畧在那人跡不到的上川島上逝世之後，「這位蒙主特選，藉以完成那位東洋宗徒沙勿畧方濟

各未竟宏願的人，「便在這一年上，（十月六日）在真正教中心的社會中；誕生入世，大概小瑪竇是一家的長子，這家庭中共計有七個兒子，一個女兒。（註十三）據他後來的記述：「兄弟間的友愛，非但不少泯滅，而且「與日俱增。」他以後常和那做代權司鐸的安多納瑪利（Antoine-Marie）和家長霍來司（Horace）保持通信的聯繫，他的兄弟們並不富有；（註十四）他母親去世以後，（一五九五年）尤其是在他父親亡故以後，他一定要「大家把各人所做的事，和各人的起居動靜，長篇累牘的寫出來，讓我知道活得好過不好過，好教我放心，憑「我」不中用的祈禱幫助他們。（註十五）在他們左右的人物，有妹倩克利米納拉（Criminella）嬌母維奧朗德（Violante）叔父德倫濟烏斯（Irenthus）表兄弟們和素長來往的朋友們，如熱羅尼莫羅薛濤（Gerôme Lucido）才洛尼米斯（Gerominis）在家的加米羅（Camillo）和馬利奧（Mario）比愛尼各老（Pieri Nicolo）薩物羅（Savello）羅克齊亞（Lucrezia）岡德薩（Contessa）他「願意吾主保佑你們，勿遭災難。」」（註十六）

這些人都是那有趣味的馬賽拉宜（Macerata）小邦的居民；他在寫信給他們的時候，也時常要問起本鄉的新聞：「你們再寫些家鄉的情形告訴我，要寫得再詳細一點，因為我總不能把他忘掉呢！」他們把這地方管得很好，這地方的人們都很喜歡那蘇會。這座城市又出了那麼許多替吾主做事的好人。（註十七）馬賽拉宜這地方，屬於邊防省份；這邊區各省份。以前曾經用兵爭奪，爭得很為激烈，境內碧綠色的河流，依着地勢的高低，注入那控制盎公納（Ancone）的亞特利亞的克海。盎公納原是一座陶利安人（Dorien）的古城；這希臘語的名稱，是因他位置在那半島的一角上而起的。那裏有許多城市，在狹窄的山脊上，或是在那裏經過河水的沖蝕，剝落而隔絕的山頭上掩映着，掩蔽得只看見頂尖，假使不曉得

別處還有地方，竟會相信每一個山頂上，只有圓頂和塔樓，像頭頂上戴着冠冕一樣。田野間有葡萄園，有橄欖園，那裏便是烏爾皮諾（Urbino）名勝地，他最大的光榮，便因他是大畫家拉斐爾（Raphael）和那以精製彩陶得名的大藝術家貝薩羅（Beato）的誕生地。此外還有許多地方是藝術的中心。當古羅馬時代馬賽拉（Maceria）就起造了一座城，「海爾伐萊西那」（Felva recina）後來這座城坍塌了，就用他的遺趾來給這地方題名叫馬賽利埃斯（Maceria）或稱馬賽拉。利瑪竇很小的時候，就見慣了各種偉大建築物，不但是古代典型的建築，而且是峨特時代末葉，以至文藝復興開始代的建築，比方十四世紀中葉的高圍牆，商人們精緻的別墅，富麗的王宮，和「聖瑪利亞諸童貞之后」莊嚴的教堂，這是於一五五〇年依照伯拉芒德（Bramante）的圖樣而建造的。

然而在利公眼裏看來，這些美麗的天然風景，富饒的物產，歷史上的勝蹟，藝術上的光輝，都給奉教信衆所目爲奇異的一個聖蹟，遮蔽得黯淡無光！這就是一聖母宮室靈遷的聖蹟；就是由天神們搬到這裏來的納匝肋聖家的房屋。依據歷代傳說，天神們把他從那一個海岬，搬過這一個海岬，直搬到這桂樹（又叫落來得樹）〔Laurium〕的林子裏；這大名鼎鼎的勞萊得（Loric）聖地，便是因此而得名，我們但看利公後來的記載，就可知了。（註十八）他說：「我在華人中有時竟向人誇耀我出身的地方，便是吾主基多把他和他母親在世時候所住的屋子，經過了好幾千里路，才搬到的地方。」這裏我們該描寫一下，青年時代的利公，參加朝聖隊，去過大瞻禮的情形。朝聖信友們，都從各處，大小道路，結隊而來，大家手裏拿着念珠，一路走，一路唱着禱文；婦孺們坐大車——因爲大家要參加這可愛的典禮，一個也不捨得留在家裏——男子們都步行着，大家一齊念着經，或者唱着聖歌，念了再念，唱了再唱。（註十九）

這個將來要到中國來做傳教士的孩子，便在這種習慣而又動人的環境中長大起來。他很早就在一位有德的司鐸尼古拉彭啟萬格尼神父（P. Nicolas Banchveni）開辦的一個小學校裏攻讀初步文法。這位神父便是利公後來所說的：「我們的尼古拉神父」（註二十）他「一心」聽從這位神父的教導，說他：「憑着很大的愛德教導我們，使我們走上現在所走的道路；那時我們正當最幼稚最危險的年紀。」但是這小學生剛到七歲，就得離開他的師傅，便在那時候，（一五五九年十一月五日）彭神父就去進耶穌會了。他等了約有一年半，直等一五六一年五月，這小鎮的居民，才一致議決，請耶穌會神父來開辦一個公學，這當兒有人解說道：「他們怕我們偷他們的兒子咧！」（註二十一）可是到後來，馬賽拉人，却似乎總沒有後悔過，把這許多小寶貝，交代給耶穌會士們，利瑪竇便是其中之一！

就耶穌會方面說，一開首就羅致了這許多人，這真是多大的勝利啊！這些人物中有孟契納利（Mancinelli）後來以善於講道著名，（註二十二）有篤斯加納利（Toscarelli）就是利公所稱爲「我的小兄弟」的那一位，他是一個助理修士，沒有晉鐸；到了遠東，先協助范禮安會長辦事，後來做了澳門小學校主任教師，利公每年有信給他，（註二十三）有比亞尼司鐸（P. Bianchi）後來做了日本的傳教士，他也和利公常年通信，（註二十四）有若翰保弟斯大費羅（J. B. Ferro）他是一個小昆弟，後來他在秘魯傳教，利公却很願意他到中國來。（註二十五）還有那阿刺萊奧尼弟兄兩位司鐸（Aleoni）他們後來會接到過利公從北京寄發的這封「華翰」，「我同時寫給你們兩位，因爲人的本性既不因肉身父母的不同，而使你們相分離，天主的聖寵，也不因靈魂上母親的各別，而使你們相隔絕；而且你們倆既然只消一個人作覆就够，你們也就可以因此得到了一點便宜。」（註二十六）

可是那後來管理業務在百忙中，仍和利公書信往來，始終如一的老同學，便是齊洛拉莫高斯大（Girolamo Costa）那人：這當兒，他已經和利公在彭老師教授的課堂裏，同桌讀書了。利公會記：「我在中國每覺得寂寞的時候，就想起我歐洲的好朋友和弟兄們來啦！我好幾次一心想念他們——那時，我覺得發生了一種大希望，希望我身後吾主天主要賜給我大大的安慰，因為今生他要我捨棄這許多聖善的人，不能和他們做甘飴的伴侶哪……你寄給我的幾封信，我從頭到尾一一讀着，感極下淚；因為我只覺書中充滿着你親愛的心情，而我以為我們除非將來到了天堂門，彼此總不得相見！願天主勿因我的罪過，而關閉這扇門，不讓我進去……你的來信，我總再三誦讀着，越讀越高興，在這些書信裏，總有新消息發現……我一再讀你的書信，好把我祖國的意大利文稍為溫習一下。我在這麼遼遠的地方，經過了許多年歲之後重新找到了一種那麼偉大的親愛馳摯的衷情；據我看來，這種情緒，如果不是在我們的救贖恩主耶穌的胸膛裏生着根，決不能這樣持久，這樣滋長；好天主要我擔任這麼許多的工作，當我工作的時候，這種觀念，實在給我加上了不小的助力。（註二十七）

講到利公在馬賽拉讀書的情形，我們只得到一點模糊影響的考據：「他在各種人事學科上，和文藝上，是成功的；」他進耶穌會公學讀書後，就想修道，却有些懷疑莫決；進耶穌會修道呢？還是進方濟各會？（註二十八）他的父親最關心着一家的前途，便正告他，說他年紀太輕，不該作這樣重大的決定。他的父親在羅馬有許多親戚朋友，和樞機主教們接近，所以教兒子到羅馬去攻法律，也許心裏希望他將來在教會的世界中，輝煌騰達，做一番大事業。

這樣到了一五六八年十月或是十一月，正當十六歲的時候，利公就離開了這從小長大很可愛的邊防省區的地帶，

似乎從此一去不回来了。(註二十九)他到這公教首都的時候，正當在那多明我會的教宗聖庇護五世，竭力督促之下，履行公教反進化運動（也有人稱爲反革新運動）而在謹嚴的外觀中造成了藝術和科學的復新；憑着這種謹嚴的外表裝飾，耶穌的教會就貢獻給我們多少有點物質化的影像——那第一幀耶穌像，據說：是出於彌額爾總領天神的啟示，由那建築術的大理論家維諾爾（Vincolo）付諸實現。（註三十）對於法學的研究，顯然是積極的研究，而且屬於實際性質，對於羅馬人的天才適稱得足以令人驚羨的，却似乎不足以誘致這個青年學生；他的興味，還是趨向着他從前的老師們，因爲他們那裏，因着聖依納爵十個同志中的幾位，尤其是那得到直接傳授，第一代承繼人的心傳，還保存着這位耶穌會會祖（一五五六年逝世）早已稱榮的傳授，那時聖依納爵創辦的兩大學府，一個是日爾曼學院（Collège Germanique）另一個是那雄視全歐的羅馬學院（Collège Romain）和所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巨額的生員；這兩學府已成爲好學青年所屬目的兩大中心，可是那比較謹慎，吸力却還要深入人心的，便是那聖安德肋初學院，這當兒，聖母升天瞻禮上一天（一五六八年八月十四日）這初學院裏恰有一個波蘭貴族青年聖達尼老斯加進院還不到兩月，便在聖母升天瞻禮上一天，即一五六八年八月十四日去世。這個學生，真正是一位有形天神；當時一般修院生說，耶穌會對於世俗事務，管得太多，到後來，耶穌會士們，却喜歡教這學生恭敬這位天神般的聖人。那時爲要表示聖達尼老短促的一生行實起見，就立下一種藝術上的心傳，每當繪畫聖人遺像時，總在他額角周圍畫着淺藍色的火燄，畫他正要從聖手裏接過小耶穌去，或者畫一位天神引導他從維也納到了羅馬，由耶穌會第三任總會長聖方濟各玻爾日亞收他入會。再後來名畫家勒各羅斯（Le Gros）依着當代的作風，畫他臨終的光景，在他所住的一間小房子裏，直挺挺躺在病榻上，一隻手擎着苦像，一隻手捻

着一楨聖母像，他純潔的靈魂，正在漸漸脫離他的軀殼。畫他的臉色慘白，像白大理石，他所穿外衣的顏色，像黑大理石，他臥榻的色彩，像黃大理石。

其他的藝術作品，如包梅朗濟奧（Pomerancio）在日爾曼公學聖女亞保利納（Sainte Apollinaire）經堂裏，示人以野蠻行動的壁畫，從新表現出爲道致命的跡象。但是那把新成立的耶穌會思想表現得最明顯的作品，却在聖安德肋修院的初學院裏做裝飾，（這幅畫自一五六九年六月七日起，已搬到基利那宮（Quirina）的懸壁上，這座初學院，曾經李旭謀（P. Richome）在他所著的「精神畫史」中，描寫得很有聲色。那裏有廣大的花園，種着滿園的奇花異卉，設置着許多噴水泉，和許多養蜂的蜂筒；初學院的兩端，各有一座聖堂：一座是聖安德肋堂，曾經貝爾寧（Berni）改造過，或爲我們如今所習見的，很好看的橢圓形聖殿；另一座是聖維宜爾（S. Vital）堂，這却和前者相反，沒有改動過，在直達大門的廊廡下，抬頭便見范萊列亞尼司鐸（P. Valerian）所設計的廊柱頭上的裝飾，是用種種酷刑的刑具做成的：十字架，車盤，刑柱，鐵刺梳，燃着的火把，滾油鍋，幾根皮條，頭上包鉛的鞭子，縛在腳上的鐵球或是石球，燒紅了的薄刃。我們一進門眼睛裏所接觸的，無非是諸般酷刑虐苦。在祭台邊，我們還可以看見兩大幅壁畫，是齊盎貝利（Campelli）的作品，表示聖維宜爾的行實。另外還有幾幅畫着聖維宜爾的兩個兒子，聖日爾凡（Gervais）和聖普洛單（Protas）先受鞭笞，後斬首。這些紀念物的印像，就跟利瑪竇到了中國啦！在耳堂上面圓頂上，畫着耶穌背負着十字架，表現他正是教人受苦受難捐軀殞命的典型。李旭謀神父又描寫着聖堂正屋兩邊的畫景，這便是我們如今所見到的幾幅致命聖人的壁畫，不過以後已經那亞爾賓（Arpin）騎士勒迦斯伯爾（Le Guaspre）和卜曹修士（F. Pozzo）畧加修飾過了。勒氏把這些壁畫，潤飾得十分精美，

幾乎失却本來面目；大家說這位畫師是極力想借鄉村風景，晴明爽朗的自然美，來使人忘却野蠻民族的凶惡的，這就透露了十六世紀耶穌會士的思想，就是聽得了真亞齊物多（Bx. Inace d'Azvedo）和他四十位同伴的慘死（一五七〇年七月十五日），便大發熱情，只落得一陣歡呼的基多勇兵的思想。聖安德修院初學修士們的休息室裏，受難的畫景還要多；李旭謀神父爲初學修士們寫這部作品，對他們宣講，書中結尾幾句話是這樣：「我最親愛的弟子們，這些都是從一五四九年到一六〇六年間，你們爲義捐軀的弟兄們的紀事畫，不但是爲尊敬他們，也是爲使你們知所矜式。」

後來利公在相近三年中，會顯出他的不耐，急急要加入這種志願軍，做致命者的候補人，想到一個善會裏去報名。這時候，這種善會有許多，已由值會諸司鐸加以改組了，改組的目的，不但在用各種方法使會友們勤修諸德，熱心奉事耶穌（尤其是習慣按時行告解領聖體的方法），也很注重會友們文學和科學上的進步。在日耳曼族公學裏，這種善會已有五個成立了，每天晚上，大家唱着「申爾福天上之母皇」這遍經，來恭敬聖母，和着很好的音樂，有好嗓音，也有好樂器，「這正是聖斐理伯納利的唱經班，和巴勒斯特利那（Palestina）多重奏樂隊的黃金時代。在將近一五六九年終時，那第一善會聖母領報會，竟發達到不能不分開作爲兩組：小組會專收十八歲以下的青年學生。利公便是這小組會最先諸會友之一，每逢瞻禮七日，參加集會，在小堂中同唱聖母禱文，以及亞物瑪利亞和其他譜曲類似的經文。一到了一五七〇年，他升入大組會；這大組會歸與格斯布樞機（Card. d'Angsbours）主持領導，那時巴登尼亞（Parthania）通儒所有文藝上和科學上的慶節，都由這大組會發起舉行。（註三十一）

還有一個最後的特點，值得我們提一提，因爲這個特點，在利公的想像上和感覺上，都留着深刻的印象，幾時我們尚

友古人，把他們的著作，還迴諷誦，愛不釋手，日子久了，就會悠然而動遐思，最甜蜜的梦想，便是要步武後塵，看一看那書中歷史，曾經展開過的勝地，憑吊一下古人留下的遺蹟。當時大家提倡着人文主義（Humanisme），因此，瞻仰古羅馬廢墟的風氣，也就應運而興，第一個喜歡憑吊羅馬舊地，對着他的遺跡深深感覺有極大魄力的人，便是那位貝屈拉克（Petraque）。所以這個馬賽拉宜的青年子弟，一到羅瑪，自然不免要發和若亞敬斐蘭（Joachim du Bellay）。拉丁詩中所述一般的許多感想，而同樣醉心啦！且看這裏第一是那滔滔黃水的蒂伯爾河，和那傾圮的古城，蜿蜒曲折，直伸到田野間，這個都市，仍保著威嚴煥赫的古代遺風。一大堆建築物，籠罩着歷代教宗的宮廷，聖伯多祿大堂，那時尙未完工，却已昭告普世，這是意大利的大觀。那華諦岡宮的畫棟雕樑，崇樓傑閣，直伸到意王的倍爾凡殿（Belvedere）還有那莊嚴雄偉的亞特利安陵（Tombeau d'Adrien），幾座環拱形的大橋，愛賽味古的（Aqua virgo）噴泉，亞格里巴（Agrippa）的古萬神廟，宮殿教堂，多不勝計。最後幾處「塵封」的古蹟，如凱司濟烏斯（Cestius）的金字塔，古代人獸鬪場，高列塞巨大的壁龕，以及那荒僻冷落，人跡不到的石礦，（那時，人們還不知道伽大公地窟）棘叢中的斷垣殘壁，深埋入土的寺院廟宇，這都是古羅瑪的奇觀。

在利公看來，也和其他許多學生們看來一般，聖母領報會，正是「初學院的對面房間。」果然，一五七一年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瞻禮，這個青年學生，終於走到聖安德肋初學院那邊去，敲那寂靜無聲修院的門了。他去的時候，只帶着極簡樸的行裝，他的皮篋裏，除了一件舊呢大衣，四件襯衫，三條手帕，和一塊飯布之外，帶放着三本書，一本是弗勞魯斯（Florus）的筆記，一本邦大龍納（Pantaleone）的拉丁文法，另一部却是「羅瑪的奇觀」彙編（Mirabilia Urbis Romae）。

(註三十二)那時，耶穌會總會長，聖方濟各波爾日，亞正在西班牙旅行，總會長職務，由那宜爾司鐸(P. Nadal)暫行代理，所以利公進會時，初學院院長，就以那宜爾代總會長名義，予以收納，這位院長的名字，叫法比五法比依(Fabius de Fabis)在共和政制的古羅馬年鑑中，這個姓氏，是極有名的。據說：利公進會之後，就寫信到馬賽拉宜稟告這件事。他的好父親一接到信，就立刻動身，趕到羅馬去阻止他。但是一到了多朗蒂諾(Ostia)當晚，就寒熱劇作，不得不中止前行。他覺得這場病，是天主聖意的表示，就此放棄了他原有的一切計劃，不再教兒子去趕世俗上的前程了。(註三十三)

這樣，利公努力應承天主的聖召，終於克勝困難，如願以償之後，便可以效法聖達尼老在法比依神父富有心得的指導下，平平安安去做聖依納爵所規定的「避靜神工」了。(註三十四)至於他此後一年中初學的情形，我們只可找到他後來在韶州備受艱苦的時候，(一五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所記的一點愁悶的回憶。那時，他曾寫信給他初學時代的老院長(註三十五)說：「我的腦海中常記憶着幼年時代的種種情景，總比其他的事情記得更清。因此我時常想起我進會後最初幾年中的事情，這些事也在我心坎裏種下了最深的根，尤其是神父的愛德，扶助我，指導我，走上修德行的道路。我對神父說一句老實話，自從我到了這裏，和這些教外人在一起以來，到如今已有許多年了，我在這許多歲月中，所有一切的遭遇，如果我完全不記得，天主從我父母手裏領出來了以後，所訓示我的一切，又使我看出神修生活是山嶽般艱巨，那麼說不定我現在的處境，還要危險得多咧！」這位法比依神父，當過初學院教師，後來便做了羅馬學院的院長，便在這時候，他爲利公請准派往外國傳教。這位偉大人物，後來又升任了省會長，他對於這一被扔到天涯地角，在異教人中心生活的，他的孤苦小弟子之一，所予的悉心照料，在隻身萬里的利教士看來，再沒有更可銘感的了。後來利公到了中國，幾

時有幸遇到了意大利籍的耶穌會同志，他鄉遇故，便覺格外喜歡，往往遊散時，恍如置身羅馬，談談說說，總要談到法比依神父身上。（註三十六）

經過了十三個月初學時期之後，利公宣發初願（一五七二年九月十五日），接着，便依着當時的習慣，立即升入羅馬學院（九月十七日）。那時，羅馬學院的建築湫隘，所以過不多時，便動了教宗額我略十三世的慈心。耶穌會青年修士們，在這裏讀書的並不多，可是學生們的國籍，却很複雜，一五七二這一年，羅馬學院的學員，共計二十六名，其中非意籍的有十名。（註三十七）利公入學後，耶穌會會長上還得把他托付給一位神父，特別留意照管他，約歷一年光景。這位神父便是後來因着就任了耶穌會第五任總會長而獲享盛名的克勞特亞瓜維伐氏（Claude Aquaviva）。他的名字，後來在中國傳教士們的往來函牘中，要屢屢提及，而且提及時，對他表示特別尊敬。（註三十八）此後幾年中，利公除了兩次到過弗勞倫司（Florence）小住數天之外，總沒有離開過羅馬學院（註三十九）。這上主祝福的學府，真是利公的一塊地，「在他從東亞寄發的書信中，可以看到許多提及羅馬學院的司鐸修士們的地方，他曾自認說：「懷念他們，乃是我所有獻壽善工中的一種。」（註四十）

當他開始攻讀哲學的時候，便在福奈理司鐸（P. Marin de Fornari）的指導下，溫理他夙已嫻習的希臘文和拉丁文。（註四十一）那時，正當依據基多教義的啓迪競尚經典主義的時代，笈史（le Tasse）所刊佈的「日露敬冷考」第一編已於一五七五年中葉刊行。屬於歷史一方面的著作，經祢夏定（Guichardin）倡導於前，蒂德利物（Tie-Live）追隨於後，就產生了有價值的作品。（註四十二）

可是在造就一個耶穌會修士的時候，各種經典性質的人文科學，還得讓士林學派哲學佔先一步。當十六世紀的末葉，士林派哲學，很受人非難，其中如巴屈列齊（Petrini）和拉莫斯（Ramus）輩，攻擊得尤其激烈，可是士林派學者，仍舊奉亞列斯多德（Aristotele）的哲學爲圭臬，對於伯拉圖哲學，士林派特別認識他的政治理論（註四十三），却攆絕那喬大機勃呂諾（Giordano Bruno）和桑采芝（François Sanchez）一類人物所主張的偏激的伯拉圖主義；便是對於一般詮解亞列斯多德學說的評論家也竭力摒棄一切帶有阿刺伯哲學家亞物羅派唯物色彩（Averroisme）的論調。（註四十四）然而士林派詮解起希臘思想來，總要設法把所有的謬點逐步說明；這是除了這新興學派的青年評論家以外，誰也沒有下過更嚴厲批評的。他們力求刪除那帶着稚氣的煩瑣的枝節，使所有哲學原理的論據，開發得更覺剝切動人。無論對於形上學的研究，或是對於一種學案的說明，在一般論辯上，或是在明白解決一個疑難問題的時候，給正反兩面作強有力的爭辯，表現他們的辯才無礙，他們都能佔着足以控制一切的地位。他們也極注重「爭論」，或者說是形式上的討論，認爲磨礪精神，研究涵養功夫，養成靈敏腦筋，好和人角逐智力的主要方法。因此，一五七三年，在羅馬做助教的葡籍司鐸，方賽加（Fonseca）神父所著的一部「哲學通典」（Institutiones Logicae）就成了耶穌會的法典（註四十五）。

這幾年裏在耶穌會的全面演進上，又經歷了一個決定的關頭。這當兒，聖方濟各玻爾日亞從西班牙公畢回來，不久就逝世了。比籍耶穌會士愛物拉梅古里昂氏（Everard Mercurian）便當選繼任了總會長，（一五七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他就任後，立即貫注他的全部精力，使聖依納爵手創修會的各種規律，依據經驗，規定準確限度，一一付諸實行。他認真辦理的結果，第一獲益的，便是東亞各屬的傳教機關，因爲當選舉他做總會長的議會，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梅總會長便已派

定了范禮安司鐸做教務視察員，委他切實組織印度日本和中國的傳教機關。（註四十六）於是羅瑪學院——據蒙戴斯（Montaigne）說來，是應為「公教修院」的學府的，——不久就引起了他的特別注意。他整整費了四十天的光陰來考察。他召集蘭院修生，一個個親自考問他的心境，他對全體修生，作公開訓話，勉勵他們特別注意五點：（一）要有堅定的意志，始終貫徹着自己的任務，（二）持慷慨的心情，以應付一切的障礙，（三）要有顯著的服從，（四）完全捨棄一切，（五）尤其是要實行昆季的愛德。（註四十七）大概利公對於這些訓誡，最注重而身體力行的，便是最後一點了，後來據他自己說，他在華時，對於外國人，特別留心照料。（註四十八）比方那葡萄牙人魏格（Martel de Vega）（註四十九）或者那西班牙人齊孟楠（Ximenez）（註五十）曾在他的函牘中，提及過他們的名字；對於他的同會初學修士，（註五十一）或是讀書修士們，（註五十二）比方巴肯南（Lello Pasaroni）他招呼得格外週到，巴修士曾向利公訴說心事，「神父，我傳教到過的地方，真是苦地方，這裏凡是外國人，都不許進來，這就使我更難受啦！幾時許多司鐸修士們能大家相聚在一起，彼此互相照應，互相慰勉，那麼便是死，也沒有甚麼可怕。」利公自己也曾寫信給富利迦底（R. Fuligatti）司鐸說：「我在這荒僻的地方，想起了我最親愛的司鐸修士們，就增加了不少神力，我對他們的懷念，足使我枯槁的心，回復了青春的生氣，使我從前和你們在一起時，所有的幾個好意願，重新勃發。」可是他說到這裏，就立刻轉過話來，作慰勉的論調：「一個好修士，為主捐軀殞命，不必憑刀劍，朝覲聖地，不必跋涉河山，不論在甚麼地方，只要血汗交併的努力工作，這便是信德干城的明白証據；即使在故鄉，實在已經拋却親朋，而且他的一身，也已遺世絕俗了。」

這種深切的思想，一般青年修士們，以前諒必聽慣了，因此青年修士們，每懷着一種躍躍欲試的心情，終於不能自遏。

向長上自告奮勇，請求准予派出去傳教。後來利公到了中國，也會因此向當時羅馬學院院長馬才理司鐸（P. Maselli）一再表示感謝。馬公原在勞來德修院院長，一五七四年，升任羅馬學院院長。利公的書信中，有過這樣的話：（註五十五）「假使許我這樣說，我並不因為遠離了我的生身父母（雖然我是很捨不得肉身的）而感覺比遠離了你一樣的悲傷，因為我愛你過於愛我的父母啊！」有時候修院中舉行慶祝，就使修士們於嚴謹的讀書生活中，得到了一次娛樂的機會。一五七四年亞爾謙雅樞機（Card. Alcia）繼任奧格斯布樞機，做了羅馬學院通儒院的主保。（註五十六）因此「全體通儒，在巴勞蒂樞機（Card. Paleotti）領導下，齊集一堂，開了一個盛大歡迎會，歡迎這位新主保，這裏我們得順便提一提，在一五六五那一年，著名音樂家巴勒斯特利那（Palestrina）正做着修院的唱經教師；一五七三年他著了一部音樂書（Impropria）到了下一年，他的傑作聖曲第三集，刊行問世。（註五十七）一五七五年是大赦聖年，各國信衆，到羅馬來朝覲的，絡繹不絕；羅馬學院的修士們，都派在「聖三賓館」服務，招待來朝的旅客。（註五十八）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彭啓萬各尼司鐸發大願，他的老學生們，便開了一個會，舉行私祝。（註五十九）這一年，疫癘盛行，死亡相繼，犧牲了多少人，其中最可惜的，便是羅馬學院的教務長班籍司鐸賴代斯麥（Vedena）利公函牘中，雖則沒有提到他的名字，可是在羅馬學院課程的支配上，尤其是在神學一門，却已感覺到他的深切影響。（註六十）把各種世俗科學，和人文科學，支配得作為神聖學科的附屬品，便是在那時候決定的。經過了脫利蔭公會議之後，一種新興而活潑的風氣，就是那公教的真精神，已在這種境界之內，發動了真正的文藝復興的大事業，所有聖教基本信理的定議，都已依著一種理應令人欣羨的準繩和睿智，加以確定。在教宗先後頒佈的這些詔諭中，有許多很堪稱為信理定義上神奇的事績。公教信理的神宮聖闕，

從人寰俗見的烟雲霧海中，再再上升，漸漸擴大，終至全部湧現，燦爛光明，輝煌奪目，便在仇敵，也因見了他的統一尊嚴而震驚。公教基本信條，信而有徵地在在表示着，和過去時代宗徒們所訓的信道，完全吻合；一切錯誤的謬理，和兀然不動的真理，分別得明明白白，不容相混，那所謂讓步的神學，模稜的措辭，一齊廢止；凡是公教信友，都覺着自己在唯一無二的信條下，團結成爲一體；在這古舊的聖教會裏，洋溢着的一種新生活的潮流；神學昌明到極盛的地步，他所有豐富繁複的表現，在聖教歷史上，可稱空前未有。那尤其彰明較著的，便是各屬教會的紀律，一舉而加以整飭，使彼此協調，和衷共濟，這是最足令人欣幸的事。詮解聖經，也不僅用言語的註釋，却利用士林哲學的原則，參考各國風土人情，博聞廣見之所得，以確定經義，使人易於了解。特別是羅馬學院的課程，由教務長賴代斯麥重行訂定，把所有冷淡無用的推詳論証，一概廢除，而極力注重於絕對的教義，依據聖經記載，聖教諸聖師的著述，列屆公議會的決議，以及各種聖學之所啓示，從事採集種種教義，而加以確定，這正是鼎盛時代；正當這個時代，那已受震驚的世俗，又眼見一個巨大的潮頭高漲展開。這個巨浪，非但來勢有力，而且善能繁殖，把公教信衆高高捲起，拋上那光明的江岸，使他們懷着依恃歡欣的心情，去洞燭既往的史事。這是辯護真教學者的黃金世紀，挾着卜式文（Possevin）以俱來；是詮解聖經學者的黃金世紀，有馬唐納（Maldonat）應運興起；也是聖教史家和其他許多科學家的黃金世紀。

在當代其他有名人物中，利公的書信上，曾提起那精微古典文學史家馬斐氏（Maffei）（註六十一）和那神修大師神學家賈利亞第（Achille Gagliardi）（註六十二）利公又曾一再提及那算學家格拉維尼（Clavius）這就使我們記起當年利公在他教導下，學習算術的時候，不屑孜孜攻習這一門，準確計數的科學，那時還在沒有發明窺測天文的望遠

鏡時代。(註六十三)但是這些有名人物，當時都給那一位耶穌會博學聖師伯辣彌諾 (S. Robert Bellarmine) 掩蔽得黯淡無光啦！在當代人士看來，似乎一代的光明，都集中在這位聖師一人身上。他於一五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那時他還沒有在比利時獲得聲名），創立了那著稱的一星期兩次的辯道班，分別講論着「天主的聖訓，歷代的傳授，聖教會的道理，和歷屆公會的決議。」那時利公當然也是聽講諸生之一，每次上課時所有的記錄，保存得和珍寶一般。（註六十四）我們寫着這部傳記，要確定利公怎樣造就他精神上的心得，那麼，這件故事就幫助我們完成了全傳的一筆。最近聖師伯辣彌諾列入聖品一案，提付核議的時候，我們還記得十八世紀中，他的列品案提出時，所有幾個和他作對的人，會責備他持躬的謹嚴，並不如聖伯多祿亞爾剛大拉 (S. P. d'Alcantara) 所為的一般。這件事說來話長。當伯辣彌諾以前一世紀中，因着人們惑於偶像主義的緣故，人類主義的學者，極力主張人和天主間相距遙遠的學說。其後賈爾文 (Calvin) 的道理，因着他的過分嚴刻，益發掘了一個更深的陷阱，因此人心惶恐不安，竟想遠遠躲避天主了。所以那時神學家的宗旨，不但要在天主前替人調和，還該在人前替天主調和。依着第一種方法來訓世的，便是聖伯多祿亞爾剛大拉，聖若望十字架，聖類思裴德蘭 (S. Louis Bertrand) 聖加祿鮑樂滿 (S. Charles Borromeo) 和其他苦修修士們，他們想用自己嚴厲的苦工作補贖，來平息天主的義怒，可是他們的克苦功夫，太嚴厲了，平常人是受不了的。他們的苦行，是使人驚羨的，却是不能使人效法的。利公不是屬於這一種為天主所特選的人，可是這幾位聖人，却也不難在他們青年昆季中，找到那末來的聖類思公撤格，步武他們的後塵。

因此我們懷念到，這班在動人的外行下，掩藏了內心的奮鬥，不欲令人驚羨，而顯示人以易於則效的懿德，俾人歸向

天主的聖人們，認他們是較合時宜，這原是一種無可爭辯的事實。比方聖斐理伯納利 (S. Philippe Neri) 一生總給人講天主的仁慈；他是一位快樂的聖人，是心曠神怡的聖人，是充滿着愛德精神，卓然可愛的聖人，亦即如詩人哥德所謂：「我的聖人，」聖伯拉彌諾，和聖方濟各撒肋爵，這兩位聖人都很熱心恭敬聖母，對於當代智識運動，要比聖斐理伯納利參加得多；這兩位聖人是樂觀派，不但因為他們竭力稱道宗教的美妙，和基多信友的神秘生活，具有令人欣慰的外觀，也因他們對於人類本性，具有善意而肯加寬恕，他們所稱頌的人，不是唯一的一「完人」，也不是特出的人，却是和洽着本性具有單純人的稟賦的人，在純粹本性的處境中，有過這種稟賦，到如今還保守着這種稟賦，經過這回挫折以後，不少受損了，却並不變惡，變得敗壞到陷溺的地步，甚至甚麼善事，都做不來。對於這等人，基多教義與其說是一切事理的最後認識，毋寧說是人對於天主，和人與人間的聯繫，是一種愛情和聖寵的聯繫。宗教應當祛除情感，懷柔人心，因而使人得有真正的自動力，養成其他種種的社會道德，如良善團結等，總之，在使人獲得幸福。

這種聖德的理想，表面上比較容易動人，然而，如果我們以為這種理想，用不着犧牲克己的功夫，就可以成聖成賢，那就錯了。利公和他的青年同會，後來為主捐軀的羅道夫亞瓜維伐 (Rodolphe Aquaviva) 完全一般，常懷着為主流血的志願，所以羅馬方面知道了東亞各屬傳教會的總經理司鐸薛爾伐神父 (P. Martin da Silva) 回歐請求添派傳教人員以後，他便再告奮勇，自請加入派遣隊；當時，也許他就同羅道夫給那位薛神父送行，直送出羅馬城外。（註六十五）他們倆終於獲得允准，遂了他們的渴願，利公啓程前，耶穌會總會長，還肯許他們到勞萊德聖地去朝覲，好乘便和他的親友見上一面，但利公願意做更完備的犧牲，只願隨着薛公和巴範濟司鐸 (P. Pasio) 同往教廷，求教宗額我略十三世祝福。一五

七年五月十八日，他就離別羅瑪，取道弗勞倫斯和熱內斯（Genes）（註六十六）前往葡國，候船出發，從此他就遠涉重洋，去參加這有新氣象的公教教會所發動，而遍及全世界的偉大冒險事業了。這偉大的企業，不但在使盲從誓反教的歐洲重歸聖棧，也要為基多爭得廣大無垠的新領土，使各異教國的人民出暗入明，歸認真主。這樣就突然結束了利公在羅瑪的訓練時期。（註六十七）他在這個時期中所有的思想，已因他青年時代所得深刻的印象，而成爲他的理想，這種思想，就要跟着他回到中華帝國了！

（註一）見蒙氏「西方隱修士」(Les moines d'Occident)引言又第五章。

（註二）利傳二卷，叁肆肆壹頁，除由文多利同譯（P. Tacchi Venturi）所編輯，計發自印度的信有七封，發自中國的有四十七封之外，將來還要加上德禮賢同譯（P. d'Elia）現正預備發表的幾封，（其中有一封已經發表），還有公家或是私家收藏的幾封信也該一並列入。作者一路寫來也隨時援引所有斷簡殘篇。這些片段，在前人著述中，都已見過，却被編輯家忽畧了。耶穌會奉命撤消以後，所有由拉谷馬思宜同譯（P. Larzouarzin）保存的六十六封信，便送還了利公的家屬收藏。（德禮賢著（Primordi）三七頁註一）。

（註三）利傳卷二，二七九頁。

（註四）利傳卷二，一七七頁；所謂英國人實在是荷蘭人（見「斐列賓羣島誌」一四八頁）。

（註五）利傳二卷，二二三頁，二二九頁。

- (註六) 利傳二卷，一二二頁—一三八頁。
- (註七) 利傳二卷，二二二頁。
- (註八) 熊三拔著 (Ursula) 一一頁。
- (註九) 利傳卷二，一二二至一二三頁。
- (註十) 利傳卷二，九六一—三，二六八頁，又熊三拔一頁。
- (註一一) 利傳卷二，九九至一〇〇頁，又一一五二七二頁；耶穌會士們到了馬賽拉貧以後，開始期間，男女僧友們怕被人認出，不敢到堂瞻禮 (沙起尼 (Sachini) 二冊一八一頁)。
- (註一二) 在希臘教會葡萄牙省區會的聖傳中，曾這樣說過：(利瑪竇傳一冊四頁一九一〇年版) 又一五六二年卜彌格司鐸 (Boym) 道出斯米爾納 (Smirna) 時，曾於講道中有過這樣的宣言 (巴台萊 (Baudeler) 摘錄，二五七)。
- (註一三) 熊三拔，一一頁；又文多利「傳教誌」六頁—Actu 一四〇至一四一頁—這六位昆仲，卻是在一五七一年八月十五日以前誕生的。(利傳卷二，二二二頁註) 瑪利亞阿德薩 (Maria Contessa) 生於一五七二年八月十四日，也許還有別的姊妹。
- (利傳卷二二〇頁—一五頁註一又二一九頁二二一頁註一，二七八至二七九頁，三七四頁)。
- (註一四) 利傳卷二，二七八至二二一頁，二七八至二七九頁註五又三七四頁。
- (註一五) 他母親的死，見利傳卷二，二二九頁，父親的死亡上；又二四五，二一九頁。
- (註一六) 利傳卷二，二〇〇頁—二〇頁。
- (註一七) 利傳卷二，一四五頁，馬賽拉貧的居民，以業審判官，檢察官，律師的尤為著稱。一五五六年春初，到那裏去開四規的

司鐸們，頗受該處信衆歡迎，他們便想在這裏爲患病的會士們，找一處空氣好的地方，造一座住院。聖依納爵已在原則上核准了這計劃，（一五五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却也料到種種阻礙（見一五五六年三月十五日的書信）。

（註一八）利傳卷二·二四五頁——關於勞萊德的歷史，可參閱勒克韋格氏（Locherer）的公教古典，及禮典大全，一九三〇年版二四七三至二五一一行，勞萊德聖地緣起。

（註一九）這裏可參閱魯意維羅氏（Louis Veuillot）的「羅瑪和勞萊德」（全書三冊，一七一至一七四頁）——利公的一位朋友杜賽利厄司鐸（P. Tursselini）曾著一部拉丁文的靈地古典史（作者所參考的是一七二七年版二三三、二六一頁）。關於作者所述，以及特洛特列克司鐸（P. Brodrick）的記載（聖伯多祿買尼削傳（S. Peter Canisius）一九三五年版，六一五至六一六頁）爲徵信計，不妨提及當時幾個前往參觀的遊客，如英國人費莫理遜（Glynnes Morrison）一般的人，他們見了那「邊境中可怕的罪人們」，和那所謂對於聖母顯宮的「教宗的迷信」，而微微表現出熱烈的情緒。

（註二十）利傳卷二，二四五頁註二，又二四九頁。彭氏爲塞納（Senae）省人，生於一五三二年。假使我們相信最初幾位耶穌會司鐸的報告，便知馬索拉宜青年們所有種種的遊戲，並非都是沒有罪的。（耶穌會史，八一頁）Monumenta Historica S. J. Polanci Chronicon VI, p. 81

（註二一）利傳卷一，一六一九頁註五；卷二，一〇頁註二。——蘇歐（Suan）著五二頁，關於這個公學，我們可以在耶穌會史中檢得許多史料，這個公學，是當地居民於一五五八年相近七月十五日時候，向勞萊德修院院長馬那勒司鐸（P. Manare）請求而設立的（稱乃慈傳彙，Taherz III）三八〇至三八二頁；三八八頁；四二四至四二五頁）。可是經過了兩年多，只聽得好說話。（Litterae Quadrimestres）伍，八二二頁；陸，六七，四三四頁），到了一五六一年，李巴代奈拉司鐸（P.

Ribadeneyra)才奉到了賴乃慈司鐸的委任，着手建設，(四月二十五日，李傳貳二六九頁)；可是他因為不到好教師，有些遲疑，(四月二十五日，全上三三八〇頁)。後來，有聖母忠僕會修士歐若伯(Fr. E. Egoe)代耶穌會出面調停，經過了幾番討論，才由市議會於六十九席議員中，以六十五票的同意，決定把這件事加緊進行，這回正式手續是於五月七日完備的，(賴乃慈傳，伍，五〇五頁)。五月十六日，便有十三位修士進居校舍，(沙起尼二一八〇至二一八一頁)；下一天便行給業禮，先由包那努(Jean Dominique Bornanus)作拉丁語演說，後由加泰隆那人若望伯烈(Jean Biet)作希拉語演說，於是開課，本城全體兒童，都去參加進典禮，計有一百四十餘人。到了五月二十一日，市議會便寫信給耶穌會總會長表示感謝，(賴乃慈，伍，五二二，至五二三頁)是月二十四日，李巴代奈拉司鐸，奉命派遣甘地司鐸，(P. Philippe de Gandie)到校，任講道師，(李傳，貳，二六九頁)可是到了聖神降臨瞻禮，甘司鐸還沒有到任，便就本校教師中另派了一人，(賴傳，伍，五二八至五三〇頁)。事前，地方當局，撥付銀幣五百元，做為開辦費，城外的聖馬利亞諸童貞之后堂，也在收入項下，同樣撥付了五百元，但那耶穌會當局認為有違本會神貧的規例，便謝却了，後者的懷疑(沙起尼，三冊，一七至一八頁)。在開始時候，因為馬那勒司鐸一身兼任勞萊德勒加精底(Recanati)和馬賽拉宜三處的院長，便發生了主要的困難，(李傳，壹，四〇三，四〇五頁)。那時教師利愛拉司鐸(F. Raphael Riéra)又病得厲害，大家怕他不能担任到九月，而事實上，他也不得到勞萊德去養病，(李傳，壹，三九九頁。八月十八日，李公來校視察，見一切都很發達，却不很穩定，初學修士，和讀書兒童們非常多。那時，所聘的教師們有柏烈，他也在勞萊德養病，已經好些了。有包拉努，有阿物朋(Michel Avellan)他們都要求派一位校長，(李傳，壹，四〇八至四〇九頁四一三至四一五頁；賴傳，伍，六一七，六四四頁，又陸八頁)。李公回去後，(八月二十六日)。馬那勒司鐸須到馬賽拉宜市去商議一個物質上的設備問題，(見九月十一日及十月二十五日的兩封書信，又李傳貳，二〇七至二一七

一頁；賴傳，陸，九五至九六頁又二〇九，三七四頁）。一五七二年九月十日左右，田維濟（Auge Dyrinus）奉命任校長（賴傳，陸，六八五頁）。這是一位有聖德的人，那時度着退隱禱禱的生活，也許已因此而勞苦過度了，（馬那勒著，D. rebus S. J. Commentarius）一五六頁）。因此耶穌會當局，願意派一位鮑宜詩司鐸（P. Emoric de Bonts）做他的代辦，來幫助他辦事，算是代替甘地司鐸，（賴傳，陸，五〇六頁）據一五六三年二月十日的記錄，一切事情，都辦得不差，（賴傳，陸，六八五頁）。只是那時候經耶穌會省會長，因為學生不夠的緣故，而撤消的那幾班教授詞學希臘文，和古典文學的高級班，又奉總會長的命令恢復了，（賴傳，柒，四四五頁，四八〇至四八一頁）。到了一五六五年，地方當局又和耶穌會總會長聖方濟各玻爾日亞交換過一次公牘，（玻爾日亞傳，叁，七六六頁，肆，八三，一三七，二〇九頁）。那時夏思司鐸（P. Jean）做着校長（玻傳，肆，一三五至一三六頁；一五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後來換了馬齊奧利司鐸（P. Jean Maffiori）（玻傳，伍，六三頁，一五六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以後各註無關重要，故畧。參考閱裴氏原著。

第二章 諾比利開教前的葡屬印度

在羅馬聖依納爵大堂穹窿形的頂壁上，有卜曹修士的壁畫，表現這位耶穌會祖傳教工作的偉大成績，他用各色人來代表地球上的四面八方，證明這種傳教工作所及的區域是十分廣大。各處都記得那耶穌會所尊敬的幾位開教宣化者的姓名，凡是讀過教史的人，也自然會一想起就想起的。當然在亞細亞洲開教的，是傳教主保聖方濟各沙勿略，但利瑪竇司鐸却也有份，他先教中國人學習天文，然後把福音傳授給他們，利公而外，還有一位學得了他的精神和方法，和他並駕齊驅的諾比利司鐸，(P. Robert de Nobili) 被稱為「外國王侯」而向麥杜蘭 (Maduré) 信奉婆羅門教的印度民族，宣揚聖化，使他們皈依基多。這三位大人物死後，所享的榮光，已足明白表示他們在東亞和在耶穌會中所處的地位，是怎樣啦！而且在研究天主教怎樣擴大展開的近代史家看來，這三位開創人物，竟也是傳教異邦一種基本道理的活典型。這種基本道理，就是適合環境，換句話說，就是能見容於異族。

當利公離開意大利的時候，這種未來的情景，當然還不能預料；那時他還是一個在訓練中的青年修士罷了，神學還只讀得「近半部」。(註一) 他同巴範濟跟着薛爾伐司鐸去傳教異邦，却是到那印度的臥亞，不是逕到中國，那時葡萄牙是到印度必由的門戶，所以他們先到了葡國首都里斯本，這位巴範濟司鐸也是意國人，後來利公和他始終很是相得，據利公自己冠冕堂皇的說，為甚我和他比衆合得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註二)

他於是取道西班牙，前往里斯本，一路並不多耽擱，那時西班牙正由他英明的君主斐理伯二世治理得昇平鼎盛，那

正在興建中的埃斯古里宮 (Escorial) 便可以代表繁盛的中心。(註三)可是在這寄居羅瑪，孜孜攻習法學。(註四)研究科學(註五)的耶穌會修士看來，那足以使他稱奇納罕的，無疑的不是這世界上君主國的昇平氣象，却是那士林派神學。(註六)和他在聖經上，國際公法上。(註七)以及神修著作上。(註八)所有的反響。(註九)普遍的展開。而且他在這地方，覺得很高興，因為他在古音勃爾 (Coimbra) 學院裏，繼續讀了幾個月書。(一五七七年六月，至一五七八年二三月間)。(註十)才知道那時羅瑪神哲學界所宗的，便是西班牙的新士林學派。(註十一)這學院裏的哲學教授們，(其中有一位叫谷詩 (Manoel de Goes) 後來利公和他保持連絡)。(註十二)正把斯賓挪沙 (Spinoza) 和萊勃尼齊 (Leibniz) 在「公寧勃列桑斯」(Cominbricenses) (註十三)的名稱下，所要利用的「亞列斯多德哲學評註大全」一書。(Encyclopédie de Commentaires sur Aristote) 加以精微的闡發；此外還有一位著名教授莫利那 (Luis de Molina) 正主講着聖多馬斯的「公道論」，那時這位學者，個人觀念的色彩，已經很濃了。(註十四)這當兒，葡萄牙國，在他青年君主賽巴斯第 (Dom Sébastien) 的統治下，因着他正在非洲用兵，好像不久就要轉弱為強了；其實這正是葡國強盛時代的尾聲。那歌頌露西大尼亞 (Lusitanienne) 王朝偉業的詩人賈穆恩 (Luiz de Camoens) 正在里斯本度他的最後的天年。(他於一五八〇年六月十日逝世)。天文碩彥 農乃慈 (Pedro Nunes) 也已活不得多時了。(他於一五七九年八月十二日逝世)。在聖教法典一方面，那聖方濟各沙勿畧的老朋友那伐祿博士 (Navarro) 經愛伏拉 (Evoira) 大學教授方濟各戈完 (Fr. de Gouvea) 主張復古之後。(註十五)他的威信，已衰落了。那班籍多明我會士格勒納 (Louis de Grenade) 那時寄居本會葡萄牙省區，仍不避艱難，熱心贊助着耶穌會的工作；這當兒，便發刊了幾種辯護真教的小冊子，

和勸人虔誠昭事的書籍；這些書本，不久就譯成了遠東的語文。（註十六）同時，巴爾多祿茂諸致命主教，費許多心思，搜集材料，而編著的神修論，也要在日本刊行，供傳教士們應用。（註十七）

那時正當民族主義昌盛時代，對於聖教，很多妨害，却發生了一件最令人詫異的事情。這便是葡王藉以招接外人，襄助他辦理殖民地文化事業的一種自由開放主義。當然葡王的大臣們，有時認外國人來侵略，不免惴惴不安，又怕本國的秘密，洩露到外國。（註十八）因此在利公起程四年前，當范禮安司鐸帶了一隊傳教士，到了里斯本，候船出發的時候，就遇到阻礙。那時他率領的傳教士，共計四十二人，其中只有六個是葡籍，其他諸人中，八個是羅馬人，一個西錫蘭人（Sicilia）一個龍巴第人（Lombardi）三個亞拉貢人（Aragon）九個加斯底龍人（Castile）十二個都來特人（Folice）所以這班人中多數（二十四名）是西班牙人（註十九）范公臨行時，便有幾個有力人物出來阻撓，只許他們十二三人下船，范公據理力爭，使他們頓口無言，不得不讓全體教士們乘船出發。（註二十）從此里斯本耶穌會住院中，便派定了一個會在印度留住過的會士，常駐着，使本會出外傳教的教士們啓程出發時，獲得便利。（註二十一）一五七七年，班葡兩國，仍因各在遠東奪取勢力範圍，而互相競爭不已，教宗額我略十三世，便大聲疾呼，給了一個答覆，作為定案。（註二十二）可是這些爭端，雖則曾經發生了幾件可為遺憾的事情，却沒有妨礙葡王，繼續竭誠贊助傳教士的工作，不問他們的國籍，因此延長了當初葡國先王若望三世，對於聖方濟各沙勿略優待的姿態。

這樣利公就在一種順利的環境中，和葡萄牙接觸，以後，也就把他當作了第二祖國。他在古音勃爾學院所讀的課程，正和他在羅馬學院的學業相啣接；他在這裏，也和在那裏一般，雖則年紀很輕，也得受修院規例的約束，不得不接受一種

教義，不過這却是適應他內心一切需要的教義，既富有古典文學意味，又是那麼切合着基多的聖道。他在里斯本，也和羅瑪一般，結識了幾個朋友。他後來到了中國，舉目無親，而又冒着危險，但見奉派來華一批一批的同志，不是到了印度便留下，便是到了澳門，就折往鄰國日本去傳教。（註二十三）在這中心惆悵的當兒，這幾位朋友，雖則遠隔重洋，却能設法給他援助。在利公的書信中，還提著他們三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位，便是後來做了葡國駐羅瑪的助理員的阿伐來司鐸。（P. Jean Alvarez）（註二十四）

利公在里斯本，雖然新交了這些好朋友，然而當一五七八年二月間，他的幾個意國老同伴，路過葡國首都的時候，他故友重逢，心裏的快樂，也就可想而知了。這回旅行的同會修士們，一個是貝爾那（Berna）是後來在薩爾賽德（Salsete）島上為主致命的一個是羅明堅司鐸（P. Regener）在同來諸人中，他是最長，以前曾為西班牙政府服務，在那伯爾（Nabes）王國做過法官；還有一個，便是那貴族出身的羅道夫亞瓜維伐，他和利公更有關係，因為他曾當過馬賽拉督學的教授，和利公差不多是老鄉親（註二十五）凡是做得出英勇事業的人，不一定是性情乖辰，脾氣古怪的。那時，羅道夫的鼻孔，每到晚上要出血。羅明堅在這小團體裏，是一個滑稽角兒，就笑着對他說：「這是他將來要致命的預兆」（註二十六）。這當兒，正有最堪欣慰的喜事，等待着這三位利公的老同學們；不久他們就領受祝聖，晉陞了司鐸職位，於三月十三日舉行首次聖祭。在這待發時期，所經歷的事情頗不少。但其中有一件，是後來利公喜歡講的；這就是他曾陸見過那御駕親征摩洛哥，不久就薨逝，使葡萄牙全國臣民遭遇國喪的國王賽巴斯第。當利公一行人將要出發（三月二十四日）的時候，曾由薛爾伐司鐸帶領入覲，向國王辭行。葡王召見後，便和顏悅色的回說：「耶穌會總會長，派這麼好，這麼

傑出的會士們到印度，教朕怎樣謝他呢？」說着，便命傳諭，這班傳教士的供應，着由內庫支給。據一位紀年史家（註二十八）的解釋，「這位國王，很願意援救印度人的靈魂，這熱心的善舉，原是意大利教士們所努力進行，不讓葡人專美於前的。宅心仁善的葡王，却知道耶穌會的會士，雖則各國都有，却在耶穌的旗號下團結成爲一體。」那時葡屬印度，一個西班牙人也沒有，因爲賽巴斯第益會下過命令，把在他轄境內，所有班籍耶穌會士，一律遣回，這無疑的，是出於他左右大臣們的惡思。可是他不久就薨逝了，這逐客令就沒有執行，當時耶穌會總會長梅古里益，便通知范禮安司鐸（一五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說他已命葡萄牙省會長，轉請新王，收回這成命，這位嗣王便是亨利樞機。（註二十九）這樣我們便可以知道，利公的傳教事業一開場，就碰到班葡兩國的競爭，遠東聖教的擴張，反因此受到了阻礙，這真是怪事！

三月二十九日，有三艘海船到期待發了，這班耶穌會傳教士們，一行十四人（其中葡籍七人，意籍六人，弗蘭芒族一人），便一齊出發；依着向例，他們由當地首都修士們列隊送行，送到碼頭上下船。據「船主」說：利公和會長桑德（*Edouard de Sande*）羅明堅以及其他兩位葡籍會士，同乘「聖類思號」；亞瓜維伐和巴範濟同在聖額我號船上。三艘海船開動的時候，岸上禮砲大鳴，送行的修士們齊唱聖歌，向這班傳教士致最後一次的敬禮；他們這一去，不但有被那出沒於亞掃勒（*Acores*）附近的「海上狗」英國海盜，攔劫的危險，還得冒着傳染那更可怕的敗血症，或是傷寒症的大災難，可是他們心曠神怡，滿不在意。（註三十）

事實上，這回航行還算安穩，旅客們最痛恨的死敵，無非是常途的煩悶罷了。假使我們相信利公的心理，也是如此，他就利用這多暇的光陰，來整理他的地理筆記簿，研究海員們所用航海的方法。（註三十一）這樣，我們就不難想像他，每

當月白風清的良夜，必然要尋覓半天的星辰，那時的天文學家想像之所得，和現在所講的截然不同。古天文學者，在具體的形式下，懸揣着天空各星座，這在現在學者看來，大概只是空話罷咧。他們依着民間傳說的故事，用人物來代表，以為有了無數的神像，或是幾個畫「球」，便可以使人一目了然啦。但是我們一看見南斗星，便已發生了置身另一世界的感想，那雙女宮，大小熊星，蛇星，蠍星，等北斗七星，都已不在那裏了。

至於這時代中，傳教士們內心的情緒是怎樣，要是不借亞瓜維伐的函牘來補充一下，那我就無法說明。亞氏曾在里斯本碼頭上寫了一封信，（註三十二）說：「這麼，我如今還有一隻腳踏著陸地，那一隻腳却在海上啦。可是我的心早已在大西洋上，在印度了，在那裏我將遇到些什麼呢？這我可不知道。不過假使我信得過我的心，那裏必然會有好事情，我是多麼願意你來做我的夥伴啊！在船上真像坐監牢，或者竟像埋在墳墓裏；我住的房間，只有兩尺寬，兩尺高，跪也跪不得，祈禱的時候不是坐着，就得匍匐着，但是我還是很高興，因為我們是到吾主的宮殿裏去哪，我們要去效法被釘的耶穌基督，我們的船艙裏，有許多聖骨，一個是聖波尼法削的，一個是蒂貝亞（Thibenne）軍團的致命者，還有那聖女胡蘇（Ste Ursule）同伴們中，一位的頭顱！」

七月二十一日，船行駛到了好望角。這班航海客遠遠裏一望，見這地方歡欣雀躍的情緒，再也按捺不住了。便是羅道夫後來也對人說，那時他所有快樂的感覺，簡直是生平所未有，當下他靈心中，便立刻想到這萬里航程，一朝完畢後，所享受的福樂，到了那時候，他的靈魂，便會看見水的彼岸。（註三十三）過了一個月，（將近八月底，）他們就到了莫三壁克（Mozambique）便在那裏住了一個月光景。聖額我曾在這地方救得了四百個加弗爾（Cafres）奴隸上船，雖有傳

教士們悉心照料，仍在餘下的航程中，死了十八個。九月十三日，他們終於到達了那鍍金的臥亞（Coa）（註三十四）

這一行人到了臥亞，安頓了以後，便訪問他們的同會神昆，向他們表示敬意。臥亞的同會修士們，也竭誠照料，替他們佈置一切，使他們可以安居；他們便在快樂中，度過了最初幾天的光陰。接着，他們便探詢臥亞天主教教務進展的情形，打聽得十分仔細；這件事，原是他們所最關心的，也許一切情形，比了他們未出國前所想像的，不見得完全一樣。天主教在那裏所處的地位，並不和他們以前所聽聞的，或是在書報上所見到的，一般振興，耶穌會士們在這黃熱病流行極廣的臥亞傳教，究竟各懷着怎樣的心情，我們又賴了羅道夫亞瓜維伐很清楚的傳述，才能獲悉全體教士們，所藉以自慰的，完全是出於超性的動機。

亞氏的函牘中曾說：「（一）在這樣救靈的重任中，吾主憑着這寫遠的程途，種種的困頓，和在這裏隨時可以遇到的死亡的危險，來教我效法他。（二）如果我從來不會有過效法救世主受苦的志願；那麼十字架，便是我們在這裏的日常飯糧哪。（三）凡是足以耽擱我靈魂，躍向天主的一切情事，我都把他剷除了；神昆們，請你們相信我；我們平素往往以爲自己已經捨棄家鄉，捐離世物，專心事主，連生命都肯不要了，然而有一天，真正實行棄絕一切之後，便立刻覺得以前的捨棄，不是真實的。（四）我們應當再作兒童，這是聖經上，吾主所諄諄告誡的，因爲在這地方，一切都是新的，言語風俗習慣，色色全新，這裏鄉土人情，食物以至全部的生活，和歐洲的生活，大不相同，便是自己的肉身，也換了一副體質。」（註三十五）

我們所保存的利公，在這時代最初寫的幾封書信，也証實了亞氏所有的感想，同時也把他那時所有的任務，告訴了

我們。一五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利公會寫信給馬才理司鐸（註三十六）說：「一年過去了，（一五七九年）我教的是初級班，（就是我們現在的修詞班，）今年（一五八〇）我到交趾來療養，便在這裏的初級班，教了四五個月的書。」這最後的幾句話，和那稍為表示幽鬱的幾頁是一樣，回溯到最近的既往，却也已經是很遠的往事，使我們不難猜度，利公在僑居印度的幾年中，（一五七八年九月十三日至一五八二年四月十五日，）種種事情，都是很不如意啦。他既和朋友分離，又因健康問題，而感到煩慮；在這氣候炎熱，使人力乏神疲的地方，繼續攻讀神學，却又須兼任教職，益發委頓難堪；有時候他還以為要一輩子教書咧，凡此種種，在他都是拂意的。一五八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他又寫了一封信，（這回是寫給馬斐司鐸的，）（註三十七）他說：「我奉了長上的命令，已在歐亞開始教授希臘文了，（大家的意見都不以為然，）全班學生約有十二名，我教了不到三個月光景，他們已跟得上來，我便開始給他們講解德謨戴納（Demosthene）的第一冊，富有刺激性的論文了，（註三十八）可是我因為在希臘文上，太用功了，便得了頭痛病，至今還沒有醫治得好。我於是奉派到了交趾，在那裏教了五六月書，隨後我就祝聖了司鐸，（七月二十六日，聖婦亞納瞻禮，他舉行首次聖祭，典禮很隆重，）又把我遣回歐亞，讀畢神學。我不知道將來是不是要我教完文法，或是在歐亞斷送了我的生命，因為這地方病勢很猖獗呢。」我們看了利公信裏這些話，便知這磨難是苦極了，無疑地，這是出於天主上智的安排，因為他所有極敏銳的感覺，或者會降格，變成假慈悲，他在弱的體質，會變得骨瘦如柴的。那時他年紀只有二十五歲，還不能達到使本性和聖寵，入於節調的平衡，得其「中和之道」，這原是古代典籍鴻篇鉅製中，所標榜的特色，為他孜孜攻讀的兒童時代所嚮慕的。他本性上所繫戀的一切，都已毫無矜惜的斬絕了，如今却在這嚴酷的學校裏，練習着棄絕一己的功夫，還學着對人的同情。

此外利公的長上，省會長黎味增德（Ruy Vicente）也早已賞識了他，要委他一種任務，使他依着一種不很平常的方式，藉此打開東方傳教生活的途徑。那時，他在羅瑪時候的老朋友馬斐司鐸，已奉了總會長梅古里盎的命，編輯葡屬印度的天主教傳教史。馬鐸奉命後，便要求供給他，熟悉該屬教務的通訊人員，因此味增德司鐸便答應，從一五七九年九月十三日起，替他物色聰明能幹的人材。（註三十九）和他合作。於是利公便首先入選。那時他沒有晉登鐸品，後來又派德齊拉司鐸代替他，這位德神父，是聖方濟各沙勿畧傳的作者；這部傳記，曾為那鑒別很精的范禮安司鐸所賞識，說在聖沙勿畧傳中，德公的作品，允推獨步。（註四十）

這位青年教士，便隨機行事，執行他的職務，我們看了他的通訊，就可以明白了。在利公的通訊，無非是把他所有關於教務，東鱗西爪，各不相謀的消息，彙集編成。他收到了各處的新聞，便把他編成報告，寄發出去，好比大本營，發表勝利的戰報一樣，歐洲方面，便把這些報告彙集了，作為勸善的書信彙編，一版再版的刊印出來。這些捷報中，所紀的新聞有：馬拉巴爾裂教徒，耶大剛（Hidalgo）親戚某貴婦領洗奉教。（註四十一）愛底奧比亞宗主教逝世。（註四十二）波斯驅逐土耳其人（註四十三）摩六甲的教務。（註四十四）瑪弟亞亞爾蒲葛格（Mahias d'Albuquerque）進攻蘇門答拉。（註四十五）澎湖王（Roi de Bungo）率日本人一萬二千名領洗皈依。（註四十六）一五七九年，濱海漁民增新教友一千人，一五八〇年，一千至一千二百人（註四十七）重建脫拉文谷（Trancore）被燬三教堂紀。（註四十八）聖多默宗徒門下，基多信友們的紛爭。（註四十九）方濟各麥底南（Fr. Martinez）和西門般（Simon Pais）兩教士逝世；（註五十）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新聞，便是羅道夫亞瓜維伐在大蒙古埃克巴（Akhar）傳教那件事，這原是冒險事業，却有

很大的希望。(註五十一)一般人對於這些報告，所有的感想，都認前途頗堪欣慰，這正是教會當局所蘄求的。因為利公信中，曾有這樣的話：「我們希望不久，不但澎湖全郡，便是日本全國人民，也要棄邪皈正。」對於印度的歸化，我們的希望，也不亞於此。……對於(大)蒙古的成功，我們也並不失望，將來也許看得見，比在日本還要偉大的大事業。」(註五十二)顯然我們不能跟着這位紀事史家，把各處傳教情形，一一講到，他可以引他的讀者們，遍歷其境，而我們却不能，而且他所曉得的某幾種消息，是不能隨便發表，不加考慮的，他在交趾時，所知道的聖多默宗徒傳下，和聶斯多略派信衆間的爭執，便是一個例子。(註五十三)

他真有批評的精神，尤其在他忠告馬斐司鐸的言論中，看得出來，他曾用極率直的語調，寫信給他(註五十四)說：「當然一切事情，你知道得比我明白，但我是在場人，親眼目視過這些事情。」對於印度的王公們，還是一句不提的好，只講些開教的經過情形吧？你的著作，的確是好極啦，我已經說過願意拜讀了。在我們沒有表示意見之前，希望你勿作任何決定。假使你同意的話，我要給你畫一張地圖，再作一篇記敘文，把這地方，全境的情形，描寫一下。我不妨給你配寶，虧得畫下了幾張圖，遇到幾回日月蝕。……我所要編纂的記載，比了前此所印行的，要準確得多啦。……你可知道，在以前從印度，或是從日本，寄上的記錄，和其他的書信中，顯著的錯誤，真不少啦。」(註五十五)這是顯而易見的，他分任着禮安司鐸的職務，反對史家的惡習，他們搜集聖方濟各沙勿略所有靈奇的事蹟，反把聖人德業埋沒了，好像在聖母像上，堆聚了無數的珍寶，堆得反把聖母遮沒了一樣。(註五十六)——

利公自己，也承認(十二月一日)(註五十七)當時大家，還不知道印度的實在情形。他說：「各王公的名字，都是

奇特得很，便是住在這裏（臥亞）的人，除了蒙古王，叫埃克巴的之外，一個也認不得。……然而據我看來，不見得是學不會的，只須一個有才學的回教徒，或是一個富有智識的波羅門人，念念那歷朝的史記，來幫助一下，就行了。」這話的確不差，便在這當兒，那蒙才拉德司鐸，就憑着這方法，來讀印度北部的地理誌，補救了這種缺憾（註五十八）過了多時，鳳尼爵司鐸，又同樣下了一番苦功，研習印度的各種教派（註五十九）但是後來到了十七世紀開始時代，才有一位諾比利司鐸，經過了詳細考察之後，便研究出一種獨創的傳教方法（註六十）這一切事情的實現，正和青年傳教士利瑪竇司鐸所發動的，不謀而合，現在我們應把這種情形說明一下。

要把十六世紀東亞天主教的地位，估計一下，就該立即先把開宗明義，也可以說得是世界通史上的第一要事，重提一提：就是在距今約計一千六百年以前，在小亞細亞一個小國度裏的都城日露撒冷中，有一位名耶穌的，迦利勒人，被釘在十字架上，氣絕身死。過幾年以後，曾有羅馬帝國的一個職官，把那新興的基多教義，用這幾句話，簡括的說明如下：「猶太人中間，所有關於一個已經死了，而保祿却定說他活着的耶穌的爭執。」任何抽象的定義，總不能說得比這句我們可稱為「基多教義精髓」的話，一樣切近。這基多教義，是根據着一件事實，就是耶穌的事實，耶穌在世時，一生的行實。基多信徒們，便是一般相信耶穌繼續生活着的人們，到如今還是這樣相信着。釋迦牟尼，或是孔夫子，不過是歷史上的人物，他們已經成爲過去了，正和伯拉圖亞列斯多德等一班過去人物一般，他們對於後世的影響，不過是一種陳跡，一種紀念品，或是他們紀實的，或是托辭的，著作所有的影響罷了。可是在基多信徒看來，耶穌不只是一位歷史人物，他還在，他在，看得見的教會裏，存在着，而且是超時代地，永存永在常常度着現世的生活。

依着歷史講，基多的教化，是從猶太山脊的兩斜坡上，傳播開來，這個山脊，我們不妨稱爲古羅馬帝國和東方世界的分界綫。可是這裏，在一件確定的事實——這也是一件主要事實——就是基多教化，從這兩方面傳播的時候，雖則兩方面同樣遇有厲害的阻力，却是奇怪得很，傳播的迅速，既不相同，所遭的境况，也不一律，在很快的當兒，地中海的週圍地帶，便成了宣揚聖化，特選之區。

基多的教化，和希臘羅馬兩國，最初發生聯繫，這回事，凡是探本窮源的智識份子，不論是信奉的，或是不信奉的，同情或是漠視的，都有加以注意的必要。這產生在巴勒斯丁，出於猶太民族中的宗教，怎的就和那文化昌明的兩大國家，密切地建立了起來，甚至有一位情形最熟悉的史家杜凱納主教，竟敢大書特書這樣的話，屢次供人援引呢？他說「耶穌基督的宗教，是唯一的真宗教，預定着，要作爲全人類的宗教的，只是因着他和歐洲文化的結合，是長久緊密的緣故，所以這教化的傳揚，理該跟着這文化本身，攻入歐洲時所走的脚步；同樣走去。」那時印度所有的基多教義，滿染着亞拉美教義的意味，這也許是聖多默宗徒講的；但那似乎使岡大拉藝術，受到了影響，後來又在小亞細亞傳播的基多教義，却已被希臘文化深深滲入了，當二十世紀初葉的幾個探古家，開始搜索中國甘肅青海一帶摩尼教和聶斯多略派的景教寺院時，便突然發現了另一境界，這個境界，和當初小亞細亞幾個很早開化的城市很相彷彿。這就可知大畫家拉斐爾，在他所作「雅典學府」一畫中，繪着伯拉圖一隻手拉着一帶狀，一隻手伸着向天，並不是藝術家故弄狡獪，因此聖教會最初的博學聖師們，以爲「希臘人多數是神學家，」情形也是如此，一如一位祖先，在異教國裏，迷了路，一個見識卓越的人，在他家裏，被人聽到了那預期的基多信徒，所有信仰的應聲一般。

在第四世紀中，這種基多教化，和異教國文化，冶於一爐的奇蹟，又再度見諸事實了。愛讀奧克達維伍著作，米努濟伍費列，令人心醉的對話的拉丁民族思想家，便在這些作品中，欣然發現了一種笑鑿近人，而富有同情心的宗教，可以無聲無息地，透入世俗人心，不必搖撼，而使人去舊從新。從此以後，公教教義，便很相宜的，適應着古代藝術，和古代思想。在失却了帝國政權的扶助時，便成了主要的支持力量。而且到了修士們，把基多福音帶給歐洲文化落後的民族，還給他們樹立了古典文學之後，後來到了中古時代，十字軍又把騎士軍和傳教士團，送到了亞洲之後，不久這公教教義，竟和這種藝術思想，完全一致了，——其中傳教士團，更直送到了元代的中國境內。

然而當十五世紀末葉，和十六世紀開始時代，歐洲聖教會，人文主義的傳授上，却發生了一種退化，在所認為一般舊思想者的勢力下，大家看到了一種風化，思想和情感上的變遷，漸漸抬頭，這種變遷結果，勢必要實現一種，自由唯理的教化的理想，有類於古代崇拜偶像的理想；便在公教信友中，也不乏有名人物，對於那使人感受威脅的，唯性論的自然神學，力求維持基多教義中的基本信理，從這些主要真理中，尋出些乾枯無味的結論來，而懷着墮落了的人類，處境悲苦，使人最覺難堪的意思。聖教會對於這班人的學說，起初還加放任，直到開了脫利滕公會議以後，才實行糾正。所以聖依納爵還在確定這些基本信理的意義以前，便已在這種複雜的混亂情景中，發見了一條可以實行的，中庸之道。而獲得成功，當然是不無功績的；因為許多學士們，和神學家們，在這混亂狀態中，已互相攻擊得很劇烈了。聖依納爵在盡力使聖方濟各沙勿略和他的同志們，脫離那福音主義派，和愛拉斯美黨（Erasmians）而轉向的時候，就主張不可為文藝而犧牲神學，也不可為神學而犧牲文藝；假借發揚文藝復興與成功的美名，而對中古世紀妄肆譏評，因着愚夫般的崇拜中古世紀，而蔑視

文藝復興的成功，這兩種心理，都是不當的，這在聖依納爵看來，不特違反理智，抑且有背信道。他和他的弟子們，都誠心誠意，愛着古典文化，和新穎的知識，這種愛好的衷情，也和那在教理上完整的信仰，密接貫通，這是最足令人詭羨的。

這種理想，說得簡便一點，便是一公教改革新一理想；聖方濟各沙勿略帶到了遠東的，也便是這種理想。那時遠東的情形，也很混亂。最先到印度，在加里略登陸的葡萄牙人，都是毫無閱歷的人，見了寺觀廟宇，便把他當作教堂；只要不像是回教，便以為是天主教。可是一會兒，他們就弄明白了，不多幾時以後，那據說是聖多默宗徒傳下的，幾處天主教教會，便發現了；因此大家相信，在亞洲大陸，離海岸很遠的地方，有舉世不知的，一大羣基督信徒們隱迹着，一般人也覺得在這些幅員廣大的國家中，人民大都崇拜偶像，而加以証實。這種異教，便是聖沙勿略一路傳教的時候，所遇到的印度教。只是他和婆羅門教徒接觸不多，似乎沒有想到佛經的深奧吧了。真奇怪，聖沙勿略在印度傳教，還沒有征服濱海的一角，可是他一到了日本却又看見印度人，不過名稱變換了，不叫印度而叫「身毒國」（中國話叫「天竺」）穿的又是中國衣服；那時還不知道天竺就是印度，這件事情，使這位索龐納（Sorbonne）的博學士，「大學校的役員」（Supplé）快慰無比。他眼見中國文化學術，受日本人這樣崇拜，不禁稱奇納罕，從此他就一心只想到中國去傳教了，從這時候起，他就成竹在胸，預先想定了一種，對於這文化發達的民族，適宜的傳教方略。但他所有這種偉大計劃，必須經過范禮安司鐸的切實推行，才能真正實現。因此當利公在臥亞捨舟登陸的時候，大家已能預先感覺到，耶穌會士們，將來要在遠東印度日本中國三大國，常駐的時期了。這時期中，印度的會士們，是在亞各拉的大蒙古王亞克巴治下；日本的在京都的豐臣秀吉和他的嗣君治下；中國的，在北京萬曆皇帝治下。

因此，我們再說一遍，基多的宗教，天主教，必當表現他澈底的創作性，他自從一位巴勒斯丁人，創立了以來，到如今，年代已很久遠了；——這位立教者的信徒們，相信他是「真天主真人」——他自從和希臘及拉丁文化密切結合以來，到如今，也差不多已有一千六百年了。這個宗教，如今又得和幾種絕不相同的文化相聯合，却絕不失去他所有的基本特性。利瑪竇到了中國以後，在設法立下一種根基，謀取便利的時候，就遇到了這個問題，那時的根基，比在脫利滕公會議以前，還要薄弱。事實上，那時耶穌會的最先人文主義者，便已感覺到，在異邦人中，求人文主義的發展，總不免要有一番奮鬥。因此聖依納爵的一位「神子」方德望司鐸曾說：「我們應使異教作家，變成基多的傳令人。」這個時代，還不是在溝通古典文學中，尋求愉快，或是美育上求滿足的時代，却該設法覺得武器，和辯論的根據，好和人較量一下。依據脫利滕公會議的斷語，天主教教會，把他教化所及的各國，所有智能道德的力量，再度集中了以後，公教中心的羅瑪，就是歷任教宗的羅瑪，越發不是一個空泛的地名了，却是一個大家看得見，而歸附的活人啦！他每當訓誨世人，到處顯着明智，和良好意識；他有光芒四射的外觀，透露着一種比維琪爾（*Virgil*）時代的作品，還要感人的仁慈；他一身兼有着母后的權威，師保的嚴厲，母親的慈惠，和婢僕的謙卑。他準備着，執行他世代相傳，領導萬民的職務。

利公對於古代拉丁文各學科的了解，既不讓於范禮安，也不亞於引他來華的羅明堅，也許因着他在最近文藝復興中，研求之所得，對於這種學識，要比范羅兩公強一點。不論拉丁文希臘文，或是當時盛行的各種科學，尤其是天文學，他都下過功夫，他在印度僑居的時候，又表現出對於歷史，和繪製地圖一門，具有特長；他所有的才學，都能融會貫通，所以我們不妨說他，不但是一個古典文學的典型，而且依着一種比較的狹義講，因為他專心研究羅瑪和希臘傳下的學術，不但是

個文人，而且也是一個工藝人，擅長手工技藝，會製造時鐘，對於建築術，也很有心得，還因着他明瞭天主教的奧義，具有一種許多學者所不能有的神秘意識，因而可以運用神奇的方法，準備和一切確屬人文主義的禮教，一致步趨。以後，他傳教工作進行的時候，不住要遇到新需要，這些需要，就會使他當場把他在著書立說和一切行事中，所有從西方文化學得的一切，改正一下，但是他隨處留心學習，早已見多識廣，一旦遇到重大問題，總要比其他教士們，善於應付，處置得宜咧。

關於這一層，利公會於一五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寫過一封細訴衷曲的信到臥亞，寄給他羅馬學院的老指導，那時被選充任耶穌會總會長的克勞特亞瓜維伐；（註六十二）在我們看來，再沒有別的文件，比這封信，說得更明白的了。他先向這位新總會長熱烈道賀，宣稱極願準備奉行所有以聽命誓願，命他辦理的一切事情；接着就說：「在最初兩年中，我差不多，常常被派教授着古典文學；今年第三年上，我就祝聖了司鐸之後，省會長便要我繼續攻讀神學；我於是讀了一足年，下一年，是神學第三年，我也必繼續攻讀。以前我雖然願意在教授文學外，担任些別的事情，而且我也曾向長上們表示過這願意，然而我仍不能不以教授文學為快事，因為我知道，這是我聽命而發的命令，也便是天主的聖意哪。」

那時，有一個那波里人喬伐尼巴第斯大，剛從臥亞省區會被遣回歐；（註六十三）利公便請他的長上，慎防這被遣者，思想不穩，而有詭詐之可能，接着便說到省會長司鐸，委派兩個出身和猶太人有親屬關係的人做了院長；（註六十四）因此引起了學院內外，好些人的不悅；隨後又長篇累牘的，討論一個精細的問題，就是當地神職班的讀書問題，那時這班學生，是預備供范禮安和賈伯樂（P. Cabral）兩司鐸，調到日本去傳教的。（註六十五）

這個問題，和剛由總會長梅古里盡切實解決的另一問題，是有聯帶關係的，這就是處理會內所有本地人，或是雜種

人的問題。經過了幾番試驗之後，已經證明這種人，大抵沒有恆心。一五八〇年，耶穌會中，有一個葡萄牙人，和一個西來勃（Cairnes）島的郡主，所生的兒子厄來弟亞（Godinho de Ercidia）雖則他有算學和研究地理的天才，是無可否認的，却終不得不把他謝絕。（註六十六）因此耶穌會總會長，根據在秘魯和智利兩國的經驗，便於一七五九年，禁止收錄這種人進會。（註六十七）

自然這種辦法，並不妨碍他們修道的志願，他們仍可加入，不入修會的神職班做司鐸，可是有幾位司鐸，一如傳教日本的賈伯樂司鐸，一認定他們只可以攻讀拉丁文和良心律，不得加入耶穌歐籍會士的哲學班和神學班肄業。一五八一年，學年開始時，這新辦法便在臥亞定案實行。利公用憤激的口吻，來表示反對的，便是這種新辦法。利公所有這種理直氣壯的辯論，我們不能把他全部錄出，却不得不摘錄原文中，特著的幾句。他說：「本會向以對人不懷私見為常例，便是在印度，也有許多年高德茂，很有經驗的司鐸，常爲了當地居民的福利，而開辦學校。……這個種族，現在受着外人的輕視，據我看來，誰也比不上我們，看得起他們，所以他們對我們，見得格外親愛。可是假使有人去對他們說，本會的神父們，也仇視着他們，反對他們，要想得到一點好處，或是謀一點事情做，不該昂着頭走路。……我就很怕這些本地人要恨我們啦。這樣本會在印度所造成的主要效果，就是使教外人棄邪歸正，和保持我們聖教信德的善果，就要受到妨害了。」利公這種有力的抗辯，總會長亞瓜維伐的秘書，必然要加以考慮。但看利公手書，原函中空邊上的附註（註六十八）就可證明。我們讀了這種論據，也就知道利公和諾比利兩位開教元勳，所見相同，而諾氏日後在印的措施，顯然是出於利公在華所採辦法的啓迪，也就不足爲奇了。

這當兒，利公還不能憑着他所有的觀念，去實行傳教工作。他應該不惜病軀，繼續攻讀神學；有兩次他竟病倒了，雖則那時除了偶然作一二次聽告解外，別的事務，已一概不讓他做了。（註六十九）亞克巴治下的傳教教會，傳來的消息不佳。先前派去的羅道夫亞瓜維伐和他手下一班人，徒勞無功，便把他們召回臥亞。（註七十）這回的失敗，使人重又感到，那要在印度完成的任務，是何等艱巨啊！除了濱海漁民區的教會，在經濟上還能自給外，那聖多默宗徒傳下的教區，已經馬阿伯拉罕（Mar Abraham）和馬西蒙（Mar Simon）兩人的爭奪，而殘破不堪了；臥亞城，好比沙漠中的茂林，四週都有佛教勢力包圍着。（註七十一）幾時利公遇見了佛教的僧侶，便想除了一般貪得無厭的遊方僧，或是做和尚吃飯的之外，總有幾個苦行的僧徒，和虔誠修持的隱士。有時候，他的窗友司蒂芬神父（P. Stephens）埋頭撰寫着公加尼（Concani）語的作品。（註七十二）他自己却在白晝惱人的時候，或是在夏季溽暑的天氣中，走到助理修士的工場裏，研究製造時鐘，造作機械，或是印刷書籍的技術。（註七十三）

這樣，利公預備着，他就要到中國去做的繁重工作却連自己都不能知道。這當兒，羅明堅司鐸，獨自在澳門主持教務，素知利公擅長算術，早已要他去做助手了。因此中日省區會長范禮安司鐸，便從日本寫信給印度省會長黎味增德，命利公駁學，立即前往中國，這封信，直到一五八二年封齋將畢的時候，才到達了臥亞。所以一過復活瞻禮（四月十五日），利公便和七個同會，相偕東渡。（註七十四）七月三日，利公到了摩六甲（Malacca）這地方由葡國派兵防守，却受着馬來人的重大威脅，所以范禮安會長，雖在那裏建立了耶穌會住院，逐漸發展着，却不敢創辦一所公學。（註七十五）這回海上航行很辛苦，所以利公八月七日到澳門的時候，已害了病（註七十六）但他登陸後，一會兒就恢復了健康，便打起精

神，去趕他所有艱巨的工作。據他自己說，這真是一一跳躍，「這一跳，使他的學業中輟了，不能畢業」（註七十七）還使他不能依著聖依納爵的規定，受畢會士們，在訓練告終時，所當受的那第三年的試驗。（註七十八）不過他剛受過的磨難，也可以代替得，便是他來華後，最初十二年中所當受的，更大更深的艱苦，也儘可以代得。

至於那使他獲得那麼許多經驗的印度，除了在和臥亞，和亞格拉（Agra）的司鐸們，討論這中華古國的真相時候之外，（註七十九）似乎利公從此不會真正的記着他了。可是利公自己呢，在印度境內，他是不會被遺忘的。那勒尼司鐸（P. Leni）雖然穿着印度衣服，也許不是學着他的表樣，（註八十）可是那諾比利司鐸，至少從一六一〇年起，一定會經明明白白，援引過利公的策畧，來說明他和婆羅門人同化的緣由，是正當的。（註八十一）我們不知道利公究竟認得不認得，——即使是簡接的認識——這位相距遼遠的門徒，（註八十二）不過目前我們已到了認定他們兩人，具有共同見解的時代，我們却要從那對於理論比較注重的，諾氏那裏，看出一一般「中國化」的傳教士們，所採的方法，即使從最精微的神學學理上說來，也是很當的。

第三章 中國文化的發見

當利瑪竇神父在澳門駐足的時候，正發生着一種殖民地政策的爭衡，使傳佈福音的工作冒着一再遭殃受禍的危險。以前，我們已經一再講過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爲了要在中國攫取商業市場的緣故，互相從事擴張勢力的鬥爭（註

一）所以這裏我們便可以把謀所以趨吉避凶，使意大利傳教士們得以在穩定狀態中進行工作的適當辦法，概述一下。

一五一一年，葡國東印度總督亞爾蒲葛格（Albuquerque）在摩六甲，初次遇到了幾個中國商人的當兒，那時候的形勢，初看起來，似乎對於葡萄牙人有無窮的希望。中國人因着這位大將很客氣的歡迎他們，又替他們出頭反對摩六甲酋長的勒索，得了利益，便入了他的誘惑，給他捧場，先引歐洲人到了暹羅，隨後，又引他們到廣州，替葡國使臣畢萊斯（João das Pires（一五一七年）開了門路；回朝廷臣在中國皇帝前說了他們許多壞話，又設法替他們開脫。但是後來平塘（Pinang）的馬來族酋長申奏明廷，說西洋人是來刺探中國軍情，預備將來侵略中國，因此，北京政府就起了猜疑。這班新來的歐洲人，却又做下了幾件蠻橫的事情，於是攻擊他們的人益發振振有詞了。此後四五十年中，西洋人到中國來，和中國的私販們做交易，就得冒着危險，遇到了日本海盜，也許連生命都不保。他們在這幅圓遼闊的中國的邊沿上度着生活，對於這樣廣大國家的內地情形，只能從幾個俘虜口中打聽到幾微的消息。聖沙勿略就根據這些不完備的報告，比照日本的情形，畫出一張中國文化極草率的圖稿。這位東洋宗徒（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二日）逝世後，葡國政府便和中國海防當局成立了一種媾和協定，後來雙方關係逐漸改善，等到葡國艦隊協助中國剿滅了海寇之後，葡萄牙人才能在那

「蕞爾彈丸」的澳門半島上獲得了插足地，還許他們一年一度——後來又改作一年兩次——到廣州買辦行銷日本的貨物，但不得上岸住宿。於是澳門便成了一種自由貿易的通商口岸，一般流浪的中國人便爭先跑到那裏去做牙子或是做舌人，但葡人和中國智識界的接觸，却是只此爲止，不能再進。所以到了十七世紀中，還有人說過這樣的話：（註二）「澳門這城市雖則是在中國境內，可是他的居民（指葡人）却特別是因和日本通商而致富，他們在那裏受到榮譽的招待。因此，他們對於日本的風俗民情要比中國的熟悉，不但是這樣，而且澳門的西洋人大多數竟自認不明白中國的情形。如果他們留心中國的事情，這總是關於他的商品的事情，却不是中國的文學或是法制。」這些話，就說明了一五五四年來華的耶穌會白賴篤（Nuniez Barreto）和多明我會克羅滋（Gaspar da Cruz）兩位傳教士何以覺得不能信任那從倭虜口中得來，雜亂無章的報告。（註三）

過了十年（一五六四—一五六五），當葡萄牙人，由廣州當局居間拉攏，設法和中國政府重修舊好的時候，這種隔閡就消除了；然而他們的請求，受到極大誤會，甚至把他們誤認作「摩六甲商人」看待（註四）。葡國人的交涉失敗了以後，當下便有一位耶穌會士貝萊士司鐸（P. Francois Perez）具呈中國官廳，請求准其上岸居住（註五）。他說：「我是一個博學的明師，週遊世界，到貴國來傳授天主的宗教，和我的同志們所做的一般，他們也到其他各國去傳授同樣的眞道，同樣的宗教。我聞中國是個堂堂大國，有許多明師和博學士，所以我來請求列位憲台發給我一張文憑，准我同他們晤談，彼此交換學識。此外，我更請求准我上陸，在一所小屋裏居住，照我的心意安住幾時，以便我在那裏向創造天地萬物的天主，爲中國皇帝，爲他的全國，特別爲治理中國的全體官府祈禱，因爲我不能在海上祈禱，這是違反天主誠命的；再則，

我已年老（照中國人算來是五十七歲）受了病痛的磨難，海上的嚴寒，又將使我重罹疾病，這件事准了我，就加給我一個大恩德。」一般說來，這些大官憲接待他還算客氣；「他讚罷了他的狀詞，官憲們就問他是學甚麼的儒師，教的是甚麼。他便由舌入譯稱，他是專究天主事理的明師，教人應該怎樣自救，官憲們便詰問他怎樣救法。他回說：「毋殺人，毋竊盜，等等，」把十誡一一數說了一遍。這就使他們認為好極，因此立刻命他的一個當差，給他一塊透明的玫瑰紅綢，圍在他的頸項上，作為他是明師和「天主的人」的記號。隨後又問他有沒有書本帶着，他回說有許多書留在商埠上（當然指澳門）隨身只帶得一本日課經。他們就問他要來，大家看了一回。這當兒，布政司突然動問，問他中國話會不會。他回說不會，藩台便說，這樣，他在中國就行不通啦，因為他少不得要帶繙譯，如果他會說中國話，那就極容易了。」

這張文憑真了不得，憑着這一紙文書，未來傳教士們所當有的插足地便確定了。一五七五年，耶穌會教士們在澳門勸化一個佛教僧徒，爲了要使教外人迅速棄邪歸正的緣故，甚至廣州引起了那一次的糾紛（註六）。幾個住在那很小的住院裏的會士們，要是不能專心學習中國言語，便立刻會覺得要在中國宣傳福音，實在是等於夢想。他們會引用一句俗諺來作比喻，說：「還是洗白一個黑人要比較容易一點。」（註七）那時，耶穌會遠東教務總巡閱范禮安司鐸在到日本視察以前，曾在澳門羈留了很久（一五七七年七月至十月——一五七九年七月）（註八）。這時候，他才明白要在這緊閉門戶的中國境內開教宣化，教士們只會說廣東語還不够，還得學習官話，不但要會說話，而且要會讀書，會寫字；這種任務非常煩雜，所以范公所指派的那位羅明堅司鐸雖曾從貝萊士司鐸，學得印度濱海一帶漁民區的言語，（註九）一朝奉到上峯需要的命令，真使他大吃一驚，然而他不得不鼓起勇氣，服從命令而從事於他應爲的工作。

在范禮安司鐸心目中，這種研究語言的工作，還得有另外一種工作相輔而行，這便是研究中國文化的工作。先是，耶穌會總會長梅古里盎曾囑咐范氏着手編撰聖沙勿略傳，所以他一到印度之後，（一五七四年）便開始按着這位東洋宗徒曾經到過的地方，留心搜集一切有關文件（註十）。那時，馬斐司鐸和利公商議過這件事情，問他那幾個能作最好的考証。利公便回答他，只說：「范禮安司鐸現正從事搜集各種詳細信實的資料。」（註十一）

這當兒，其他方面的人們也在打算着解決這個困難問題。當葡萄牙人在中國西方登陸的時候，西班牙人也打算從東方進中國，却因經度測定得不準確，以致中國的方位，不能依着那分界線認得明白，便把中國劃作他們勢力範圍的一部分。幾個斐列濱的奧斯定會教士們，尤其是那辣宜司鐸，便利用了那時海寇李麻洪（*Limahong*）所引起的幾件不幸事件的機會，到福建去整整住了一個月，從那裏的一家中國書坊帶回了百來本書，憑着這些書本編成了一本關於中國的報告書。（註十二）利公從印度乘船出發的時候，曾在船上獲悉了這件事情，因為那時有一個會於兩年前，同他的長上雅發祿（*J. B. de Alharo*）從馬尼刺到過澳門的魯加勒利（*J. B. Lucrrelli*）要到摩六甲去接替一個出身意大利，却入了西班牙國籍的方濟各會傳教士，辣宜司鐸的報告書，以前會到過他手裏。（註十三）

可是當時的形勢，使澳門耶穌會士們研究學術的和平工作，蒙受極大的阻礙。葡王賽色斯弟森薨逝以後，接連發生了許多不幸事件，使葡國一切擴張勢力的計劃，頓趨幻滅。歐亞方面，船主米朗達（*Gonzalez de Miranda*）奉命傳消息說葡萄牙已擁戴班王斐理伯二世做他合法的君主，但以尊重葡國臣民一切權利為條件。這當兒，那以前曾被澳門當局驅逐出境的魯加勒利，便利用着這種環境，打算恢復他前在澳門建立的修院。當他被迫出境的時候，一般反對他的人會

響賊過：「要等天上的列星落了下來，他才得在這裡插足。」如今他們見他趾高氣揚地捲土重來，又在這中國商埠了魯氏的重來，和印度商船帶來的消息，在使中國人得知管轄的轉移，所以那班籍耶穌會士桑采芝才從馬尼刺來秘密籌備一切。大家相信桑氏是仍舊經由日本而回到斐列濱去的，但是其他馬尼刺的方濟各會士們還是相繼而來（註十四。）這些事情，到了翌年二月十三日，因着澳門葡當局一定要他們動身，便都了結，我們也不必舊事重提。據利公後來的記載（註十五）「有幾個西班牙人曾從那新世界，或是西印度羣島（在我們說是在東方）來到了這裏，他們是要到中國內地去的。他們經過了許多危險，可是葡萄牙人却設法使中國人把他們釋放。這件事中國人答應了，只是約定他們不得再來；他們中有許多是嘉佈遣會的修士，（就是經聖伯多祿亞爾岡大拉改革過的方濟各苦修會，）他們以為中國已經歸化了，才懷着一片熱忱來傳教，其中也有一位是本會的司鐸（就是耶穌會士桑采芝。）」

「中國歸化」這便是范禮安和羅明堅兩氏的心願，當利公從印度啓程來華的時候，他們已在澳門了范公於上年三月九日從日本啓程，到了澳門，便專心一志，組織那中國人的小團體。這班中國信友們在和歐洲傳教士們分離了以後，便和其他遠東各地的僑民，在那俯瞰耶穌會住院的山頂上的聖瑪爾定修院裏，組織了一個「耶穌同志會」(Conférence de Jesus) 集合在一起。那時有四個奉使到羅瑪去的日本青年，正在那裏學習拉丁文，和幾種歐洲文字，候船前往臥亞（註十六）范禮安司鐸房裏滿堆着中國書籍，每當公務稍暇的時候，便憑着這班繙譯人員的襄助，查閱各種中文書本，（註十七。）可惜那時羅明堅一點不能替范公辦事；他奉使到肇慶謁見兩廣總督，於五月底使畢回來；不幸得很，他回來後，害上了一個惡瘡，弄得不得法，要變成大病，因此，他就不能再到肇慶繼續辦理那未了的交涉。（註十八）正當羅氏留

居澳門，寒熱劇作的時候，幸得利公帶得一座時鐘來到。這座時鐘，是歐洲的製造品，由臥亞省會長教他帶到中國來，供教士們應用的。澳門耶穌會當局於是把澳門審判官班納拉（Pinela）要派人給粵督餽送眼鏡這件事情暫時擱起，讓羅公休養。（註十九）利公却很幸運，一到澳門，病就好了，便一立即一從事學習中國言語（註二十）；他的老大哥所辛苦經營，却没有完了的一切事情，就立即卸到他的肩上，由他去料理，其中有一件工作，是繙譯一部初步中文課本，以供小學生們應用（註二十一）。這當兒，耶穌會住院裏的一班繙譯人員，已經由羅明堅教到會作初步文言文了，對於利公也是一種很大的助力；可是後來，利公却說他們對於中國文字的智識並不深，「並不較深於商業往來上所有必要的文字。」眼前呢，他自稱他所有的一切，已覺得很滿意，一切都「很便易」，他曾說：「我有許多外面的助手作教師，在教授上，也已獲得了許多便利。」（註二十二）雖然這樣，他在起初學習的時候，却也未曾不經歷過困苦艱難而使他心灰意懶啦。他曾寫過一封信，給那教過他古典文學的老師福奈利司鐸（註二十三），專講他初學漢文時的困難，原書摘錄如下：

「我讀過漢文，老實對你說，這中國文，比了希臘文或是日耳曼文的確截然不同。言語不但跟着許多說法而轉變，而且有許多字音，要有一千多樣（不同的）解釋；有時候，兩樣解釋的字音，只憑發音的輕重高低來分別，一個字分着四種聲音，念起來，念得或者高一點，或者低一點，（後來，似乎利公發覺了南方的五音和強發音（註二十四））所以，有時候中國人彼此交談，要把所說的寫出來，使對方了解，因為有些事物，說起來相同，寫起來却不一樣咧。講到文字，你們如果沒有看見過，或是實驗過，像我一樣，那簡直是件教你們相信不來的事。中國文字特別多，有一句話，有一樣東西，就有一個字；總算起來，有六萬多，（後來利公把中國字和埃及的像形文字相比照，說一萬字已敷日常應用（註二十五））而且諸字各

不相同，又很混雜。你要是願意的話，我可以給你寄上一本附有解釋的書。一切文字，都是單音（後來利公又認識了兩個雙音，這是「依着我們的讀法」）（註二十六）這些字寫起來，是和畫油畫一般的寫法，因此，他們（中國人）用毛筆寫字，正和我們的油畫家用毛筆繪畫一般。他們的寫法到處通行，所以他們的言語雖則相差很遠，却因有了一律的文字，全國人民都能憑着文字，書籍，使彼此互相了解，這是我們（歐洲）的文書寫作所不能的。因此，日本暹羅和中國這三個國家都是很大，很不相同的，他們的言語更截然互異，可是三國的人民，彼此却容易了解，大家都用着同樣的文字。比方他們所用以代表上蒼的「天」字，我們可以念作「西愛羅」（Cielo）日本人念作「吞」暹羅人又另有念法，拉丁文叫做「采隆」（Caelum）希臘人叫「烏蘭諾斯」（Ouranos）葡萄牙人叫「才奧」（Ceo）其他各國的人也都有話法。對於其他諸字也是這樣。此外，中國文字有這一種便利，就是他們在文理上沒有所謂冠詞名詞，代名詞，沒有一位，也沒有單數複數，沒有陰陽類，云謂詞，沒有一時限，沒有一語氣，這一切，他們都用狀詞來補充（就是現在我們所謂專用詞，）這種狀詞他們用得很講究。」

要和一處地方的居民相交接，懂得言語當然是一種必要的方法，但是范禮安司鐸一心記掛着要把中國的情形描寫出來，便命利公立即應用這方法，等不得他把漢文讀得精通。在他所撰寫的聖沙勿略傳中（註二十七），他開首就宣稱：「歐洲人每每很喜歡披閱東方事情的記述，所以幾個本會的朋友懷着使大家都知道東方的心願，一接到在印度傳教的司鐸修士們寄來的書信，便在各處譯好了，刊印出來。只是這些書信，出於許多人的手筆，他們又都天各一方，相距窩遠，再則他們寫這些書信的時候，不會想到要刊印出來。刊印又不是奉命的，因此種種的關係，結果就不免發生了

一種混亂的現象，使人不易明瞭真相，或者有許多地方與事實不符的弊病，爲補救這種流弊起見，我認爲有把這一切的事情用更清醒，更有次序的記載，寫成一部聖方濟各沙勿略史傳的必要。在這部史傳中，我得處處謹慎，凡是不很真實，不甚確定的事情，我一概不寫。」

范禮安司鐸對於這些東方民族尤其是對於中華民族，所以立即報告的緣故，是因那時歐洲人不能實行那所謂「雜板」方法，要他們明白，研究這些民族的文化 and 風俗民情，究竟不是一件徒勞無益的事情，恰是相反，便是在墨西哥，那在幾位方濟各會的大人物，如薩哈公（Bernard de Salsani）等所認爲使他們的傳教工作，適應着這新民族的一種有利的初步辦法，在范公却把他看作一種必不可少的預定計劃；這不但是爲要了解過去事實，却也爲要以明慧的眼光，去預測那未來的情景。我們見他對於東方各民族的情形，總是那麼細心，就最可靠的來源去考証他自己的寫作，便是爲了這個緣故。

那時，所有關於中國的一切著述，或是刊印的作品，却都還平庸得很。桑采芝司鐸所說的話很不差。他說：「這一類的記載已很多，似乎不必再加上其他他的作品，大家也覺得不願意多講了。但是實在所有的著述都是有毛病的，因爲有幾本書中所講的事情在中國是沒有的，或則有許多事情在中國是有的，而這些書中却把他略過了。再則，這些書講來也雜亂得很，有幾個作家從來沒有到過中國，却也寫起來了；他們所講的事情多有出於臆測；有幾個雖則到過中國，却在受有限制的地方，住得不多幾時，行動很不自由，而且來去匆匆，不帶繙譯，也沒法作有條理的考察，採訪起來，既不明，又不澈底。」這在我們讀過那幾個葡籍俘虜的報告，那多明我會士克羅滋（Gaspar da Cruz）的陳述，或者即使讀過那奧斯定

會士孟道若的古典作品的人，對於桑氏的估價是不會認為過於嚴刻的。孟道若 (Gonzalez de Mendoza) 曾於一五八六年把辣宜司鐸的筆記，和他所有從福建得來的中國書籍中摘下的選錄，以及幾個到過中國的方濟各會教士所得的資料，彙集起來，編成了這部書。而且桑氏對於一五八三至一五八四年間龔多奇 (Gonçalves) 為紀念聖類思公撤格而作的「中國概況」一書，或是對那一五八二年秉多 (Mendez Pinto) 和在里斯本的馬斐司鐸合作而撰寫的類似小說的記述，表示懷疑，也是正該如此。這種根據不正確的情報，而造成與事實不符的結果，我們不難在馬斐司鐸描寫中國人宗教那一章中看出來啦！(註二十九)

為謀補救這種遺憾起見，那在斐列濱的奧斯定會教士們曾採取一種策畧，却因時間不足，又缺乏便利，不能澈底進行：我們西洋人既然不能進入中國久居內地，就該竭力設法使中國人來就我們。那時印刷事業，在中國極形發達，不但歐洲各國無與匹敵，便在歐洲，也難與爭衡，要實行這種策略，最簡便的辦法，就是開設一家中國書坊，各種書籍，要力求完備。無疑地，羅明堅司鐸必然會奉到范禮安氏的命令，在廣州着手籌備。無論如何，一五八二年三月九日，范公回到了澳門之後，他的最先要務之一，便是努力搜集各種門類極繁的作品。利公前在印度的時候，便已以精研史地，善繪輿圖著稱，當下便立即請他做一篇中國概說，要他日夜工作，「迅速完成」(註三十)。他要約略批評中國學術的時候，可以借助於羅明堅所有的經驗，可是這種經驗，那時還是籠統得很咧。利公這篇作品，結果由范禮安司鐸在聖方濟各沙勿略傳中採用，分佈在三章中(註三十一)。有時候，也印成單行本，給他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題目：叫做「中國奇觀記」(註三十) (Traité des merveilles de la Chine)

這個標題，就足以單給他一個人證明，在這篇記敘文中，對於那所謂控制着西洋人和中國人間最初關係的藐視觀念，一點也沒有不即不離的態度。（註三十三）——他在這時代中所編撰的其他一切的記述，也是一樣。十六世紀的中國，覺得自己要比在他週圍的各國要較勝多多。便在這一點上，可以知道他的意氣自豪，真是無可限量；他從各處收到的，無非是歌功頌德的表章。證實了他國運的治隆。她自信是他天下的中心，是亞洲最高的聲名文物之邦。那最先到中國來，叩關求入的歐洲人，都感到了活躍的印象。他們從那戰亂頻仍，好像害着好戰病的印度、安南、和摩六甲羣島這一帶地方出來，看見中國到處現着昇平氣象，在這廣大的疆域中，自西徂東，自南徂北，四通八達，行路可以確保安全，便不能不因此而有深刻的感想。至於傳教士們在中國發見了各種情形之後，便發生了一種侮蔑的心情，只覺得不高興，這是因他們對於這種文化，還只隱約看了一看，當然不會有欽佩的表示的。

可是，到了他們能够用手摸摸，這中國世界的幾件重要質素時，這種情景，就改善得多了。利公給福奈利司鐸解釋一番的情形，正是如此（註三十四）。他說：「我們在這裏，很約略地計算中國皇帝收入的賦稅，才知道他每年要有一萬萬（兩）以上的收入。可是假使你以為有人要懷疑我們說了大謊話，（我想幾乎一定要發生這回事。）那麼，我就許你把我相信所寫的這個數目塗抹了，假使這封信要給人看見的話，好教我們的報告，不致被人目為荒誕不經。不過你是知道我的，你知道（假使我說了，是因）我相信這話是真實的。」這裏，我們可以明白傳教士們，雖則一定要中國人相信他們所傳的宗教是卓越的，却並不否認中國文化的偉大，他們的意見恰是相反，哪但這件事實，經過了切實證明之後，却使他們遇到一個難題，使他們冒着足以引起謗讟的危險。

如果中國只是一個文化低落的國家，中國民族，據說是只有原始時代的文化，沒有傳授，沒有歷史，那麼，歐洲各國對於中國的認識，當然不見得要比認識格林蘭和航海經過的西北地帶，較為重要，比了發現摩六甲羣島和那裏所有的香料，那更一定沒有甚麼用處了。無奈中國委實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他所有的文化要比他所不會認識的西方文化，絕不相同，而且歐洲人既然久已自信唯我獨尊，他們就自認歐洲便是一宇宙一啦。豈知地中海畔的疆域中，所產生而發揚得燦爛光明的文明，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在亞細亞大陸的極東，別有文明，比了歐洲文明毫不遜讓，也許還要比拉丁希臘文明較勝一籌，不但較為完備，而且更重要的原因，也許是在較為古舊（註三十五）這最後的一點，在范禮安司鐸的論著中，並沒有顯著地伸說一番，因為那時似乎還不能覺得中國的歷史書籍，要等過了幾時（一五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前）才設法在北京辦就送到（註三十六）。反之，在三位意籍耶穌會士的集體著作中，却暢論着中國文化是相當完善，不過這種完善，和其他各時代中，一般嚮慕中國文化的人們，在華所見的，不是完全一樣罷了。范禮安氏所講的中國，不是十九世紀中，歐洲人所稱道的中國，製造粗劣商貨，行銷無價值東西的中國，善於製作而不失溫溫爾雅；也不是「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如伏爾泰（Voltaire）輩所想像的中國，把他看作一種「人的理智」的勝利，解脫了一切超性方面的羈絆；他的見解，還是有如十六世紀的一般智識份子，在這人烟稠密的境界中，所能發見而不禁稱奇納罕的一般——這班智識份子是在儒斯弟尼（Rusien）所屬各機關統治下的司法界中，和在看到古典遺跡的古典文學界中培植起來的——在范氏刊行的原著中，專論各種「德性」的寫作，佔二十一頁，論「秩序混亂」的，只佔着八頁，還有兩三頁，却是對着中國人的特點，比方婦女們幽媚貞靜的生活等，表示欽佩。

然而我們切勿以為范氏書中的記載，全是確切不移的事實，後來利公在華僑居了三十年之後，曾親自批評這些初期的論載。他說：「我們曾見過他們（指中國人）最繁盛的各省，天天和這民族的官長紳士們談論，我們講着中國人的本土話，有意學着他們的禮法風尚，最後，一編在手，晨夕不離，那原是很重要的事情。凡是生平沒有到過這不啻新的世界的人，這些都是絕對辦不到的事情，他們只靠着信賴他人，而寫作，所寫的不是目擊的事情，却是聽得來的事情哪。」（註三十七）再則，有了經驗，才知道書籍的本身，事體縱然確實，而在一個文章絢爛的國家，也不應絕對信賴，「往往事物的真相，遠遜於名筆的言傳。」（註三十八）

這些事情，且不必管，范禮安氏所編撰的聖沙勿略傳中，也有利公所繪製的中國輿圖，這是於一五八二至一五八三年間繪就的；因着他是表明中國文化的第一圖稿，便使人感到了無上興味。這幅地圖和那些畫在帆布上的輿圖相彷彿，上面劃着平行線，和子午線的方格。那時，利公對於中國的地名，還知道得極少，又很模糊，所以他在這些方格上，小心翼翼地按着經緯度，分佈着幾處已經知道的大都邑，以及山川、道路，緯度相差還不多，經度，却差得很遠（相差約有好幾度）。因此，他所繪就的這張中華帝國圖，是走樣了：北部太狹長，把北京的緯度，定為四十七八度（應作四十度）；中部太漲大，由於不能確定兩邊的疆界。可是這總算是中國，包括着當時的十五行省，和幾道大江的特著的河道網（註三十九）。這幅地圖，列在聖沙勿略傳的篇首，於是范禮安司鐸的著作，終於編成問世了（註四十）。

范氏的作品，分作極不相等的兩大部份，一部份表示這「中華大國」固有的德性，一部份表示秩序紊亂，但是第一部份篇幅佔得太廣了，所以再分為兩份，列作兩章。第一章所講的最後一點，就是中國治民之道，范氏認為極關重要，便在

第二章中盡情闡發，佔了全部篇幅。范氏從日本回來，知道遠東各國的文化都發源於中國，因此對於中國嚮慕益深（註四十一）。他在這部書中開首先泛論，「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並沒有甚麼相似之處，而他却在各國之上。這便是最重要的那件事，而且中國在東方列國中，最為富有。他在某幾點上，和我們歐洲各國的富饒，和完備很相類似，勝過的地方却也不少。」接着，范氏便依據中國人的書籍，和所得的情報，或是依據臆度，而數說出七個卓越的優點如下：

（一）中國是個疆域最廣大的國家，屬於一個君主的統治，南北縱四百餘法里，東西橫三百餘法里，為防禦蒙古民族人入寇起見，在邊疆上建築了一座「很大的城垣，縣延三百餘法里，幾令人不能置信」（註四十二）。

（二）這是一個人口最稠密的國家，全國分作一百五十餘府，一百五十餘直隸州，一千一百二十餘縣，許多地方有軍隊駐防，（大的四百九十三處，小的二千五百九十三處），村鎮多得不可勝計，納稅的居民有六千零二十五萬餘人（註四十三）。

（三）全世界中，沒有（比中國）土地更肥沃，物產更豐富的國家。中國人雖則比歐洲人吃得多，却有可以滿足一切需要的物產：五穀，蔬菜，果品，家畜，野味，魚類，「難以悉數」……而且這一切的東西價錢都極便宜；也有酒喝，大衆吃米，有些人吃荔枝（註四十四）。

（四）資源的豐富，看來其他任何國家，都不能和他相等。金，銀，和各種金屬礦很多；稀有的商品，如麝香……等也不少；江河中船隻往來不絕。這些事可以獲得一個最好的憑據來證明，就是把中國皇帝所有各種的賦稅，約略計算一下，便知他個人所有的收入，要比全歐洲的（也許連非洲的一併在內）諸王公收入的合計還多。戶口

稅約計三千萬金以上；供給性質的捐稅，如鹽稅等，在五千萬金以上。這些賦稅，他們的書籍上，都開列着詳細的數目，但是我只開總數，省得太煩了。』至於關稅，據說廣東一省，就繳解給皇帝白銀三千一比高斯（*piccolis*）。（有些人說是四千，這就合着七百四十萬餘的「杜格」（*ducats*）啦。（註四十五。）

（五）中國天氣溫涼，民生安定，看來沒有一國可與媲美；風景美麗可以入畫。（原文作：「天然景色好像一幅圖畫。」）他說：「假使我不曾用過一番功，費過許多心力，從他們的書籍中博引詳徵，製成了一幅全中國的地圖，把他滿佈全國的都邑城市，以及所有山川湖沼，一一列名其上，連我自己也不能置信，這真正是奇觀哪。」他看見了中國南部的幾座大城池，和城裏所有的市場，寬大的街道房屋，「也許沒有歐洲大廈的富麗，却蓋着很好的瓦片，」便認中國的城市，「即使不見得比歐洲的城市更爲美麗，也總是一樣的美麗，」所有橋樑，「看來好像是出於羅瑪人的手蹟。」（註四十六）

（六）中國的人民，是全世界最勤奮的人民，「便是那瞎子和跛子們，也能自謀生活，而不虛度光陰；乞丐也不多見，沒有一寸的土地是棄置的；一切都能善爲利用」（註四十七。）

（七）他是在所有已發見的各國中，一個最平安，治理得最好的國家，這是一件應使我們驚訝的事。尤其是因這些異教人民，沒有得到真理神光的燭照，不知道治理的真道。『范氏認這一優點極爲重要，所以足足寫了一章篇，加以討論，這章的命題是：「中國皇帝及皇族的地位，職官及其治民法。」這最後的一點，比了那以前的六項「奇觀」，更須詳加伸述。澳門的葡萄牙人，去見中國官憲，當時的情景，顯然使他們留着深刻的印象。駐鞏

慶的兩廣總督，接見這幾個罕見的西洋人時，真有王廷的氣派（註四十八。）便是那在澳門職司管理本國人民，給他們維持治安的小吏，也想憑着那外表體面的排場，來誇耀他在封建制度下，所有絕微的權力。利公曾給我們留下一篇描摹盡致的文章，敘述他進見這位官員時的情景，和後者在街道中賣弄他騶從簇擁的威風，他說：「一天，我們去拜會他，承他看得起我們和我們的學問，便格外加恩，立起身來，不要我們下跪，可是我們就此站着，站了有近半句鐘光景」（註四十九。）

范禮安司鐸給我們傳下的記述，要是把他逐一詳細分析起來，那必然是很有趣味的。他開首先講中國「皇帝」，照我們通常說話就是一「總皇」北京的皇宮，御花園，皇位繼承法，以至各種大小官僚；「他們好比中國的神道，因為一般平民對他們是那麼畏懼尊敬，甚至真正朝拜的條件，也已毫不欠缺（註五十。）他們雖則照例無權拿刀殺人，或是把人無端處死——除非是幾個最高品級的大員——可是一應官員，都可以施用笞杖。那藤條竹板，打起來非常殘酷，所以老百姓都害怕他們，對他們必恭必敬，過於我們對於歐洲任何君王。」范氏對於中國官員治理人民的非常方法，另外提出五種特點，加以伸述如下：

第一點，中國人民只能憑藉考試，為進身之階，以博取功名爵祿，因此，各處城市鄉鎮，便有無數學校，幾乎處處都有，有幾個大學，學生多得，「無以復加」，他們的科學，雖則要比我們的不完備，他們的科學程度，似乎還在亞列斯多德以前的古哲學家之間，——亞列斯多德創立了論理學之後，當時的科學，也因獲得甚多信道的真光而昌明——然而他們也已認識了自然哲學和倫理學，天文和各種算術，醫學，以及其他各種科學，尤其是中國人對於文章和國語兩門。正如我們對於

拉丁文一般，必須下過多年研究功夫，才能理會。此外，他們還得特別研究本國法典中的民事法和治民之道。末了，他們也有書籍，而且要比我們歐洲所有的多，這些書籍，都是印就的各種科學書，也有許多別的書籍。這些便是歷史詩賦，以及其他萬千門類的書，但看中國各處都邑中書坊林立，已足使人稱奇納罕了。事實上，一般有名望的人，大都一輩子在文字中討生活，他們日常的功課，無非是寫文章，著書立說罷了。再則，中國讀書人多有珍奇的書籍，專講中國的一切事物；有的講各種礦山，各地方所有的財貨，和其他一切的東西，下至各種禽獸，魚虫，花草，樹果，一切植物，以及其他種種微細的東西，無不應有盡有；各物的特性，也有詳細說明。這些書籍很值得一看，我把許多書拿在手裏，看看他們怎樣描繪他們的圖畫；有許多事情，我也留心研究，找人給我講解，還請幾個繙譯的好手，給我把手中原文譯出。」（註五十一）

這許多頌辭，以後還得略為提及，但是這種治民之道，所有的特點，仍當使人常懷欣羨，所以那第二點，就要說「中國人民的馴服，和國內秩序的安定了。因為中國的治法雖然不免嚴酷一點，而人民的馴服，也不免出於卑鄙的恐懼，可是照他的辦法來治理人民，在我到如今所見過的世界各國中，要算中國的秩序是最好。」第三點，辦事極認真。第四點，憑着極遠大的見識，來消除國內和平的一切障礙，對於外國人的警備，手段高妙，令人欽佩，而且定下死刑，以防本國人民私出國境，或是藉此引導外國人入境。第五點，是他所有藉以防止人民叛變的法，命宗室親王分駐各省，却不准他們干預民政；任命各省地方官，必須迴避本籍（註五十二）。

范氏對中國如此頌揚一番之後，便有人提出質問說，「可是在這個好夢正酣的國境中，難道缺憾一點都沒有嗎？」范司鐸便答道：「有的，既然他們缺少着一件主要的要事，就是認識天主，和天主的宗教，因此，國內的秩序，和他們在所有

治國的方法中，所保持着的卓見，不足以防止許多極嚴重的變亂。」原因是（一）官府濫用權威，咎責近乎專橫，致多冤抑虐民之事，但朝廷有按時巡察之律，以圖補救；（二）不尚武事，結果養成怯戰之風，雖則據說毗連滿蒙一帶邊疆，和常受倭寇侵擾的濱海區域，軍民抗戰意志要堅決得多；（三）中國人對於外國的一切，都「遠而避之」，「一般下層民衆，似乎全是全世界最壞的人民」，雖則那些信奉了天主教的，「看來實在是好的，而且是虔誠的，似乎他們如果都能信奉了我們的宗教，獲得聖道的眞光，諒必大家也都是這樣」；（四）人口過於繁盛，因此盜匪海寇，到處充斥，「防守沿海一帶的水師，有時作惡甚於海盜」；（五）官場中犯着幾種大罪惡，如狎變童，和過度的飲宴，以致他們雖則有知機應變，長於治理的天才，却心粗目眊，對於認識天主，靈魂福樂，以及身後禍福諸事，竟如蔽塞了聰明一般，聽不見也看不出，因為這些事，他們一點都不知道，而且一點沒有聽到過，也不願意聽人家給他們講道理，却是東耳朶進，西耳朶出，一點沒有聽得入耳，這真是令人詫異的事，」只是「一件事，却和一切異教國的情形完全相反，」這便是中國婦女們幽媚貞靜，實屬不比尋常。」（註五十三）

范禮安司鐸在結束這篇論文時，又把中國的語言，風尚，酬應的禮儀，和各派各門混合的宗教，加上了幾句清晰的說明。依着范氏所說的一切話，大家都能斷定天主教傳入中國這件事，必然是多麼便利啊。無奈中國的「門戶是緊緊關着，中國的智識界，也是那麼封鎖着，天主的事理，就進不去啦。再則中國的官府，無論如何總是拒絕和外國人談話，尤其是和外國人來往。這樣深閉固拒，使人無法叩門而入的情形，在其他各國中是絕無僅有的。此外，中國官場中，隸屬極嚴，下屬對於上司非常恭順，非常畏懼，封疆大吏對於當朝宰相，也是一樣，所以宣揚聖化，如果不是探本求源，先從皇帝入手，那麼，這

扇門似乎永遠敲不開。目前，最好有人能進京去觀見中國皇帝，當面談談，這件事，照人的力量講，我們外國人似乎總是辦不到的；可是天下事，在人是不可能，在天主却件件做得到。本會的兩位司鐸，在這中國境內學習官話，已有好幾年了，他們所辦的事情也已獲得進步了，我們惟有依着這條路，才能希望（究竟有沒有希望，全在我們能不能努力做去）在中國和人接近。（註五十四）

總之由於耶穌會士們對中國深加重視，才能如利公日後所一再道及的，使「伯拉圖但能於理論上成立的，思想在中國見諸事實」（註五十五）實現了為民真牧的「哲學家」的無上權威，而且「這中華民族完全不能接近」這種假想，也沒有絕對予以証實。羅明堅司鐸曾為廣州城裏幾個中國人，士所邀請，其中有一個是駐防將軍，「在自己的公館裏，很親熱地招待他，請他同座進膳」還把自己的兒子授給他教他抱」（註五十六）所以如果利公把范禮安氏所籌劃，而由羅氏草草實行的方法，再加深切研究，使他成為十全十美，那麼，他就有在中國社會中，向前更進的種種機會。

第四章 步武羅明堅司鐸的後塵

在范禮安氏所有廣大煩雜的計劃中的一點上，這位青年教士利瑪竇司鐸，當下便已表現他對此確有把握了。他於歷史地理語言，具有特長，這是無可爭執的。因此，要他着手調查中國情形，雖則這種工作相當繁劇，在他，確也並不為難，而且做起來要比羅明堅司鐸迅速得多。但利公對於那中國傳教事業的發動人，所有其他的囑托，却採用了一種極明智的辦法，先從明瞭他前驅所有已經辦到的一切事情入手，和他一致步趨，所有不盡妥善的地方，且待後來實驗後，見有必要，或應行改革時，再加改正。這一點給利公傳的諸史家，大都不免把他忘懷了，經過一種極平常的刪改之後，這些史家目眩於利公豐功偉績的光芒，便看不見他先驅極有價值的著作了；這正如人們在歌頌巴西開教元勳安謙德司鐸（P. Archidia）功業的時候，每易忘却那位諾勃列格神父（P. de Nobrega）的辛苦經營，暗中摸索的勞績一樣。可是利公自己却恰是相反，每當執筆時，總要歸功於他勇往直前的前輩，便是後來發見了幾處不很妥當的見解，不得不加以改正時，也必出之以極端愛護的哀忱，憑着綜合一切事理的智能，說明所以必須修改的動機。現在，我們也竭力依着這種同樣忠實仁恕的態度，來講利瑪竇氏在開始時候，怎樣步武者羅明堅司鐸的後塵。」

羅氏來華從事傳教事業，在困苦艱難中，所感覺的第一需要，不是物質上的援助，却是道德上的支持。那時澳門耶穌會住院還沒有多大發展，以前我們已經長篇累牘的請過了。（註一）可是照利公後來寫給耶穌會總會長克勞特亞瓜維伐的信上（註二）說：「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們給中國宣傳福音，有一個總站，作為出發點，還不如給傳教士

們中途寬得一處插足地爲有益。但范禮安司鐸已在日本體驗過幕府間封建勢力消長的危機，因而認定必須預備好一處相當安穩的地方，作爲遭難者的收容所，也可使訓練傳教人員的基本事業，獲得庇蔭。他以為臥亞距離太遠了，摩拉加又太容易發生戰爭，便徵得了羅瑪總會長的同意，不顧那些想入非非的異議，決定在澳門成立一所學院，作爲遠東天主教會培養人才的處所。

澳門耶穌會自一五九四年以後，便「突飛猛進，一日千里」的發展着，可是在一五八二那一年上，那可以使人預料的徵象還是一點都沒有。那裏的司鐸並不多，那時他們也和歐洲派駐澳門的各屬傳教機關的司鐸們一般，有一個良心的問題，當前待決：「我們應該先照管那已經領洗的呢，還是先照管其他的人們？」這一點曾爲了摩六甲羣島的教務，向總會長亞瓜維代請示過。亞氏的回示很明確，他說：「論選擇，應該學習教理的異教人佔先。」（註三）可是亞氏雖下了這個指令，有幾個司鐸，以後仍不得不照管他們的本國人，和幾個混合種的本地人，——自然一般葡籍司鐸更喜歡這樣——但范禮安司鐸却盡心竭力加以阻止，不使對於教外人的傳教事宜，好像只該留待非葡籍的耶穌會司鐸們去辦理一般，還乘着葡國王廷提倡真正傳教自由主義的機會，在宣揚基多福音時，杜絕一切近民族專利的主義。便是在贊同羅明堅司鐸所創行傳教方法的同志中——這種人稀罕已極——我們也找到幾個葡籍耶穌會士，那很有聖德很可敬的賈南羅代理司牧（Mr. Carneiro）便是其中之一；他自從正式主教（沙亞主教（Emmanuel de Sa）一五八二年將近五月時到任）到任之後，仍得在耶穌會住院中度他的退隱生活。

統觀全局，當時范禮安司鐸雖則曾從日本函知羅明堅氏，表示他決心支持羅氏的立場，可是我們看了利公書中的

話，便可確知利公並不過甚其辭啦。他說：「近三年來的情景，簡直使羅公在此遭受了半致命的苦難。他和諸位司鐸同在此間，他們都是很有聖德的人，可是對於信友們的情事，惟有職司管理的人們才能了解。」（註四）范氏從日本回的來時候，帶着四個日本專使同來，預備率領他們到歐洲；他回到澳門以後，曾到過廣州去參加定期市集，和中國官員相見。初會面的結果，他認為極堪滿意，便竭力督促在澳門開辦了一個半獨立性質的「聖瑪爾定院」用以容納沒有「葡萄牙化」的遠東居民，和要在他們中傳教，學習中國言語的傳教士。但范公走了以後，澳門的耶穌會教士們就不免要感到不安了。本來澳門耶穌會院長郭梅詩司鐸（P. Pierre Gomez）對於羅明堅司鐸的任務，始終處置得宜，無可比擬，無如他陞任了中日省區副省會長之後，便不得不到日本就職，把原有的職位，另讓他人。這位新院長怎樣辦理，且看利公的書信，便可知道了。

利公這封書信依舊是寫給耶穌會總會長克勞特亞瓜維伐的，他說：「願我公考慮一下，假使總巡閱（即范禮安）司鐸把這裏所有傳教事宜的全部職權，托付給本院院長（指出山下住院的院長，那山上的聖瑪爾定院，屬他管轄，（註六））是不是較為適當。我深信我們三人（羅明堅、巴範濟和利公，巴鐸曾因此暫時受到影響）是意大利人，自不願有所計較，可是那派有職務的人，却該把應有的職權復還他們。有一位司鐸是由省會長（即印度省會長黎味增德）派到這裏來做本院院長的，他以前曾做過印度各學院院長，（也許這是指賈法拉司鐸（P. Jorge Carvalho）這是和利公同行，派往日本澳門的七位耶穌會司鐸中唯一留名的人，（註七）如今他又由印度教務總巡閱領回了。」一五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這位司鐸曾給我一再說過，他要是留在這裏做院長，要把所有學習教理的青年們一概驅出。他說這句

話，並不是因爲我們辦理不善。因爲他和我們其實很友好，實在是因他管慣了學院，對於（新）教友，却絲毫沒有好感哪。

其他種種的事實——以前我們已經說起過（註八）——也足以說明利公所有惴惴不安的情緒，並不是一杞人之憂。不過他寫這封書信的時候，無疑地還不會知道范禮安司鐸已經採取了種種的措置，以謀挽救了。那郭梅詩司鐸在航途中遇險翻了船，便不得不折回澳門，暫復院長原任（時在一五八二年將近十一月月底，或是十二月月初，也許和桑采芝司鐸同回；那時桑鐸所乘的海船也在台灣海面觸礁遇險）（註九）不久，原任日本耶穌會會長賈伯樂司鐸從長崎趕到，便接任了郭氏的職位。經過了這回實驗而有這樣當機立斷的處置，當然，大家對於勸化外教人歸正的宗徒事業不致再怕遭受委屈了！

利公的來華，對於羅明堅司鐸是一種精神上的安慰，這不但在傳教教會內部的措施上看來，是如此，便是對於中國禁止教士們和平入境的禁律上，所有種種障礙的前瞻看來，也是這樣。到了將近十二月初的時候，澳門當局接到肇慶兩廣總督迭次來文，邀請羅氏，一俟病勢痊可，便把利公從印度携來的時鐘隨帶前往相見，這當兒，范禮安司鐸還在澳門，要等到月底才動身；得信後，起先還決不定這件事該怎麼辦才好。據說（註十）讀罷了粵督照會之後，大家才知道，內中還包括着許多別的事情，因爲由中國官廳傳喚前往的司鐸們，應在肇慶城裏建造兩座房屋，一座作爲聖堂，一座作爲住院。這好消息使闔院的人個個歡呼稱慶；這件事情，不論院內院外，個個都認爲已經盼望多時了。但范總巡閱却躊躇起來，不敢遽下斷語。因爲他很明白這是一個極大的計劃，必須有人贊助才行，可是羅公却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援助。如果其他

諸鐸不是全體一致敦促着范氏當機立斷，他差不多要讓這機會錯過了。那時，巴範濟司鐸，正和派往日本的本會會士們同行，到了澳門。范公在諸鐸中獨選中了他。這位巴司鐸才德俱全，雖則不諳言語，看來也儘足以裁長補短啦。范氏擇定了巴鐸之後，再派羅明堅做他的幫手；又命利公主管聖瑪爾定學院中學習教理的青年，如果巴羅兩鐸日後得有良好效果，前途頗有希望，他就可前往加入他們的工作。

事情是這樣安排好了。到了十二月十四日，兩位奉派的司鐸，到碼頭上，似乎正要下船的時候，便見有一艘總督衙門的差船，來迎接他們。他們却延期起程，直到十八日才動身。范公不能在澳門等候他們報告這回嘗試的結果如何，但在乘船前往臥亞之前，（十二月三十一日）却「曾留下手諭，囑咐兩位司鐸，如果此行迫於情勢，不能有所作為而歸來，則範濟司鐸仍當前往日本傳教——這是已經派定了他的任務——其他兩人「即羅利二公」應再候機會，將此事妥為進行，只是他們仍該依着原定的初步計劃做去。」

范禮安氏對於所謂中國的「道統」，常防着估計太低，他所有這種見解，不久就有事實給他證明了。這原是極重要的要點，自應詳加查考，尤其是因中國業已獲得了一種很不相當的聲譽，說他向來是特別放任，信仰自由的國家。可是正如一般人觀察之所得；（註十一）「如果有許多人在中國受人輕侮，這無非是因講過十八世紀的自由信仰的緣故；誇耀中華帝國治理的賢明，這更無異於為史文（Siven）人和加棘斯（Cata）人辯護時，所有一種轉向的方式，這地方既然遙遠，大家自必不會去看得。」

事實上，宗教信仰不得自由——某種程度的不自由——是中華民族歷代相傳的法度。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國人，大都師

法古人，一切言行，都奉古聖先賢爲圭臬，一切事情的善惡，也認識得較爲明白，因爲那時候他們的生活，和伏羲黃帝黃金時代的生活，相去要比我們近一點。中國最古，最受人崇拜的經書，早已命人攻斥異端邪說了，和世界的進行恰是相反。在書經和論語兩部古書中，也已把那些異端邪說斥絕了。孔子週遊「七十二國」的時候，曾毫不遲疑地把種種邪說攻斥不遺餘力，可惜列國諸侯，一個也不肯實行他的王道，可是孔子死了，到了這位大師的遺教，已爭得了相當光明的時代，便有孟子應運興起，大聲疾呼，駁斥揚朱墨翟的謬說，在聖門中，至今爲人所稱道。從此以後，孔子之道，日益彰明，這些異端邪說，也就永爲後人所斥絕了。講到這裏，就發生了一個疑問：既然有了這勢力早已遍及全國，成爲唯一正道的「孔子之道」，何以各種宗教仍能相繼發展，甚至全國遍地都是廟宇，僧尼道姑，爲數竟達億萬，而且流傳至今，雖則勢力已衰，却還沒有消滅呢？這個問題太廣泛了，不在本書討論範圍以內，我們未便給一個完全的答覆，只說這種越例的狀態，是由於孔子之道不足以壓滿大衆的宗教情緒，就够作爲解答了。因爲孔子所講的道德，冷峻而乾枯，人民每當艱難困苦的時候，總得趨向神靈，尋求安慰，而孔子却絕不講神慈憫矜憐的德性。中國在公元後六百年中，政綱失墜，戰亂頻仍，佛教便乘機興起，以至盛極一時，「道教是跟他學樣」——但是到了唐代，中國復歸統一（六一八至九〇六年）舊時所有道統的精神，因此也就復活，一般儒士也便同樣以恢復道統自任。因此唐代儒林對佛教羣起攻斥，其中如傅奕、姚崇，尤其是韓愈，攻斥得最爲激烈，文公的「佛骨表」（八一九年）是這一類文章中的傑作，至今爲人傳誦。到了八四五年（唐武宗會昌五年）朝廷下詔禁止一切從外國傳入的教門，令將所有廟宇寺院悉予拆毀，財物一併充公，這道詔諭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從這時代起，這禁教的詔諭雖則不及道教——而且道教已經立爲國教——可是人民要做道士，必得官廳准許，道教的教長，已

成了朝廷的職官，要負責處理全國道觀所有違法事件；創建道觀，必須先經奏准，違者男子終身流放，婦女入官爲奴。這種辦法，雖則讓人民信奉一教，藉以滿足他們宗教的需求，却仍防止着人民利用道觀作爲一種逋逃的淵藪，在犯了法，白晝不敢見人的時候，可以借道觀藏身。這是在預防道教或是佛教逐漸發展到專政擅權的階段，也在限制寺觀的財產，不至因永不變賣而愈積愈多，無限量地擴充起來。

但這種種的限制辦法，不能使國家恒保太平，不受秘密會社充斥全國的危害。這些秘密會社利用神秘的儀式來麻醉民衆的精神，往往使維持公安的當局感到可怖的威脅。所以明代的法典中曾加入了幾條苛酷的法律，用以制止民衆傾向着這種邪教的信仰，因爲教匪作亂原是屢見不鮮的事情。

這種苛律，我們以爲確有令人恐怖的緣由。有些人還把他資爲口實，說：「中國朝廷那裏會懷疑放任；實在，全地球各國政府中，要算他教禁最嚴厲，磨難最劇烈了。但看明代官廳懲治異端邪說的嚴刻：刑法的酷烈：吏胥的貪婪橫暴：這一切和其他種種的事情，便知這一朝代的佛教教史真是一部血淚的史乘哪。」（註十三）這樣看來，中國政府，爲了維護國家的利益起見，尙且要隨時搜索佛寺道觀，那麼，對於一切新興的宗教，自然更必禁絕在先了。可是也有人說過幾句公道話：（註十四）中國境內，有一件關於外國宗教的事情，足以令人注意的；這個宗教在佛教以後流入中國，却爲官廳所放任。這便是利公所熟知的那伊斯蘭教（Islam）（在中國稱回教）（註十五）一般認中國極端信奉異教的史家，對於耶穌會士們傳教的成功，找不出所以然的解釋，便說那時「中國儒家的道統觀念正打着瞌睡。」但我們在這部利瑪竇傳的評論中，就要說明當十六世紀末葉和十七世紀初葉時代，一點也沒有這種情形。而且，也有人以爲「講甚

麼儒家道統觀念打瞌睡；就一件事實推求他的原因，倒不如把這件事實加以証明，這豈不是更好嗎？」我們討論中國政府對於各種教派的態度，有一件事務必牢牢记取，就是歐洲各國所有使法律嚴格執行的保障條款，在中國的專制皇朝是沒有的。那時的中國，行政和司法的職權，操在一個人手裏，這種情形，就足以說明；如果對人沒有問題，凡是官廳認為有利國家的事，便可酌量情形，不顧法令，隨意准駁。當時統治中國的北京萬曆皇帝，不是也會說過：「釋道兩教，為輔翼儒教所不可少」嗎？不過，有人說，一般官僚，大都出身儒士，所以行使職務，往往意氣用事，成見很深，不稍寬假；他們背後還有一羣開散好事的生員，和人品混雜的候試子弟，往往要以熱心衛道為名，要挾上官，興風作浪；這也是實在情形。但無論如何，中國官僚中最聰明的人，不久便迫於行使職權的實際情形，為各教派謀妥洽，便是那公然觸犯法網的教派，也只得加以開導。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氏（Pelliot）的記載中，（註十六）曾說：「大家知道利瑪竇和湯若望的善意和熱忱。他們還有廣泛的科學智識。這幾個見了他們昭事虔誠而傾心，那幾個因着他們精通曆算而向慕。他們知道許多奇異的事情，却不擾亂公共治安，所以大家聽他們自由，還要向他們請教。」可是這些話，我們還得加以補充。羅明堅司鐸首先試行的這種叩入人心的方法，總得看那答應保護新到教士們的官僚所處的地位，能不能穩定，才可以決定這方法有沒有效用。這幾位新來的傳教士，隨時有被人斥逐的可能。原任官員一朝去職，後任就可以把他所准定的事情，立予撤銷。這樣說來，我們就可以明白在羅明堅司鐸辛苦經營的開創時代，在華傳教事業，成敗利鈍的關鍵了。

當利公帶着羅明堅所備的工作用具，在澳門繼續攻讀，同時給范禮安司鐸翻閱中國書籍，加緊預備摘錄的時候，（註十七）澳門突然發生了一連串的意外事件。十二月十四日，澳門當局正式承認班王斐理伯二世為葡萄牙君主，同時

却寫信給斐列濱的西班牙人，請他們避免一切足以引起中國人疑懼的行動，因為當時情形，已足使中國當局認外國人都存心侵奪了。無奈這當兒，班籍耶穌會士桑采芝，和賈南羅主教，范禮安郭梅詩兩鐸，商議之後，便設法把西班牙直接派遣的使臣，和巴範濟羅明堅兩人合在一起，去見兩廣總督，還預備晉京去見中國皇帝，請求按照葡萄牙人租讓澳門的先例，讓給一個沿海的小島，（諒必是廈門灣中的島嶼供加斯底隆人（Castillans）居住。桑氏爲了這件事情，在澳門居留很久，因而使葡人很感不安。但那時還沒有直開到馬尼刺的船，桑氏以爲只好取道臥亞，或者先到歐洲，再乘船回歸斐列濱。（註十八）是月十八日，巴羅兩人帶了「巴達薩修士」（Freie Balthasar）一個「葡萄牙化」的教友孟斐理（Philippe Mendez）還有一個叫裴若祿（Goncalo）（註十九）坐了肇慶總督的官船，離開澳門，臨行的時候，利公送他們下船。他留下了一個能念中國書，寫中國字的田愛谷（Diego）一個會說官話的麥努埃（Mannel）（註二十）在他左右供職；還有一個印度孟買人亞郎索（Alonso）會隨桑氏到過肇慶，給他作舌人，却因他指斥總督衙門吏胥的么喝，便爲肇慶官廳所猜忌，不准他再去。（註二十一）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范禮安司鐸便帶了四個日本青年，和兩個方濟各會士動身了，桑采芝却仍留着，因爲他終於租得了一艘海船，預備直開到馬尼刺。他沒有等得好久，（約一月十四日左右）便接得了孟斐理帶回的，在肇慶開教最初的消息；經過情形都很好。教士們先住在一座廟裏，覺得太熱鬧了，官廳便給他們一所更方便的房屋；這座房屋在城外，但離城很近。（註二十三）桑氏趁着這送信人的機會，對巴羅兩鐸再行囑托一番，這兩位便再向他表示忠誠，仍由孟斐理回報的那一天，正是桑氏啓程前往馬尼刺的日子，（二月十三日）桑鐸於是懷着這種信念而動身了。以爲他可以絕對算得定要在這兩位中國傳教士身上，實行他一切的計畫。（註二

十四)

這位西班牙耶穌會士帶着這一定成功的信念，到馬尼刺去了；當時在華的傳教教會似乎已有了穩固的組織。但我們先該敘述一件重要的事情，這件事情對於利公日後的傳教工作，要使他感覺到很久的影響。孟斐理從華慶回到澳門的時候，已不穿着葡人的衣服，而穿中國人的長袍了。這是一種新決定的表記；羅巴兩公在二月十日和十二日先後寄來的兩封極重要的書信中，曾把這種決定，解釋得明明白白：（註二十五）

「我們會憑臆度，來猜測那一種目的才能感動總督做這件那麼困難，那麼出人意料的事情。」就是這樣歡迎我們的事情」：據我們看來，可以贊同的意見是這樣：（一）他和羅明堅司鐸初次相見，便有敬慕之心。除了那鐵製的時鐘之外，羅公還帶着幾個計時的滴漏，又帶了幾副眼鏡，他見羅公送了這些東西：既不要銀子，又不要其他的酬報；尤其是羅公在進呈的稟帖中，說自己素來的職志，是奉事天主，研求各種學問；在本國聽說中國人極良善，性情極溫和，有許多優越的禮儀，良好的風俗，還有無數講理的書籍，和許多立身處世淵深精奧的大道理，所以他願意到中國來學習，住在好百姓中，認上國風光；爲了這些緣由，他就離別本國，遠涉重洋，航行了三年，經過了許多危難，才到了這裏。但他不能在澳門觀光學習，所以請求准賜安居內地，生死不貳等語。因此，似乎總督看了稟帖，便以爲這種請求，對中國人是榮耀極了；容留這種蠻夷，使他們化爲文明有道理的人，自然是一件好事。事實上，中國官府對於葡萄牙人確有這種觀念，把他們當蠻夷看待，沒有學問，不懂得禮貌規矩；第二個「使總督敢容留我們」的理由：便是因爲看見了其他的官員，很客氣的接待我們，那時，官場中還沒有和外國人往來的習慣，除非預先極嚴密地防備着，是不會接見的，而且接見時，

還得在公堂上。(三)總督衙門的文牘師爺，待人和氣至極，例如提起要利瑪竇到華慶來，我們問他這件事能不能獲准時，他答覆的口氣，表示澳門的諸位司鐸都可以准許到這裏來。(四)人們不能說總督要我們在這裏作質。因為他待澳門的居民也是這樣。澳門的西洋人該感謝，他給他們供給食物，而且葡萄牙商人們，每年兩次得到廣州互市，也是受了他的惠賜。至於送給他的那時候，他並不當作一回事，大約過了一個月光景，不知道他還去看一下沒有。澳門的天鵝絨更不在他眼裏啦！那文牘師爺會親自對我們說過，教我們不必再費心了。……」

官場中待教士們這樣慇懃，自應該有一點報効，作為代價，這便是巴羅兩公在他們二月十二日的書信中所告訴我們的。書中講着介紹利公到內地去最好的方法，便是教他隨帶一份禮物，送給那文牘師爺，祝賀他的生辰，說：「我們以為在利司鐸沒有和葡人到廣州（參加春季的互市）以前，他的事情還是不提起的好。目下廣州將軍——就是羅明堅的朋友」（註二十六）正在這裏要到察院去拜會那巡按大人：「兩天前，我們曾去謁見他。他接待我們很不差。還給了我們一兩紋銀，作為佈施，談起了我們穿着的衣服，他親自給我們擬定一種頭巾的式樣，說總督和衆官府願意我們穿着和北京的一師父們所穿一般的衣服。……這是極受人尊敬，重視的服式。」（註二十七）這就不免要使教士們和佛教僧侶，就是中國的和尙們，同化啦！巴羅兩公把這件事情通盤打算之後，認為要在中國社會上獲得地位，除此以外別無良法。從此，他們便薙鬚剃髮，穿着長大的衲衣，衣襟在胸口交叉覆着，果然很莊重。他們「對一切人做一切事，好教基多光揚於中國。」講到這回極重要的決定，我們不但後來看見諾比利司鐸在印度傳教的時候，竟依據這先例而公然仿行，且更從諾氏找到了神學理論上的正當根據。諾氏的答辯文——太長了，不能在這裏錄出，便是概括地錄出也不行——是後來一六一

○年的作品，先寫了八篇緒言作開場，以後便分作十一個神學論題，依着士林派的論辯法反覆伸述，藉以證明他這種行為，是很有根據的。（註二十八）現在我們只從這篇辯論文中，採取那足以說明本問題的片段。

諾氏在緒言中，先證明一件外表的行事或是行為，（或是一個標記）他的本身，並無甚麼善惡，假使這不是憑着一種外來的名稱，而出於意願的話。（註二十九）再則，異教人的一切行為，在沒有証實以前，都不是罪惡。（註三十）因此，我們在沒有明瞭他們這樣做，或者這樣用，是爲了甚麼目的以前，不當指斥異教人的行為，或是標誌。（註三十一）可是這種目的，單讀聖多瑪斯或是其他士林派作家的著作是不會找到的，惟有在異教人所有講論這種題材的書本中，才能找到。因此，諾氏便把印度婆羅門經典中的條例，說出。這些經典中所述的行為當然有些行為的本身，和他不正當的做法是不善的，比方敬拜邪神，便是這一類的行為，可是還有其他的行為，如結婚時所有的儀式，階級的標記等，是外表的，無可無不可的，全看做得怎樣，才能成爲不善。：「這端道理，是根據聖奧斯定所著「基多教理」第二卷中的學理，由聖多瑪斯加以引伸的：(La Sae qui. q. art. 1er. in. C) 1. 凡是由人類創造的一切敬拜偶像或製作偶像的行為，或是一切對於一個受造物或受造物的一部份的敬禮，有如敬拜天主一般的事情，這都是迷信的，「因此，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在有敬拜偶像罪的情事中，凡是不有意犯這罪的人，只因他做的樣子不好，才如上面說過，有了罪。」

諾比利司鐸提出了這些前提之後，便就他所有的十一段論據，逐一加以開發。第一論，異教人的行為可分兩種：（一）是人的行為或因出於本性，或因由於共同習慣，趨向宗教敬禮的行為，例如燒香等。（二）另一種的行為，在人自己是無可無不可的，却因迫於習俗，而趨向於異教人的舉動，這裏也有三種不同的方式：

(甲)可說是純屬物質方面的，只因制定這些行為的是異教民族。(乙)是爲了區別奉教和教外的緣故，這種區別並非爲宗教關係，却爲民族關係，(例如羅瑪的猶太人總得帶着黃帽子使人認識。)(丙)是爲了宗教關係，表明信徒和非信徒的區別，這種行為，可出以兩種方式：(子)這種舉動，同時屬於人生應有的需要，例如我

公教中神職班的制服，和異教中僧道的服裝，衣服本來是用以蔽體的，同時却也可以爲了宗教的用途而別創一格；(丑)這種舉動只是由於宗教規定的需要，例如我們司鐸們所用的幾種飾物，在異教人的祭禮中也有使用的。

第二論 前項(一)的行為是不能做的。的確，聖日羅尼莫和教宗安特里昂(Adrien)曾說過在沒有給人立下壞表樣的時候，假使有急切的必要，這些事情是可以做的，本會的「伐朗濟亞(Valentia)也認爲這種意見未必不是如此。(2a 2ae, disp. 1a, q. 3a puncto 2)我呢，我對於聖日羅尼莫理當尊重他的意見，怎能加以辯駁，然而我總沒有依着他的話實行過。」

第三論 在一已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就是上文(二)(甲)(乙)所講的事情」都不是有罪的「假使新教友們不能用原有的衣服，便該把這衣服更換，這未免很難受了。本會所有在日本，中國，英國，土耳其希臘的傳教司鐸們都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第四論 所有在宗教觀點上用以區別教友和非教友的東西，假使這些東西的性質，在人事方面是一無所用的「(二)(丙)(丑)」……那麼，據我的意見，這些東西是不正當的」……然而我們也不妨一問自己，要是這種衣服或是標記，同時也算是體面的，那麼，可以不可以穿着，或是佩帶着，來裝體面呢。直到格拉濟亞(Garten)時代，羅瑪奉教

的總皇們還佩帶着那教長的領帶，這是異教各教長在舉祭時候用的，那時羅馬總皇還自稱為教會元首。這些事情既然是這樣，便另換了一種意向而轉入那除了宗教性質以外，別有性質，別有一種社會意向一類事情的範疇。」〔(一)(丙)(丑)〕這顯然是屬於和現在所有關於衣服問題一類的東西。

第五論 但這最後述及的行為「(一)(二)(丙)(子)」有沾染迷信的可能，其沾染的程度不等：(一)或在名義上是相等，(二)或因最初目的，是屬於民風方面，(三)或出於詩歌的寓言。

第六論 本會在日本和中國傳教的司鐸們採用俗侶服式的行為便是一個先例；依着這個先例，我們可以使用「所有在異教人中有迷信目的，而依據性質却是民間習慣的東西」〔第五論題第一類〕比方衣服，便是這一類的東西。支持這種意見的依據，我們不妨援引亞曹 (Acor) 的論據，見 (Institutiones) 卷八，二十七章，或引多明我會士 巴奈滋 (Banez) 和耶穌會士 伐朗濟亞 對於 (ca. rae quaestio 3 art. 2) 的評論。(註三十一)

第七論 況且在聖師們所規定的情事中也許公教信友們使用原屬民間習慣，而偶染着迷信色彩的東西，不必疑惑，〔第五論題第二類〕。

第八論 或者，這一類東西所有迷信色彩不過是出於詩歌神話的杜撰，〔第五論題第三類〕那尤其是沒有關係了。

第九論 所以一般說來，公教信友穿帶異教人的衣服標記，必須有正當緣由，又須注意勿使因此留下惡表，

第十論 可是傳教士們有時候確有這種正當緣由；這便是救靈的大緣由。教宗依諾增德三世也曾於一二〇一年

五月間，准許里伏尼（Trinne）的傳教士們穿着和當地人民一般的服裝，藉以避免引起異教人民仇視的心理。每一個教士該適應他所在各地方的習慣。有一種兩重的實驗顯示着在東方所當關心的事情，便是救靈的要事；直到現在，照歐洲的方法（在印度）傳教，一點也沒有獲得使人棄邪歸正的成效。這原是對於印度上等階級所求的唯一的神益。印度沿海一帶下等階級的漁民皈依聖教，無非是為逃避回教徒的欺侮罷了；反之，恐着適應的方法來傳教，可以使這裏的異教人容易歸化，這是一種從經驗得來的事實。（註三十三）

第十一論 憑這種方法來傳教，絕對不會留下惡表，而且即使有人誤會了，認作惡表，也決不至被人剝奪了一種肉身上的利益，更不用說靈魂上的利益了，尤其是在說明了他所有行為的動機以後。「我聽說在印度南部我們的遠方這種辦法受人謗議，總覺得十分詫異。事實上，本會司鐸們先在中國，後在其他各處，也是這樣做法，却誰都沒有控告過，說他們立下了惡表。」（註三十四）

我們所以不憚煩勞把諾比利司鐸這答辯書加以援引，是在說明傳教士們在服式上和僧道相混同這件事，原是一個多麼微妙的問題哪。須知諾氏寫這答辯書的時候，這種辦法，利公早已放棄多時了，即使在原則上不放棄，至少已放棄了穿和尚衣服的實際辦法。後來，傳信聖部也禁止教士們穿着和佛教僧侶同樣的衣服。這些都是以後的事。

目前，正當一五八三年春初，澳門耶穌會士們所有最佳的願望，似乎已經獲償了。是年二月十三日利公會寫了一封書信，（註三十五）宣稱已確知自己不久便能乘着廣州春市（通常於三月間舉行）的機會，和肇慶的傳教士們相聚一堂了。不料這當兒，他忽看見羅巴兩人神色沮喪，突然回來。原來粵督陳瑞被京裏的仇人參了一本，已得撤職的處分；他

怕後任再劫他容留外國人私居內地，便急急把兩人打發回來。羅巴兩司鐸本來很想等新總督上任後再走，但那文牘師爺却催他們快動身；給他們一封蓋了印的執照，教他們向廣州關官投遞。可是他們到廣州時，恰巧關官不在，江防守卒竟不許他們到羅公住慣的旅舍暫住幾天。（註三十六）

猶幸賈伯樂司鐸剛從日本來到澳門，便從新策劃，設法實現原有的期望。巴範濟司鐸便遵照范總巡關的命令預備和郭梅斯等同往長崎；這回他雖已受到挫折，却並不失望。他曾於六月二十七日，上書耶穌會總會長（註三十七）說：「這件事我們已有了經驗，將來再進行就比較容易啦，如果我們破費些銀子，給總督或是別的官員送一點禮物，那就更容易了。」他又微露狡狴地說：「因為在中國，送些禮，化一點銀子，無論甚麼事情，終究都辦得到。」當然，他想不到他的話竟說得對極咧！當他還沒有離開澳門的時候，（他於七月十四日動身）那位肇慶的新總督郭應聘要吊銷前任發給教士們的執照，便差了總督衙門的巡捕到澳門耶穌會住院來追還這件公文。賈伯樂院長便召集全體司鐸開會商議，大家一致決定派羅利兩公到廣州，把這件公文，親手交還給關官。這件事情整整辦了一個月。一次，兩公以為他們可以在廣州暫時住下；不料那關官，接到了巡按突然蒞止的消息，便害怕起來，當晚送他們動身。他們在歸途中經過香山縣，竟看見城牆上貼着新總督的告，示痛責不愛國的中國人，把本國言語教給「外國和尚！」這樣看來，教士們要在中國內地立足，簡直是不行了。尤其是在內地人民懷着厭惡外國人的心理，和這位新總督的治理下，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註三十八）

然而對於歐洲國家這樣的判斷是對的，對於中國，却要顧慮到封疆大吏有便宜行事，近乎專斷的特權。還沒有過了一星期的光陰，有一個總督衙門小小的門官，得到了金錢酬報的許願，便給羅利二公運動成熟，來報已經替他們請得正

式核准，許他們回肇慶建造房屋和聖堂！這回只因澳門商家經濟拮据，幾乎使羅利二公無法進行，幸而葡萄牙人還不失慷慨的信仰，竭力張羅，才能充分籌集，第三次出發的經費（註三十九）到了九月一日，羅利二公便帶了翻譯，乘坐官船，離澳前往。他們到了廣州，遇到了一班方濟各會士從安南回來，在海南島附近覆舟遇救（註四十），便稍作停留，援助了這班遭難的同志。是月十日，他們到了肇慶，當地一班秀才們，就出頭竭力反對，羅利兩司鐸却不顧一切，加緊進行。却得肇慶知府王泮極力保護（註四十一）。蒙總督讓與了東鄉萬花樓附近的一塊地基，那時這座樓正在建築中，還沒有完工。利公素有辦事長才，這時候，便立即施展他的本領，着手建築一座西式小屋，作為住院，取名「至聖童貞院」，又稱「仙花寺」（註四十二）。但所帶的銀子還不够，羅明堅司鐸於是不得不回澳門續行捐募。那時，有一個印度臥亞附近的島民，會製造時鐘，所以他還給知府許下代辦一座時鐘。可是日本來的船還沒有到澳門，捐款不能如數募到，只得教那印度人趁那送他來的官船先到肇慶。這當兒，利公第一次舉目，無親地，獨自在肇慶留着，住得沒幾時，便遭受磨難了。我們看到了這種患難，便知他那時在中國處於很不利的地位，同時却也看出了他的精神和毅力，所以我們不得不把那一回的事變講述一下。

要講那一回的事變，先該明白那時澳門一帶的本地人對外國人十分厭惡，葡萄牙人已從他們得到了竊盜兒童的惡名，還說他們「把孩子偷去吃食」（註四十三）。加弗爾（Cafes）逃走的奴隸們也在這地方宣傳這種恐怖。如今肇慶的新住院，常關着大門，這和中國人的習慣不合，因而引起了鄰近居民大大的不快，便有一班人專喜歡登上那未完工的萬花樓，把瓦片磚塊等物拋擲到住院屋頂上，當作消遣。一天傍晚，利公手下一個僕人，捉住了一個惡作劇的頑童，把他

關起來。(後來說明只關了一三遍信經的時間)(註四十四)鄰居們出來替這孩子討情，利公便立命釋放，這一下可就壞了。仇人們就借這事端，勾結了那發起興建萬花樓，作為廣寧十一縣集會機關的當地士紳，想出一條毒計，陰謀陷害利公。於是那頑皮孩子的一個家長，——他在府署裏有人相熟，——便披頭散髮，到府署放聲大哭，控告外國人把兒童誘進屋裏，給他們喝上迷藥，關了三天，再賣到澳門。第二天，府署的差役便來拘捕，利公才知被人控告，連答辯的話也來不及預備，已被差役拖到衙門裏聽審了。知府王泮就對利公審堂痛加申斥，說他給了利公許多好處，却得到了這樣的惡報。據利公自己講，「這當兒，他真難受極了，只得把自己托付給天主和聖母，求主母默佑；因為他在這許多異教仇敵的包圍中，實在一點辦法也沒有……他不但怕當眾受杖，(這類案件，杖責原是極平常事)更怕多年辛苦經營所得的效果，因此全部毀滅，而遭斥逐，使聖教大失體面。」幸而那時跟着他的印度青年，平時很細心，把丟進來的東西，都拾起來，放在袖裏；當下，便在公堂上一齊倒出來，作為証物，然後和利公共同聲辯，証明他做的是好事，不是惡事。於是王知府起了疑，覺得這件事有些蹊蹺，便命差役去把監造萬花樓的三個老工頭找了來。這三個老人，非但不肯給原告做証人，還把這件事情的經過情形，據實訴說了一遍。知府據供，便命帶過原告，喝用大杖痛打，這大杖頭上是劈開的，兩三下，就可以打得皮開肉爛，鮮血四濺啦！原告串通的兩個同黨，見這事變了卦，知道不妙，就膝行上前，極力抵賴，說這件事與他們不相干。審案的時候，利公始終跪着，這當兒，便也叩首至地，替他的仇人們求寬赦。王知府終於明白這件事如果辦真了，不免結下仇恨。對利公也是危險的，便把一切錯處都推在那印度人身上，命差役把他立刻押回澳門；那時鐘也不要製造了，却重新發出了一張保護外國人的告示，因此，利公才能繼續讀書。

這樣，利公在痛苦的情景中，度過了冬季，却憑着他和藹可親的態度，漸漸掙得人心，贏得了貴顯來賓的敬慕，尤其是那位肇慶知府王泮（註四十五）到了春季中，那日本的回船終於到達了澳門，羅明堅司鐸便募得了大宗捐款，帶回肇慶（四月間）用以完成未竣工的房屋。（註四十六）羅利兩司鐸在肇慶的地位，更見得穩固了，雖則又換了總督，却没有受到影響（註四十七）。然而新的煩惱又跟着來啦，那西班牙耶穌會士桑采芝利用着因海員叛變的事件，而使斐列濱當局不得不派一位大員到澳門查辦的機會，（一五八四年五月一日）捲土重來，繼續進行他和肇慶傳教士們的直接交涉。由於澳門耶穌會院長賈伯樂司鐸的居間，他竟得使羅明堅教他的翻譯員進呈一件不是自己出面的請領護照的稟帖。不料這件事，被葡人得了風聲，結果完全失敗了。（註四十八）

耶穌會當局曾囑利公編一本中國誌，第一次他編成了，以後，又覺得太簡畧，這時候，便着手再編，還加上了一幅中國輿圖（註四十九）。可是這還不是他最費心思的任務，是年六月，或是七月起，他還同一個住在院裏的福建秀才，從事校閱羅明堅司鐸所著的一都要理論的初稿，預備把原有的語體文改作文言。（註五十）這種工作是極辛苦的，傳教士們已在印度和日本嘗試過了。

羅氏在印度沿海漁民區域傳教時候所用的要理問答，在眼力極高的諾比利司鐸看來，文詞上已看出了許多重大破綻，和使人誤會的語辭，如「聖神」的譯名；有些地方竟說得不對，如「光榮或是永福」等文詞太粗俗，字句夾雜，對於各種聖事和教會事件，文字的語譯既不是宜摩爾（Talm）文，又不是葡萄牙文。對於經文詞句，如聖經，天主經，信經（又如「諸聖相通功」的名詞），諾氏也毫不遲疑地，加以修改。他根據蘇亞萊氏（Sares）所有把各種聖事的儀式和

其主要的語辭，譯成方言的學理，修改天主的名稱，和用以表示彌撒聖祭的辭令。（註五十一）

在日本傳教，要適應民情，更覺困難。聖沙勿畧所修飾過的要理原本，早已擯棄不用了，因為書中的辭句，有些是出於佛教經典，容易啓人輕蔑的心理，這是很可怕的。（一五四九至一五五一年。）其後，額谷司鐸（P. Gago）的改訂本，和儂乃慈司鐸（P. Melchior Nunez）的要理問答，（一五五二至一五七〇年）仍不免爲人找出五十處「危險的字句。」後來教士們爲補救這使人誤解的危險起見，便逐漸用使彼此互相接近的方式，把葡萄牙字句，用日本音讀譯出，這便是賈伯樂司鐸在陸任澳門院長以前，獲得切實勝利的解決方案。（註五十二）可是這種方法，又遇到了另一困難，這便是要把這些用羅馬字拼音譯出的葡萄牙文，用日本字刻出。范禮安司鐸，率領日本專使到歐洲的時候，原來的計劃，不但想把拉丁字母的字體供給日本傳教教會，還要介紹「葡萄牙，更好是弗蘭特爾（Flandre）」所有的喀筭喀那（Cadacna）文字的模型。（註五十三）可是第一部日本文字的要理問答，直到了一五九二年才告成，大約到一五九八年才刊行問世。

所以中國的傳教教會，因着有雕刻的木版可用，得將中國文字的要理書佔先出版了。羅氏所作最初的幾篇要理論文，和幾種經文，當然和在日本一樣，都是用羅馬字拼音寫成的，澳門的保守教友也許就用這樣的手寫本，學習教理，預備領洗。然而不多幾時以後，這些要理論文就有翻成中國文字的手抄本了；那位駐防將軍在廣州的時候，（一五八二至一五八三年），手裏會拿着這部「要理書」，很有味的讀着。（註五十四）不過范禮安氏和澳門諸鐸所核准刊印的，（一五八二年十二月）書本，無非是用羅馬字，譯音來編成的罷了。這當兒，羅明堅司鐸也已着手把天主經，聖母經，十誡等譯

出，最後，便譯就了那「中國文字」的要理論文。（註五十五）以後羅氏更把澳門一般沒有學問的教友所用粗俗語體的書本，改成文言，藉以適合讀書明理的人物。這便是在利公的監督下，那福建文人在肇慶所務的工作。這位秀才早就請求付洗了，可是羅利兩公却怕引起不利的反響，不肯急急要教外人歸化。賈伯樂院長却不以然，亟願異教人，及早皈依；他向中國官廳一經請准，許他前往肇慶視察之後，便去給那秀才付了聖洗，給他取名保祿。（註五十六）同時，肇慶城裏有一個新教友叫秦若望也領了洗。當巴羅兩公被總督送回的時候，這秦姓教友曾把兩公留下的祭台，藏在家裏，替他們保管。（註五十七）那時，當地人民，一點也沒有反對的表示，恰是相反，這兩個新教友的鄰居們，都來給他們道賀，因此賈伯樂院長不妨寫信給耶穌會總會長，說肇慶的會院，一經過了三個總督的磨難，却沒有壞了根基，一可以認為已立下穩固的基礎了。（註五十八）此後，利瑪竇神父個人的勢力，漸漸取代了羅明堅司鐸的勢力。直到目前為止，那官廳發給執照上，只把他當作羅公的一僕人，一列入他的名字哪。（註五十九）

第五章 西方科學和文化的流入

要到世界上不論那一個國家，去宣化開教，而使傳教事業日見發展，基本的條件，便在認識這個國家的文化，和該國文化所由表現的語言文字。十六世紀末葉，一位在秘魯傳教，而以擅長傳教學識著名的耶穌會士亞高斯坦司鐸（P. José de Acosta），曾於著述中說明了這層道理。他說：「基多信友們和教授基多信道的教師們，都該認識出前人的錯誤，和迷信舉動，留意觀察，印第安土人們是否至今還公開地，或是隱秘地奉行着，這不但也是有益的，而且也是極緊要的事情。」從前那在墨西哥傳教，大名鼎鼎的方濟各會士貝爾那迪薩哈公，Fray Bernardino de Sahagun（一五九〇年去世）

所有種種努力，正是爲了要迎合這種顯著的必要。他原是一位服務最悠久，而方法上又是最超脫的先覺的典型。（註一）亞高斯坦曾依着這種趨向，草擬了一張要給他們宣傳福音的各民族的分類表，寫這張表的時候，對於中華民族一門類，曾請羅利兩公供給情報，由桑采芝司鐸轉達，同時，却就他在太平洋沿岸可以遇到的中國人，訪向中國的風俗民情。他記着這件事，（註二）說：「我請一個從墨西哥來的中國商人給我翻譯這一句很簡單的話：「若亞高斯坦從秘魯來了。」他很費了些心思才譯出。他祖國的人們竟記不得桑采芝司鐸的西文名字。再則，中國並沒有所謂哲學但有文學。一個只識得他們所有二十四個字母的印第安土人，念起馬丁或是亞郎沙這種名字來，要比識十萬字的中國官僚要便當得多咧！」這樣，亞高斯坦的著作中，有幾節概論着一篇考証文件，比了馬斐司鐸寫的幾章冗長的章篇，却要準確得多。亞氏對於秘魯民族認識特真，在專論這民族的著作「De Procuranda Indorum Salute」一書中給「野蠻人」或

是「印第安人」這些名稱下了一個定義。因為「既然有野蠻人，和被稱為「蠻夷」的人，自必也有未開化的印第安人和已開化的印第安人。」那些在森林裏的印第安人，像野獸一樣，沒有律法，沒有首領或是酋長，講話像野獸叫嗥一樣。他說，那加拉依勃族（Caribs）便是這樣的人，生性兇殘，喜歡吃人，異族見了他們都很害怕；他們赤裸着身體，幾乎一絲不掛。可是我們在墨西哥和秘魯所看見的印第安人，却比這種野蠻人高明得多咧；他們雖然沒有文字，却有官長管轄着他們。他們有天賦的聰敏，非常柔順，不固執，因此，能計算支配時間，用他們自己的方法來解決算學上的難題，和文明國用人用所有種種方法和算式，用筆計算的，一樣煩難。但這些比了那有穩固政府，法令明文，有系統的官制，有城池可以防守，有廣大富裕的商業，還有古代傳下的文字，如日本尤其是中國的民族，自然要相形見絀了。亞氏又說，印第安人族類極不齊一，決不能一律看待，「好比一式一樣的衣服，不能同樣適合着兒童，青年，或是少壯的人們。對成年人傳教，要使他們洞明真道，必須憑理論來說服他們。如果用激烈的方法，那非但不能使他們信從聖教，反足以引起他們對天主教的仇恨。」

（註三）

我們不知道亞高斯坦司鐸和在華傳教的教士們有沒有直接關係，可是後來，在中國教士們反對用武力傳教，和那班籍耶穌會士桑采芝作激烈爭辯的時候，他曾和一般理論家站在反對一方面，給在華教士們遙為聲援，這就不足為奇啦。當時一般理論家如耶穌會士莫利那（Molina）等，都根據那千古不朽的多明我會士維篤利亞（Francis de Victoria）（註四）的原理，推論到各條結論。如果這位傳教事業的理論家住在中国南部，就不難把這一帶所有各處複雜的人種——中國的「印第安人」——從海南島上的蠻族數起，由川滇邊境的獐獠族，苗族，苗族，直數到嚮附中國的，越南緬甸。

的人民，而擴張他的分類表了。只是利公如今所孜孜勸化的人民，實在是文化昌明的民族，是正式的中華民族。

這初步的分析請罷了以後，我們就得趕緊注意到中國都市人民一種內部的重要分野，——差不多可以說是一種分裂。事實上，從孔子的春秋時代，尤其是孟子的戰國時代起，中國市民制度的情形，理想上，是和伯拉圖時代共和制度的情形完全一般，分作兩個極不相等的部份：一部份是下層的民衆，包括農、工、商、大衆的平民……另一部份是佔着極少數的上流社會，也許只佔着百之三四的成分，却因他們是從三四萬萬人民中甄拔出來，所以更見得高貴。孔子所有立身處世，要做「正人君子」的理想，是他們所當研究，而身體力行的。因此，一般觀察家所有的印象，當然要因他們是否曾和這些甄拔出來，實在處於指導地位的人們接觸而大不相同。此外，我們也該期待着這兩部份人民間相互的比例，也依着中國各省情形的不同而歧異。在利公來華傳教的時代，文化最發達的省份，大概屬於揚子江下游的各省，例如江西（那時要比現在富庶）又如安徽（文化很悠久，有朱熹和王陽明所傳的學派），南京（差不多是現在的江蘇省，文化極發達，也極富庶），福建（沿海地帶比較繁盛），尤其是那疆域最小，却是最富庶的浙江（蠶絲極有名）。比較起來，廣東一省，歸入中國版圖較爲遲緩，因而文風落後，不及其他各省，每當舉行鄉試的時候，應考的生員還不及安徽一縣的多。人民智識淺陋，所以那時廣東人容易受人煽惑，盲從仇外。

我們看了利公一五八四年間，一封書信的片段。（註五）便可以知道那時肇慶一帶的居民，接待這兩位意大利教士的情形，是怎樣了。他寫着：「我和羅明堅神父此刻已在肇慶了。這個城市，在中國內地，和澳門，相去有五六天的行程，從沒有遇見過一個我們相識的人。我不是說我們意大利的同胞，可是連葡萄牙人或是印度人，也一個都沒有。我們

給這裏的人們做了嘲弄和驚奇的目的物；他們也從沒有看見過外國人。幾時我們在街上走過，尤其在其他和我們所住的城距離遙遠的城市中經過的時候，要是不願意看見道路阻塞的話，就必須快快走過；往往有一大羣人跑來看我們，阻住了我們的去路。這並不是過分形容。他們給我們題了許多渾號，那最普通的便是「洋鬼子」。雖然如此，一般著名人物都很尊敬我們，他們到我們的住院，或是聖堂裏來，都是很有禮貌的。」

這裏，我們就可以看清楚不同的態度了。一般平民，一點都不能了解，依舊仇視着那些讀書人，尤其是那幾個從別省來的官僚（說得簡便點，我們就稱爲「中國社會」）却開始對新來的教士們感覺興趣，而且受到他們的影響了，這和平的叩入人心，便是利公日後所當努力進行，艱苦的傳教工作。

事實上，羅明堅司鐸的病軀，似乎始終沒有完全康復，他和巴範濟初次到肇慶居住的時候，已向人訴苦，說他「很疲勞」。然而他雖如此辛苦，依然僕僕道途，不恤征塵勞頓。自一五八三年九月十日起，（肇慶住所切實成立的日期）至一五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止，（啓程回歐的日期），其間約計五年又兩個月；羅公在這時期中，出外長征，先後至少四次，共計費時在三十個月以上。第一次自一五八三年年底，至翌年四月間，他丟下了利公，讓他獨自在肇慶住着，自己却到澳門去募捐；一五八四年九月十三日至十月底間，他又去見賈伯樂院長報告開教情形，以便賈公向上峯陳報，賈院長陳報以後，范禮安司鐸便添派了兩位葡籍司鐸，到這新產生的中國傳教會服務；那時范公在印度做了省會長，因此中止赴歐，沒有陪送那日本專使。這兩位司鐸中一位是孟三德（P. Edouard de Sande）他一到澳門（一五八五年八月）便立即前往肇慶以後肇慶的教務，便由他主持，脫離了澳門院長的管轄。（註六）這當兒，王知府陞任嶺西按察司副使，（即

嶺西道）他的後任和他同籍，都是浙江紹興山陰縣人。這兩位新舊知府便力勸肇慶諸鐸到這專出幕僚的地方（註七）去立院開教。羅利諸公本來以為只站得一隻腳，很願意「兩隻腳」都站着，聽了這話，自然高興極了。於是羅公便奉命偕同范禮安派來的另一耶穌會士麥安東修士（*Fr. de Almeida*）前往紹興開教。一五八五年十月二十日，羅麥兩人在廣州秋市會面，得王知府的一個兄弟的襄助，取道北上到達了那人稱「中國福地」的浙東。他們初到後，大獲成功，是年復活瞻禮日（四月六日）王泮的老父竟領洗奉教，無奈紹興的儒士（向來以精通法學，工於刀筆著名全國）反對他們，終於設計使他們返歸廣東（一五八六年六月）。那時，「羅麥兩人中國話都說得很勉強，他們的通譯年紀老了，又沒有才幹，辦不了這樣大事。」（註八）因此，他們到不多時，便已站不住了。同時肇慶方面也發生了種種事情，使孟利二公覺得他們的地位，全靠着知府一人維持。於是大家便急急贊成再向北方進行的建議，預備到河南一座有名的古剎去遊歷。因此，羅公取道廣州，韶州，前往河南，到了廣西省會桂林小作勾留，再行啓程北上，又到湖南邊境一個小村子叫白水村，住了四個月光景。可是羅公行後，過不多時，耶穌會當局認此行無甚效果，便召他回來。所以一五八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羅公又在肇慶了。（註九）以後，幾個月，便發生了幾件不幸事件，使肇慶的教士們為之惶慮不安。這些事情，一半是由新奉教的人民自己釀成的，以致孟三德司鐸不得不先回澳門。不久，羅公也去找他，却就不能回來。（一五八八年一月）由范禮安派他到羅瑪去組織一個教廷專使團。（一五八八年十一月二日）（註十）

因此，肇慶教務的全副重担都放在利公一個人的肩上了，以後還得肩負着在華開教的重大責任。故事的傳說——便是現在歐洲人中的傳說也是這樣——抹殺了他一生的豐功偉業，甚至在上海的古董鋪裏，陳列着幾個白磁的小菩

薩，肥胖得醜陋難看，坐在一張沙發上，或者一張小型安樂椅上，像製鐘店或是客廬老闆，監視着工役模樣，却說這便是利瑪竇，麥底安利。（註十一）不消說得，這種東西毫無價值，好比明朝的中國畫上，或是湯若望時代的各種東西上，簽着鄒世寧的中文名字一樣，都是令人捧腹的大笑話。還有那些述近小說的傳記，把利公講得和肩負小販一般，在一種半開化人民驚奇注視之下，沿路叫賣着他的商品；（註十二）自用鳴鐘，千里鏡來打通門路，見到了萬曆皇帝。（註十三）這種傳記也是謬妄極了！

事實上，利公有賴於他前輩的努力很多。他來華以前，有羅公做他的先驅；羅公以前，更有葡萄牙人，把幾件西洋的東西介紹到了中國，比方那最重要的是天鵝絨。（註十四）其次是望遠鏡。（註十五）烟草（註十六）等。但中國人對於這些西洋的東西，總沒有像日本人那麼歡迎，西洋人在廣州的互市，大抵是用從別處得來的銀兩換取中國的貴重物品，如絲經，磁器，麝香等，然後轉運到日本，或是運回歐洲銷售。羅明堅司鐸所關心的第一要事，便在使中國人不致誤會，把他當作「摩拉加商人」，因為元末以後，中國人對於地理學的智識，已很淺陋了，往往把葡萄牙人誤認為摩拉加人。羅公爲使他做官的中國朋友們，對於歐洲文明獲得較爲正確的觀念起見，先向上峰索取「一冊吾主基多一生與蹟的畫像，幾篇古經上的故事，幾本奉教各國的風土紀……以及幾種適用的書本，特別是一部插圖很精美的大本聖經。」（註十七）耶會所屬傳教教會的圖書館，歷史已很悠久了；當一五四一年聖沙勿畧從葡萄牙啟程東渡的時候，曾由葡王若望三世贈與價值葡幣一百元的書籍。這些書籍中，我們現在只知道有一本日課經，一本馬爾古馬羅魯氏（Marcus Marulus）所著的「神修生活」；一部插圖很多的聖經，附訂着一部普通的註解，那裝訂是很講究的。至於中國他曾從富昂德

(Constantino Ponce de la Fuente) 借得了一部「學理大全」(或者也許是一部藥學的綱要)。(註十八)那繼續他在日本傳教的白萊篤司鐸，也帶去了一部大本聖經，幾本小冊聖經，和聖經的註解，幾種伯拉圖的著作，亞列斯多德的倫理學，蒂德曼 (Tielman) 的哲學，聖多瑪斯的神學大綱，駁斥異教人的概論，西爾物斯德肋 (Silvestrina) 的神學概論，好幾部聖教聖師的作品如聖奧斯定，聖斐爾納德，聖西比廉 (Cyprien) 等，一部潑多萊梅 (Poliencé) 的地理，一部聖教鑑畧。(註十九)

跟着時間的演進，傳教東亞的耶穌會士們漸漸明白了印刷事業和設立圖書館兩件事情，在於文明國家從事傳教工作的價值。因此，一位和利公同時代，在大蒙古傳教的教士蒙才拉德司鐸 (P. Monserrate)。在寫他的雜記時候，(一五八九至一五九〇年) 說明了他曾參考過若才夫 (Joseph) 潑多萊梅，聖日羅尼莫，田奧陶 (Diodore de Sicile) 薛維伍 (Aeneas Sylvius) 保祿喬扶 (Paul Jove) 等的著作，還讀過古代作家如司德拉龐 (Strabon) 伯里納 (Plinie) 邦貝烏斯 (Troguis Pompeius) 亞包洛道 (Apoliodore) 索立努 (Solinus) 盧根 (Lucain) 等的傑作，他也曾悉心檢討過古印度史家如味增德步凡 (Vinc. de Beauvais) 聖安多尼，弗勞倫斯 (S. Antonin de Florence) 教宗庇護二世，薩倍利古 (Sabellius) 伏戴拉 (Volterra) 保祿喬扶，若望巴洛 (Jean de Barros) 伯多祿梅齊亞 (Pierre Mexia) 富谷蘇 (Folgosus) 伯拉底那 (Platina) 巴米埃利 (Palmieri) 岡比尼 (Cambini) 的作品，以及格拉維喬 (Clavijo) 游記等。(註二十) 便是那些無須這樣熟悉世故的傳教機關，也都留意置備一份有關神學和神修的書籍。當荷蘭人佔據摩拉加的時候(一六四〇年) 曾在耶穌會住院中找出拉丁文的神學書籍四百六十冊，教律書籍八十五冊，此外還有二百冊

左右葡萄牙文的神學書籍。」（註二十一）

如今羅明堅司鐸所要儘先置備的書籍，便是這種較有宗教意義的書籍，可是他還要加上圖像，好讓地方上的官長觀看。所以他還要些材料，好把古新聖經上的人物像，用作各房間的裝飾。（一五八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註二十二）那時，肇慶會院中，已有幾箱子書了，特別是那幾冊大本的聖教法典；這些都要在院中陳列。（註二十三）已經收拾了一個房間，鋪上地毯，裝飾完備了。利公對於這在萌芽中的圖書館也力謀發展。後來，到了湯若望主管時代，已有五千餘冊，到現在又差不多加了一倍。（註二十四）可是利公暮年，將近去世的時候，他還因所備的書籍不敷應用而表示遺憾（一六〇五年五月十六日。）（註二十五）

羅利兩公一方面把書籍陳列，一方面又繪製了許多畫像，聖母像和救世主像。（註二十六）一般官僚和讀書人見了這些西洋藝術的作品，都羨慕得了不得，羅利二公便分別惠贈。於是王泮的父親也從他兒子那裏得到了一幅，便在紹興本宅經堂中，謹敬懸掛，天天進堂，跪在聖母像前，念玫瑰經。（註二十七）

機械學和物理學的應用，也不妨處於第三地位，尤其是那威尼斯（Venice）玻璃製成的三稜鏡，從斜面看來，可以映照出五色的虹彩，便成了最有名的寶物，竟有人說他是「無價的寶石」（註二十八）教士們對於時鐘的最初觀念，似乎是從羅公的幾個中國朋友得來，他們曾對他說：「再沒有可以使皇上更喜歡的東西了。」（註二十九）自利公把印度省會長所贈送的時鐘，帶來了以後（一五八三年八月七日），大家就一致讚歎，無論利公生前死後，這種褒獎的公論，一經品定就永沒有打消啦。（註三十）

傳入地球儀和日晷儀的第一人，也不是利公。當一五八二年終時，羅明堅和巴範濟兩司鐸便已把這些東西帶到肇慶了。（註三十一）范禮安還再三吩咐他們利用這兩樣東西以及那世界輿圖以引入注意。（註三十二）

利公的前驅們所有這些優先權一經確定之後，我們就該承認利公對於這一切東西的妙用了，不過他自己說得很謙虛，說他：「只在細事上做工夫，大事讓別人去做。」（註三十三）他一方引起中國人對於奧戴里伍斯（Ortelius）的世界輿圖的興味，（註三十四）一方面又製成了一座可以看得出鐘錘的時鐘，（註三十五）曾和羅公會同寫了一封信，向關係方面索取別種計時的機械。（註三十六）

在中國官僚看來，這一切的事情，一點也不稀罕，至少也沒有甚麼了不得，可是見了他房間裏，滿堆着中國書，見他在那裏孜孜攻讀，却不禁稱奇納罕了。（註三十七）這就可知利公的操守，確能引起來客的注意，得到他們的同情，甚至使他們欽仰敬慕，要比歐洲文明所誇耀的任何新奇製作，效力要大得多。此外他們看見利公所編的第一部中西字彙，完全是依着一種新穎的次序，即使不佩服，這也必使他們納罕稱奇。這部手抄本，共計一百八十九頁，每頁分三行，第一行葡萄牙語，第二行意大利拼音，第三行中國字，只有起初三頁有第四行，註明意大利語。書後，有一句表示虔誠昭事的跋文：「願天主和童貞母聖日爾凡（S. Gertrudis）和聖包爾戴（S. Porcia）獲光榮，亞孟耶穌。」（註三十八）教士們在這中國人自身對於語言分析上的基本問題還沒有感到興趣的時代，除此以外，再好的辦法沒有了。（註三十九）

無疑地，當時有幾個最熟悉東情形的人，因着那和利公所提出的一般的各項問題，曾就利公所有關於中國的一切情報，加以週密的審查。過了五十年，有一個至今有名的考古家徐霞客，把那時一班濫用詞章俗套的文士們盛行的成

法一概打破，也是出於不得不然，他遍遊中國幾次長途旅行的記載，竟和近代測量地形的記錄本相彷彿。（註四十）可是利公在撰寫中國雜記的時候早就先他出此了。（註四十一）利公也不像許多後繼教士們一樣，添上種種繪聲繪色的描寫，來迎合讀者們心理，例如十七世紀末葉的馬若瑟司鐸先後寫給蔡詩司鐸（P. de A. Chaves）的書信中，說廣州是一座古怪的城市，街道狹窄，闔城的人民螞蟻般叢聚着；肩負小販們赤着腳，奔走往來，頭上戴着一頂形狀奇特的草帽，既可以禦雨，又可以擋太陽；貴人們不用馬車，却坐着奇怪的椅子（指轎）要用六個，或是八個人抬着；有幾條街道，看不見一扇窗，房屋都是開着店舖，大概很簡陋，用竹扉當門戶，「官府出行，隨從的儀仗要有一百多人，揹着官銜品級的硬牌」（註四十二）利公却絕不以獲有這些外表的印象而感覺滿足。他置身這異族世界中，四周都是異邦人的境界，却不厭求詳地訪問着這世界中的風俗民情；這樣按部就班的做去，這遼東的古國，因着關山難越，又有回教國橫亘其間，得以閉關自守，和歐洲隔絕了好幾百年，終於漸漸顯出他的真面目，和我們當初的想像，就相近得多了。我們憑着那些註明日期的文件，不難尋覓利公對於這種「東方學識」所有過程的線索，在聖沙勿畧傳中所有那根據中文文件的分析而撰寫的各篇章之後，還有一篇爲了西班牙人羅馬（Rohan）而作的冗長的討論，利公在這篇文字中所講的，無非是目觀，或是從有根據的人那裏聆悉的事情。（一八五四年九月十三日）（註四十三）隨後，又寫了一篇中華帝國略說，筆致很生動（一八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註四十四）特別是那一五九〇年在澳門印行的一篇拉丁文談話（註四十五）內容尤其是切實。假使馬可勃羅算是歐洲人發見中國的第一人，那麼，利瑪竇司鐸便該算作第二人了。（註四十六）「那時葡國人都說中國地方從沒有戰爭，饑荒，或是瘟疫，這些話實在應該認爲一種共同的見解，不該認作實情……雖

則大家盛傳中國人研究各種自由科學，門類繁多，尤其是自然哲學和倫理哲學；中國也有幾個大學，可是這不過是道聽塗說，是傳聞，不是事實；中國人所特別講究的，無非是文章詩賦罷了。」（註四十七）

利公的記述究竟價值如何，我們不難一看就見。他的記載都是依據準確的聞見。正如他寄回歐洲的中國略圖（註四十八）或是羅明堅司鐸所收集的那些嵌在屏風上的畫片，後來帶回去，送給西班牙王和教宗西斯篤五世的一般（註四十九）都是足資徵信的材料。利公的觀察，精細非凡，他曾記（註五十）「在廣州城裏，以及在廣西境內，有許多居民，小脚趾上有兩個指爪和安南人一般，——從前安南人有六趾。」——安南古稱交趾——他雖然不是植物學家，却喜研究大黃的性質和功用。（註五十一）他定下了一貫的方針，來編定在華傳教機關的檔案，因着這些案卷，他自己和他的後人，才能編成傳教史傳。（註五十二）所以依着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國情，實在應推利公為第一人。他所寫的一篇中華國名，「支那」一辯，——慣常有人說是衛匡國司鐸的作品——大可認為歐洲人研究漢學——歷史性的——的先河。（註五十三）最足使人欽佩的，却是他有審度的權衡。當時人們不肯信任新經，却無須憑証，承認古經所有廣泛的記載，可使這部有關各民族的史籍，不失價值；（註五十四）利公所有這審慎明辨的特長，就藉此避免了和十八世的「象徵家」相混同。（註五十六）

而且在下列幾點上，中國的史家們也不能給他一個教訓。這種教訓，梁啟超氏曾說明過了；有的只知注重歷代的朝廷，而不注重國家民族；只知重視個人而忽視大眾的集體；注意過去時代的傳說，而不注意目前的現實；着眼於簡略的記事，或是編年體的史紀，而不究史事的哲理。這些人往往不能創作，只知抄襲成篇；只知搜集資料編纂成書，却不精於抉擇

這時代中至多有幾個人，如胡應麟（一五五一—一六一八）輩，尙能獨具隻眼，摘發古本的陳腐（註五十六）相反，利公在羅馬學院研究辯護真教學時候，已能拋却文字的鋪張，議論的鑰鎖，摒棄各種綱要，諸家註釋，而直接探本窮源，逕就聖經和聖師們的著述，尋求論據了；同時警反教人迭次攻擊聖教最懷愛的傳說，——比方勞萊德聖室靈遷的故事，——也啓發了他考証史實的興味。當他和中國儒士暢談的時候，他所有這種種的修養，必然要形諸辭令啦。

這種慣習的談論，便引起了大家所不知道的種種困難問題；這些困難問題，就整個的中國民族說來，要等到一九一七年新文化運動成功後，才獲得了真正的解決。實在，那時候，不只是把天主教的主要道理，力求準確地譯成華文，就算了事。虧着那時「天主十誡」的華文本已於一五八三年年底印就（註五十七）「要理問答」也已於一五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再版了（註五十八）因此，天主教的主要道理，大家都能領悟。以後，大家又央求利公把「天主的聖言」——就是聖經——譯成華文。這件事，他既沒有多餘的時間去辦，而且也辦不了（註五十九）當然，繙譯的困難對於文化水準多少高低一點的各民族，都是免不了的，可是在中國，還得加上一層十分特別的困難，就是文言語體，同時並存，却截然不同。那時，要把歐洲思想傳達給中國人，還是白話文容易達意，雖則當時大家認爲白話文不登大雅，只可用於下品的寫作（如小說傳奇等）當佛教流入中國的時候，幾個天竺高僧來華說法，也會用白話文來譯述佛教經典，却多少獲得成功，便是宋朝的理學大師朱熹，註釋四書經傳，爲後世所稱頌，但朱子註解所用的文體，雖不是絕對白話，却和白話文相差不遠。

因此，從一五八五年起，利公便開始向他的讀書朋友們，約畧講解全部天主教道理，却講得明白曉暢。（註六十）他

講：天主的實有和天主的性體，人有欽崇天主的本分，盡了這本分，身後才能獲得永賞，免墮地獄；崇拜偶像是異端；人類原祖亞當厄娃，原罪的負累；天主第二位聖子降孕於童貞瑪利亞的胎中；耶穌在世時候的靈蹟和他的受苦受難，被釘十字架而上而死；耶穌死後降下靈薄獄，拯救古聖人們；耶穌死後第三日復活，四十日升天；耶穌分派諸位宗徒到世界各國傳揚福音。利公講到這最後一端道理，便乘機說明他爲甚要繼續宗徒們的使命，效法他們的芳表，到這與世隔絕，從沒有領受過福音的中國來。我們知道利公當時即使提起聖多默宗徒曾經到過遠東，而表示懷疑，他還不能知道唐代聶斯多略派教士所傳的景教，更料想不到元代方濟各會士到過蒙古和北平，這件事便是十七世紀中華的方濟各會士們也竟不得而知。（註六十一）

他給新教友們講明了天主教的基本信理和道德準繩之後，便可給他們灌輸一點關於聖事的知識了；特別是聖洗聖事，這是他們個個都可以領的，赦免已往諸罪的聖水，或許那最足發人深省的地方，便在利公藉以勸人信奉天主聖教的語氣，他對着那來聽他宣講的文人學士，非但不像老師對於不識不知的學生們一樣，耳提面命的教誨着，反一秉至誠，對中國文化表示欽佩，他和中國官憲迭次晤談，學得了許多禮數，許多謙讓的辭令，於他很爲有益，因此，他到處執行職務，每當和學者們縱談暢論，不得不陳說有爲，他們所當知，而未聞的大道，就是認識眞主和天主眞教時，總是善爲解說，自承歉意，每稱「只緣倣國和上國相距遼遠，以致未能及早上聞，誠爲憾事」，這種話說得多麼委婉動聽，多麼冠冕堂皇，尊重恭敬，而又富有同情，這種種的德性，實爲勸化文化悠久的民族如中華民族所必不可少，却在利公的談話中完全表現出來。

他在傳教的進程中，不得不在中國的言語中尋求那足以譯述天主教道理和西方觀念最適當的辭令。所以我們雖則不必把他主張用白話文的見解過分推崇，說現代擴棄文言改用語體，是利公當時提倡的直接效果可，是我們總該承認利公的主張對於最近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成功，未始沒有簡接的貢獻。這種貢獻，在讀了他的行傳後，便可明白看出了。讀了拙著「中華民族的智德和天主教哲理的關係」一書，明瞭最近三百五十年來這一問題的全部歷史後，更不難獲得充分的證明。（註六十二）

目前，我們暫且根據利公和他同志們遺留下的書信，看看那些聽他宣講的人們最初的反應是怎樣吧。這些函件中尤足使人注意的事情，便是教友們當時所處的地位，因着他們的服式和佛教僧侶相混同，無論如何，已很削弱了。這種光是我們在「教士列傳」中已經剴切論及，這裏不必贅述。（註六十三）再則，利公因着他所有科學上的創製，如世界輿圖，以及人稱「無價寶石」的三稜鏡，時鐘，日晷，天文儀，地球儀等，（註六十四）已被人加上了一個術士的虛名。可是他如果為聽衆中最有名望的人所注意，這却是因着他在高談闊論中，每每透露着他所帶來的全部西洋學術所致。這句話我們從一封新近發現的書信中得來；（註六十五）這是利公在羅明堅司鐸到浙江傳教的嘗試失敗，明瞭這件事情的困難後，於一五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寫給他羅瑪學院的老院長馬才理司鐸的原書如下：

去年，「一五八五」羅明堅神父曾和另一同會，即「麥安東修士」同到一處，和這裏相距兩個月行程的地方，一即紹興，打算立院居住，却没有成功，不能在那裏立足，所以今年他已回到了這裏啦。現在我們共有三個人在此，一即利羅兩公和孟三德司鐸，麥安東修士已奉命返歸澳門。他給我們講起那一帶地方，土地肥沃，和歐洲一般，城市比廣東繁盛，

人民的性情也比較好一點。目前我們在這裏等候，一有機會，就得輪着我們兩人，「利公和孟三德」前往，再作嘗試。這機會果然不久就來，我們希望這回再去，我們就可在那裏安穩站住。這希望後來完全失敗。」

「我在這裏，和另一位葡籍司鐸同住，「卽孟鐸」我正按部就班，專心學習着中國的語言文字，研求不遺餘力，所得成績，還不至使我報顏，現在我不大要人翻譯，也可以不用通譯了。」

「我們所轄的教友已增多了，不久，就可以有相近四十人，凡是有經驗的人，都說這數目並不算少。有許多人來究問我們天主教的道理。在許多有名人物中，今年來了三位官憲，他們都是本省所有最重要職官之一，內中一個是駐廣州的布政司，在廣州圍城中，要算他是全省最大的官吏，「總督不住在廣州。」他先寫信來問我們要「西洋道理」書，這是他自己起的書名，「就是那時已經再版的要理問答。」後來，他到這裏「肇慶」來的時候，我們就去謁見他，他待我們很客氣，教我們同他一齊坐下喝茶。以後，幾天中，到了夜裏，他就到我們院裏來，「我不知道他這種舉動是不是因心懷着猶太人的恐懼而然，「引聖經尼各得莫夜裏見耶穌的故事。」——和我們談論教中道理，往往談上一兩小時才告辭。」

「另一位「官憲」宗教觀念要比較深切。這便是那位嶺西道，（註六十七）「管轄幾府的兵備道，就是當初開教時大家都曉得的王泮。」他把我們請到他衙門裏，率領全體僚屬來見我們。我們在那裏請論天主事理，講得很久。他的主要目的，在問明我們航海來華的宗旨。據我看來，似乎他相信我們能行奇蹟，因為不這樣，我們不能經歷了三年的航程到這裏來。」

「第三個「官憲」是總兵，他做着這廣東省的統領，統帶全省兵馬。（註六十八）他到省城裏「肇慶」來參見總

督的時候，往往要到我們院裏來，而且羅神父和那位葡萄牙神父「卽孟三德」也曾到過他廣州的公館裏，「必然是在一五八五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兩天中，動身到浙江以前」他待我們，總很看得起，對我們表示十分好意。」

可是直到如今，除了那在總督以下，做着本城最大職官的父親「就是王泮的七十歲老父，復活瞻禮日由羅明堅司鐸在紹興付洗」以外，這些主要人物，誰也沒有給我們勸得進教……我們希望在那一帶地方「浙江」人們把救靈魂的事情看得重一點，將來也許會有大人物把這件事提倡發動。但這件事，惟有日後專務傳教工作的人以極大辛勞流汗的代價，才能實現。至於我呢，神父啊，我只覺缺乏這裏事業所需的毅力。

「佛教僧徒們卑鄙齷齪，在這地方大家都看不起，我們雖則有人竭力抬舉，可是至今還是受人輕蔑；我們所受的侮辱，竟至難以筆述，不能憑書信傳達。聖誕節日，或是前一日（一五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總督衙門的文案，傳令把我們住院裏所用的一個譯員捕去，誣指他盜去了三個奴隸，把他們送給住在相距四天或是六天行程的地方（澳門）的葡萄牙人。這夜，本來爲了過聖誕醒着不睡，這件事發生了以後，更鬧到早晨，通宵不得安眠。我們担着很大的驚憂，澈夜祈禱，求天主護佑。到了早上，我拋下了別一位司鐸讓他獨自和那來過瞻禮的衆教友在一起，我自己去見總督，說明這件事是受人誣陷。天主的聖意使他們找到了那幾個奴隸，我們的冤誣，因此昭雪了。可是幾個月以後，這文牘員死了；這原是天主所許的，也許有些人以爲這是天主報復這件不義的事情。

「再則，今年「想」必是春天「江水」「西江」泛濫，甚至沖進各處屋子裏，淹沒了全部田地，許多屋舍被沖倒塌，釀成很大的災害。因此，便有許多窮人，到我們院屋裏來避難。他們於是漸漸體驗到天主教愛人的表記，和他們所期待的恰是

相反。因為避難的人數衆多，夫妻兒女都來了，我們把房屋的下層，全讓給他們，而且那幾天中，我們不但讓他們居住，還給他們吃飯。我們所有的錢，雖然並不多，可是以後我們還給他們一點錢，幫助他們再造那已被沖壞的房屋，對於窮苦的教友也是這樣。這種舉動便成了闔城上下，肅然起敬的緣由。

吾主的聖意還使那求子心切的嶺西道王泮得到了一個兒子。他曾請我們按着這意願多多祈禱我們的天主，我們也送給他一尊聖母像和別的東西，他把這些聖物供在家裏非常恭敬，所以大家盛傳我們的天主給了他一個兒子。便有許多不生育的婦人們到一個教友叫尼各老的家裏，（註六十九）——他家供着我們送給他的一尊聖母像。她們敬拜聖母求賜一個兒子，後來她們竟要給錢，但那教友拒絕不收。以上，便是我想得起來，要約畧告訴你的，今年所有的事情。感謝天主，我身體覺得很好，可是我對自己却不很滿意，這種事業真大極啦！所以我切盼你格外爲我求主垂佑。近幾年中，我又製造了幾個球，最後製成的那一個是天球儀，這是總督教人囑辦的，可是他還懂得這球是怎樣用法。此刻我正做着幾樣這一類的小東西，因爲不這樣，他們不論對我們，或是對我們的事情就要不信任啦。」

利公寫這封長篇的書信，結束時候，還把他所要的書籍，和各種東西重行提及，說這些東西「在這裏需要的迫切，效用的偉大，真是無以復加。」這就使我們看出利公在社會上，雖則不見尊崇，却憑着怎樣的聯繫，來保持他讀書朋友們的重視和信任了。除了上述三個中國官員，和幾個安南的使臣以外——這幾個安南使臣到北京進貢時，遇到歐洲的教士們每喜歡和他們晤談。（註七十）——我們所有的文件，還提起其他中國社會鴻儒碩學，爲本書後文所述及的；他們的姓名只須一查縣志，也不難確定。（註七十一）自然，現在我們不知道的，諒必還有許多，只要我們繼續加以探討，也不難逐漸

發見。

當羅明堅司鐸在中國居留最後幾年中，和利公結識了許多朋友，可是這些朋友却並不嫌多。因為這幾年正是不幸的時期，肇慶的生員們詭計多端，協力排外，加以有幾個新教友行爲不正，使教士們的處境，日見困難。事態的演進，竟使那竭力保護教士的王泮，覺得所負的責任太重了，便想脫卸干係，可是他雖然常怕因此獲譴，却終於陞任了湖廣布政司。於是闔城的官民，大家聯合起來，齊集歡送，向他表示感謝的誠意。（註七十二）這當兒，肇慶四郊又遭水災，使利孟二公懷憂掛慮。那時羅公已去了，不久，孟三德司鐸又奉命回澳門，只剩利公獨自一人留在肇慶，既須招待來訪的賓客，又要照料新進的教友。到了一五八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范禮安司鐸才率領了日本的專使，從臥亞塔船回來；他在那裏住了近兩年光景，正當這新產生的教會遭受極大艱難的時候。（註七十三）他回到了澳門，先派麥安東修士到肇慶，給利公作伴。利公得和麥修士重行相見，頓覺十分歡慰，可是還沒有過得兩天，便又得到了一個令人沮喪的惡消息，頓使全盤局面成了問題。

那時，廣州有一班耆老；他們「從不控告他人，也從沒有人控告過他們」，因此，特別受人尊敬。利公稱他們爲「安閒遊惰的王侯」，正足以表明他們的境況。這班「遊惰的王侯」，每年要由公家化錢請他們吃一頓酒席；他們穿着一種特別的服裝，使人一見便知他們的任務是「維護公衆的福利，却不尋求個人的利益」。這班耆老約有百來人，這回請了一個文章做得很好的訟師，起稿做了一張狀子，羅列幾種罪狀，控告西洋教士，其中有一點，是告教士們化了四五千洋錢，在肇慶建造萬花樓，說：「澳門葡萄牙人要在民間煽起叛亂，這筆錢，諒必從葡人得來。」按照中國專制時代的成例，他們可

以用一紙公稟，來表示人民的公意，（註七十四）所以他乘着御史按臨的機會，向他呈控。這位御史素來以清廉鯁直著名，所以他們掛起「攻乎異端的招牌」，深文周內他們的訴狀，洋洋灑灑，文章做得像韓愈的原道一樣。幸而他們所控各節，事事虛假，不難辨明冤誣，但仍須經過許多的程序，使利公等受過許多驚恐，才得驅除這可怕的威脅。

麥安東修士來後第三日，肇慶府署裏有一個小吏來秘密告知利公，說這件控案，已由御史發交駐廣州的海道查明呈覆；海道依照行政系統，轉發廣州府，由廣州府署咨行肇慶府署調查。這當兒肇慶府印由首縣方諾（譯音）暫為兼攝。這位縣令，對於羅利諸公素表敬仰。利公的朋友們，尤其是那府署裏姓楊的師爺，都勸他讓過這回風波，再作計較，況且這當兒，從前發給羅公的文憑，已被羅公帶往澳門，所以更該暫為退避。但利公等却一心依恃無原罪聖母護佑，不惜犧牲一切，決計不走。麥安東修士也許願如獲平安，當請澳門諸鐸獻祭九台。結果，這件控案，教士並不失利，因為過了兩天，代理府尹傅利公等到案質訊後，認廣州的耆老胆敢干涉他轄境以內的事情，而表示憤慨，便囑利公做一張答辯狀，翌日交案。利公辯訴書的內容大旨如下：「我和幾個同志仰慕中華盛治的聲名，才梯山航海，跋涉二萬餘里，從天竺國（即印度）來到如今已有七八年了。我因在澳門和在其他海上的住所，找不到種種便利，可以舉行我的祭獻，才請得准許在這地方棲身，苦持修行，專務恭敬天主，不欲擾及他人。惟知謹守國法」等語。

在這痛苦的境遇中，我們很可以看出出一種新生的勢力，因着利公所有廣大豐富的才學，使中國社會中一般優秀份子漸漸感受到這種勢力的影響。過了一天，肇慶知府假滿回任，全不知道這件事情，利公便和麥修士相偕前往府署晉謁，送給他一個威尼斯水晶製的三稜鏡。知府呈覆肇慶嶺西道的呈文中，對這位「修道之士」表示憐憫，說他「猶如遠來

的飛鳥，一飛到中華國土上來棲止，豈可視作「衰草浮萍」加以驅逐？因此，利公的答辯狀，不照先前的手續，向府署呈遞，却逕向廣州海道呈遞，由海道轉呈御史批示。駐肇慶的嶺西道更會同本城的當道和知府，親自來訪利公，給他說這件案子，包管不會失利。結果，利公竟獲得了兩重可喜的效驗：第一，利公從此可以領得證明文件，註明他自己的姓名；第二，麥安東修士在肇慶居留，可得官廳默許。這場風波就在九月八日以前結束。（註七十五）經過了這回艱險之後，大家才明白該怎樣竭力設法，使在華的教士得以安穩居留，這當兒，范禮安司鐸因為他設法使日本派遣使節的計劃獲得成功，覺得勇氣倍增，便催羅公早日動身到羅馬，晉謁教宗，請求派遣使節。教士們都希望假使教宗派遣使節和中國皇帝通好，教士們在中國傳教便可以得到正式核准。因此，利公便奉命同一個中國文士，預先代教宗擬好一篇致中國皇帝的華文的答辭。（註七十六）可是事實上，要實現這個計劃所有種種的努力，結果完全失敗了；以後，利公所以仍能在中國棲身立足，全仗着他所有西洋學術西洋文化的聲望，將來他還把這種學術文化漸漸介紹給中國，顯然成了灌輸西學的功人。

第六章 從肇慶遷往韶州

廣州耆老的控案使范禮安司鐸深感不安，因此他曾令澳門全體耶穌會士加工祈禱，多做苦工，求免這回被逐的危險。（註一）後來，那代天巡狩的御史，把這件控案，發下澈查的結果，對教士們尚無不利，利公在肇慶的地位，反因此一時更見鞏固了，但范公却看出這種情勢是極靠不住的。然而目前在華教務，雖則不會立下穩固的基礎，可是在最近六年中，確已有了極大的進步啦。大概說來，一五七九年所定的計劃，確已逐步實現了。肇慶的教士們因着竭力研習中國語言文字的緣故，已經掙得某些官僚的敬慕，受他們尊重了。西洋珍奇物品的供人賞鑒以及歐洲文化最先的表現，已足使少數華僑領袖天主教人文主義的秘奧。在官廳公開保護的蔭庇下，肇慶院中服役的幾個新保守，以及肇慶城裏幾個學習教理的平民，便能開始度着教友生活，每逢主日及大瞻禮日，經常到堂與祭，聽講道理了。當然肇慶城裏四十來個教友（註二）比了別處信友們的龐大數目，真如「滄海一粟」，但看一五八七年一年中，傳教東方的耶穌會教士，共計五百二十四人，印度受洗的計八千人，日本受洗的有二萬人，到了一五八九年，羅瑪會有人說：「看了從中國寫來的書信，可見在希望中的信友，超過實際上所有的人數，即使講實際，這不過是一個開端，我們不該認此區區為不足道，却該着手設法，使傳教事業漸臻穩定，等時機成熟了，然後再加緊進行。」

而且自從賈伯樂司鐸到澳門做了院長以後，已竭力推行勸化教外人棄邪歸正的工作；利公的環境雖多不利，却仍欣然繼續進行他傳教的任務。當時，澳門教會當局，打算在肇慶紹興以外，再在他處成立一處傳教機關，可是范禮安司鐸

却主張緩進，後來羅明堅浙江之行失敗了以後，就足證明范公實有先見之明。但因着肇慶幾個高級官員的暗助，皈依的信衆，仍得有增無減。那時，利公曾有信說。（註四）「你們要曉得魔鬼把我們當作他的大對頭，因為我們踏進了他的勢力範圍，住下了不走啦。」這些話，包含着多厲害的意義啊！凡是在異教國傳教的教士們，大概不難懂得。這位義籍教士也許和當初「喜報福音」的時代一般，和一種潛伏着的惡勢力大起衝突；這種惡勢力，當然不是正當的權力却把正當權力篡奪了，他和這惡勢力奮鬥的時候，必然完全記得那班惡魔在耶穌面前叫嗥跳躍的醜態。中國人民大衆心裏相信有鬼，民間所有的迷信，正和羅馬古代人民的迷信不相上下。可是那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件事情似乎表明利公却不肯相信魔鬼的能力可以獨霸一切。在他眼裏看來，以爲鬼的力量雖則足爲衆善的仇敵，無非是由於人的心理作用，決不能控制人的靈魂肉身。據說：（註五）有一個住在西江對岸的人，在亂墳中過了一夜，或者因爲受了驚，或者因爲他看見了魔鬼出現，或許好像看見了魔鬼出現，就變得像着了魔一般。他家裏趕緊請道士，帖符籙，供魔像，念經拜懺，却全不見效。有人請利公前往治魔。利公到後，看這人不像真附魔，所以並沒有念驅魔的經文，却命把符籙盡行燒毀，然後對病人念了幾遍經，把自己的聖骨匣繫在他頸項裏，勸他病愈後進教。果然，過不多時，那人病好了，就全家信奉了天主教。從此，利公便在這地方得了名，大家都說他從魔鬼手裏救了那人。」

這裏，我們很該把中國人的迷信一節，特加說明，因爲這是天主教在華開教時代所有特殊現象。那時，一般觀察家，走進了中國人家，一看就可以看出中國人的生活，似乎全沒有深刻的宗教意味，而覺得詫異。他們在大多數人家裏，究竟看出了甚麼呢？第一，一舉一動不脫迷信本色，却沒有祈禱，默想，並不按時參與宗教功課，只在家裏供着幾個佛像，或是神像，

一個供着祖宗神主牌的家堂，前面擺着一個香爐盛滿了香灰，却不點着捧香。每逢時節，尤其是當家裏死了人的時候，總要叫近處寺院裏的和尙或是道士來做法事，有時候，往往要把幾處寺院裏的和尙道士一齊請來。到了規定時節，大家都要上墳掃墓，有的遇到菩薩生日還要去朝山進香，這些地方同時還舉行着廟會，或是賣買的市集。

仔細看來，民間最流行的敬神風俗，要算是禮拜財神了。這財神並不是一個甚麼了不得的大人物。不過是一個依據神話的傳說，隨意塑着的神像罷了。廣州塑像店裏所塑的財神，形式真簡單極了，連人的形像都沒有；一個木雕的小神龜，前面掛着一個香爐，後面紅漆的壁板上，寫着一個金字「神」。可是大衆想發財的心理，和灌輸這種想像的作俑者的心，却絕不因這簡單的示意而衰退。這播散財寶的神祇已接受了用以滿足欲望的全般的性體，大家期待着他來實現各人的所欲。（註六）

不但中國人是如此，我們如果徹底研究民衆藝術所有裝璜修飾的意義，不難一看就看出種種裝飾的主要意旨是象徵的，而這象徵主義的底蘊也是很簡單，是出於幾個基本觀念的。幾時我們研究希臘磁瓶，我們可以寫成一本書，來討論這些磁瓶上所有言情的字句，這就證明愛的情緒，在希臘人的生活佔着重要地位。又如我們看了峨特式大教堂石柱或是石壁上雕刻着的花紋，和神秘的獸像，便可以認出這種雕琢的主旨是在啓示宗教信仰。同樣，我們考察中國磁器，符籙，刺繡，只見這些東西，上面都是顯得幸福的表示，便可斷定中國人心目中，常懷着這種願望，而知中國人的情感常爲這種願望所支配。中國人所以到處寫出這些心願，這無非是因他們相信這樣做法，總會發生效驗所致，以爲吉利的祝詞，和不吉利的詛咒一般，本身都能自起作用；所以在衣服上和在日常動用的器皿上，一再寫着吉祥富貴的祝詞，就能多

多遇到吉利多得幸福。中國人也認長壽是無窮福樂，所以年老的都受人尊敬。也許是這種尊敬未免過分，因為一班頑固守舊的老頭兒，對於公共的事情，大家許他們干預得太過分了，凡是革新的計劃，他們總是死勁反對着。因此，這班守舊的耆老便成爲當時中華帝國故步自封，不求上進的原因之一。中國在富貴壽考之外，還懷着「有後」——子嗣——的心願，爲如果沒有子孫，遵照定制，按時奉祀，去世的祖宗在墳墓裏，或是在家堂裏，就不得安樂，反過來說，活着的子孫，如果沒有死去的祖宗陰靈呵護，也就不得太平。世代縣延的爵祿，也爲人所崇拜，所以一朝發跡做官，都認爲非常榮耀，應考中試，是發跡做官的先聲，也大足以誇耀鄉里。其餘迷信的傳說還多着，比方二十八宿，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小說閒書中的英雄好漢，還有許多凡人成仙的故事，尤其是那八仙的故事，是最流行的民間傳說；某人得道成仙，某人長生不老，大家講得津津有味。總之，「這些磁器，刺繡，圖畫，不只是足以代表那使人賞心悅目，自出心裁的藝術思想，我們相信在這些東西上所有文字圖案中，還能聽出億萬人的呼聲，永遠喊出這千遍一例的中國人的心願。」（註七）

利公在這舉國一致的迷信心理中，怎能辨別得出那本來認得天主的人所有微弱不調和的氣息呢？他和他的同志們初到肇慶的時候，大家把他們認作有煉金秘密的道士一流人物，便有一班陰險小人想謀害他們。一般人以爲葡萄牙商人到中國來買了許多水銀，到日本去販賣，就帶了那麼多的銀子回來。他們不是跟着葡萄牙人同來的嗎？這就可知他們一定有點金的仙草，西洋人叫點金石——懂得點金術。再則肇慶教士們雖則度着出家人的生活，却不向人問乞佈施，因此，大家猜度着他們的錢，來路一定很神秘。羅利諸公起先很想闢謠，無奈越辯越使人起疑，認他們說的不是實話。末了，和他們要好的中國友人們，勸他們不必再辯，還使他們懂得這種謠言，比猜疑他們受澳門葡萄牙人的津貼，給他們做探子，

還算好一點。(註八)再則，他們顯「寶」似的，拿出各樣新奇的東西，尤其是那人稱「無價寶石」，「玻璃質的三棱鏡，讓人參觀，也使造謠的人有所藉口。後來，到了一五八八年將近三月的時候，利公會計劃好一種收斂運動，其中有一條，是把銀質的聖爵，改用白銅。(註九)製成，可是這種辦法已嫌太遲了，肇慶住院的西式樓房，和所有藏書，種種珍奇物品，以及那「大自鳴鐘」，上面有一隻鐵針指着鐘點，報時的鳴聲，使四周的居民生活有了規律。(註十)這一切似乎就够使闔城一部份人民有些眼熱啦，那鄰近的花塔，(即萬花樓)是和這住院同時落成的，當地生員們「教士們的住院叫「外國塔」。(註十一)覺得憤慨，便也起名花塔，可是往院的正式名稱倦花寺，是後來知府王泮所題。(註十二)不料在這富有詩意的至聖童貞聖母的名稱下，肇慶人民就毫不遲疑，把聖母誤認為那「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啦。這觀音是佛教密宗所敬奉的一位女性菩薩，在那時民間流着行的一部荒誕不經的小說西遊記中，確定了她的個性。這正如那最先到遼東的歐洲人一般，看見了「送子觀音」，便以為這是耶穌的母親聖母瑪利亞。(註十三)同樣，那時肇慶的中國人見教士們在祭台上供着一幀據說是聖路加手繪的聖母像摹仿本。(註十四)便以為西洋教的天主是一個女人。所以後來羅利兩公就換上了一幀救世主像，免致訛傳，却仍把這聖母像供在小祭台上。(註十五)從前佛教從西方傳入中國，現在新來的教士，也來自西方！說得準確一點，來自「泰西」或者「大西洋」。(註十六)無奈那時候大家弄不清楚，因此，教士們一切傳教事業，也有些像當初佛教的前例發展着，比方羅明堅帶着麥安東到紹興開教的時候，曾在廟裏對和尙們講過天主教道理。(註十七)的確，多虧利公善於說辭，幾個最通達的讀書人，已漸漸能加辨別了。因此當萬曆皇帝下詔禁止創建廟宇添收僧徒的時候，有一個管轄僧侶的小吏，前來傳諭。(註十八)利公却能給他說明立場，証

明他並不干犯禁令。但表面上教士們和僧道相混的地方還多得很；長袍，頭巾，薙鬚剃髮，深居不出，以及早晚誦禱的功課，洗禮用的聖水等等，還有些涇渭不分。到了一五八五年，教士們爲了實行和中國人同化起見，便各自在原有姓名之外（這姓名是按着他們的西文名字最切近的讀音翻成中國字題的），再取了一個字（例如利瑪竇字西泰）（註十九）。然而肇慶諸鐸雖則處處留心，使天主教和佛教不相淆混，無奈社會上對於他們公共的名稱，依然和佛教的和尙們混同着，大家都稱他們爲「僧」，便是教宗也被稱爲「大僧」。（利公奉命代教宗西斯篤五世）（註二十）預擬的那答謝萬曆帝的國書中，對教宗便是這樣稱着。）

這樣，在華耶穌會士們因着和佛教僧侶相混同的緣故，就被迫處於卑微的地位啦；究竟他們因此受到了何等的影響，我們只須一讀范禮安司鐸對於利公在肇慶居留時的評論，就可明白了。范公在這篇評論中提出三點如下：「第一，他總不能和官長對坐，到了公堂上，還得跪着；第二，他被人疑爲澳門葡國人的間諜；第三，肇慶住院被人當作廟宇一般看待，人人都可以隨意出入，官員們不時帶了惹人憎厭的來客，到院裏來宴飲，一連打攪了四五小時」然而范禮安司鐸對利公的忍耐，深表欽佩，他又說：「須知在這開始時代，他是怎樣忍受着，希望却又那麼微幾，啊！他從沒有寫過一封信給我，說他要回來了，他在中國留着，也並不和許多人所說的一般，是空費光陰，徒勞無益。」（註二十一）

講過了這些情形之後，我們便該說回來，繼續敘述在御史批駁廣州耆老們控案以後的事情了。這回風波平息後，利公得到麥安東的襄助，恢復了他的日常工作；同時，澳門方面，新到了一個意籍修士叫石方西（Fr. de Paris）那時還沒有晉鐸。這位修士是由范禮安和日本使節同回的時候從印度帶來，要他在中國傳教的；他到了澳門，便在孟三德司鐸指

導下，開始學習中國語文。（註二十二）肇慶的教友繼續增多着，其中有一個是利公僱用的平民，因為沒有子息，就把自己交托給天主；天主賜他的女人生下了兩個雙胞胎兒子，他於是合家奉教了。還有許多嬰孩，「在臨死時受了洗，到天堂上做了新主保。」（註二十三）

這種種的事情，都給教外的仇人們瞧在眼裏，特別是那一班生員，和那花塔的會首，這個人大家疑惑他，「表面上做着我們的朋友，暗地裏却想做我們的仇敵。」大家相信廣州耆老的誣控是和他有關係的。這一次他們的陰謀完全成功了，利公不得不讓過他們的惡勢力；其實，他還是再接再厲，只憑一句話來應付事變，說：「但聽吾主援助我們。」（註二十四）

不久，那繼任郭應聘的老總督，病死肇慶督署，由廣西巡撫劉節齋陞任。這位劉總督是南京人，他見前任死在任上，肇慶總督衙門是不祥的凶宅，不願在這這衙署中居住。因此，他駐節西江下游的梧州，等造下了新衙門再來。於是他的屬僚，都到梧州去參謁述職。（約在一五八八年十二月間，）便有幾個屬僚向他獻媚，說肇慶西洋人的住宅，正好作他卸任後的生祠。他聽了這班下屬這種奉承的話，覺得樂不可支，便不問情由，想把這座房屋填為己有。於是嶺西道就奉到了他的訓令，大旨如下：「本總督訪悉近有許多外國和尚來自澳門，在江邊建造廟宇，藏置輕舟，來往各處，刺探本國內地一舉一動，種種事情，報告澳門葡人。他們都是深謀遠慮，不怕勞苦的人，利用種種新奇製作，藉以招徠人民，至今人民日夜爭趨，前往聽講，傳播一種中國未有名稱的宗教。他們每天想法做出新奇的東西，講論各種學術和各樣的書本，以便誘惑愚民。他們又在公衆地方造起一座自鳴鐘。」末了，劉總督命嶺西道調查這些事情，如果查明屬實，就該把肇慶諸譯送回澳門，

或者勒令遷往廣東北部的南華廟居住，因為那裏不容易和外界交通。

這回的命令，和廣州耆老們的控案不同，這些雖則同是誣蔑的話，可是就大概而論，在物質一方面，這些話確乎說得不差。所以利公的朋友們就勸他搬到南華廟暫且住下，等換了總督，再作計較。在利公一方面，這件事情發生了以後，立即報告范禮安司鐸候示。范公的答覆命他「不惜一切代價抓住已經獲得的現有地位，否則就回澳門，他說：『我們不難給你找到別的地方，使你可以獲得更大自由，發揮你的熱忱，而得更大的功效。這當兒，恰值知府公出，所以這件案子調查的任務，就得以一個府署裏代行的僚屬辦理。利公於是「再具呈，聲請按照廣州耆老控案的前例，依法進行調查。但總督的權力多麼大，誰敢得罪他？他的鈞旨誰敢違拗？但看他到任後，便吹毛求疵，雷厲風行，不稍寬假，廣州的商家先吃他敲了一筆大竹槓；一個早已洗手的海盜魁首，一聽得他要拏辦，沒奈何，只得重操舊生涯，再去落海；他下令命人到瓊州灣採珠，尤其是欺君罔上的不法行爲。所以這件事，實在無法可想，惟有暫時擱幾天而已。利公趁此機會，趕緊給十八名男女新保守預備領洗，教繙譯員教他們和他們的子女，學習聖教要理；可是到了付洗的時候，「要他們脫去頭巾，露出額角，又經過了不少困難，等聖事一行罷，他們就立刻把頭巾帶上。」（註二十五）以前，新教友同時領洗的，從沒有這麼多；在這種超性的歡慰中，利公汲取了承當大難的神力。

他正想親到梧州向總督竭力聲辯，却打聽得總督已溯江東下，到廣州檢閱水師，預備征期倭寇了。肇慶府署的代行知府，趁着這意外的延擱，托利公到澳門，代某某京官代買大紅呢，和其他西洋貨物。因此，利公得有機會，和同會諸公，重行相聚幾天，留下麥安東看守門戶。那新從歐洲回來的日本代表們，便給他講述此行的成功，怎樣在他的出身地方，受到了

熱烈的歡迎（約一五八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左右）。利公「却有許多事情，要和澳門諸鐸商議，這些事情不是往返函商所能澈底商妥的。」（註二十七。）范禮安司鐸起先似乎執定成見，認在華傳教的企圖，差不多已經完全沒有希望了；這時候，經利公再三陳說之後，便收回成命，准許他萬一肇慶不能容身，不妨遷往他處居住。這樣商定了以後，利公便趕緊回返他奮鬥的場所。便在這時期內，他結識了那位秉性溫良，操行奇特的文士瞿太素。這位瞿先生便是後來發展教務，出力很多的名人，可是這當兒，非但開拓的時候還沒有來到，便是那已經佔領了多年的地盤，也正受着要被人擄奪的危險咧。

到了一五八九年五月間，劉總督征勦倭寇得了勝，蒙朝廷優旨嘉獎，權勢益見擴大了。（註二十八）新建的總督衙門也落成了；他就進新督署居住。他已經幾番催促過肇慶的地方官驅逐教士了，這時候，又不知爲了甚麼緣由，和廣州的葡萄牙商人起了爭執，因而懷着一腔憤怒要在教士們身上發洩。那嶺西道却反對他說：「只是他們造這座住宅，化了六百多洋錢呢。」——這個數目在歐洲果然不算多，可是在中國已算是一筆鉅款了。總督大人不肯掏腰包，拿出這許多錢，却又怕人參他強奪，不肯不給分文，沒收下來，只說：「哦！償還他們五六千洋錢就是。」他當下差人傳諭利公知道。利公回說：「我怎可把天主的屋子賣掉呢？人家豈不要說我浪費浪用，連教堂都吃下了嗎？而且即使我肯賣，把六百洋錢變成五六千，做這種買賣，我不是發財嗎？」利公真大胆，說了這些話還不算，還敢三番兩次，到總督衙門去求見總督，無奈總督關起大門，「對這藐視他賞賜的人拒絕不見。」事情弄得更糟了，利公向各衙門進了幾張稟帖，請求至少許他到別處居住，「不論廣西，江西，或是其他各省，不拘那一個城市裏都可以。」但總督越發發橫了，一概批斥不准，非把肇慶諸鐸，逐回澳門不可。

在這感受極大痛苦的幾天中，似乎看見了一縷希望，豈知這一縷光明，完全是水月鏡花，徒令人空喜歡而已。這當兒，巡按廣東的御史又到了，依例先到省城拜會總督，住了十二天，由闔城文武歡送下船，船埠上還排列着許多護兵，有儀仗鼓樂而導，儀式極爲隆重。這班文武隨從，忽然齊向着花塔走來。肇慶諸鐸和幾個朋友先在樓上看他們送行，萬料不到他們要到自己住院裏來。以前，總督或是本城的大員，從沒有到過教士的住院來參觀，所以這回一點也想不到他們要來，直到差役們來敲門才明白。總督陪着欽差大臣進院參觀利公的小陳列館，尤其是那搜藏着許多中西書籍的圖書館，見了各種新奇的東西，大加讚歎，賞鑒一番之後，才同到樓上納涼，進極豐美的茶點，徘徊了好幾小時才走。欽差走了以後一般對教士們表同情的人，便來向利公道賀，以爲危機已過，不至再有意外了。肇慶署理知府還當堂命承辦本案的書吏停止執行，勒遷的命令不再追究。可是到了八月初頭，劉總督竟又決計法辦啦。無疑地，欽差一去，他就無所顧忌了。他傳到那位署理知府，而下訓令，說：「這幾個和尚是外國人，務必令其出境，而且他們所講的道理與本國和尚的道理不同。」署理知府還想敷衍，就遭革職，便由總督派了兩個武巡捕前來，勒令利公在三天內出境。知府沒法可想，但能讓利公抄錄全案宗卷，和各官員所具稱道他的保狀。總督的批示中，說：「據稱利瑪竇來華並無歹意，節經查問，亦無犯法情事，但須知其出身異國，既隨處可以修道，何必定在中國，省會爲本憲駐地，殊不宜任令外人久居於此，當令伊等各歸本國，故此大飭其返國，似與國法人情絕不相背。至其建屋所費不貲，固屬實情，但該款既由捐募得來，即不得視爲己有，其於該員等准給之數再加銀十五兩，共計銀六十兩，俾伊出洋返國」等語。（註二十九）

這種強迫處分，真有點野蠻。這在利公原已早作準備，也未始沒有料到。這件事變他應付得非常明白了，當足使人人

知所矜式，但他一輩子保持着他回到肇慶的權利，至死不肯放棄。當署理知府來傳達總督旨意的時候，利公向他表示感謝，却不肯收那作為補償損失的銀兩，說：「他不需要銀子，他的本國人和教友們，不會不供給他路費。至於房價，那他是決不能收受的。」這些話知府一點也不反對，便是利公問他，「要教總督喜歡，我自己出肇慶府境留下我的同事，使得使不得？」他也說這可以，還給利公說明理由。於是利公把行李分作兩份，一份帶回澳門，一份交給麥安東照管，整整忙了一天。無奈總督不懂得這種事情，兩個武巡捕執定說：「不是教他到廣州再從那裏到澳門。」署理知府就老實說他只能發一張到澳門的護照。利公寫信報告這件事情時，（註三十）曾說：「神父，我眼看着多年辛苦經營的所得，失於一旦，那些可憐的信友們，猶如沒了父親的孤兒，齊到我們住院裏來，放聲大哭。這當兒，我心裏的悲憤，諒必你不難想見哪。」

利公既不表示怨憤，也不出言恫嚇，一壁打包裹，一壁揀幾件小東西分送給最窮苦的教友，把重笨不便帶走的東西，托給幾個誠實可靠的人代為收管；又把救世主聖像供在一個教友家裏，教眾信友按着他照陰曆排定的瞻禮單，每逢主日及大瞻禮日，大家都到這一家會集，念經求主，聽講道理。這當兒有一個統帶巡捕的武官想趁火打劫，把幾樣東西，拿去受用。利公就毫不遲疑，大聲呵斥，說要去告訴總督。這回他不得已而發怒，原是應當的；除此以外，他向眾人懇求，要是他有甚麼得罪他們的地方，要請他們寬恕。他這種高尚溫良的態度使在場的人個個起敬，憐憫他無辜被逐，便是他的仇敵們也不在例外許多人以為「這樣的人，無辜被逐，他熟悉中國情形，難道不會報仇嗎？」

最後，利公的行李，逐件裝上了官廳預備好的兩艘大船，帶到一處和省城距離畧遠的地方。信友們已在那裏等着了；同時利公帶了一袋鑰匙，去交代給署理知府。知府再催他收那六十兩銀子，利公一定不肯，只得教他具名，出一張字條，証

明他不收屋價，然後，給他一張文憑，上面寫着稱道他的話，另外發給一張護照，交廣州關官驗放派兵護送到澳門。於是利公諸事齊備，只剩和信友們道別了，他先向他們誥誡一番，給他們祝福了以後，才鄭重告別；彼此都以為此後永遠不相見了——這種見解未始沒有理由。這樣，利公「好比一塊石頭，費了那麼許多氣力，流了那麼許多汗，把他抬上山頭，差不多就要抬到山頂上了，却不料突然滾下來，跌到了地上！」利公等到了廣州，找不到關官，不得不停船等着直等了兩天。他們就在廣州買衣料，改裝穿西服，先差人到澳門向范禮安司鐸報告一切，說他們就要回來了。

到了那一天，他們突然看見後面有一隻小船載着兩個差役飛駛追來，叫利公等趕緊回肇慶。大家覺得這事蹊蹺，肇道肇慶官府要他們回院嗎？不見得。不管他，這總是好消息，因為的確他們知道此番一歸到澳門，要想獲得允准再進內地，真是難乎其難，而且就人的力量說，這簡直是不可能啦！以後，對中國官府，大家要永遠害怕咧！他們於是欣然從原路回轉省垣。到了肇慶，就聽到了許多離奇的謠傳；那素來很佞佛的總督老太太得了一個夢；總督自己怕教士們報復……終於由署理知府，告知利公說總督大人因見利公不肯收下那六十兩銀子，很覺放心不下，只怕和他作對的人們控告他，待他前任待得極好的外國賓客不照公道，所以定要請利公把銀子收下。利公依舊根據前述理由重行拒却，知府聽了，沒奈何，只得請利公親自向總督說明。利公便帶了一個中國人去見總督，他只用那人作伴，因為他很會說中國話，無須有人替他繙譯。可是利公去的時候，「不知究竟是吉是凶，不免有些惴惴恐懼。」他於是進了總督衙門，離公案遠遠跪下。總督却叫他跪上前來，和顏問道：「本憲好意給你六十兩銀子，你為甚不要就走了？」說着，便想把這銀子親手授給他。利公回說：「我到處都找到好人幫助我回家的路費。」總督說：「不差，不過本憲送你東西，你不該不受啊。」利公於是平心靜氣

的說道：「我在這屋裏住了多年，並沒有得罪人，你却把我驅逐，好像我是壞人，所以我看受你的錢，是不對的，我不受也不好說我不客氣啊。」總督聽了便有了氣，站起來大聲呵斥說：「怎麼，本憲的命可以不聽嗎！」說罷，又對那繙譯說：都是這個混賬東西，教他這樣講。」便命差役把這可憐的小子，套上鐵鍊，鎖起來。那人竭力陳說，不干他的事。利公也說如有冒犯，由他獨自承當，又說：「大人息怒，如果大人的好意，和所說的一般，就請把好意表示出來，這不在乎幾塊錢，只求不要逼迫我去冒出洋過海的危險。既然大人不讓我在肇慶，只求給我另外指定一處在中國境內的地方好，教我度這殘生，我已活不得幾天了！」

據利公後來講起這件事情說：「這當兒，總督給我說得動了心，顏色就溫和得多啦。」利公所有溫和而堅決的態度，終於挽回了總督的心意。利公的話他聽不很清楚，便命他隨從的官吏再說一遍。他聽了，覺得有些感動和憐憫，便重新提起他當初的本意，不是要把利公驅逐出國，不過要他搬到他處居住；利公却不肯啊！這時候，利公便請求到廣西或是江西，但總督說這不屬本省管轄，所以除了廣州肇慶兩處不宜有外國人居住外，他可以隨意揀一處。利公就揀南雄。總督說那可以，但勸他不妨先到南華廟和韶州城裏試試。緊張的局勢就此緩和了，利公便照中國規矩伏在地上叩頭，向總督謝恩。總督也向他表示親善，送給他一包印就的書籍，書裏詳細記述着他剿滅盜匪，平定倭寇的武功。

打罷退堂鼓，利公便出衙，走到轅門，又遇見了那位署理知府。他聽得大堂上震響着呵喝聲，還在那裏担驚害怕；此刻知道了結果，才放心歡喜。不過他不懂得這兩個外國人怎肯離開他們管轄的廣東到別省，未免有些詫異。「恰巧和知府同來的一位官僚劉三扶，剛從韶州來省，劉先生本是韶州的佐貳，此刻正代理着知州職務。他急急到省的原因，是在求見

利公因爲上一夜，他做了一個神秘的奇夢，「夢見幾個神道，和他慣常在廟裏看見的不同。」因此，他以為這夢和「外國僧」不無關係。他聽了總督和肇慶知府當面關照他，妥爲照料利公的話，當天就要帶利公趁他自己的船，一同前往。但利公願意先着手佈置，和某些人接洽，等諸事辦妥後再去。劉知州等不得不丟下利公，先自回去了。那些由利公寄放東面的信友們，被心懷嫉妒的鄰居控告，說他們搶去了原告保管的物件。肇慶府便派人查明利公所有全副的傢具開列清單，命兩造一齊繳到府署銷案。於是利公收下了那六十兩銀子。請府署換發護照，然後再到總督衙門辭行。總督也很客氣的接見他。到了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瞻禮，利公召集衆信友，向他們告別。這回，大家知道神父們既不離開中國，就不是永遠不能相見，便覺有了安慰。利公於是出了肇慶省城，乘船溯西江而上，到了三水，換船折入北江，便在這裏寫了幾封信，寄回澳門，報告一切。三水東通廣州，西接北江，是中國西南各省和那商業文化的中心廣州間的唯一交通要道。華南八九月的氣候，還很炎熱，利公等坐着沒艙船，行好幾天水路，一路又沒有人可以交談，真覺得難受。一件事更使他感覺不安，他看見有一隻船在後面跟定了他們。這會不會是在大路上打劫的強盜嗎？直到行程告畢的時候，他們才知道這是廣州關官派兵來保護他們的巡船（註三十一。）

北江的兩岸，有幾處是絕壁懸崖，江水在這叢山中迴迴曲折的流著。這一帶山地是中國佛教的發祥地。有人在霞山的仄徑上，指出一塊岩石，說這便是公元五百二十年左右，高僧達摩精思成道處（一般牽纏附會的人說達摩便是，聖多默宗徒，還每以爲五百羅漢中有一位是馬可勃羅。）後來，那道宏和尚曾到這地方來和他的弟子們道別（註三十二。）在距離英德五公里的地方，還建立着一處供奉觀音朝山進香的勝地。但廣東北部的佛教中心區域却是那規模宏大的

南華寺；這座寺院便是六祖慧能（公元八百年左右）的發祥地（註三十三）。據說：這位苦行高僧，親自播穀，供給闍寺僧侶的糧食；他腰間束着一條鐵索，嵌入他腐爛的肌肉；一天他見一條虫落下來，掉在地上，便把他輕輕拾起，放在自己腐肉上，說道：「你還有吃的東西，爲甚要逃走呢？」在佛教的外觀下，達摩僧把參禪法傳入中國，至今遠東各國還盛行着參禪的遺風（註三十四）。

利公和麥安東兩人到了八月二十四日，才到達了那和南華寺相距兩里的埠頭，利公的名聲却早已傳到這裏了。那位韶州知州在三四天前已派了一個差役在這裏等着，迎候他們。南華寺裏的和尙聽到了這個消息，就大爲震動，因爲有許多和尙不守清規，養着婦人，生下了兒女，有些還暗中做着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的勾當。這當兒，他們奔走相告，互相問着：這些外國和尙到這裏來做甚麼呢？管佛教的官府，會不會革新風氣，要把廢弛的戒律大加整頓呢？因此，他們雖則心裏不願，面子上却對利麥兩公極表歡迎，只是不讓他們居住適宜的房屋。

這一幕的經歷，利公會給我們留下了充分的記載。那時，來迎接他的和尙共有十二人，可是大家都懶得不當一回事，到碼頭等候的只有兩人。管碼頭的小吏，也等得不耐煩了。船一到，知州衙門的差役就要把行李傢具拿上岸去，但利公成竹在胸，却對他說，最好等和方丈見過面再搬。於是吏胥們請兩位教士上了馬，正式護送他們到了南華寺。這南華寺建築在一處清靜的山腰上，四周羣山環抱，果木森森，蔥翠可愛；澗水潺潺，山茶遍地，四季常青，大殿雄踞山腰，莊嚴瑰麗。僧衆千餘，分住十二院，每院有一首座主管，但都屬方丈統率。山脚下有一個小鎮，只分兩條街道，兩邊都開着舖子，全靠香客營生。利公和麥安東到後，便由知管僧先領他們到那給過路官員預備的客房中，略爲休息，然後領他們去看兩三間不堪居住

的屋子。他們順便參觀寺院的全部，經堂，佛殿，多得數不清，還看到了六祖慧能潛思修煉的山洞，和誦經咒的山洞；走進了羅漢堂，只見裏面供着四百多尊羅漢，「有裝金的，有髹漆的，都是他們生平所未見。」幾座碩大無朋的洪鐘，有點銅鑼做的也有鐵鑄的，歐洲的鐘都沒有這麼巨大，」鼓也是大得和鐘不相上下。利公說：「我們不如在山脚下的小鎮上居住。」這晚上，麥安東仍回船上過夜。

第二天，正當陰曆望日，寺裏六七十個和尚，便齋戒沐浴，穿上珍飾的法衣，排了隊，從一座大石梯走下，到供着六祖金身的地方去禮拜，那裏同時點着九十八盞明燈。利公見了，未免有些目瞪口呆，以爲「中國人雖然跪拜偶像不算一回事，便是不信，也不妨拜拜，」却不料恭敬一個祖師，竟這麼鋪張揚厲，便覺不勝驚異。他對這位成佛的祖師，連腰都不彎一彎；他們看他這種態度，真是大不敬啦！這裏我們就可以明白利公的用意了。「他來的時候，就存心甚麼都不依，而另一方面呢，却甚麼都不讓他隨便。」

所以，八月二十八日的早晨，南華寺的方丈一早就帶了三四個僧徒，教利公乘着馬，一路送他到韶州城裏，州城和南華寺相距的路程是六十里。同時麥安東仍坐了船，由水道前往，比陸路多五里。所以麥公得趕緊動身。到了正午，利公已過江進城了。便運到州衙門去見知州，做了一張呈文送進去，說：「我們不能住在南華寺；我們向來和儒士官府往來談論慣了，認爲知己，那裏和他們離開得太遠了。」知州見他回來大爲驚異，又聽說這兩個西洋來的和尚不敬佛像，「只敬天地大主，」越發覺得詫異了。利公怕知州聽信讒言，便從袖裏拿出一本日記本，指着幾行模糊的字迹，竭力聲辨，引韓愈的話，說：「中國自古無佛。」南華寺方丈聽了，就回說：「不錯，但六祖見南方人文教不先，據說他因此教人造像敬佛。」這話

就結束了爭執，南華寺是一定不去了，但仍須呈報總督，批准了才算確定。利公見韶州的環境還算適宜，便決計住下，不再前往南雄。這天下午，他聽了知州的話，請一個書吏一個地保陪着他去拜會本城大小官僚，費了整半天光陰，才完事。他們個個都很客氣地接見他。這當然是因他們知道有知州保護他，也許是因利公這回對於官場拜客時所有繁雜的儀式，比以前熟悉得多了，使人不敢怠慢。惟有那州丞是名進士出身，和他初見面，不很喜歡，但只須利公和他畧談天文地理，他就覺得這外國人的學問在他之上。利公辭別時，便許下他等地球儀送到之後，就拿來請他賞鑒。

利公一路回到州衙，一路有大批羣衆擠着觀看，大家爭傳着他的名字，說他有非常的本領。這天他在烈日下，騎着馬趕了大半天的路程，本已乏累極了，這時候便覺得頭昏腦脹，所以還沒有到晚上，他就不管好歹，到一座廟宇裏住下。他的行李還在船上沒有到。這一夜他草草睡下，便大發寒熱。但他覺得這地方已給他征服了，再辛苦幾天，他的地位必能更見鞏固。韶州位在緯度二十九度又三分之一，強（註三十五）。正當兩大河流的交叉點，西由武水通湘西，北由北江入贛南，是商業上的要衝。韶州城築在兩道河流相交處的土股上，市面沿兩岸伸張着，據說：以前人烟稠密的時代，曾有兩次，要比肇慶繁盛；目前，韶州居民約計五千戶。最繁盛的地方，是在河西的西市，那是用鐵索把六十多艘船接連起來，做成一座浮橋，和州城相接的。南華寺的和尙在這裏造了許多廟宇，至少有二十來處。西市最熱鬧的地段叫南安橋，距離浮橋約一箭之地，鬧市便在附近，知州衙門的吏胥就勸利公在這地方住下；「這樣，既合着總督的意旨，住在城外，又和他的朋友們和民衆相去很近。」利公認這意見很對，便立即照辦，不顧南華寺方丈反對，因而使廟裏的和尙們不懷好意。這當兒，恰有一位過路的大員住在這座廟宇的空屋裏，利公就趁着這位兵備道來拜會的機會，請他派一個差役領自己去看看全部的

的地勢；這個差役，利公已經和他相熟了。那裏有一所很好的院落，正對着廟宇，只隔得一條路，鄰居也很少。他於是立即請人和這位官員開始談判，請他遷讓。但這件事沒有總督核准，是不能談妥的，便由知州等當地各長官行文肇慶府，就交利公坐來的船帶轉，使這件公案早日辦結。在未得批示前，利麥兩公暫時在那管理廟宇的職官公館裏寄住。來訪的人絡繹不絕，他們都要比廣東南部的人和善得多；誰也沒有提起澳門，或是葡萄牙人的事情，大家認這兩位是肇慶來的新客。

在這過程中，澳門諸鐸真是多麼擔憂啊。他們接到利公第一封來信之後，便準備一切，來安慰這兩位被逐的同志；以後，誰都不見回來，反更音信杳然了，便派一個會說中國話的人沿路訪問，直訪到肇慶。有人說：「神父們已被驅逐到廣州去了，不知現在到了甚麼地方啊！」這使者回報了以後，澳門諸同會越發放心不下了。當時有一位關心中國事情的麥蒂南司鐸，(P. Ferdinand Martinez)曾私下對石方西修士一再說過：「我們不會再和利瑪竇見面了。」范禮安會長於是再派一個比較精明能幹的人去探聽，還命他必須探得確實消息，才准回來。這第二使者先到肇慶探問一番，依舊毫無下落，沒奈何，只得回去，却在路上遇到了那帶信的船夫。這封信裏利公講起經過情形，說：「天主對於中國的仁慈把他留下，或者說使司鐸們仍能立足。」那時，范公正命諸位司鐸，為遭難的同會，加工祈禱，多做苦工，一接到這封信，才放了心，覺得十分欣慰，便趕緊打發一個叫茄斯巴的傭人送去幾封滿紙慈愛的回信。他說：「你竭盡一切可能的方法留在中國吧，就這樣保存這座住院吧，他的聲名已傳到了歐洲啦。過去的苦難正是將來成功的神聖印號啊！」(註三十六)

利公的回信是這樣寫着：(註三十七)「聖母聖誕禮，(九月八日)因着茄斯巴的來到，吾主使我們獲得了安慰，吾公和同會諸公的來信都由他帶到了……的確，那時我需要這種安慰，因為這當兒，敵人們的氣餒，比以前更凶了，他

們想出種種方法，要把這傳教機關大加破壞，使我非常焦慮。事實上，一有危險，我就設法求安全，一點也不高興加重我們事務上的困難。不過我聽到你和大多數同會諸鐸的意見，以為這回換了地方，我們非但沒有失掉了甚麼，還得到了便宜，我就不願再持反對的意見了，我也覺得回復了勇氣，高興再為勒賽（Reiss）服役七年。」

利公引古經聖祖雅各伯，先為里雅，後為勒賽服役七年的故事，而許下的心願，後來差不多完全照着字面實行了。從他在肇慶開教，造下了仙花寺，起到被逐遷移，在韶州西市住下為止，其間大約經過了六年；他在華傳教的第二階段，從韶州到南昌，也和六年相去不遠（五年又八月）。他在這幾年中，雖則遭遇了許多困苦艱難，鬱鬱不得志，可是中間偶然也有心安神樂，前途呈現着一線光明的時候，不過他努力進行，孜孜不倦，總是耐心等待着時機的來臨，好教他傳播天主的聖道。

第七章 中國的文教

利公在韶州重整旗鼓之後，所有直接效果之一，就是發現了中國文教的精神：這不是慣常大家所想像的一種陳腐刻板的經典文學，却是一種真正的人類文明能把外來的文化學術和本國的文化學術相與融會貫通，撮採精華，覓取方法，以求進步。這種文教的精神在一位儒士身上表現出來。這位華儒持躬狷介，操行清奇，很足引人注意，一朝結識訂交，便矢志忠誠終身不貳。這位是誰？便是常熟先賢瞿太素先生。

爲使我們對於這種人物的估價，更見準確起見，眼前不得不把正文暫爲擱起，先講一講那浩如烟海的漢學典籍，使一般研究漢學的外人望而生畏。近代人士如果要仔細研究中國的文獻，主要的指導，便是那四庫全書的簡明目錄，這四庫全書，是當十八世紀末葉，清帝乾隆時代編纂成的，內容分經、史、子、集四部，所以稱爲四庫。這本目錄，差不多把所有的書名完全列入了；各種註解的經書，巨帙的史籍彙編，諸子百家的著述，歷代名人的文集，無不廣爲搜羅，應有盡有。研究這本目錄的作品，有韋理氏的 (Wylie) 「中國文學記要」和魏格司鐸 (P. Wiegner) 的「圖書目錄」，在後者的著述中，一再表示深切煩悶的感想而刪去了其中許多的書目。(註一) 可是近代 (一九一七年) 中國一般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在這欽定的四庫全書之外，看到了幾部爲人藐視的白話文，或者近乎白話體的小品文字，詞意明白曉暢，文筆又生動活潑，便嘖嘖稱奇，大加歎賞。這種作品在民間私下流傳，大概是文人遊戲之作，作者還力圖托名自隱，不肯說出真名。這些小說傳奇之類，使我們得以認識中國社會上錯綜複雜的情形，正如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短篇小說家給我們保存着當

時義大利社會的真面目一般。所以我們不妨就上述種種來評判那篇「鍊金人」的序文，這是從和利公同時代的一部書叫「今古奇觀」摘錄下來的（註二）

「他是在一般衣衫襤褸的人們中，穿長衫的一個，他自稱師傅教人變化五金的法術。那麼這班人爲甚不給自己，做成些金子呢？這無非是因他們的法術，只能把清水賣給那相信的人們罷了。這些話是生在本朝（明）開國時代的名人唐解元伯虎做的四句詩的釋意。我們在上邊說到處可以遇到一班靠「燒丹煉汞」做職業，行險僥倖的異人。他們詭計多端，不住做圈套，教那貧賤的愚夫愚婦去鑽，行蹤飄忽，像鬼一樣。他們自稱能認得幾種草藥，和丹石放在一起，就能使頑鐵變成金銀；這便是他們所稱爲爐火術，也叫「黃白術」。他們一開場，就教人拿出些金銀飾物，交給他們，據說這是金母。以後他們就乘間拿了這騙得的東西，逃之夭夭了。」

這真是咄咄怪事！因着民衆的輕信，就把利公當作這種江湖術士一流人物。他在肇慶留下了兩種建設，一種是精神方面的建設，就是那人數寥寥，只有八十多名教友的天主教教會。（註三）另一種是物質方面的建設，就是那教士的住院。他一走，這住院的大廳中，就立即由總督供上了幾個佛像，外面圍牆上還嵌着一塊石板，上面刻着「廣東劉節齋捐銀購此外國人之屋宇」（註四）。利公在日記中曾記：（註五）「關於我們被逐的動機，全中國境內已傳播着一種野話。這種野話，據我想來將來，要傳下幾百年，不能除滅，因爲有許多人把這完全虛假的野話，當作一件千真萬確的新聞傳說着。他們說總督先把外國人叫來要他們傳丹石變成銀子的符咒。他們回覆他，說這咒語不能威逼傳授的。所以他們雖受種種威嚇，却始終不肯教給他。就爲了這個緣由，他把他們逐出肇慶了。他做了這件惡事，沒有一個人不罵他。」

便是那韶州知州表示的親善，有些突如其來，也難免不別有用意。但范禮安會長早已囑付過利公了，教他竭力避免一切足使人誤認教士爲富有財物的措施，或者在表面上做得使人懷疑，「我們在現在所有可以給人的東西以外，還有其他金銀財寶」（註六。）九月一日，利公等到韶州三天，後當知州請他們吃飯的時候，他們先向他表示歉意，說他們還沒有把那自鳴鐘裝好，所以不能請他參觀；眼前也沒有別的東西做禮物，只得奉上些衣料和玫瑰香水等（並沒有那人稱「無價寶石」的三稜玻璃。）那位曲江金知縣會請他們到縣衙門去過兩次，對他們說，素聞他們有貴重的東西，所以勸他們謹防竊盜。那時，南雄的縣丞正在韶州訪案，金知縣便和他同到廟裏來訪問。利公爲滿足他們所有普遍的好奇心起見，便展開那祭台上供着的救世主像，和一篇救世主傳，還慷慨淋漓地給他們講耶穌救世的故事。這兩位官僚就留下了一兩銀子的佈施，教在像前焚香齋供（註七。）利公曾記述道：「於是天主的聖名就當着一羣人前傳揚了，在韶州住了十五天，真要比在澳門住上一年有效啊。」

也許韶州人官話講得不如廣肇人，言語舉止不及廣肇人文雅，却也沒有廣肇人那麼刁滑，那麼迷信；教士們住在那裏，一點也沒有惹他們憎厭。四鄉的土地，不很肥沃，物產貧乏，只有大米和各種水果，而且這地方既然是過路的碼頭，生活費用就貴得多。天氣也比較寒冷（有時近處山頂上積雪不消）（註八。）從十月到十二月，瘴氣很盛，韶州居民害瘴氣熱病的要有三分之一，不治而死的很多，尤其是外鄉人得了病，難望痊愈，事實上，教士們和他們的僕人們，到得不多幾天，就受了瘴氣的侵襲，相繼病倒了；而且他們在這並無這種治療設備的地方，得了病既沒有人替他們診治，又沒有對診的藥品，可以服用，病勢就越發加重了，首先得病的是伯特羅（Pedro）泰（Xina）文大（Veritas）三個僕人，跟着茹斯巴也病

了。九月十一日，麥安東也上了床，到第七天晚上，看來快要死了，但九月十九日病勢有了轉機，就漸漸痊愈。利公始終懷着不可動搖的依恃心，不辭勞苦，不怕傳染，照料着他的同志和人們；可是到了九月二十日，他也輪着了，病倒了一星期，到九月二十七日才能勉強起床，帶病前往交涉購地建屋的事情，商辦一切詳細手續。他雖則比同事們有一點力，却還弱得很，沒奈何，只得挨着到州衙去見知州，前後共去了四五次。他擇定的那塊在廟對面的地基，由知府傳集鄉圖保甲四長居間說合，出價購買。這塊地本來只值八九兩，到十兩，這時候却討價八，九十兩，至少要六十兩。這當兒，肇慶知州已換了人，利公和肇慶官廳的通信因此擱下了。另一方面，范禮安會長主張這地方暫時借用，不付價銀，但利公怕和廟裏的和尙們相混雜，認為不妥。他又探悉那時在廣州的韶州道發來的批示，飭令知州必須等候總督核准後，才可定奪。末了，到九月二十五日，接到了肇慶新任知府的咨文，通知本案已奉核准，這位新任，以前也和羅利諸公交好。和尙們的態度本來是以官廳的准駁為轉移的，既經總督核准，這件事情就不成問題了。九月三十日，利公病體新愈，就使出價購地的經過情形，呈報知州備案，知州也為之欣慰，經過了幾樣瑣細困難之後，就發給他一紙批准文書。利公便立即派遣茹斯巴回澳門，去見范禮安會長請示，並請求籌撥款項，范公就把這回遷居的事情，呈報那縣會總會長，却要利公担負一切責任（註九）。他又寫信到印度，召兩位葡籍青年會士來澳門，預備在華傳教，這兩位青年一位叫蘇利歐（Jean Soeiro）另一位便是羅如望（Jean de Rocha）那時都沒有晉鐸（註十）。茹斯巴回去的時候，范公又命鍾巴和黃明沙兩位華籍修士，同去襄助利公傳教。這兩位都是澳門人，鍾巴相出身廣東新會縣，是個富家子，神經稍見衰弱，身體却很壯健，官話還講得不差；（註十一）。黃明沙體力稍差，却讀過一點拉丁文（註十二）。這可見那時候，在華耶穌會當局，已開始利用澳門教會的本籍

人才了因此，我們也就知道耶穌會士担在華傳教的任務，差不多一起頭，就叫中國人來合作了。這兩位助理會士，是最先的中國修士。歐洲教士們有了他們襄助，就用不着通譯；這些人「大都不忠實，對於教士們的信譽，大有妨害一切事情，都被他們搗亂了；因為他們很狡猾地，把教士們的一舉一動，看在眼里裏，再把裏面的一切情形，對外面胡說亂道」（註十三）。利公於是急速進行着手建築新屋。這塊地基是長方形，長三十三公尺，（合十一丈）寬二十七公尺，（合七丈半）（比摩慶的地址大兩倍，）後面有小樹林，圍繞着一個可以養魚的小池湖，畧加點綴，便可用作遊憩的地方。從十月四日起，范公的款項還沒有撥到，木匠却已動工了。但利公的經驗，已給了他教訓，所以他這回興工建屋，就力避足以引人注意，或使當地生員有所藉口的舉措，只造平房沒有樓；窗向裏面圍地開差不多樣樣都照中國規例做，惟有那小聖堂尺寸比較大一點，因為大家希望——後來知道大謬不然——要有許多教友共集一堂。知州見了這樣湫隘的規模，很有些意料不到，但多虧范公撥到了充分的款項，一切工程都完成得非常迅速（註十四）。

物質方面的設備，只算得是一種附屬品，在一個傳教機關中，固然這是少不得的；精神上的光輝，那才是要素咧！我們不訪問一問：那裏能不能找到一種尊嚴的氣概，可以在摩慶的住院並駕齊驅。我們在前面講過，看來好像是一煉金人「記中的被騙者」一流人物，便在這地方發揮了他的個性。他的確有一種高尚的精神，有各種寬宏質直的德性，甚至使我們不能拒絕他的判斷，和對於人生日常一舉一動深刻的推求。只是他堅信着丹鉛的神效；人人都有弱點，這便是他的弱點！（註十五）這一位名叫羅太素字汝夔，原籍江南常熟（現在的江蘇省）他的父親羅文懿公普曾大魁天下，是三百進士中第一人，在他的文章詩賦中，見他胸襟高雅，為政治民，見他廉明公正，可惜他享年不永，官做到南京禮部尚書逮

爾逝世。太素小時候在弟兄輩中，是最聰敏的一個，如果專攻場墨，那麼，獵取功名，正是易如反掌，無奈他也犯着貴家子弟的通病，一朝擺脫了嚴父的管束，便任情享樂，把千金家產，浪費一空，在燒汞煉丹上，化的錢還居多數。如今他弄得一貧如洗，不得不離棄家鄉，出門覓食。幸而他出身舊家大族，他父親的同寅僚屬又很多，便去找他的父執，或是先世的門生故吏，做依人籬下的食客，度着優遊歲月的生活。假使他生長在十八世紀的法蘭西，他便是一班敗落鄉紳們中的一個；穿着漂亮的衣服，抖擻精神，和那裝腔作勢，自命不凡，靠做官吃飯的人們，或是那傲氣滿身的貴族，厮混得熟極了，可以無話不談，代他們策劃，決斷一切。這種人在中國，便是那所謂「中人」；這就是說善於居間說合的人，沒有他，甚麼重要事情，都講不妥辦不了。太素聽人說利公有燒丹煉汞的秘方，便到肇慶來訪道，可是那時候，利公正當遭受窘難，所以他未便響齒，沒有求到那久已聞名的丹方。他曾去拜會過他的父執劉節齋總督，和他的同鄉嶺西道，可是這兩位待他却很冷落。但韶州的州佐，和他是舊交，利公到了韶州，他就托州佐妥為照應，他自己也托這位朋友在廟裏弄到了一間很好的屋子作廬所，好教他和這位外國教士相距很近，因此便於過從。一天，天氣晴和，他備下了盛大的禮儀，到利公那裏，定要請利公做他的師傅。利公再三推却不得，沒奈何，只得讓他行大禮受他三拜；他送的綢緞等珍貴禮品，也只得照單收納，又聽他在廬所裏擺了一席請師傅的酒筵。但利公也留心記着，後來答應了許多西洋禮品，價值要貴得多，好教人不疑他貪吝。這件事便是利公和太素誠摯交誼的開端，他和太素締交之後，便能進而研究中國四千年來所有立身處世做人的大學問。

他們倆結識了以後，太素便不時往見利公，聆其教益，所以在最初一二年中，獲益的却是太素。他起先專心一志，留意於燒汞煉丹的方術，一經利公在理化方面畧加指示，便因此獲得了西洋科學初步的啓迪，而心懷嚮慕了的確，這位思想

卓越的青年學子，受過中國數千年文化的薰陶，對於歐洲文藝復興後新發明的思想學術，很能心領神會，足令人嘖嘖稱奇。西洋人每每指摘中國儒士不諳算術；這在一般並不自稱博學的人文，還不能嚴加責備，對於太素，尤應視為例外，因為他「籌摹着新穎的學術，似乎他無論怎樣學，總是學不厭，而不能使他滿足的。」他先習西洋算術，「這比中國人用算盤的算法，把算盤珠撥來撥去，計算數目，方法要高明，也簡便得多。」隨後，他研究格拉維司鐸（P. Clavius）的「地球儀」，這便是沙克洛包斯谷氏（Sacrolosco）專論的詮解。末了，他竟學習歐吉列（Euclid）的第一冊幾何原理了；這在一個從沒有讀過三段論法的人，更足使人詫異。當然，在現代人士看來，這沒有甚麼了不得，可是在十六世紀時代，這種科學，已够麻煩，學的計算法，「來測定高度和距離。他日夜溫習着利公教他的學業，或者修飾着他的圖畫簿，畫得非常美麗，比了我們歐洲人所繪的圖樣，一點也不輸。」他又親自製造各種儀器，如六分儀，四分儀，地球儀，渾天儀，測星鏡，羅盤等，木的，銅的，便是銀的，都能做得一點不差，技術也很不壞（註十七。）

因此，中國境內，科學創造的樞紐，經這麼一推動，就重行開動啦。這個樞紐，自從元代滅亡後，（一三六八年）實際上已經閉塞多時了（註十八。）這還不算，據說：太素「把他「所學得」的一切學術，用極簡明，極雅馴的言語，編著成書，給人閱看。」——這可見利公倡導着的一種革新文字的運動，經過了許多爭執，後結果在十九世紀中，先由曾國藩氏予以聲援，到了目前二十世紀，就因新文化運動的成功（註十九）而達到目的。這件事實對於中國的前途，却有重要關係；如今中國在智識上，道德上，如果已有革新的氣象，這無非是因在各方面受到了新思想的侵襲，是因新的觀念深入人心，把舊

觀念完全推翻所致；那精神的動產——假使我們可以這樣說——已大加改變了。當十六世紀時代，曾有幾個從事這種運動，聲名不顯的先驅；這些並不是出洋的留學生，因為那時候出國到海外，去研求這種新學術的，一個也沒有，却是幾個從事譯述或是編纂的作家，因着他們的貢獻，中國的文人學士，就能讀到國外的著作。所以除了利公後來認為繙譯他的世界輿圖（註二十）還可以將就對付的那個福建生員，以及其他在華慶的幾個文士之外，真正開始編纂那幾部雖則簡單，却很有益的科學書籍，因而把西洋學術灌輸到遠東的人，總該以太素先生為首屈一指了。華慶的大員們只知在外表上着眼，欣賞着義大利精美印刷的外觀，投影的木刻，花體的大字，亞爾特（Aide）和曼努斯（Manuce）的活字，紅皮的封面，可是太素却和他們大不相同，要知道在這些大大小小的裝訂得非常講究的書本中的「夷」文，究竟講着些甚麼事情。他生活在這狹隘的世界中，四面受到包圍，處處要仰仗他人的蔭庇，只覺障礙重重，難以超越，然而他終於一下就越過了。利公是個知而能行的人，是東方和西方兩世界間的聯繫人，和溝通中西學識的先達，——以前，中國人和西洋人是不能互相了解的。所以，他見中國的智識份子，大都自命才高學博，遇不到一個求知的人，由得他表示憤慨。他一朝遇到太素，就覺得此人又當別論了；這一位虛心向學，便是在他看不懂的外國文書籍中，所包涵着的神秘寶藏，他也想分嘗一嚮，却不料那裏正蘊藏着西洋學術，和人生的大學問；這種學問如果到別處去尋求，不見得能學得那麼完全吧。這位中國文人於是對那泰西鴻儒十分欽佩，景仰之心，也就一天深似一天啦。

他孜孜不倦地學着，他的成就要比他所期望的超過了許多。某些哲學史家對於中國儒士們所稱頌的地方，似乎正是他們所常有的大弱點之一例，如烏塞爾（Masson Oursel）的論著中（註二十一）有曰：「孔子的哲學不論是那麼淺

近那麼不經意，却代表着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和我們同時代的哲學家——這不止一個——所要勸導我們的態度，正是十分相近，這既不是和亞列斯多德所有的態度一般，偏重意想，也不像斯多亞密爾（Stuart Mill）一樣，主張現實，却是專講着人性，就是說一種合於行為的思想，在社會上能轉移人心，利及萬物。」也許胡適和現代許多中國學者們，他們也要因着數千年來不能只憑一本僅有一千七百餘字的「大學」用作闡發中國思想哲學的依據，而感覺不滿。胡氏曾在他的「一部論著中」（註二十二）說「哲學每依着論法為轉移，闡發哲理，又依着論理的方法為轉移，這種情形，在哲學史上表現出的真多着啦……歐洲和英倫的現代哲學，已從討論方法和開始建立一種新機構入手了。」有人要問：假使羅太素開啓的道路，不是依舊限於極少數文人的狹隘範圍，而為中國全體智識界所遵循，那麼，當十六世紀末葉以至十七世紀初葉中國人的思想會發展到甚麼地步呢？這層已經梁啟超氏說明過了。他說，有清一代中，所有全體——或者差不多全體——創始的思想家，都已懂得歐洲的幾何學了，這就是說他們對於三段論法的應用，都已熟悉了。那麼，他們為甚麼沒有用這問答式的方法來擴展他們自己的思想呢？不但那些如高音勃列桑派（Combricence）的士林派作家的理論，他們早已熟悉，便是笛卡兒（Descartes）、萊勃尼齊（Leibniz）等大哲學家的學說——斯賓挪沙（Spinoza）更不必說——也都早已見慣不足為奇（註二十三）。可是這却與尋求真理並不相干。太素信從真道，全不是因歐洲奉教的文明國家，所有這種哲學和形上學的外觀，對他有甚麼特殊吸引力，却是天主教的神德教訓，使他心悅誠服。這就可見他不失中華民族聰明的本色啦。一天，他終於放棄他的成見了，便請利公給他講解天主教道理。這真是一「稍縱即逝」的重要時機。因此，利公把其他一切的工作暫行停止，下一番工夫專和他論道，一連談了三四天，把全部要理給他講得明明白白。這位中國弟子，從頭到

底很留心地仔細聽着，把要緊的地方用筆記下；隨後，他又把疑難的問題，逐條寫出，每條後面，留下空白的地方，好讓利公把答案寫在旁邊。利公看到他的詰難，「都是我們神學上所討論的最困難的難題，最大的癥結，不禁大為詫異，而在太素一方面，原以為這許多癥結是一個也不能解決的，却由他的老師一一解釋明白，便也大為驚奇。」又有一次，他聽講聖人們為天主捨棄一切的芳表，便說：「這並不是苦事，也不是難事，這在依照貴教道理，希望着身後享福的人們，尤其是如此；以前，我們中國人沒有努力去做這樣的事情，這無非是因以前我們所有的宗教，一個也沒有許下我們，一定能得到這樣的賞報罷了（註二十四。）」

這些談論如果使太素得到了真正的啓示，那麼，我們見他和利公彼此各表驚異，也就不足為奇。這當兒，利公已漸漸能在中國人中，加以辨別了，不但能辨別那兩種出家人，「緇衣和玄衣」（註二十五）辨明那穿灰色長袍的是和尚，黑色的道士，還能知道中國人的主要教派，分着儒釋道三教。（註二十六）正在這時候，那簡短的問題體小冊子，似乎在孟三德司鐸主持下，在澳門印行了，這本小冊子，使我們聽到了他和太素論道以前，所有思想的直接應聲，我們不妨把這篇文字照錄出來——差不多全部錄出——如下：（註二十七）

「中華民族……雖則處處可以看得出一個很聰明的民族，有高尙不凡的天才，却始終在犯着很大錯誤，不知信仰真主的狀況中生活着，讓種種不同的見解牽來扯去，跟着各種教派同流合污……其中最著名的教派有三種。第一種是儒教，「孔子之教」，孔子是一個很有名的哲學家（現在西文中 Confucius——孔夫子——這拉丁化的名稱也許發源於此）……是最偉大而千古流芳的諸人之一；凡是他的門弟子和信奉他的人們，都對他極表尊重，

每逢朔望，大家都要到學宮裏會集，在他神像前上香跪拜。他講的道理，概括說來，是要人跟着本性的光明，做他們的引導，教人勉修諸德，「仁義禮智信五德」，學習齊家治國之要道。的確，這一切都是應加稱頌的，只須孔子曾講到全能的天主，以及人身後的生活，不是那麼專講着「天」和「命運」，尤其是不斤斤於教人敬拜祖宗的神像，在這一點上，他犯着崇拜偶像罪，是不易獲赦，也許完全不能獲赦的。然而我們仍該承認中國人中所有其他的道理，再沒有比孔子的道理，一樣近乎真理了。第二種教派是佛教，在我們嚴正的來賓所編著的要理問答中，（這是訪問的人們——就是日本使臣們——所指的羅明堅司鐸）已把這一派人加以駁斥了。……佛教僧徒對於來世的生活，以及賞善罰惡的道理有些懷疑；但他們的教義，都帶着種種的謬說。第三種是道教，道士們學着一個人，「老子」，他們以為這人有道德是應當崇拜的。這後兩種教派的僧道，度着極卑鄙的生活，在官府前該跪着，不能對坐，有時候，還得受笞杖，這就和他們在日本所處的地位大不相同啦。」

我們讀了這一篇文字，便見作者推崇儒教，把他和釋道兩教分別得很清楚，這在那時候，已算得是至論名言了。不過儒家所講玄微的唯物主義，和在行事上主張「天道不可知」，正如那宿命論和奉祀祖先的偶像主義一般，似乎與天主教道理相背悖，而為甚多教義所不能容。此外，還有那所謂「清靜無為」的遺風，大家懷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這也和天主教精神相抵觸。因為羅公的問答上（註二十八）還講着傳教士們不能進中國的緣由：「因依照中國的習慣，真使入境，只准三年一次，（大概是指南方藩屬的真使，北方如高麗等國是一年一貢的）又怕外人刺探國情，防範的嚴密，使人詫異；二，因中國人對於異族懷着絕大藐視心；三，因人民謹守國法，拘泥習俗，視為天經地義。」

大家知道歐洲的史家對於這最後一點的見解是很不一律的，例如拉梅氏（Lamy）的論著（註二十九）曾說：「亞洲人固有的特性，是喜歡清靜無爲，傳統觀念的力量和自尊自大的勢力，在亞洲民族中，彼此互相助長着，使他們相信自己思想行事的方式，在一切方式中是最好的了，而且惟有這樣想法，做法，才算好。因此，他們對於外國的一切，都懷着夾雜着藐視的疑懼心理」了。便是那些批評中國人不像拉梅那麼峻刻的史家，也以爲中國當明朝時代崇尚經學的科舉制度，漸漸變成了虐政，在刻板的八股式制藝對策，和奏議中不知斷送了多少有創造力的英才，各種學術完全一束諸高閣，一便是繪畫也專講摹仿古人不知自出心裁，獨創一格了。這種以考試經學，作爲授職臨民之試驗的制度，果然使學國一致的政策普及人民，却把個人創作的天才摧毀了。這在利公如果他確曾有過這樣的判斷，（據我們看來大概是不會有的）這回他遇到了太素，就不得不把他的見解修正一下啦，他明明知道這一位的確，做得中國文教的代表人物，很有力求上進的精神，富於求得新知的欲望；以後，他還要憑着這一位的介紹，漸漸去接近那思想活潑的儒林哪。

這位特出的朋友，在韶州居留的時期並不很久，我們根據利公一五九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發的一封信（註三十）知道他只住得一年。但這個還沒有進門的新信友，在廣東省境內住得比較長久，所以他替利公辦好了幾件要緊的事情那時候，他所以沒有領洗的緣故，無非是因受了中國風俗的妨礙。「他沒有兒子，只有幾個女兒。可是中國人都認沒有兒子是人生最大的缺憾……他的正室已經去世了，他就納了一個妾做側室，只因沒有生下兒子，所以不願和她脫離，又不肯正式娶她做妻，因爲她沒有做正室的資格，因此，利公不能給他付洗，他皈依真教這件事，也就擱下來了，等他獲得了充分神光能毅然決然棄暗投明，歸認真主的時候，再作計較。然而他的靈魂並沒有失落。因爲幾年後，他的側室給他生下

了兩個兒子，他於是不再嫌她出身微賤，就承認她做自己的配偶，把她立爲正室。」（註三十一）

從一五八九年年底起，便有一班官僚，學着太素的樣，常到利公那裏去談談，不但韶州衙門的官吏（一個也不在例外），不時帶着他們的子弟，去訪問教士們。（註三十二）便是其他的官吏到教士住院來拜會的，也有不少，除了那代理過知縣職務的縣丞以外，還有那帶兵的共備道，新任知州（十月六七日到任，是太素的同鄉）（註三十三）駐本城的曲江縣縣令，鄰邑南雄知府（太素的老帥，也是同鄉）和南雄少尹王應麟（將來要給利公做忠實的扶助人）那做着北江小邑英德的蘇知縣，是江西贛州人，他每次到韶州來公幹的時候，總要到利公那裏去拜訪。他的老父，以前曾有人對他預言過，將來他到了六十歲要再娶，到了七十二歲，要遇到一個外國人，「他的福樂和他全部的幸運，都要靠在這人身上。」前半節的預言已經及時應驗了，此刻利公到了韶州，似乎要應着後半節的預言啦。因此，那位英德縣令，每到韶州就竭力敦促着利公，要帶他同到英德。但利公總推說肇慶劉總督的脾氣不好，只怕他見怪，所以不便擅離，向他表示歉意。末了，利公見這位知縣的老父，確懷着熱切的心願，認這是天主聖意的表示，便於一五九〇年一月一日，帶了一個助理修士，僱了船，啟程前往。太素不肯曠廢一天的功課，便跟着同行，可是利公也因有他作伴，這回出行，便獲益不淺。利公到了英德，寄寓在一座廟宇裏，來拜訪他的人絡繹不絕，差不多闔縣的人都來了。縣令是一縣之主，利公到了蘇知縣的治下，這位縣令便舉行盛大典禮歡迎他，那老封翁見了利公，更覺得非常滿意，竟立即要求領洗奉教，但利公鄭重將事，勸他暫緩領洗，等將來他能到贛州去拜訪他的時候，給他付洗不遲。當下利公便送給他一個銅質救世主聖牌（後來他活到八十歲，帶了這聖牌在原籍本宅壽終，利公趕不及到江西去拜訪他。）第三日，或是第四日，大家商定到白龍洞去遊覽，這是一個天

然的，或是人造的洞府；在英德城外右方，那裏山泉噴水極多，匯成一道溪流，產魚不少。利公和太素等在那裏遇到了南雄的少尹王應麟，那時他正察訪到此彼此相見極歡，利公便和他立下了深切的友誼。這天晚上，英德縣令設宴款待，席間有歌舞唱了一本很好的戲曲，到深夜才散席。王少尹就請利公趁他的船同回韶州。（註三十四）

在這種情景下，這遷移後的教士住院就回復了以前的生氣。那裏來訪的貴客，也許要比在肇慶時候少一點，因為韶州不通是過路的地方，不是總督的駐地啊。但太素依舊留心結識地方上一班有名人物，帶他們來，介紹與利公相見。在一般士紳中，總督的第五子和他的胞姪曾有兩次來訪利公。這兩位讀書公子，到了韶州，地方官便到他們船上去拜會迎接。（註三十五）他們却連回拜都不去回拜，從此，利公等在肇慶被逐的往事，在這裏就誰也不提了。

因此，一切情形看來改善了。到了一五九〇年一月一日，那兩個澳門人——鍾巴相和黃明沙兩位助理修士，便進耶穌會，開始初學，同時繼續學習着漢文和拉丁文。（註三十六）利公也忙着籌備一切，以便奉行范禮安會長命他到另一省內立院開教的命令。（註三十七）却爲了麥安東修士的健康問題，漸漸感到憂慮。麥修士熱心奉事天主，在這瘴癘的地方，忍受諸般困苦，還覺得不夠，還要加上許多苦工，甚至利公不得不禁止他再打苦鞭。他先後打過苦鞭的記數，共記去五千只差得二十了。（註三十八）這時候，他雖則遵命停止，却嫌太遲了，便又病倒，韶州既求不到良醫，又沒有對症的良藥，不得不把他急急送回澳門調治。麥安東去了以後，利公便請太素向官廳說項，准他召石方西修士來補這缺額，不幸又出岔子，這件事不得不暫爲延擱。原來韶州住院的小堂，並不公開，不准婦女們和一般民衆進去。那裏供着從墨西哥送來的一幀賽維勒（Seville）聖母畫像，畫着聖母抱着小耶穌，聖若望宗徒對他朝拜，畫得十分美麗。（註三十九）利公趁中

國人過新年的機會，把這頓聖像，陳列出來，供在外人可以到地方，讓大家瞻仰；不料到了夜間，鄰居們趁暗把石塊拋擲到屋子裏來。利公的傭人們趕出去查看，那幾個拋石的人就逃散了，却帶了許多人回來尋覓，把傭人們毆打，不是逃得快，準被他們打個半死。那時候，地方上的民衆，對教士們已有些仇視了；這件事，如果認了真，勢必越發惹他們懷恨。利公很不願意使事態擴大，免得影響石方西前來，無奈太素不以為然，便安排下向知州呈訴，先說明他自己也住在院裏，隨後他到州署去謁見知府，當面稟告這事經過情形。知州聽了，起先面有愠色，一言不發，後來他見傭人們都有傷痕，便向他們究問根由，然後叫過巡丁，大加斥責，命差役給他們套上鐵鍊，押着他們去捉拏兇犯。恰巧知州問起麥安東的病況，太素便乘機進言，說利公獨居寂寞，景况淒涼，因而向他請得允准，許石方西來到韶州居住。那幾個巡丁查得主兇是體面人家的子弟，便覺十分爲難。可是利公手下的兩個僕人，挨了打，未免不甘心，便瞞着主人，私下到橋堍去守候着；遇到了兩個少年，認出他們是兇犯，便拏住了，交給巡丁拘解。這兩個的父母得訊大驚，連夜來見利公，求他代請寬宥。『這些原是無知無識，頭腦不清的青年，違背着家長的意旨在外闖事！』利公回說他本來一點也不計較，這件事審問起來，也決不追究。於是巡丁就回去回稟，說找不到兇犯，知州聽了大怒，喝令把那回稟的打板子，把另一個還押這兩個巡丁；沒奈何，只得供出那兩個主犯。兩家的父母又着急，便再去見利公乞憐，一連跪了好幾次。利公按修道人的本分，又爲了要教人知道他以德報怨起見，總是甘心情願，替他們代求知州免究。他去拜會了兩三次，終於求准了，又得太素居間陳說，知州重新發給了一張保護的告示，貼在住院大門口，因此表面上恢復安和的狀態。（註四十）

范禮安司鐸於一五九〇年七月初啓程前往日本後，孟三德司鐸便奉派陞任澳門院長，兼在華傳教會會長。這當兒：

他利用者中國官廳發給石方西修士的護照，親到韶州，作數日勾留，視察那新成立的傳教機關。不料他回去的時候，却被那「生性粗暴，對西洋人素極仇視」的香山縣縣官加以留難，不問情由，把他的兩個僕人打了一頓板子，把船扣下不放。孟公回澳門，經澳門和韶州兩方面派人設法援助，才得釋放。（註四十一）

一五八九和一五九〇兩年中，看來不會有人領洗奉教。到了一五九〇年年底，太素就離開韶州往他處去了，却去得並不很遠。那時，石方西並沒有來，來的却仍舊是麥安東，他在澳門住得有些不耐了，急急想回原職，便來陪伴利公。這時候，他雖則寒熱已退，却依然十分羸弱，到一五九一年十月間，又中了瘴氣。他這回病倒了，只有七天，就此一病不起，病中忍受疾苦的德表，很足爲人所矜式。利公因着他的死亡，感覺很深的悵惘；他說：（註四十二）「我居留中國的時候，他和我相處三年，在最艱苦時代，做着我的伴侶。如今我只覺得又須重新再做起了，實在是三次四次做起啦。……今年我們本有極好機會，可以到別省去開教；有幾個重要人物肯帶我們同行，也有些人寫了很客氣的信來，請我們去訪問他們。麥安東司鐸去世之後，一切計劃只得停止進行。本來我們希望今年要由教宗派遣欽使來華通好，却總毫無消息。」此外，那裏葬死人的問題，也使利公大感焦慮。「要是按本地的習慣葬在山裏吧，那我們是不願意的；葬在小聖堂裏吧，這與中國的風俗太不合了，誰也不願這麼辦。假使葬在近段，挖掘了一個墳墓，依着死者的意願，在墳上豎起一個十字，那非有五十兩銀子不辦，未免耗費太多了」（註四十三）因此，大家決定依照中國風俗，且把棺柩停在院裏，候范禮安司鐸定奪。利公等本想將就些，買一口劣質的棺木，可是有一位和教士們要好的人化了四兩銀子買一口比較體面一點的。麥公的遺體就穿着司鐸的祭服，放在這口棺材裏。凡是和教士們來往的人們都穿了喪服來吊唁，便是那素來不出門的劉老頭兒也來了，那

管轄和尙的僧官也和他的僚屬同來。利公不許人依照迷信的俗禮，把祭菜供在櫃前，他自己也不肯穿白色的喪服。這在中國人看來是不大合式的，——他給人解釋說：「修道人既然在世俗中已如死了一般，他肉身的死亡就不當一回事。」可是僱員和僕人們仍都依照中國風俗，每見有人來吊，便穿着喪服，出見賓客。澳門方面，麥公死後，孟三德院長，便派石方西修士來代他的職務，石修士到韶州的時候，正當總督出行，路過韶州，闔城文武大家忙着辦差迎候的時候，（約在一五九一年十二月。）（註四十四）

那時，這位封疆大吏，正奉皇上聖旨召他進京，大家以爲他此番奉召，有「入居台輔」的希望。利公在衆目昭彰之下，帶了石方西修士，同到他的座船上拜見。這回，總督接見利公的態度，却是十分和藹，拿出了幾部書送給兩位教士。——這些書將來他們很有用處，——只是他聽說，利公不喜歡在南華寺修行，未免覺得詫異罷了。他在韶州還沒有動身，突然得到了惡消息。御史彈劾他的結果，他的官階職銜都被褫奪了，又因他虛耗公款，着他賠償四萬銀元，把他的家產查封發賣。這好比晴天霹靂！他——急，就急得背瘡發作了；像他這麼大年紀，這當然是可怕得了不得。他的兒孫們家人和僕役等就趁火打劫，把他隨帶的財帛，劫掠一空，各投生路。因此，他是被遺棄了；大家把他丟下，便是要喝一滴水，也沒有人給他，只好喊着「我苦啊！苦啊！」就這樣死了，死得沒人過問。

一五九一這一年中，大概在近年底時候，有一個南雄的大商家到韶州來謁見利公。這是因爲太素在外竭力傳揚利公的盛德，使他聞風景慕，所以他特來專誠奉謁。他的名字叫郭松華，原籍江西德化；生平爲人正直，是個極虔誠的佛教徒，向來吃素斷葷，魚肉蛋乳，早已一概擯絕。他尋求眞道，已有多年了，却總不能滿意，這回來見利公，目的惟在求道。因此，利公

悉心指教，把天主教的正道真理，給他詳細講解。「他聽利公的教誨，句句中他的心意，這正是他久求而未得的，所以利公每次講罷，他必要下跪叩謝。教士們和他來往，個個高興，每見他來院相訪，都對他十分親熱。」隨後，他領了聖洗，由利公給他命名若瑟，便回南雄去了。他以後每到韶州，總得堅邀利公和他同返，給他新生的兒子付洗。一次，利公見他有獻神默坐的習慣，「這和我們的默想神工還不至十分背悖。」（註四十五）便給他畧加指正，更進一步教他行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所創始的第一星期的避靜神工，却見他行這神工，「竟像老教友一樣。」這位南雄商人的歸化，不久就引起了許多人追隨則效。

這當兒，太素先生正帶了眷屬住在南雄城裏。這南雄城，位在梅嶺脚下，和韶州的距離，不過四五天的水道行程。他因利公送去了一點新年禮物，（中國陰曆新年爲一五九二年二月十三日，）便親來道謝，並請利公到南雄走一遭，看看他的許多朋友。利公也有意思去看看幾個朋友，和那姓郭的新教友，結果，便答應了。太素去了兩三天以後，利公便也動身了。郭松華得到了利公來到的消息，便約會了許多預備奉教的親友，出城遠遠迎接。這班人一見利公，好像獲得了寶貝一樣，便要簇擁着他一同回去。但利公應當先去謁見知州王應麟，這位便是他前在英德遇到的，太素的朋友。據利公講來，（註四十六）「南雄城，比弗勞倫斯（Florence）大小不相上下，主要部份在北江和另一可以通航的河道中間。城外兩處市集，有兩座橋和城啣接，一座是石橋，一座是木橋。凡是從歐洲、印度、摩拉加、和摩六甲羣島等處，運來北上的一切貨物，都經過這裏……這兩座橋，有人專管着，每天開兩次，放船隻通行……利公一到南雄，先徒步去拜見知州，從州衙門出來以後，却坐了煖轎，去拜客。他有意做得氣派大一點，使人知道他不是僧道一流人物，再則他在路上，可以免去羣衆的相擾。王

知州送他出大門，接着就去回拜，又因利公送給了他一些禮物，便也帶了一些禮物送還。屬官吏見上司對利公這麼客氣，便也跟着和他交歡，大家爭先前來拜會，設席邀請；有時候利公一天要有兩次被邀，大有應接不暇之概。那時雖然正當封齋期內，無奈盛情難却，利公只得一一領受，每次入席，但喝一兩杯清酒，畧表心意罷了。利公見官場都來拜會，只得也去一一回拜。有些官吏命眷屬都來和利公相見，有的還邀集了鄰舍親友齊來瞻仰。利公在街道中經過時，看的百姓擁擠不堪，有許多人竟走過來把轎轎揭起，有的等他下轎時攔在轎前，大家都爭先恐後，要看看這位外國貴客的丰采。」

利公在官場中酬酢一番之後，才有空暇和一班平民交際。這些便是郭若瑟的親友，他們當然比不得官場規矩大禮數多，可是他們在德性上，和在有志講求天主事理上，却要比官場中人強。這位姓郭的雖然是個大商家，手下有三四十人受他僱用，可是在中國，「一個有錢而不讀書的人，只能享有平凡的聲望；一個人進了學，即使他窮得沒飯吃，也必非同小可。」利公在這班率直而誠篤的平民中，却受到了深刻的刺激。他記着道：（註四十七）「我承認我在這裏所觀察的情景，真想不到我在中國這麼早就會看到了。在這位好老頭兒安排下的廳堂裏，設立着一座祭台，上面懸着吾主和聖母像，一天到晚常有人在這裏守着，不會間斷。我整天在那裏坐着講我們教中的道理，接連講了七八天，有時候還得講到半夜裏，連念日課的功夫也沒有……有許多人在這屋裏過夜，等到天一亮，看我行彌撒聖祭，其中大半是別省人。這就堅定了我的信念，確信其他各處人們對於救靈魂的事更見得關心。這回經我付洗的，共有十人，六個大人，四個兒童，其中有若瑟的那個小孩子，還有他的兄弟和親戚。若不是若瑟聽信了人的假話，說一個人要做教友，就得效法他脫離世俗，丟了妻子和生意，做隱修才行，那麼，領洗的還可以有許多咧。」

這種令人欣慰的傳教工作，可惜不能長久繼續下去，因為韶州的住院，非得利公坐鎮不可，如果他再不去，就得發生危險。那位新到石方西修士還不能看守這屋子。這一年，利公自己似乎也要在韶州繼續進行那已在南雄開始的勸化運動，因為他還得給幾個人付聖洗，尤其是那在韶州住院服務的幾個僱員和傭人。這些人都熱心極了，甚至要去毀滅木偶，有時，利公竟也難加阻止。這種事情，一經傳出，就够使教士們冒着再遭驅逐的危險。利公一再誥誡他們，不得胡鬧，但他們依舊不顧他的禁令，私下去幹。一天，有一個新奉教的孩子，偷得了一個香樟木製的木偶，趁着夜深人睡的時候，便悄悄到廚房裏把他丟在爐灶裏。『石方西修士一覺醒來，只覺香氣觸鼻，便到各處巡查，結果發見了這東西，一半已經燒燬了。利公得報後，不動聲色，如像他一點不知道這件事情一般。』此外，有一個僕人因為不肯拜家裏的木偶，就被他的父親打了一頓，備受虐待。又有一個保守教友，受他進教同伴的激動，便掘了一個洞，要去弄一個木偶來，葬在那裏。這種種的事情雖然不智，却足證明「這個國家一朝歸化，必不讓日本專美於前；而且她的疆域既然要比日本遼闊得多，將來耶穌會在中國的收穫，也必然要豐富得多咧。」（註四十八）

中國上流社會信奉天主教，往往有一種極大障礙，這便是納妾問題。中國的舊禮教，素以「無後」為不孝，如果絕了子嗣，這便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所以一般士大夫，年紀到了三四十，如果正室還沒有生下兒子，就得娶一兩個「如夫人」——妾——作側室。如今他們要信奉天主教，便不能有妾，非脫離不可。無奈依照中國人的舊道德「婦女不事二夫」，一個女子嫁了丈夫，不論是妻是妾，要是沒有極重大理由，決不能無端休退。妻妾被丈夫休退，她的母家就認為奇恥大辱。而且被休退的婦女，也難再嫁，她的一生命運也就注定了。所以凡是讀書明理的人，以為為了奉教，把妾遣回母家，是極不道

德的這種人要被認為名教罪人爲社會所不齒。那位青年司鐸石方西頗能了解中國社會對於這問題所有極複雜的心理。因此，他不嫌冒失，竟向上峯建議一種在倫理觀點上不相容的解決方案，主張：「把兩個婦人都留在家裏，只把那先娶的作爲唯一的正室！」（註四十九）利公却另有高見，便回說：「在他國中，天主曾補救了種種更大的困難，如今，這種困難，我們盼望天主將來也一樣要加以補救。」（註五十）利公這樣一心依恃着天主，以後雖則還得經過許多磨難，才能撥開雲霧而覩青天，却總是不會錯誤的。無論如何他，和太素先生以及他的一班朋友們一經樹立了密切的友誼，便不難看出在中國的文教中，的確找得到支持天主教教義的基點，而這種信念，以後也就給了他不少助力。

第八章 歐洲人研究漢學的開始時期

當麥安東修士未曾逝世以前，和甫經逝世以後，大家還沒有見利公感覺到研究漢學的必要。恰是相反，那時似乎他正忙着辦理幾件目前的事情，不會從事於久遠的準備，如研究漢學這一類的工作。他所朝夕縈懷的要事，便是那要求教宗遣使來華通好的計劃，爲了這件要事，專等羅明堅司鐸回來，竟等得有些不耐。他主張這件事，「須得備下一份厚禮，要比那日本使臣們帶回來的好得多。」（註一）此外，他也許憧憬着那如羅公曾經到過的紹興一般，中國境內的福地，——人文薈萃之邦，——尤其是那文風鼎盛的蘇州；以後他對於這地方般般嚮慕，是因聽得了太素講起他家鄉的可愛而然的。（註二）無如他處境困苦的實在情形，把他在韶州牢牢束縛着，使他寸步難移。他曾記着道：「種種事情，把我悶得透不出氣啦。」沒奈何，他只得打起精神，努力勸人棄邪歸正，藉以自慰。到一五九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一共勸得「十六七人」信奉天主真教。（註三）「其中有三人是家長，也可以說是重要人物，希望他們將來要提攜他們的子女和親友們，跟他們奉教。」（註四）還有幾個，時間還沒有來到，譬如那姓龔的，過了好些時候才領洗。（註五）又如那姓白的，做人很正直。（註六）他說：「這裏有不少秉性良善的人，有三四家素有名望的人家，每逢節慶日，總要來邀請我們，餽贈些禮物。」（註七）

便是這種那麼拘束的傳教工作，也免不了要因發生了一件慘案受到妨害。利公曾記着（註七）「前幾年，我們在聖保祿宗徒曾經親自講過的艱難中挨過了；不料今年我們又遭遇盜賊的危難，雖則說句老實話，以前，我們並沒有完全

倖免。」這件極嚴重的事變是這樣發生的。以前，太素住在鄰近的時候，似乎教士們的仇敵，還始終不敢妄動。（註八）可是這位好朋友自從一五九二年以後，就離開廣東省境了。這在利公一方面，也未始不是有利的，因為他到處給他的師傅揚名做着他的「旗鼓號筒。」（註九）有一羣年青人，大約十來個，其中有好幾個，和上次的事件有關係，一天晚上，他們在一家喜事人家吃罷酒出來，便到那鄰近的廟裏集會，吃酒賭博，當下就商量好打進教士住院，把屋子裏的人嚇逃了，好動手搶劫，以為這屋裏一定有許多金銀寶貝。這件事發生在七月初，——其實是六月底。（註十）當時經過情形，據利公講來是這樣：

「將近半夜時分，他們另外約了幾個同黨，人數共有二十多，手裏擎着火把，拿着槍，有的拿斧頭和麻繩。幾個賊人，先爬上牆頭，跳進我們花園裏，便去開了門。助理修士們和僕人們聽得響聲，就驚醒了，却以為是幾個不拿武器的小毛賊，溜進天井裏來，只須喊幾聲「捉賊」，就可以把他們嚇跑了。我們於是開了通花園的走廊門，四個人一齊出去，差不多個個赤手空拳；我們本想在屋裏找一根護身棍，却尋不到。我們在暗中看不清楚，竟走到了來打劫的賊人中間。他們非但不逃，反點起火把，打過來，打傷了兩三個僕人，把石方西兄弟打了幾棍，又在他頭上砍了一斧。我知道我們不能拒敵了，便命退避；大家就跑到走廊裏，想把門關住。不料強人們丟進一塊木板來，把門撐住，我竟不及關上，我的手上就被他們砍着了一斧。於是我們只得逃進房裏，把門門上。我決計從窗口跳出去求救。可是這窗口離地頗高，我跳下的時候，不幸蹙傷了足筋，只得一步一挨的，勉強走到圍牆邊，叫人救應。那時，到城裏的橋正毀壞得不能走。有幾個鄰居，正做着賊黨，其餘的，大概通賊，尤其是那些和尚，所以儘管我喊叫，一個也不來援助我們！然而天主記着我們啦。僥倖得很，我們的學生中有一個爬上

了屋頂，揭起瓦片，向賊人們打去。賊黨被擊大驚，又聽得我大聲叫喊，就不敢再打進來，却不懂我怎能逃出這屋子。他們着了慌，就趕快逃走，非但沒有搶得一點東西，反丟下了幾件証物，一根棍子，一頂瓜皮小帽，一個包袱，回到廟裏去了。我們雖則受了傷，却感謝吾主保佑我們不死，保護這傳教機關，免遭毀滅。至於我呢，我除了覺得十分欣慰外，只知道說「願天主受讚美！」準備爲拯救這些靈魂，求主加恩，完全按照全能天主的聖意受苦。天主主要是喜歡的話，願我們現在開始流着的一點血，要做我們最先的祭獻，作爲將來宗全傾流的開端，爲愛慕天主的緣故。捨棄了我的生命！」這些話是利公寫給他初學院老師的書信中的話。他還加上一句說：「假使全能天主的聖意喜歡使這一切事情的結果，賞賜我得到致命的榮福，如羅道夫亞瓜維伐司鐸所得到的一般，（亞氏於一五八三年七月十五日在薩爾塞德致命）哦！神父啊，那麼，你的老學生的福氣真多麼大啊！」（註十一）

受傷的人們療養了很久才復原。出事後，過了兩個多月，石方西修士才算痊愈；至於利公，行動還很勉強。到了九月一日，利公才第一次起床，爲他的姑母辣利亞（Lata）舉行追思聖祭。（註十二）然而他雖則還沒有完全康復，（註十三）却不得不到各衙門替兇犯們討情，請求從輕發落。因爲按照中國法律，這種持械夥劫，殺傷事主的罪名，問準了，得處死刑，所以利公等不願深究，使罪犯們獲得生機不致感覺失望。

利公接着講：（註十四）「出事下一日，我們差人到州衙門稟報。官場重要人物便都來院察勘。南雄知府更送給我們幾樣治傷很有效的藥草。那統帶步兵的武官，派了許多兵丁來保護我們，但我們不需要大隊人馬，只留下了幾樣武器。知州察看攻入屋院的情形，便知賊人來處不遠，而且看他們的行徑，非和四鄰勾結串通不可，便命差役帶過一家鄰舍，連

幾個和尚，加以訊問。他們抵賴不過，只得供認知情。案情於是大白。那遺下的瓜皮帽和包袱等各種贓物，也經認出是某某人的東西。這件事情我們本想不再追究下去；因為這和我們的業務不合，而且在被牽涉的案犯中，有兩三個是和我們要好的人家的子弟。但知州定要我們補具正式訴狀。我們只得竭心盡力，輕描淡寫，把這件事化成極小，說我們甚麼也沒有失竊，末了，還求堂上寬宥免究，或則從輕發落。慣常遇到這種案件，訴請究辦的時候，大家總要舖張揚厲，狀詞做得格外兇狠。這回我們的訴狀，却大不相同，所以兇犯們有率領闖家大小，來向我叩謝求饒的……但審判官越見我們寬宏大量的表樣，越恨着惡黨的無良，其中有七八個（也許十二個還不止）知道我們告他們的狀詞非常寬仁，竟一點不想逃走，差役來拘捕他們，毫不為難。利公等還竭力求情，替他們開脫；知州便回說：「這件事，你們盡你們做西洋『好修道人』的本分，」可是本官也得盡我做中國好官的本份。」於是他逼着案中兩三個兇犯，要他們完全招出實情……」

我們雖則竭力設法替賊黨開脫，但這件案子，審過了幾幾堂之後，終於判定了；這判決真可怕啦！那為首起意的，處死刑；其他從犯罰充官奴，做三年苦工；那些和尚和四鄰，以及巡丁們和守夜的，都處罰重款。一次我去見知州時，說：「衆人都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怨恨的人一個也沒有。」知府却回說：「你真不曉得咧，你們的鄰居，和尚們，便是你們的大仇人。他們見你們住在相近，就恨極了，只想把你們趕走哪！」

這件案子雖已判定，仍須呈報一位恤刑官加以審查，這位恤刑官是由京中特派到各省覆查定案的，每隔五年來省一次。利公會去謁見他（十一月十二日前幾天），但利公越是懇求免刑，他越不肯輕減，「因為他以爲這教士怕人報復。異教人全不知道我們對仇人真懷着一片學心哪！」（註十五）

訟案久懸不結，雖則不免麻煩，却也有些益處。這樁案件，已番過了八九堂，如今又解到肇慶的按察司衙門了。因此，利公獲有機會，回來看他最先勸化的教友們。其中有幾個跟着他到了韶州，好些搬到了澳門，「可是那幾個留着的，沒人管教，已變得野頭野腦啦！」利公便竭力給他們撫慰一番，又給五六個新生的孩子付了洗（一五九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後。）（註十六）這當兒，他接到了幾封信，叫他趕緊到澳門。因為那時日本又掀起了教難，范禮安司鐸便於十一月十二三日，回到澳門暫避。（註十七）利公便也啓程前往。這回，他和范公見面，是在人世間最後一次的相見。於是大家對傳教事業的前途加以討論，「議定了幾件重要的事情。」利公順便去和醫師商議，醫治那跌傷的腳，醫師勸他還是不醫的好。後來利公就變成跛腳，却還能往來行走，只是不能走遠路罷了。

這時期中，利公所有的情緒是怎樣，我們一看他的遺書就可以知道。他說：（註十八）「仇人們不肯讓人搶去這麼好的一塊肉……他們，見本院裏還點着一星的火光沒有熄滅，便大為惶恐，竭力設法，想把我們逐出這屬於他們的本國……據我看來，沒有一年能平安過去，不教我講出幾件意外的事情，或是幾樁很大的危機，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別處的傳教教會中，有人記着幾件使人矜式的故事，講述些收穫的效果；這裏，我們只能講着我們的艱苦，和行善的障礙。」在他寫給他初學院老師的一封信中，結尾他曾表明過這樣的自信心，足使他內心的情緒暴露無遺。他說：「神父，那些便是我們在印度時候，每年朝聖的大畧情形……這是我所記得而欣喜的。我已經把一切事情，給你講完了，好教你幫助我向好耶穌謝恩，感謝他所賞賜我的許多恩佑。你要知道，雖則那許多煩惱和逆境艱難，已經概括地給你約略講過了，可是那最要最重的苦況，依舊沒有寫得出來，不過這不是可以寫在紙上的事情，而這一切的艱難，天主已把我們救脫了……」

此刻但願全能天主賜我們能忍耐，把我們做成合用的工具，當得起這種偉大的任務。」（註十九）

無疑地，利公必能向他的上峯范禮安會長隨意細訴衷曲。（註二十）范氏爲了日本情勢的轉變，有些擔憂，這時候也許已因教士們墨守成規，過於注重他們所有攻斥佛教的傳統觀念，忽視那繼續增高的儒教思潮，而不免惴惴恐懼了。（註二十一）但無論如何，他眼看在華教務進展這樣遲緩，以爲這也許是出於天主上智的安排，便命利公繼續研究漢學。當一五九三年開始時候，他循例填就一份表格，向耶穌會總會長呈報一年傳教工作，便在這份表格上附註說明：（註二十二）「韶州有司鐸修士各兩人，……他們現正從事研習中國語言文字，作爲要課，他們最近勸化的信友，人數很少，却耐心理待着，但等時機一到，便可着手播散天主聖道。」范公所說的這個時機，還得等好幾年才會來到，可是經他這麼一提，歐洲漢學誕生的日期，便因此標明了。

事實上利公在澳門住了幾天以後，韶州方面已來催他回去了。他於是立即動身回韶州（一五九三年一月十七日以後）（註二十三）重新着手指導石方西和鍾黃兩修士的課讀，當然還有幾個初試修士也在內。（註二十四）他的體質，依舊很好，他曾記着道：（註二十五）「實在，我有那麼許多事情要做，不知道我有沒有餘下的空暇來害病。」那石方西又謙遜，又用功，尤其使他喜歡，利公說他「極願爲愛主故，捨盡他的血。」這當兒，他已漸漸能單獨接待來訪的賓客了，應對適宜，說話也很有力，而且他攻讀漢文，進步也並不較遜。（註二十六）利公等又以爲那一年中領洗的，只有近十名，其中還有兩名是嬰孩，領洗後就死了，便又想到另一地方再去創立一所住院。這地方離韶州約計一個月路程，（想必是蘇州，或是蘇州附近，太素家鄉的近段）這時候，已有人堅邀利公前往那裏了。因此，范禮安會長也已吩咐蘇如望和羅

如望兩人準備，一有機會，就離開澳門，去找利公。那時，恰有一位大人物路過韶州，耳聞利公盛名，便來院訪問，和利公整整談了一天又一黃昏，才告辭。這位便是瓊州王忠銘，官做着南京禮部尙書，因為被仇人傾軋，只得回原籍暫避。（註二十七）却因此得和利公相遇，覺得十分快慰。他知利公精通曆算，決計回京供職的時候，要帶利公同去，幫助他修改中國曆法，使他因此得以陞任北京禮部尙書。

可是這一年（一五九三）到了秋季，那瘴氣的疫病又照例流行了，闔院的人害病的竟有一半，惟有利公沒有受到傳染。這正合着義大利的俗諺：「天主給那種衣着的人，過那種的冬。」（法國也有一樣意思的俗諺：「天主爲剪毛的羊先量好風勢。」）那兩位中國修士先得了病，不得不把他們送回澳門診治。接着，石方西修士又突然病倒啦，他必然預知他的終期近了，因為一天，他看見了一塊做飯菜的醃肉，便微笑着說：「盼望他去世以前，這塊肉還沒有吃完。」利公估計石修士的身體結實，以爲這話是幻想，可是石方西修士却教他明白這話不錯，就對利公宣佈他的終期已臨近了說：「同志我祝你大大的成功。」利公記着道（註二十八）「我一聽這些話，眼淚就進出來了，我呆了幾分鐘，連話都說不出來啦。」過了幾天（一五九三年十月五日）這位天神般的修士，便逝世了，枕邊始終放着一篇恭敬聖母的歌咏。利公又說：（註二十九）「這是我在這荒野中唯一的伴侶，唯一的慰藉，如今我又孑然一身了，這是第四次哪！……這裏，痛苦真要比播種和希望來得多。人類的缺憾常，難填補，假使看得見自己工作的效果，就可以得到一點安慰了。」過了幾時，他又記着：「假使人們憑人的眼光來看我，一定要當我真正被遺棄啦；但一想到吾主是我們的佑助，我看似乎我一生從沒有感覺到這麼大的快樂，因為吾主斷定我爲了愛慕他的緣故，值得把我在這許多艱危困苦中保留着啊。」（註三十）

而且石方西修士死了以後身後諸事也比麥安東修士死後要好辦，沒有發生紛歧的意見。事實上，利公等剛想到澳門耶穌會當局正忙着辦理幾件最近發生的事情，勢必無暇及此，却不料便在石修士去世的那一天（十月五日），就看見一位助理修士押着一艘船來到。范禮安會長先已決定把去世的教士們葬在教友們居住的地方，所以派船來接麥安東的棺柩。這船來得真巧，正好把石方西的棺柩一併帶回澳門。這件事對於重視死者的中國人的確很有意思，使他們相信這兩位外國教士的遺體，是要帶回西洋去的；這就可知他們與和尚們不同啦。這兩具棺柩一到澳門，就舉行盛大的葬禮。孟三德院長的演辭中，曾講着這傳教的教會，在極不利的時代開始創立，確信將來一定要成功的。葡萄牙商人們也以為這在華的教會，經過慘淡經營才告成立，表示盡力捐輸，決心贊助。（註三十一）利公懷着十分抑鬱的情緒，目送這船開出之後，便又着手工作，這是他第五次或是第六次再做起了，可是他的仇敵，南安橋的和尚們，却因上次的案件，受了牽累，大失體面，如今一心只想報復。范禮安會長用盡種種方法，對利公許下一定要予以援助，那時，中國教會的經費問題，雖有着落，却不很可靠。那西班牙國王斐理伯二世所保證的，每年二百金元的捐款，不能按時收到。再則，澳門一埠，要供給好幾個修會的需要，供給得也已經够了，而且到了一五九四年，澳門耶穌會修院，已切實擴充，改作了大學院。（註三十二）當下，范公派定了一位年齡成熟的修士做利公的助手。這位助理員能獨自一個人代替那兩位已經去世的聖德修士。（註三十三）他的名字便叫郭居靜（P. Tarare Cattaneo）是熱奴亞人（Genoa）世家出身，和日本使臣們同來，以前曾在濱海漁民區行使過兩年司鐸職務。他本來是派到日本傳教的，范公一接得石方西修士去世的噩耗，便把他改派到韶州。可是他進中國內地這交涉，辦得頗不容易，直到一五九四年七月七日，他才到達任所，便在利公指導下開始研習漢文。

（註三十四）這樣利公又得到了一個機會，教這新來的西洋學生研習漢文，試試他的教授法；這連以前已是第三次或是第四次試驗了。他一壁教人，一壁也遵照范公的命令繼續自修，更求深造。他既然還不能宏開聖教，只能一和淚播種，一或者只算得「墾墾荒」，不想「在歡欣鼓舞中慶祝豐收」（註三十五）所以他惟有專心致力於這種枯燥無聊的讀書工作；因此，韶州的小小住院，依舊做着一種預備將來從事傳教的修院，而不能把他當作正式傳教的機關。

這當兒，利公指導着那兩位生長澳門的中國修士，在這韶州修院中攻讀拉丁文和中國文字，希望他們學業的成績，不在那些日本籍諸同會之下。（註三十六）同時，歐洲的教士們也依着中國的成例，按部就班的，讀着中國的四書五經；利公爲了便利他們攻讀起見，便把四書的章句，用拉丁文譯出意義，還添了不少註解。他研究漢學的功課，本已間斷有七八年了，這時候，便請了一位有名的教師，在這位名師的指導下，重新發憤用功，每天上兩課攻讀那些「他全不懂得」的書本，而且還學做文章。（註三十七）他曾記着：「我這麼大年紀了，（那時他是四十一歲）（註三十八）却要學做學生！這算不得一回事，因爲天主既然爲了愛我的緣故降生做了人，我也就爲了愛他的緣故，決計做學生。」除了他自己的功課之外，利公還給他的同志每天授課三四小時；瞻禮五放假，自然，主日和大瞻禮日也必是這樣。這種治學的規程，孜孜不倦地力行了好幾年，所以大家見他進步得這麼快，也就並不驚奇啦，尤其是因他運用着一種不平凡的天才，可以「當場記起。」他沒有說明他怎樣運用法，可是看來這總不外乎屬於視覺一方面的；就是學一句話或是一個字，先認定了一樣東西，再在想像中看這樣東西，來記起那一個字。他又組織了幾種文人雅集，地方上的文士也被邀來參加；有時候，他們見他一口氣背誦四五百個字的一章書，不論順背逆背，都不含糊，掩着書一看也不看，便不禁稱奇納罕。（註三十九）他

這樣專心一志地研究着漢學，便是遇到了橫逆，也能忍耐了。到了一五九三年十二月十日，他竟能公佈他的成績，說中國的四書，他已譯成三部了。（註四十）那第四部的譯文下一年，也可脫稿。（註四十一）他希望在一五九五年中所有四書的譯稿都能脛清。（註四十二）其實，這些還不是繙譯原文，不過把原文的意義用拉丁文來解釋一下，加上很多的添註罷了。（註四十三）可是後來的西士，却能用他作為個人的參考書。（註四十四）范禮安會長也要教人抄錄出來，供在日本傳教的教士們應用。（註四十五）利公曾在他的序文中說：（註四十六）「無疑地，這對於本會諸同志，未始沒有用處，而且據我看來，似乎歐洲方面，也許要因着書中所有的倫理觀念，感覺欣喜。這又是一部『奢乃格』（*Sacrae*）或者說是一部第一流異教作家的名著。這部書值得一讀，因為書中有精微卓絕的，闡明倫理的章句。」不久，龍華民司鐸來華，把這書實行攻讀，一五九八年曾說：（註四十七）「中國讀書人總說，這些書本，中國以外，誰也不能了解，我讀這些書，却並不覺得要比讀薛舍羅或是諦德黎扶（*Tire-Live*）的書，更為困難。」

四書利公有時把他稱為「四部書」（*Tetrahilion*）（註四十八）這原是中國讀書人的一部基本教科書，還有那要比四書尊重得多，經孔子加以刪訂的四部古書，以及那依據傳說，是由孔子親自著述的第五部書（*春秋*）。這五部書稱為「五經」，一般應試的生員，必須在五經中選擇一經，專門研究，臨時出了題目，必須能夠當場做出一篇文章，做得一頭頭是道，「才可以去應試。因此，利公便也依着這種成例，至少研究過一種經書，給新來的教士講解，却似乎並沒有把他譯出。但無論如何，他自己總會就教明師，下過一番苦工，把五經完全讀畢。（註四十九）自從漢唐以後，二千年來，中國人總是懷着這種心理：除了四書五經以外，不肯再就其他方面去尋求全部智慧的原理，這種傾向，亘續了那麼久遠的年代，

結果便使中國的典籍，差不多有一半是四書五經的翻版，和闡解經義的著作，後者在實際上，不免要造成歐洲文學的變遷，假使歐洲的思想界繼續離棄着聖經和亞列斯多德哲學的啓迪；因為歐洲人在某一時期內，確曾離棄過這種啓迪了。

當利公從事研究漢學的時候，所有闡解經義的詮註家，都受着一種潛勢力的重大壓迫。朱熹的註解不必說，便是那比較有主見，能自成一家的，哲學家如王陽明一般的學者們，也不能完全擺脫這些唯物觀念極深的理論的羈絆。（註五十）利公憑着他素來的思想以及他所有的見解，要擯棄前人的註釋，不須假手他人，試行直接尋繹原文的意義，便發起了一種頗著成效的運動，不過這種運動，結果還不能把中國思想本身的核心，分析得明明白白。（註五十一）

這種脫離羈絆的運動，跟着一種更爲探本窮源的辯護真道的嘗試而加倍努力進行。這種辯護學可以媲美聖多瑪斯的理論，駁斥西才執拉那（Sicut de Gratian）的亞物羅學說，好擺脫那他所認爲達到亞列斯多德思想通常境界的謬論。利公會於一五九五年記着（註五十二）「那在摩慶印就的『第一本要理問答，我們久已停止分發了，』便是那些木刻板也於一五九六年上半年中銷燬。（註五十三）教士們認這本問答過於簡略，而且佛教的口吻很多，那尤其是不合。因此，范禮安會長要利公再寫一本。這本新問答中，沒有把前書所有本性方面的各種理由（註五十四）捨棄不用，却加上了從中國經書中摘錄出來的論斷，用以証實原有的理論。利公會於一五九五年十一月四日記着（註五十五）因此，我（翻閱六經）記下了許多有利於我教信理的章句，如天主惟一，靈魂不死，真福的光榮等。」同樣，以後我們也要見他，爲了使憂苦者獲得慰藉起見，在聖經所記古聖若伯的德表以外，還加上了中國一書中所講善人的故事，這些人一生行善，却受盡了命運的磨難。」（註五十六）

我們在後文中還要提出許多例子，討論這種辯護真道的方法；這裏，我們的目的無非是要指出這種辦法，對於中國一般思想，尤其是對於歐洲人所研究的漢學，所有重要性罷了。現在一般歐美學者每以爲這所謂漢學便是對於中國作科學的研究，正如研究西利亞的「西利亞學」和研究埃及的「埃及學」一般。這和十八世紀中法國耶穌會士們所有錯誤的見解，多少有些關係，可是這種錯誤，也是由中國儒士們自己釀成的。在過去時代中，我們見了那些四開本和那些巨大的對開本，便以爲這些鴻篇鉅製中，必然包含着許多鴻儒碩學的一身心血的結晶；這班著作家原會到過這文明古國，這個國家的文化，又因年代久遠，學術淵博，範圍廣泛，的確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返觀利公遺下的著述，簡略微渺，所以從那時起，似乎大家都不願意給他奉上一「漢學家鼻祖」的徽號，承認他是研究漢學的創始人；他所收藏的中國書籍，在來訪的貴客眼裏看來，雖則堪稱豐富，可是比了寧波范氏的天一閣藏書，以及明代末葉其他有名諸家的藏書，真是渺小極啦。

但中國如果不只是一樣死東西，却是一樣可以捉得到靈魂的活東西，對於中國的認識，可以給現代全人類的文明有所貢獻，那麼，誰能否認利瑪竇司鐸所有前驅的偉績呢？因此，他擺脫了前人的註解，創下一種推陳出新的批評的原則，彈智竭慮，去直接尋求原文的意義，覺得不滿意還給中國思想的本身介紹一種求進步，因而也是求得正確知識的原則。一般和我們同時代的思想家，讀過了老莊，荀墨，諸子的言論，按着歐美諸家的哲學仔細比照一番之後，便想憑着廣泛的史料有所作爲；這在利公，原已依據他所有公教文化的全部遺產嘗試過了。我們不妨稱他爲薛舍羅——我們也知道有些人一提到這名字要做嘴臉，好像這位羅馬大文豪的才情是醜極的——但這是公教文藝復興時代的薛舍羅，這就是說

這位薛舍羅已裝上了新士林派在條理上和詞意清晰上所需要的一切條件，以及當代所有各種實驗科學的學識。我們提著利瑪竇的名字，真不是想到了蒙戴尼 (Montaigne) 這種人——他實在太浮躁而捉摸不定——却是想到了那我們應當懷念的鮑樂滿 (Frédéric Borromée) 或者我們還該想著那蓋博羅圖書館的創辦人，聖方濟各撒肋爵 (S. François de Sales) 那位洛列蒙 (Florimontane) 學院院長。這樣說來，無怪現代復興中國文藝的一般先進人物要提出這位十八世紀傳教士利瑪竇神父的「偉大成功」！把他認為憑着了解重視的精神，使中西文化相接近的一個例子。(註五十七)

利公在韶州所過的幾年光陰，真是非常苦悶，除了他一心依恃上主，他的信心始終不會動搖外，他的勇氣所賴以支持的，便是他所有這種深切的信念。據說：(註五十八) 一次，黃明沙修士「因為傳教工作毫無成就，也毫無成就的希望，不免有些抱怨，便說不如動身到日本或者其他比較有希望的地方。」利公便責備他說：「不要胡說，你真不知道啦！假使我單看那些已經排除了的困難，和開始時候所有的障礙，自然我要希望到別處去，到榛莽遍地的荒林中去開拓啦。至於你所說的希望，我們的事業還不至那麼絕望，有一天你總會看見我坐着和閩老們懇談咧。」這一席話後來果然見諸事實，所以黃修士常喜歡把這件事講給人聽。因此，利公隨處留心，繼續和中國最有才學的智識份子來往交接，相與切磋琢磨。他已經使當代中國思想的趨向起了轉變。

然而一種不能超越的困難，一種可以使他的地位根本發生播動的大缺憾，依舊使他只能站「在中國社會的邊沿上」；這便是他和僧道們相潛混這一點，雖則這不過是表面上的混同。這正如現代中國提倡佛法最熱心的太虛上人

說的一般：「過去時代，佛教所以不能在中國盡量發展的緣故，無非是因佛教僧徒僞促一隅，大家把他們擠在公共生活範圍以外所致。」利公越是在看見他的鄰居，韶州廟裏的和尚們和他相距咫尺，越發覺得羞愧的確，他不是不曉得，在那二百萬出家修道的佛教僧侶中，未嘗沒有真正出類拔萃的高僧，或因他們的學問，或因他們在獨居幽僻的地方，度着克苦修行的生活，而爲人所稱道，可是「在事實上，大多數的和尚不守清規，被認爲中國境內最不堪，罪孽最重的壞人。因着挑選極濫的緣故，這些人大都是極貧賤人家出身，從小就被父母賣給老和尚做徒弟。他們做了和尚，不能娶老婆，却最是好色，最喜歡犯邪淫罪，不過他們怕官府拏辦，只得偷偷摸摸，秘密幹着那些勾當罷了。……他們的廟宇或是寺院裏，都有分隔着的住房，有一個方丈管着他們的生活。……廟裏的房間可以供人租借。……每一座廟宇都像一個大客寓。……那裏和尚們把念經拜佛，宣講佛法，討論修行要道等事，看得極不關心。」（註五十九）「太素曾有好幾次要求利公撤廢儀式上的障礙，因爲這些儀式，使一般體面人物便不能和他隨便討論教理。」（註六十）這便也成爲一種理由，使教士們早就停止分發那最先的要理問答。可是據一位老紀年史家的解釋，（註六十一）「利公還不准院中用院外人對於天主教修士所有那些卑賤的名稱，無如教士們學着葡萄牙司祭的樣兒，剃去鬚鬚，又剪掉頭髮，抱獨身主義，住在寺院裏，依照規定時刻念誦經文，這一切仍不能使他們在大庭廣衆間，免除那不體面的名稱，因而一點也不能做出些大事來。只因行動上有些相似，就被人加上了同樣的稱呼，可是這種稱呼所代表的人所做的事情，真是大不相同哪。」

這位義大利籍耶穌會教士對於中國儒釋兩教的教化，下過一番研究之後，自然要把那受人輕賤的佛教僧徒們所奉行的佛教主義完全擯絕，去接近那受全國人民尊重的儒士們所標榜的孔子學說啦。自從他到了韶州以後，韶州官場

中人見他舉止儒雅，循循有禮，不禁爲之心折，因此，他便能和韶州一帶以及南雄方面的官紳往來晉接，其中有許多人對他更優禮相加。一五九二至一五九三年中他樹立了這些友善關係之後，便和駐澳門的范禮安會長幾經討論，其中有一點是鬚髮問題。利公的意見以爲「要使天主教順利進展，做教士的便該留起鬚髮，留長頭髮，好教人不把他們錯認作念佛的和尙，」但那時范公似乎還不敢遽加決定。後來，到了郭居靜司鐸要動身的時候，澳門諸位司鐸和山規勒主教（Mgr. Louis Caguelira）曾開了一次擴大會議，把這件事情提出討論。結果，利公的建議終於通過了，便由郭居靜司鐸把核准文件帶去，於一五九四年七月七日到了韶州。（註六十三）

從這時候起，利公個人獨居寂寞的苦悶是終止了，只是他外表的行動，還是漸漸地改變過來。（註六十三）一般歐洲人以爲利公預備依着科舉的定制去應試，考中了秀才，再去考舉人，進士，好在中國獲得頭銜。他們弄錯了，顯然這是不必的，他「只要站在西洋讀書人的地位和人相見就行，因爲中國人只須看見有學問的人，照本地方的風俗，穿衣裝束和本地的讀書人來往交接，一般舉動，便覺得不討厭了，不管他是甚等樣人。」（註六十四）但看郭居靜司鐸到了韶州，第一次去拜會那位新任謝知州，便照秀才見官的儀式行禮，一般和教士們要好的朋友們便覺大爲欣喜。（註六十五）利郭兩公每當公餘閒散的時候，還喜歡縱談往事，追憶他們在羅瑪時候的情景，因此，利公會說：「我們恒在羅瑪消遣光陰。」（註六十六）

這種苦中尋樂，未始不合時宜，因爲那時那夥劫住院的案件還沒有結束。郭公到了韶州後，不久，便有巡按要到這一帶地方來察訪，所以一班案犯的同黨便約會了四五十人在廟裏集議，大家同心協力，預備恨命幹一下。（註六十七）他

們寫下了狀子，控告教士們和葡萄牙人通同謀叛在他們的屋子裏藏匿了四十餘人。這些人要求韶州的官吏給他們幫忙，却誰都不答應，只有那做州署第二僚屬的少尹，和第四僚屬作對，才肯替他們出頭作主。這第四僚屬和教士們是朋友，便來秘密通報利公。利公便差人叫到了一兩個案犯，教他們轉告衆人知道，說他再三去替他們討情，求減輕刑罰，到如今還是辦不到，可是他只消輕輕說上一兩句壞話，準教他們吃大苦，那些同黨們聽了就害怕，嚇得不敢作聲，只求利公替他們開脫。利公就答應了，十月五日開審的時候，（那時這件公案還沒有了結）他當堂請求免予究辦，那位巡按見這事沒人追究，便設法把那已判重刑的十個案犯開脫罪名，更新判決，說他們不是賊，不過惡作劇罷了，隨命各責二十大板，釋放回家。這就使他們的父母免了奇恥大辱，真是僥倖極了。可是下一天，巡按動身到別處地方的時候，只見大批羣衆約有二百多人，齊到他經過的路上等着相送。這算是他們對利公表示感謝，又見那少尹借他們的名義，請求巡按大人畧停片刻，解決一個重要問題。不料巡按知道他們的用意，或者認爲他們揀的時候不對，便命傳諭，既然事關重大，就不該等到他動身的時候才提起，說着，就命差役們把衆人驅散了。這樣的結果，真教他們「啼笑皆非」，奈何不得。利公等原已一心聽主安排，到此便覺十分欣慰，一般善人却見教士們潔身自好，與世無爭，不禁十分欽佩。

郭居靜司鐸來了以後，所有的歡娛，歷時不久，到了十月裏，他也受到瘴氣的磨難，病倒了一個月，才能起床。便在那時候，那對教士們悉心照料的韶州州尹，須依照定例，三年任滿後，晉京陛見述職，州尹職務依法應由少尹代理，不料接事前兩三天，他在大堂上突然死了，便由那和教士們要好的第四僚屬代他的職位。（這件事發生約在一五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註六十八）這一年領洗的很少，九月中只有幾個，其中有一個是本城一位重要人物的兒子，是讀書人；

十月中（略在十二日以前）有那位教授漢文的先生，爲了要試他有沒有恆心，教士們已讓他等得很久了，他的父母是極有聲望的。（註六十九）那年青的依納爵是違反了父母的意旨進教的，他爲了要自由信仰，才到院裏來服役。（註七十）這些新教友都很熱心，有時候竟熱心得有點不合時宜，不得不加節制。（註七十一）

事態的演進，漸漸使教會當局顯見有加以變動的必要。這已由范禮安會長和孟三德院長，共同決定了：「在一般相距遼遠的人看來，韶州的住院維持到現在辦的事已算不少了，而且的確非有天主特別的護佑不行。……可是那裏的空氣不大好，人心更壞啦，所以必須有兩處地方可以立足，庶幾一處傳教機關即使被取消，不致使整個傳教事業，完全毀滅。」（註七十二）

瞿太素曾一再敦促利公前往江蘇境內的蘇州。（註七十三）但利公等必須先找到一個方法，使他們可以冠冕堂皇地離開廣東省境。那瓊州的王忠銘至今不見回來，他的仇敵們詭計多端，始終陰謀阻撓着，不讓他回復他南京禮部尚書的原任，從事修改曆法。（註七十四）但到了一五九五年四月間，好機會終於遇到了。（註七十五）那時恰有一位大臣帶了大隊隨從，溯江北上，路過韶州。他的名字叫石星，官居北京兵部侍郎要職，這兵部是全國最高軍事機關，有一位尚書，兩位侍郎主持，因此，便是各省的督撫在軍事上也得受他節制。（註七十六）「他有一個兒子，年紀二十一歲，因考秀才沒有考中，覺得十分羞愧，竟變成個半瘋子，延醫服藥，總不見痊愈。他原籍肇慶，祖居離城不遠，所以這次回籍，便有一個供職肇慶的官員，給他提起利公，說他是一個崇敬天地真主，飽學有道之士，能藉祈禱療人疾病，因此石侍郎道出韶州，便命差官來請利公到船上相見。他迎接利公的禮數非常優異，先派人帶了幾匹馬來，請利公等乘坐，見過了，便請坐獻茶，問

他們出身何國，所奉的宗教是怎樣，末了才說到他的心事，請利公相助治療他的兒子。這時候，韶州所有大小官紳，都當場在座，見石侍郎對利公這樣優禮，便都不勝驚異。利公見機會很好，便回說這種疾病治療頗不容易，只有一天的功夫，實在嫌太少了，但利公又說，既然大人就須進京，他可以跟着同行，而且他也早就想到北京去了，「因為一則這裏的氣候太不合衛生，再則我們原是讀書人，不遠三萬里而來，正願瞻仰上國風光。末了他說：『我希望我們所奉事的天主，有法子教我治好你的公子。』」

當下這件事，便議定了，石侍郎就命知州立即發給一張護照的確，這護照上定着回來的日期，只註明江西字樣，也不會准許利公到南京。但利公已覺得滿意了，他想自己跟着這麼一個大人物同行，就用不到甚麼文憑，他的宗旨，無非要很體面的樣兒，離開韶州罷了。

而且時間十分偏促，第二天，石侍郎就得動身了。利公決計讓他先行，好教自己不受他拘束，情願貼川資。這一天，他忙着預備一切。那兩個澳門修士都害着病，黃明沙更病得厲害，鍾巴相雖然比較健一點，却不得不留着，給郭居靜司鐸作伴。利公便在三個將來要進耶穌會，此刻在受試練的要理教習中，揀了兩個：多明我費囊迪，和若望巴拉大，跟他同去。那新奉教的青年依納爵定要跟利公同冒險，不怕替他赴湯蹈火，但利公怕他父親生氣不敢帶他同行。（註七十七）

這回利公突然出發，使他站在「中國社會邊沿上」的時期，切實告終，從此，他憑着自己所有漢學的學識就能到處以西洋儒士的資格和人相見啦。他也換上了儒士的衣服啦。每當循禮拜客的時候，他穿的是一件綠色的緞袍，用明藍色緞子縫透，下蓋有流蘇，衣領袖口都飾着三四寸寬闊的緞綢。袍袖很大，很寬展，「差不多和威尼斯人的衣袖一樣。」腰帶

也一樣是絳紅色，藍綫透綴在袍子上，分作兩根飄帶，垂下直到地上，「像義大利寡婦們束的一樣。」鞋是繡花緞做成的。帽子的式樣很特別，和西班牙司祭們的祭巾，有些大同小異，只是稍爲高一點，又像主教的禮冠一樣有摺角，還添上了兩根翅，戴上了好平衡，如果頭搖動得過了分，就會落掉到地上，帽子上有黑紗罩着，這就叫「蘇東坡」帽。（註七十八）司鐸們出門拜客，就坐着轎，帶了一個司書，有兩個穿長衫的僕人跟着。（註七十九）那尊稱的習慣也沿用着。（註八十）到了屋裏，戴着四角十字形的便帽，比葡萄牙人的圓形帽要高兩倍。（註八十一）穿的也是平常的中國衣服，不用扇子，也不佩帶別的儀式上的東西。（註八十二）此外，教士們也留長了頭髮，「像德國司鐸們一樣，一直留到耳朵邊，只不像從前的法國人把頭髮披散着，却有些像婦女們一樣，梳着髻用玉壓着，底下小洞裏插着簪，把頭髮約束住把髮髻完全藏在帽子裏，」據利公後來說：「院裏的傭僕們，梳的髮髻沒有這麼麻煩。」（註八十三）教士們的鬚鬚留滿了一年，就長得拖到了腰帶，這在下頰上只長得三五根十來根稀鬆鬆的中國人看來真是一樁大奇事。」（註八十四）司鐸們不論在中國日本或是澳門，都只用竹箸吃飯，已用得很久了，說這是「清潔得多。」（註八十五）而且人人都會使用摺扇，「和在西洋地方用手套一般。」（註八十六）

顯然有些地方，他們到底不能做得和中國讀書人完全一樣。因此，利公覺得自己總不能換上一副眼睛，一個鼻子。他說：「我們看來是微細的，他們却看作很大啦。」（註八十七）至於學他們留長手指甲，那真是太不方便了：「他們中，有許多指甲長到一掌半多，必須套上細竹管來保護着，防他們像玻璃一樣容易折斷。」（註八十八）

十八世紀中，歐洲方面，所有因着這種革新而引起的責難，曾由洪若翰司鐸（P. de Fontaney）加以駁斥。（註八十

九)他說：「有人對我講：『你們到中國就可以穿綢着緞啦；在城裏，你們可以坐着轎，不必步行啦。宗徒們宣傳福音是這樣的嗎？穿了綢緞衣服，你們還能守神貧願嗎？』我就給他這樣答覆：『在中國傳教的這些人的觀念，以為這樣去給中國人傳揚耶穌基督，和手裏拿着討飯棒，赤了腳去傳教，原是一樣的事。一個傳教士在異教國裏的生活，全不是爲了他們自己，却是爲天主掙得人靈。他的德表和一切行爲，都該依着這個目的加以調整。……感謝天主，本會在中國的傳教士們，和那在馬杜萊 (Madure) 穿苦衣，守嚴齋，赤足往來，傳教的教士們，原是同會弟兄們，和那在加拿大森林裏，深山積雪中，挨着凍餓，跟那野蠻人同來同往的教士們也是昆季。爲要使人領受福音的辦法，在這一團是好的，够的，有時候到了另一團，就變得一無價值，或則不足以化人了。本會最先（到中國）傳教的幾個教士，也懷着充分的志願，在中國穿着窮人的衣服表示他們棄絕世俗，和在他國一般。羅文藻主教（南京中國籍主教）和其他諸人曾屢次對我說起過，利氏到中國最初幾年中，原是這樣還同和尙們住在一起，住了七年（其實是十二年，說得更切實點，是「與和尙們相混同。」）穿的衣服，差不多和他們的一樣，生活十分清苦。官僚們勸他換換樣，說：「照你所處的地位，聽從你的人必然不多，人家也不會讓你久居在中國的。既然你有學問，你就得像我國有學問的人一樣過活；那麼，你就可以同不拘甚麼人講話啦。官場中看得起讀書人慣了，也就要看得起你啦；你去拜會，也就肯見你了。百姓見他們看重你，也就要敬重你，高興聽從你的教誨了。」羅文藻主教稱讚當時教士們，定了這個主意，又說假使他們要在中國宣傳福音建立真教，惟有這種辦法，是他們所能採取的真正好辦法。」

而且利公也並不想掩飾着他所有的情緒，他慨然自承的話，足以證明他的心境，便是在研究世俗末學的時候，也沒

有忘掉聖依納爵所有關於謙德階段的遺教。他曾記着：（註九十）「果然，尋求榮譽，不是我們分內應為的事情，無奈這地方的人，不認得吾主的宗教，要傳揚聖道，全看宣講聖道的人信譽如何，因此，我們在表面上，不得不適應着中國人的風俗，照他們的辦法做去，……如今，我們開始享受着的這種榮譽和這種信用，却不至妨害我們的靈魂。吾主曾使我們先在恥辱卑賤的生活中，整整過了十二年，又使我們遭遇了種種極大艱難，這就很够樹立起良好的德業基礎啦。不論甚麼時候，我們總是被認作世間的廢物看待哪。所以吾主既然賜我們能在煩重的工作中恆心守着，我就希望他也要賞賜我們聖寵，使我們不至因着這些榮譽而驕矜。我們還該前進咧，所以我們更希望以後我們要遇到種種機會，為吾主多多受苦！

下編

西洋儒士

我們要研究利公的事業，先該力求了解他的事業，因此，我們必須確定他當時所處的地位，明瞭那些聆取他言論的人所懷的實在心理，設法從所有文件中，尋繹出中國人所懷的願望，所有的想像力，所有使人眩惑的字句，和思想的潮流，……所幸利公的筆記，尤其是他的函牘，協助我們從事於這種精細的研究工作，使我們能逐漸看出中華民族的精神，使這中華古國的靈魂，好像在我們眼簾前活躍着一般。

這時代中中國的政治情形我們差不多可以不必追述。那時朝中正鬧着立儲問題，原因是萬曆皇后沒有生下兒子，王妃生皇長子常洛，鄭妃生子常洵，可是鄭妃得神宗寵幸，生了兒子進封貴妃，因此，羣臣知道萬曆帝有廢長立幼的意思。（一五九二年）這和先朝遺制太相背悖了，便有一班守正不阿的朝臣，羣起力爭，釀成了極大風波。我們讀了利公的遺書，還可以約略看到當時羣臣諍諫的情形，朝臣因此遭貶黜的有百餘人。但其後因滿朝文武一致力爭，甚至要全體去職，神宗才不敢一意孤行，終於冊立了常洛為太子。（註一）

京城以外，也發生了幾件事情，使國運漸趨黯淡。一五九二年寧夏之役，韃靼族巴拜爲了兒子承恩被巡撫黨馨笞責，懷恨在心，便連絡了軍鋒劉東陽等與兵作亂，佔領了黃河沿岸的重要堡壘。陝督魏學曾檄兵征剿，把寧夏城圍攻了六個

月，又引水灌城，才削平了叛亂。（註二）

明代中國最大的外患便是倭寇。那時，日本正當幕府封建制度趨於沒落的時代，大權操在豐臣秀吉等三巨頭手裏，他們高唱着尊王攘夷的論調，努力統一全國。（註三）這三巨頭中，一個叫（Nobunaga）是稟性暴烈的青年武人，他的標語可以概括成爲這樣的話：「黃鶯若是不叫，我就殺了他。」另一個叫（Kasai）性情是狐狸般狡猾，他的主張：「黃鶯若是不叫，我們且等着他叫。」豐臣秀吉站在兩者中間，到了一五八五年便握了全國大權，却因他的那副尊容難看，便有人諷刺他，給他起了一個雅號，叫「小糊塗」。他的格言是：「黃鶯若是不叫，我總要安排得使他叫了才罷。」自從一五八六年起，他就一心想先征服朝鮮，再入寇中國；爲了要謀使葡萄牙人借給他船舶，幫助他侵略起見，他不惜許下葡人「在日本各處建立教堂，並下令全國人民信奉天主教。」（註四）實則，當時日本的教難，他正該首先負責；這回的教難却使日本和世界文明相隔離，因而使日本文明的進化遲緩了二百年。似乎他這回用兵侵略的宗旨，除了擴張領土，使他部下的軍隊，有些事做，不致久享閒逸外，還想乘機排斥幾個信奉天主教的大臣，便是那些信奉佛教的勳舊，也在被擯之列。野心勝過他的理智，他行險徼倖，不惜起傾國之兵，侵略朝鮮。用這樣雄厚的兵力去跨海遠征，這也許在拿破崙時代以前，是絕無僅見的。一五九二年（明萬曆二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秀吉徵發了二十五萬大兵，命年老殘酷的加藤清正和年輕浮躁的小西行長做前鋒，從對馬島渡海直逼釜山。這兩位將領素不和洽，加藤是個頑固的佛教徒，小西是新奉教的基多信友，彼此意見相左，隔閡很深。但他們雖則各懷貳心，只因朝鮮軍備廢弛，所以不到一個半月，朝鮮境內差不多全部淪陷了。到了這時候，明廷才派八萬兵去救援，却失敗了。神宗和在朝諸大臣得報大爲震驚，就命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經略備倭。

軍務，又派李如松，如柏，如梅，三弟兄率師同去救應。那位兵部尚書石星便在這時候爲了這事奉召晉京，路過韶州，就帶了利公同行北上。但中國每見軍事佔不到便宜，往往會用外交手段來獲得勝利。後來秀吉一死，加藤便先回，在路上被明軍邀擊，燒了船，狼狽回國。小西也被總兵劉綎打得大敗。（萬曆二十六年）他在朝鮮作戰了四五年，勞師糜餉，原已覺得厭倦了，在將近一五九六年時候，他曾派過一個使者到明廷。這使者叫（Naitondoto）（註五）也是教友，據說：他曾勸得「皇后宮裏的三個大太監願意領奉天主教，還許下天主教可以自由傳入中國。」這些事情雖則有人告訴了利公，他却還不會打算利用這種諾言，他所有對於日本的印象，無非是他左右的人們的印象罷了。他曾記着（註六）「日本民族雖則比中國要小得多，可是日本人是好戰的民族，所以中國人他對們很害怕；因此，大修戰備，又徵募了大批軍隊以防倭，不但是要捍衛國家，也爲了要保護瀋陽哪。」

這種種的環境，對於一個在中國內地的外國人，的確是頗不順利的，利公却就在這種不利的環境下，不顧艱危，向南京進發，要是可能的話，還要繼續北上，到明代中國的首都北京咧。

下編 第一章 在中國顯官蔭庇下

我們懷着我們西洋人所有對於宗教的觀念，見利公扔下了韶州南安橋廟裏和尙們所代表的佛教境界，轉向他方，就不免要認利公已放棄了原來的計劃，不願引導肇慶南雄的這些「食草者」或者說是「密密教」的弟兄們，使他們歸認基多了。所幸這種揣測是不對的，我們對於這一點的觀念，得改正一下。事實上，中國的佛教，的確因為組織不統一，雖有熱心人建立了許多寺院，却有不少為毫無價值的人們所佔據着因而成為窮途末路的逋逃藪，蔭庇着一般我們所稱為處境艱窘不能自存的社會盜賊，使他們得以不受管束逍遙自在。但除了這些廢物之外，却也未曾沒有精神界的寶藏，為公教史家所發現而嘖嘖稱奇的。

魏格司鐸曾記着：（註一）「阿米弟派，確是禪教的鮮花，他的方式是最講究的。這一派的哲學家崇拜泛神主義，一種極純粹的泛神主義，但終究是萬有皆神的主義。幸而這一派人數稀少，他們不重視科學，在實際上也不妨害他人，所以他們不論男女，都守緘默，不肯多言，嗜欲簡單，心思精細，他們的道德教訓非常純潔。他們表示懺悔或是立定志願的行為，他們的認罪和祈禱，都是虔誠謙遜得使人驚異。我們只須看看他們的舉止和他們談話，便可以感覺到一種謹嚴深切的信念，一種安和溫婉的虔敬心，這在其他任何異教教派中是找不到的。不論是誰，看見了他們公開的敬禮，就要說他們有信德，便是我雖則不是軟心人，也因目視了種種虔誠的景象感動到了心眼裏。一個基多信徒和這些好矮人一經接觸，就會發生到了老家裏的感想。」

大屋司鐸 (P. de Grandmaison) 也說：(註二)「回教離基多相距得遠了，印度和中國却離得更遠啦。可是依據穆漢謨德的說法，天堂上的生活，竟描摹得有如一種奢華享樂，休息的生活，設想地獄也和天堂一般，是一種完全屬於物質方面的樣子，地獄裏的苦刑完全是形體上的，至於因為失落了天主，所有的悔恨和痛苦，一點也不提……阿米弟派在淨土宗方式下所講的天堂，顯見得較為澄清，較為適合於宗教，讓他們看來，如果把永福的生活，設想得和現世恣情逸樂的生活一般，那真是卑鄙啦，把現世生活的需要和義務搬到天堂上，乃是一種肉欲的想像。」

這樣，便是一般有宗教信仰的人們所有的宗教。利公原和范禮安司鐸一般，相信在一箇集中權力如中國的國家，只要在皇帝跟前獲得了極小的成功，就能使全國各省受到影響，所以他爲了要在中國贏得人心起見，便廢棄了羅明堅和巴範濟兩司鐸所採用的僧服，換上了儒服。這樣，他就免除了和佛教僧徒相混同；這班和尚原是爲文人學士和官僚們所輕賤的，可是一般儒家子弟，却大不相同，到處受人尊敬。但天下事有利必有弊，中國的風俗，婦女可以到廟裏燒香，(註三)利公換上了儒士的衣服，對婦女一方面的傳於工作，就有些不方便啦。幸而日子久了，也就有了一種補救辦法，而且他反坦坦蕩蕩，把這種辦法引進了那我們所稱爲真正「中國神道」的官場中去，這個名稱雖則有些形容，却並不過分誇大。

事實上，據最先來華的教士們講「中國官場對於所有神像佛像，既不信仰，也不加重視，說他們知道這些無非是愚弄平民的把戲，可是對於百姓們這却也是少不得的，不但可以滿足他們精神的需要，還可以借此駕馭着他們。」(註四)所以在老百姓看來，做官的都是有福的，他們所享舒適的生活，便是真正唯一的幸福。平民窮苦得凍死餓死，是恒有的事，

踏進了官場，便到了人世間的天堂。百姓們對於官，真是一「奉若神明」，都得怕他，崇拜他。利公每歎官場中物質主義太濃厚，但這也不能一概而論，便在官場中也未嘗沒有像瞿太素一樣志行高潔，不慕榮利的人。

這位義籍耶穌會教士利瑪竇不久便在一位「中國神道」蔭庇下的旅途中，經驗到種種便利了。他於一五九五年四月十八日（註五）仗着兵部尚書石星的保護，帶了巴拉大和兩個權當要理教習的僕人，立即僱船從韶州出發，一面派多明我從陸路跑到南雄，知照信友們在中途相見。石侍郎已先一天動身了，約利公在梅嶺那一邊相會。利公一路前往，一點沒有遇到困難，到了南雄，一般朋友們和信友們都來送行，還爭先向他表示誠摯的衷情，幫助他搬運行李，實踐弟子們對師傅許下一「負囊担物」的諾言。（註六）使利公得以趕上行程。這是因為到了南雄，若再依着水道前進，須得繞一個大彎子，路就遠得多，所以利公循着以前羅明堅和麥安東入浙的路由，（註七）捨舟登陸，（註八）好坐了轎，從那粵、贛兩省交界處的叢山中，在危崖絕壁上鑿開的棧道上過去。

這條棧道，正如中國人所說的一般，是中國南部和中部的「咽喉」，是一條「交通孔道」。一切貨物到了那裏，都得由人背着走過，據說靠此謀生的扛夫，有五萬人之多。一般前輩教士們曾搜索枯腸，用盡了種種令人驚歎的字句來描寫沿路的風景。這條道路路面鋪得很整齊，常有人打掃乾淨，便是下雨天，也好行走，一路有無數溪流，都用小橋跨過，沿路兩傍，搭着竹棚，也有供行旅過宿的旅舍。柏茂祿司鐸（P. Palmeiro）曾記着（註九）在七華里的距離上，來來往往的羣衆，比了在里斯本城裏最繁盛街道上，正是一樣的稠密。利公也會估計過來去的人，至少有二千。這梅嶺和鄰近的南嶺、大庾嶺在十八九世紀的地理學家眼裏看來，認為非常重要，所以後來竟把他們列入了中國境內的主要山脈，以為他們

的高度有二三千公尺。其實，梅嶺拔海不過三百公尺，這正如阿尼巴（Anibal）見了那阿爾比斯山上一條通道而驚駭一般。（註十）山頂上所有的仄徑都通到一條很深的壕塹，上面造着一座廟宇，有駐軍防守着；不論白天黑夜，都可以來往通行。回到南方的時候，路上可以看見那長滿了果樹，遠望一片碧綠的懸崖下，展開着阡陌交錯的田野，城市村落，歷歷在目；向北一望但見崗巒起伏，危峯矗立，俯瞰着這一條交通咽喉的羊腸鳥道，在絕壁下蛇蟠盤旋。利公行經此處，和多明我以及那僕人急急走過，讓巴拉大和幾個信友去照料行李。

南安在南方內地，重要性要比南雄差得多。（註十一）這座城市是在江西的山麓上，旅客們從水道入贛時，南安便是首先經過的城市。利公和石星約定相會，便在這一處地方。石星做着統轄全國軍事的長官，所以他每到一處，便有地方官吏和大批民衆，正式出城迎接。他到南安這一天，利公還不能見到他，却和他的隨從僚屬，談得很投機，尤其是那老管家和那辦奏稿的幕僚，很要好，把自己的禮物拿出來給他們看過；一具計時的細砂滴漏兩柄製作極精的扇子。（註十二）

第二天，利公便和這位大人物相見，受到他的殷勤接待。

石星從沒看見過這樣的砂滴漏，他接下了便放在桌子上。他和利公談到了晚上，便同進晚膳，彼此又暢談着歐洲各國的風俗民情，西洋學術，以及天主教道理，談得很爲親切。當下，利公提起他願意在廣東省以外不拘甚麼地方，揀一處住下，石尙書就給他說明北京和南京這兩處地方，沒有多大希望。他說：「這兩處是首都，你又是外國人，要是你不是去給皇上進貢，那就甚麼都辦不到啦！浙江又是沿海省份，那裏有一外國人，就得起人猜疑。最相宜的地方是南昌，那裏我會做過官，（十年或是十二年以前）我可以盡我的力來幫助你。」以後，石星一路北行，雖則忙着要接見正式拜謁的官吏，好幾

次利公去見他，他總先予接見，始終對利公表示十分敬愛。石尙書要利公和他同行，原是為了要醫治石公子的疾病，可是這當兒，大家忙得把這件事擱起不提了。利公於是趁空閒，把所帶的書籍和曆算上應用的各種用具拿出來，供人觀摹。從此，利公便得到了擅長科學的聲名，石尙書和一般來訪的官僚，都稱他為「先生」，或者稱他為「師曠」。

他們從南安取道贛江，到了贛州。贛州城，「比弗勞倫斯大一點」，位於贛江右岸，（約在北緯二十六度半）就商業上說，要比韶州重要；江面上，有一座用鐵索把船隻連合起來，做成的浮橋，每天開啓一次，使航行的客商們完納了關稅後，可以通過。石尙書一行人，到了贛州，地方官已準備下盛大歡迎，那時候，已是夜間了，他們在千百火炬照耀下，熊熊火光中，照見岸上有二三千兵士，齊穿着軍服，排成兩行，延長到三分之一華里，放着銃，鳴着鎗，向石大人致敬，一時音樂大作，鼓號齊鳴。這種不經見的大場面，表明贛州是那人稱「四省總制」的駐地，這不是說他實際上統轄着四個省份，只因他担任着巡視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四省邊境的職務，所以這四省中，每一省劃出兩個城市，歸他節制；他對於這些城市可以行使一種特別的職權。這位大員知道石兵部一到，便率領了全體僚屬，親自前來拜會。他們又打聽得有一個外國人同來，也想和他見面。但利公以為這事過於突兀，也許要使石星猜疑，不如托詞謝却，他於是自己化錢僱了一葉扁舟，很輕巧地避開了這塵世的煩擾。却得趁此機會，容與中流，欣賞着贛江兩岸，堤畔綠蔭的美景。後來，他說：贛州城很雄壯，可以和南昌媲美，偉大不在南昌之下。」

在贛州停留的時間並不多，過一天，就啟程了。這贛江因着有一條支流來相匯合，江面就放寬了，可是有一段長約四分之一里的江面，河身又窄起來啦，因此，過了這裏，便有二三十英里的急流，名叫十八灘。（註十三）爲了這些連續不絕

的淺灘，所以在贛江中航行的船舶，雖則一樣有很高的桅檣，却都不裝着龍骨，因此這種船在航行的時候，真是不穩極了。再則贛江中所有像石星乘坐的官船，船身龐大，不啻水上行宮，是一種全身髹漆的畫舫，船裏分作許多艙房，正艙中設置的傢具很多，有十二張桌子，十二把椅子。（註十四）一般迷信的航行客，經過這險灘，總得到灘口的廟裏去燒香求佑，這座廟宇金碧輝煌，非常壯麗，但石星雖已給了廟裏的和尙們鉅額的佈施，而且平平安安地過了灘，不抖他的妻妾和子女們所坐的那艘大官舫，還是免不了觸着暗礁要沈沒。其實，這裏的江水並不深，不至有很大的危險，但這班乘客，以為就要在江中淹死了，便一齊大聲叫喊起來。利公一聽得他們的喊聲就注意，便命趕快把自己的坐船行駛過去，讓他們到了他的船上。利公的船行駛了一英里多的路，便趕上了石星的船。他便命把船夫們和他的兩個差役各責二十板，又命另僱了一艘贛州的船。但石星的眷屬要等到夜才換船，所以利公和巴拉大兩人便上了一艘測驗江水深淺，在前開路的小船。便在這小船上，在一處叫天吁灘，水流湍急的地方，他們倆遇到了可怖的大危難。這艘船停泊在一座高山脚下，突然一陣橫風吹過，打着船身，船夫們趕不及把帆篷卸下，船就翻身啦。（註十五）

利公自己講起這回事，曾說：「當下，我們就沒頂啦。我已經腳踏著浮沙了，便把自己的靈魂托付給吾主，只想我死在這樣的航途中，真教我感覺極大的欣樂。忽然，我覺得我手底下有一根繩索，便抓住了，好不容易，拉着他浮出了水面，水却已吃得不少了。我於是用腿夾過了一塊浮在水面上的木板。我又在其他許多漂流的東西中，摸到了我的文具箱，一隻打開的小箱子，恰巧水流拖着這翻了身的船，船底浮出水面，因此，我就抓到了船身，出了水；接着，便有人來援助我，到了岸上，其他救起的人已有了不少了。在這回的災禍中，大部份的旅客都得救，便是幾個吃奶小孩子也得了命，唯有巴拉大踪影全

無，連屍首都撈不到。他真是我的大帮手，是我此次出征的扶持人。如今我失掉了他，一時，便有些狐疑不決起來。就此罷手呢，還是再接再厲地向前邁進，隨後，我恢復了對仁慈天主的依恃心，終於決定繼續向前邁進。」

這回的禍殃，使石星受到了很大的損失，許多東西尤其是那些預備送給北京王公權貴的禮品，受了潮，就弄壞了。可是他見利公遇險受驚，依然表示同情，派了兩三個人去慰問，又送了一筆錢，作為巴拉大的治喪費。經過這回慘禍以後，這地方上便留下了一種傳說，以為利公在出事後，見犧牲在這險灘上的人不知有多少，因而大發慈悲，把一件聖物丟在江心，藉資「鎮壓」，所以有人找到了利公的彌撒經，在梁溝廟裏保存著。（大概這不過是記著朝聖者姓名的金邊冊子罷了。）從此，利公所開闢，至今還有人繼續開拓着的這一條瓜徑，要由利公在崇山峻嶺中，鑿道前進啦！（註十六）

過了兩三天，他們便到了吉安，航行也就中止了。吉安位於贛江之西，約在北緯二十六度四五十分，是江西的重鎮。據說吉安一處，「所收的賦稅要和一省的賦稅不相上下。」因此，中國有一句話說：「一城又一城，吉安最要緊。」（註十七）石星等到了這裏，又三次遇到了危險，這就使他厭倦了水道航行。當夜，突然起了一陣狂風，有好幾艘船幾乎傾覆。他於是決計捨舟登陸，由陸路到南京。他所需的一切費用都是由國庫支給的。有幾次，利公見形勢很不妙，揣想自己就要被遣回了。因為這時候日本正在侵畧朝鮮，朝鮮既為中國藩屬，明廷就不得不發兵援救。因此，中日兩國間，便發生了戰爭。這當兒引外國人深入中國內地，豈非不適宜嗎？於是，利公不再被邀去見石兵部了，石星的右左也沒有人再來請他去醫治石公子了。利公為未雨綢繆計，便裝着極鄭重的模樣，去見那辦奏稿的幕僚，拿出一件寶貝來給他看。這件寶貝便是那威尼斯水晶製的三稜鏡，因為能分析太陽光，所以在沒有見過的中國人眼裏看來，竟當他是一件奇妙得了不得的寶物。這東西

利公給他看過之後，便說：「假使你的東翁肯繼續照顧我，帶我到北京，這東西我就奉送給他。」這回，這所謂「無價的寶石」還是像過去時代一樣有效驗，不會誤事。然而這位兵部大員雖則很愛這東西，却只答應讓利公到南京，趁夜裏，差人來知照，教利公坐船，跟着他的眷屬和李季同行。利公也就答應了，說：「好吧，但是必須發給我一張正式的護照才行。」這件事，爭論了好久，但利公執定不再退讓，石星只得答應給他做一張呈狀，依照定例，請求准他「去遊覽南京的名山。」

第二天，利公便帶了一點小禮物和那素著盛名的三稜玻璃去見石星。石尙書便對利公訴說他的惡運，說來說去，說了一大篇話，又說：「我豈是那樣薄情人呢？我生平從沒有待虧過一個人，一生行事，總是力求正直！」利公引中國經書上的前例，來勸慰他，又給他講古聖若伯的故事。以後，大家討論到將來回去的問題，便又起了熱烈的爭執，「利瑪竇爲甚不肯回韶州，連肇慶都不肯再去呢！」石星見利公執定不回，便再勸他到南昌住下。利公講起這件事，說：「可是我只要到北京，或是南京，便說出種種爲難。我拿出那使他目眩的三稜玻璃給他看，這要比人們給他講過的還要好看。他估計這東西值一二百銀元，但起先他定不肯收受。最後，他的主意打定了，就說出這些話作結束：『北京是辦不到的，我准你到南京吧。』我的呈文已預備好了，可是他却沒有帶得自己的官印，只得教沿途的地方官辦理發給護照事宜。因此，那吉安知府便印發了一張護照，這張護照上，寫明可以到南京，蘇州，浙江省，以及其他附近各城市，還追述我在中國僑居的緣起，照錄了韶州官廳發給的文憑上，附抄着以前肇慶兩總督兩次准狀的原文。這便是我所得最好的結果，除此以外，我不能再有所冀希了。我告退的時候，又有一番推讓的爭執，要石星收受我的禮物；我勉強他拿在手裏，他差人把三稜鏡送還，但我見慣了他們的做法，終於再送還他，又附了一件小禮物，送給那辦奏稿的幕僚。」

於是，石星等十三人，坐了轎，用十四五匹馬馱轍行李，由陸路上南京，一路有軍隊護送，利公也便在那一天，帶了兩個僕人，坐了船，繼續進發，每到一處停泊，地方官總已預備下盛大的歡迎，他也分享着那和歡迎王公大臣一樣的典禮。船行了一天，便到右岸的吉水。這也是文風鼎盛的地方，雖則小小一縣，却出了四個進士（那時廣東一省只有一個進士）韶州的前任知縣便是吉水人，這當兒，他從北京回來，正忙着嫁女兒，鋪張極盛。利公便去拜訪他，這回他是穿了儒服去的。

利公講：（註十八）「當我們在韶州，穿着僧服去見他的時候，他擺起官架子，接見我們，禮數很簡慢。這回却大不同了。他穿了禮服出來迎接我，陪我談了很久，末了，又設下筵席款待我。我給他說明我們換穿儒服，不再剃光頭髮的緣由，說我們本來是以讀書為職業的人，教人學習天主教事理，以及其他科學。我們初到肇慶的時候，還不會講中國話，不懂得中國人的風俗習慣，便受了人們的欺騙，答應穿和尚衣。其實，我們與和尚大不相同，我們的道理正和他們的相反，我們的職務，也和他們的截然不同。他認我的話說得很對，便要留我在他家裡住幾天，但我因石星的差役們正等着我，我也願意有他們作伴，所以我不便久留，只得利用這位知縣的家人，寫了一封給郭居靜司鐸的信，托他帶去。」

以前，利公小心謹慎，不肯在公衆地方出頭露面，這回他雖則冠冕堂皇走出了韶州，必然仍以爲這種預防的措施，不宜遽而放棄。（註十九）江西省的地形，好比一張大樹葉，贛江好比樹葉的派絡，重要各城市都在沿江分佈着，這些城市從前都很繁盛，自經「洪楊之亂」，就衰退了。利公溯江北上，經過了好幾處有名城市，其中有一處是人稱「御史城」的臨江，因爲臨江一府，（距吉安三日程，約在北緯二十八度半）出的御史很多。從這裡起，贛江就分作九個支流，把陸地分成九個島嶼，船舶往來，絡繹不絕。在將到南昌前幾天中，利公便蜚伏舟中，足絕不出。末了，他們在從吉安動身後，第十一天

上，到了南昌。這地方，十年前麥安東會來到過，那時，正當一五八五年的聖誕節前夕；他到了以後，那遇到了一陣從北方吹來的暴風，把江水吹混了，喝不得。（註二十）南昌在商業上，和船貨運輸上，比廣州差一點，可是風景文物要比廣州強得多，所以聖太素會不住向利公稱道這地方的好處，勸他到南昌去居住；而且太素在南昌的時候，還對的他許多友好相識，講起過利公的才德，不過利公自己不知道罷了。便是石星也勸利公住在南昌，以爲這地方位置適中，南下可以直達廣州和韶州，北上可以直達南京和浙江省，真是中途極妙的驛站。無奈這當兒，沒有人介紹，這初步的開闢工作很不容易，利公仍不顧一切，決計上岸進城，到一座有名的古寺去走一遭，這座廟宇至今還在那舊城裏保存着。他的意思，是要借着石星幕友的名義，去設法佈置，看看將來他如果不能在南京立足，能不能重到南昌來住下。

據利公講，他曾說：「我於是帶了僕人們，教同舟的幾個人陪着，到幾處名勝地方去遊覽，又特地到了那改作了萬壽宮，又稱「鐵柱宮」的許真君廟。依着本地人的傳說，（註二十一）數百年前，南昌有一個人，懂黃白術，能把硃砂變成銀子。他調濟窮人，施捨了許多，又降伏了那一條龍，救了闔城百姓。這條龍有幾千里長，降伏了以後，縛在地底下一根鐵柱上；有人指着，說這根鐵柱還在那裏。末了，他帶了他的住宅，和一切傢具，飛昇到了天上，連屋裏的耗子都仙去了；因此，大家給江西人起了一個綽號，叫「江西耗子」。那供奉許真君的殿宇，非凡宏敞，如今已被那些留着鬍鬚的道士們污辱了，當作自得的商場，天天有人在那裏趕市。有些人見了我，便都受了驚似的跑開了；這就使我害怕，怕鬧出亂子來。我的僕人多明，我便告訴他們，說我是西洋來的外國讀書人，他們聽了，奮興得更厲害啦，便有人向我做手勢，教我拜偶像，有些人幾乎要動手強迫我了。幸而跟我來的人把我拉開，說我甚麼神道都不信。這當兒，要對着這樣的羣衆，詳細講出一篇大道理，

真是不合時宜咧。我於是後悔起來了，不該大意走出來，尤其是因為我看見了這裏的人對他們的偶像崇拜得更要比廣州人熱心。從此，我就打定主意，以後除非把我們天主教道理預先講明白了，決不再到廟裏去遊覽。我於是出了廟門，民衆的騷擾更厲害了；我怕這件事情傳到總督和官僚們耳朵裡，便回轉身來，大聲說我住在中國的日子很久了，如今我是陪著石尙書到南京去的啊，——這位大人物，南昌人是沒有不知道的。隨後，我設法擺脫種種的煩擾，躲在船裏不露面，同是石星手下的人們却去拜會他們東翁的朋友們，特別是那給總督治病的一個醫師王繼樓。（註二十二）

過了南昌，江面還是那麼寬闊，却分作兩道河流，一道通到那著名製造磁器的中心景德鎮，羅明堅和麥安東到浙江的時候，便是從這昌江上去的。（註二十三）利公却越過了這條在右面的支流，沿着鄱陽湖西岸繼續前進，經過了一座小城市，叫南康（今名星子約在北緯二十九度半。）這一帶正是廬山，「山峯常在雲霧中，是因產生了許多神話而著名的。這座大山中所有的廟宇，和一年中所有的日子一樣多，那裏還有幾千苦行的僧侶隱居着。」向北是九江，慣常到廬山去的人總是從九江出發，現在要上牯嶺避暑，也必先到九江。（註二十四）

鄱陽湖「並不很大，却是很長，」湖面的寬窄參差不一，在那時候計長約三十里，廣約七里。（註二十五）湖中沒有潮流，來往的船舶都用帆篷行駛，沿湖一帶，城鎮林立，有河道通到福建，也可以入海。在湖裏航行了兩天，就到了湖口。這是在鄱陽湖出口處的一個小城市，「防守極為嚴密，」過了湖口，便進入那浩浩蕩蕩的揚子江了。（註二十六）這便是中國人所稱為「長江」的大川，有幾處江面有二三英里寬闊，江水極深，據說竟是一深不見底，「而且是極危險的，萬一失足墮江，就難免不喪了生命。利公給我們遺留下關於他航行的記述，不但饒有趣味，也不乏風景的描寫。他的船「進了長江，

船夫們便小心翼翼地駕駛着，因為江中常有倏起的陣風，只有大船能在江中行駛，到了夜裏，或是遇到了暴風雨，就得折入支流，或是兩邊的小港中停泊。每當潮來潮落，尤其是在月滿的時候，江中波濤洶湧，便在鄱陽湖中也不免要受到影響。（註二十七）

利公從韶州出發後，在第二十二天上，到了安慶。這是一座大城市，也是重鎮，有許多軍隊駐守着，位置約在北緯三十一度。他沒有提起那稱為安慶名勝的壯麗的大寺（一五七〇年重建。）那時，凡是到南京去的船隻，到了蕪湖，就得報關註冊，所以利公等到了那裏，就照辦了，却沒有完納關稅，只化了一點錢，給關上的巡丁做小費。利公曾說：「我不想把我在路上所看見的一切事情詳細記下。」他一路前進，但見無數停泊着的大船，有幾艘有三四根桅杆，船身極堅固，却没有龍骨，所以行駛時很不穩定；帆是蘆蓆做的，遇到逆風，也能行駛，不過有時候，一天只行得十八里到二十里。江心中，有許多島嶼，也有孤山。山上建着廟宇，廟裏的和尙，每每來乞錢，說是一點燈油錢。一向北再進，麵粉漸漸成爲普通糧食，「只須化兩文錢，買三個蔴球，就可以充飢啦，用不着乾糕餅，或是大米。」魚類很多着，木柴却很難得，大家用炭代柴。長江兩岸，每隔五個驛站，就築着金字塔式的烽火塔；有了警報，就在塔上燃起烽火來，憑着這視覺的信號，來傳遞消息。

五月三十一日，南京終於到達了。南京一名應天府是總督的駐地，（註二十八）一切都和那一五九二年所寄發的記敘相符。如今，這座城市，自從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已失掉他所有政治上的地位了，却仍做着文化的中心，曆史上和稗史上的首都，是禮義文教之邦，也是上流社會中，一般文人學士，和許多有名人物住慣的地方。（註二十九）我們且讓利公自己講述他所有熱烈的希望，以及他此番在南京小住半月後，所感到使近心痛的欺罔。（註三十）他說：

「我住的一座屋子是在裏城外，却是接近城門（大概近水西門，後來改稱三山門。那外城是土城，靠着長江包括聖彌額爾山，第三城是皇城。）我住下了以後，便有大批羣衆來看我，石星的幕僚便逼我，趕快回韶州，否則，至少我不得說出和他的主人有關係。可是我明白我所有的聲勢全從這種關係得來，而且像他這樣有權力的大員，便是說出來，對他也必不至有甚麼妨礙，所以我總不住對人說着我起先是跟石尙書同來，以後跟着他的隨從同來的。」

「在我離船上岸，下客寓的當兒，我聽得有人說道：『你看見的這外國人，是劉五的好朋友。』（前肇慶總督劉節齋的第五子。）我正一心想去找這個老相識，所以我就向剛才講話的那人，探問劉五的近況，便知這人原是劉五家醫生的兒子。第三天，（六月二三日）我的老朋友劉五便同了這醫生父子兩人，來找我了。他設下了一席酒筵，款待我，又介紹我認識了好些人，其中有一個秀才，和他的兒子——也是秀才——和我特別要好，請了我四五次，喜歡請聽我講論天主的事理，和我本國的情形。有幾個聽講的，以為我是從上界下凡的人。『道教的神話總是這樣。』當此征剿倭寇的時候，在這對外國人防得極嚴的都市裏，這一切的事情，總算不是壞兆。我出去的時候，總坐着轎，免得引人注意，這也教我更有體面，又省了我步行極長距離的勞苦。」

「不久，我就開始表明我的意願，要在南京住下了，說我為南京的聲名所吸引，我的意思，要在這裏了結我的餘生，但我絕不說出我所有傳揚我們聖教的主要目的，我的朋友們便說這事容易，因為我穿的衣服，講的言語，以及種種的習慣，已很像中國人啦。只是一般大官僚的意見，和我相差太遠了，我不敢去接近他們，小官呢，胆子小得一點都不敢作主。」

因此，利公不得不找出一個有相當聲望，却不深閉固拒的人。過了幾天，利公便去請教一個出身某直隸州，也許是

太倉州」他的兒子本年新中狀元（註三十一）的入，開始進行種種的佈置了。利公正要和他們約期會商的時候，他打聽得他的老朋友廣州的兵備道徐大人如今已做了鴻臚寺正卿；以前他在廣州時候，原會兩次邀請過利公離開韶州，同他一起到別處居住的。（註三十二）利公說：「這個消息使我多麼高興啊！我想在這裏住下的時候，如今就來到啦，我日夜祈禱，尤其是每天舉祭時不輟祈求，如今天主已俯聽我的祈禱了。劉五便鼓勵我去拜會他。我於是把會見新狀元的事展緩了，由那個醫生陪着，同去拜會徐大人。這天是六月十六日，我去的時候，穿上了禮服。

「這位大官員一見我進門，不料我突然來到，起先好像呆住了；後來，他看見我帶來了一份豐富的禮物，便像從前一樣，很客氣地招待我。他不要我行大禮跪拜，請我和他對面坐下，獻了好幾次茶。我們的談話很友好，我爲討好起見，便把我和石星同來的情形，從頭告訴他。末了，我對他說我是專誠來拜望他的，多虧石尙書給了我一張護照，所以希望我可以在南京住下，得在這裏叨隸研幪，請老大人加以維護。

「這當兒，他突然變過臉來啦！這位徐大人開頭便大聲歎了幾口氣，好像有些失魂落魄一樣，不知怎樣才好。他於是後悔起來了，悔不該讓我進門，他說：「可不是禁止外國人到南京來嗎？」到他衙門裏來看他，那是更不行哪。我要被監禁起來，他也要被人查問到我的來歷，和我所做的事情呀！我的來意確然是好的，可是我在廣東既然被人猜疑，我給人家留下的印象是何等惡劣呢。他的脾氣於是大大的發作起來了；他動了火，指手蹬腳，大拍大叫，像發了瘋一般。我沒法使他息怒，他不管我有護照，也不認得那保護我的石星。他一知道我在南京，便防着爲我受累。」

這樣的情景足足過了半句鐘，他却不敢拿出不客氣的手段。末了，他怕同僚知道利公來訪，便教利公回去。利公又說：

「他請我原諒他剛才那樣對付我，又勸我離開南京回去，說除了這裏，別的地方他都可以幫助我。」

接着，利公又講那些當差的，見他待我這樣前恭後倨，都覺得驚惶失措，莫明其妙。那位同去的醫生，一見風色不對，便直奔回家。我也覺後十分懊喪，回到了客寓裏，只見那裏已出了一亂子啦。因為徐大人已命差役們來傳店主人到衙門裏去究問了，差役們正在向店主勒索敲詐，我只得向他說明一切，教他放心前去。可是他受審回來，給我們細細講過堂的情形，說問官誣他私通外國，要把他拖下打板子，逼他招供；隨後，又叫過一個舉慶出身的書吏，問他關於我的情形，好像從來沒有看見過我一般。這個僱員便供稱七八年前，舉慶官廳因為我有嫌疑，曾把我驅逐過。徐大人聽了這話，越發有氣了，便把他的腔調再提得高一點，使勁喊着，說他必須查辦。不幸的店主人，還在渾身發抖；徐大人於是逼他把我送到廣州，他回來的時候，必須領得江西官府的憑証才准銷案。這苦小子，只得訴窮說苦，求開恩，說他不能丟下了他的生意。他於是不得不當堂具結，說他必定要阻止我，不讓我到浙江，——因為我會說過要到那裏——還答應僱一艘船，逼我立刻到江西。明天他必須帶回一張憑証來，証明船到了甚麼地方。」

利公講述這件事情，却用以下絕不表示怨恨的話作結束。他說：「神父，你看，這似乎便是我們和這位大官僚交好的下場；從此，我們便明白他們的話和他們的諾言，是不大可靠的。如果一個被認為有道德當作聖人一般看待的大官僚，只因他對其他的官員有些害怕，便不惜這樣對付我，那麼，其他權力比較微弱，心術却更敗壞的官僚們所有的手段，也就可想而知啦。這個人向來被認為極有榮譽的，我也相信他所說的話，說他這一切的辦法是爲了我的好處，可是在我一方面，這便是我所有的志願，要在這裏居住，情願被捕下監獄，不情願離開這城市啊。」

這當兒，利公的朋友們，尤其是利公向他們誇耀過和徐大人很要好的，那秀才父子倆，便對他說起那鴻臚寺的毛病來了。他們說：「大家認他是清官，這果真不錯；可是他雖則在家裏慳吝得像窮人一樣過活，却懷着唯一的志願，就是想升官。所以利公去拜望他，正是做錯了，如今最好不去理會他的判決，且在南京或在南京附近，秘密住下再說。」這些勸慰利公的人們，一壁講着這位大人物的慳吝，一壁爲了利公的不幸，竟掉下淚來啦。但在利公看來，這回他要在南京住下，似乎不合吾主的聖意。因此，利公一方面爲避免受法律制裁，永遠閉塞了他的歸路，另一方面，爲擺脫那逆旅主人以及他担着驚憂的家屬和他纏繞起計，便照天主的聖意，決計不往浙江而退歸江西。他在那裏，依舊可以和南京的朋友們通信往來，同時，也可以和在澳門的教會當局，韶州的郭居靜司鐸繼續函商進行的方畧。

六月十七日，利公心裏十分悵惘，身上又發着小寒熱，只得又下船，「重新開始航行，不但逆着江流，抑且逆着他的心願。」（註三十三）但將到南昌的時候，却蒙吾主賜以安慰，這種安慰，在他看來，確是出於一種天上的措施。

他雖則已經識透了中國人心的變幻莫測，却還不知道怎樣去適應着「這種紆迴曲折的思想和願欲，這和歐洲人直捷了當的理解，原是大不相同的。」而且他所採的步驟，不曾細加斟酌，以致他事業的成功受了妨礙。現在，他才信服了，明白自己應該用一種柔韌不懈的堅忍，心來代替那種剛強堅決的意志，抑制他西方人的躁急性，不再說「我要」而說「我願」了；懂得等待、轉彎、計較，來抓住他所渴求着而逃避他的人了。因此，他不得不挫鈍着他從歐洲教育得來的剛強的意志。（註三十四）他歸來時，恰遇着北風，所以他一帆風順，只過得七八天，便在六月二十八以前，到了鄱陽湖的入口了。這當兒，却轉了南風，他就怕過湖要損失三五天的光陰，不免有些納悶。便在這些不如意的環境下，發生了一件事

情。這件事情我們有兩篇記載，雖則前後相去有十五年之久，可是內容是相符的。（註三十五）那時，他正心想着以後怎樣進行，想了整整一天，便睡下了。便在這樣似睡非睡中，他夢見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一路走，一路對他說道：「你在這個國境裏，這樣飄泊往來，不是有計劃要把舊宗教推翻，給他傳一個新宗教嗎？」這時候，利公原曾處處留心，從沒有對誰說起過他有傳揚我教聖道的心意，所以他就對那人說：「你既然知道我的心，你必然是神，否則你便是魔！」那人說：「我不是魔，却是神。」利公於是，是很溫恭地俯伏在他脚下，好像遇到了那正要尋覓，好向一灑傷心之淚的人一般。說：「主啊，你既然知道我的心願，爲甚至今還沒有援助我呢？」說着，又伏在他腳跟前，哀哀痛哭起來了。吾主就安慰他，對他說：「你一直去，到這個城裏，我要在王廷中援助你。」這時候，利公以爲夢中所指示的那座城是北京，可是他後來從北京回來，重進南京，城正和那時所見的情景相符合。他醒來的時候，眼淚還盈眶濕睫，便對他的伴侶多明我講出這個夢境。這當兒，多明我也因這種種的逆境，而莫名愛憤，所以利公講給他聽，好教他獲得安慰，因爲在他看來，這決不是一個平常的夢。」在中國官僚人力扶持失了效用以後，利公却獲得了天主上智的佑助，到南昌去發展了。

第二章 人文薈萃的南昌

利瑪竇司鐸既不能在南京住下，又不能前往浙江，所以他惟有禱智竭慮，努力設法在南昌立住脚跟，免得被人迫逐。回到韶州，或仍僑促於廣東省境。他對於江西省內的情形，雖則寡聞淺見，却已估量到這地方和廣東大不相同，兩省比較，便覺廣東文化低落，民不知禮，不難一看便知。「葡萄牙人所有述及中國情形的記載，如果確有許多不愉快的回憶，說中國人舉動粗魯，不講禮義，我們便該明白，這些話普遍講來，那真是大謬不然！須知這種情形，惟有在那時候的廣東省，或是其他文化落後的省份，或者是如此。」（註一）

而且那時候，似乎一種持續不絕的有利的環境，已足為利公得慶成功的先兆了。且不說那使他獲得甚大欣慰的奇夢，他沒有進鄱陽湖的時候，還因轉了南風而擔憂，怕過湖要有三五天耽擱，如今進了湖，又起了一陣好風，因此，他一帆風順，便得半程抵一程，於六月二十八日平安抵埠，因而下一天，他得遂其心願，舉行慶祝聖伯多祿聖保祿兩位宗徒的彌撒典禮，這便是他所要奉作他新建設的主保的。（註二）此外，他在船上時，又認得了江西總督署裡的一個職員，這人是督署裡的一個小吏，為人很和氣，在城裡熟人很多。他聽利公說起自己身體疲乏，又害着寒熱，不得不將息幾天，畧加調理，便向利公表示欣幸，還請他寄寓在一個朋友租賃的廬所裡。利公就依着他定奪了：這却是很有幸的，因為後來他去訪問一個韶州舊官員，說來說去，總不敢給他設法幫忙。（註三）可是這位和氣的介紹人，一上岸，就去給他預備住處，又在碼頭上給他僱下了一乘轎子，帶了全部行李進城，到城門上誰都不問他，要查驗護照。所以利公後來曾說：「我走進這座城，正

和我所希望的一般，由吾主爲我引導。」又說：「如果起先有了甚麼困難，結果總是轉禍爲福。」（註四）

這位，他決計緩進，不像在南京時候一樣，急急去和外界往來了。他在居停家裡整頓伏着，調治那「輕傷風，使他在床上起不來。」（註五）他寄寓的地方極便辦事，是在城中心，官僚們居住的區域。再則，他的夥伴多明我也不能多多幫他去。我幾個可以援助他的有力人物，所以他過了差不多一個月光景，沒有出去交際找朋友，只得留心暗暗裡去探聽本城的種種事情，和一切詳細情形，把自己托付給天主；同時他只結識了幾個人，和他們做朋友。（註六）瞿太素和石星這兩人的確沒有騙了他。（註七）

南昌這地方和那對外國人有疑忌的濱海地帶相距遼遠，他的位置是在肥沃可喜的平原中，要比韶州一帶適合衛生。他「比弗勞倫斯大兩倍，」在那磚土造成的城垣裡面，有許多廣大的空地，這些空地用以建堂立院，還可以開鑿兩三個池沼。有許多宅第園囿已頹廢了。城裡有人居住的部份，割成區域，到了夜裡，便把柵門關閉，還有守夜的更夫週行巡視着。商業行市都在城外發展，城市的中心區域，有一種率真誠篤，可以代表當地民風的人民居住着；那裡，節孝牌坊和鄉賢先達的碑誌多得難以勝計，可說已無再建餘地。一般人注重忠孝之道，是著名孜孜不倦，力求爲人正直的人民。有些人相信靈魂不滅，因而敬拜神像，其中有許多是吃長素的，也有些人，不願身後禍福，只講究齊家治國的學問。除了手藝人和勞力的不計外，我們可以把他們區別成爲四類，這些都是上流人物。（註八）（一）本省和本府的官吏，如總督、布政司、按察司、知府、知縣等，（二）前會居官受職的縉紳，或是現任文武的親屬，這班人很受地方長官的尊敬，尤其是南昌出了做過宰相的「關老」以後是這樣，（三）皇族，支系極繁，佔着全部居民四分之一，其中有兩三個受封着「王」的尊號，（四）著名

三學出身的生員，人數極多，他們的勢力，却比別處小，其中有七八名，於一五九五年北京會試後，中了進士，同時廣東全省却只中了五六個舉人，這一點便足以把江西列入中國文化最發達的省份了。

利公本人，雖則一點不知道，這蒙主特選的人民，却早已聽人說起過他的大名了。他在韶州時候的老門生翟太素，利公會說我不知道怎樣才够答謝他爲我所做的好事情——會把他的女兒嫁給南昌一位王爺的十三歲兒子，因着這親戚關係，得和一般有名人物相往來，便逢人告訴，說曾遇到了一個德學超羣，住在廣東境內的外國人。（註九）所以根基已經打好了，不過利公一方面的人，還沒有知道罷咧。

似乎利公因着和那做醫生的王繼樓相會以後，過了幾天，才想由他介紹，漸漸踏進這個社會。這位王先生做人和氣至極，家世也很好，「是本城第一名醫」，生平喜歡結交朋友，邀客宴飲。利公去拜訪他的時候，也依照拜客的禮儀，使一個七八頁的全東帖，敘述他怎樣和石尙書相交共游的經過，又附了幾件西洋物品，作爲進見的禮儀。他這樣做法就够啦，因爲這位名醫，原已聽得太素稱道過利公，不想此番利公竟特來過訪，可見自己的名望真不小，便覺得意非凡。（註十）一切的經過極圓滿，利公按自己的經驗，知道和中國人往來，當着衆人不宜太謙卑，外表上必須保持着高尚的形式，所以他教僕人們穿了長衫，自己也穿着緞袍，戴着讀書人的東坡巾；他的鬚髮，在韶州時候已留長了，足使那在下領上，慣常只有七八根鬚髮的中國人「見了嘖嘖稱奇。如今王繼樓邂逅了一個熟習中國禮節，熟讀中國詩書的外國人，真覺得多麼高興啊！當下，他就安排下一席盛筵來答禮，又請了兩位皇族來陪客，請利公坐了首席，把他「當作從極遠方來」的貴客看待，席間各樣的肴饌都放在前面，盤裡的水果，像金字塔一樣堆起來，誰也不再用於僧道的名稱，來稱呼利公了，却只

用文士的稱呼。（註十一）而且過了幾時，大家發見他學問的淵博，不但擅長曆算，應用毫無疑難，亦且通曉六經，於是那些欽佩他的人，便斷定他堪當進士頭銜而無愧。

多虧王繼樓在外揄揚，利公的聲名就一天比一天大起來啦，他所有當場想起或是一看就記得偉大記憶力的天賦奇才，使在座諸人個個驚奇不置。（註十二）在中國文壇中，這種天才，不能不加以無上的尊重，因為中國讀書人的主要功夫是熟讀，背得出的書越多越好。有一個儒士這一年正擔任着一種要職（註十三）便給利公介紹和他的兩個親戚相見。這兩個也是讀書人，利公認識了他們以後，便可以去訪問其他的官僚，或是皇室的親族。此外，還有一個曾在韶州做過官，是利公的好朋友；他自願給利公設法去接近幾個重要人物，但這些要人都怕為這個外國人受累，一個也不肯幫忙。後來，還是那位王醫士開了端。那天，利公放大了胆，很謹慎地向他表示自己的心願，要在南昌城裡居住，他本來想利公肯久住，那是再好沒有了，却以為他是不肯的，所以他聽了利公的話簡直有些不信，以為自己聽差了。利公爲了要用一種似是而非的明智的障翳，來掩飾他的預定方針起見，托辭接到了石尙書來信，勸他在南昌住下，不教他回廣東，去住在那不合衛生的韶州。南昌城裡，提起這位大人物，那個不知曉，再則，利公護照上有石尙書的名字，必然更容易教王先生相信。（註十四）

利公和王繼樓暫相睽違，是不是爲了這在表面上似乎口不應心的話呢？不論無非是因利公誤信了一個朋友（韶州縣吏）的話，（註十五）以爲住在城外一間市房裡，晦迹隱居，蟄伏不出，要比較穩當一點，這地方是由一個和利公熟識，住在附近的秀才給他安排下的，却沒有得到官廳的許可。可是利公便是住在那裡，也曾說（註十六）「因着我不時

進城訪友，而燃燒起來的火燄已一天大似一天啦。到這幽僻的地方來看我的人真多，以致我竟沒有功夫處理私事，還有些人要找我却找不着，那存心不良的，便去散佈流言，說有一個外國人到城裡來，辦幾件重要事情。這些話被一個官聽到了，便去稟告總督（陸仲鶴，寧波人）（註十七）要是沒有王繼樓和一位「不但在本省，便是全國也有名」的大人物出面闢謠，極有效力，那麼，事情也許要弄得很糟咧。」

這位大人物在我們歐洲方面的文件中，叫他 Chan Tencrim（章斗津）說他主持着一個書院，在這書院裡讀書的約有一千人，他們專講着道學，彼此互相砥礪，要在誠樸的外觀下，度着有規律的生活。（註十八）他曾聽瞿太素「以誇大的言辭」詭稱耶穌會諸鐸的教學法，說他們院中人士「讀書的方法，比中國不同，進步也較爲迅捷」至於他們的品行，便是在他們那裡做僕役的，也要比誰都好一點。（註十九）所以這位儒宗泰斗的道學老先生，知道了這些事情，雖則和利公素昧生平，却給王繼樓送去了一封手簡，說明利公之爲人，繼樓對於官場人物沒有一個不熟悉，便把這事原委告知了總督，和當地各長官。

利公接着又講：「然而總督雖則已聽人一再道及我的爲人，對於這「外國人」的才學品性，揣度得很明白，這件事却不肯置之不問，所以他做得似乎一切都不知道模樣，便命督署武巡捕四首領中之一，着他查明我的住處，調查關於我的各種情形，要他一天就繳令回稟；同時，却吩咐他不得對我採用任何非禮的辦法。事實上，這個警官不知有甚麼事情阻止他，不曾親來看我，只教一個差役拿了他拜客的名帖來，請我前去訪他。」

「只聽到了這麼一句查案的話，那些以前待我很不差的人，就個個都反了臉啦，那房主人和隣居們都嚇得要死了，

將近天黑的時候，竟要把我連我的行李，一齊揮出門外，讓我在街上過夜啦。但我已從王繼樓那裡得悉總督的秘密意旨了，所以我放大了胆，和那些人理論，誰也不敢把我驅逐出屋。第二天，我去見那警官，他接待我非常客氣，見我竟像見總督一般。他把我的話記錄下來；我給他解釋說，我到了以後，所以沒有去謁見列位長官的緣故，是因我害了重傷風，至今還沒有痊愈，他很客氣地回說，要把我的聲明轉稟總督，還要盡他的權力來幫助我。後來，他和王繼樓商議之後，便約三個同僚，同來答訪，好教大家放心。過不多時，王繼樓便在自己家裡給我預備一所院子，讓我暫住（這屋子有一間客廳，三間房間）等我自己找到了廝所再搬。

「這當兒，總督得到了報告，便和王繼樓商量，隨即命人召我，一天去見他。我想這回應召前往，究竟是吉是凶，很難說定。我去的時候，還有些放心不下，所以我先預備好，要盡我的能力，脫離他們的掌握；怎樣請他原諒我，在這城住了這麼許久。我走進那花廳的時候，總督正在那裡坐着，他一見我，便站起來向我拱手。我照例跪下跪，他却命我起來，這樣的待遇，已是大有體面了。隨後，他叫我站近一點，聽我講解，我們所教的道德學理，以及算術和各種日晷儀的製造法等，約講了半句鐘光景。他隨聽隨問，又說了許多稱讚的話，使我覺得很難為情。他說：「但看你的容貌，見了你的人，就猜得出你是好人啦。大家知道你在中國，是專門為人民謀福利的，中國書你也都讀得很好了。」

「這些話，我聽得好像出了神，只見這件事，遠過了我所希望的一切，便想我自親了一個聖蹟啊！我心裡覺得我不應當受這許多的稱頌，但爲了吾主福音的光榮，我就因此滿懷欣慰，心想天主上智按着時候，加以黜辱，與以舉揚；「不論光榮和耻辱，榮譽和卑污，但願一切光榮都歸於天主。」我不免驚惶失措，只得漲紅了臉，再三說「不堪當，不堪當。」這就使

總督所有對於我的事情的意見，獲得了証實。

「接着，我們的談話轉到我和石星同來這件事上了。我的答覆，恰和總督所訪問的情形相符合。他又問我在南京遇見些甚麼人，我便告訴他會見過徐大人，却把那幾個他所不喜的人畧過不提。有人給他講起過那威尼斯水晶製的三稜鏡，所以他表示願意見識一下。我就拿出來給他賞鑒，他見了那斜視時，所有美觀的彩虹，不禁大為讚歎，便命人拿進去，讓他的眷屬欣賞一下。我要把這東西奉贈他，他就謝却，免得惹人議論。他也要我給他製造一個日晷，一個測星器。講到視覺記憶術，他便要求我給他三個公子寫出一篇說明書，因為他們照規矩，是不能出衙門的。最後，他歸結到這幾句話，問道：「那麼，為甚你不住在我們這很高尚的城裡呢？」我就回說：「我在廣東省總是很不合式，我有兩個同伴，都已在韶州得病死了，因此，我才出走。如蒙大人允准，我願意住在這裡。不准，我就回到那裡。」他說：「那麼，你在這裡住下吧。」這便是最後的一句話；這一次的會談是值得記念的。我們談到這裡，王繼樓便進來了，又把我所說的一切，再度加以証實。」從今以後，利公可以抬起頭來在一切場合中出面了，他已正式踏進中國的高等社會了。（註二十）

利公此番晉謁總督，大概是一五九五年七月底或是八月初的事情。他見過總督之後，接着便到各衙門拜會布政，按察，提學，知府，知縣等，地方上各長官。他給府縣官說明他在這裡居住，已蒙督座當面核准。這些官長，非但不拒絕他，而且個個學着總督的樣，都很願和他相見，那些曾在廣東和利公相識的官吏，更當他老同鄉一般，歡迎他。也有許多人仰慕他的德學，和他做了新朋友。例如那位縣令，在縣署上房，不能出來和他相見時，就請利公到上房，款待他。這樣給他的體面，又和從前韶州知縣款待他的辦法不同。當然利公對那些再三幫助他，使他最後獲得成功的人，是不會忘記的。因此，利公先送

給王繼樓一份厚禮。繼樓受了這份禮，很覺過意不去，所以他以後遇有機會，總給利公竭力吹噓，使一般顯宦名士和利公訂交來往。利公左右，很想使總督收下那三稜玻璃，便托繼樓代爲奉上。但總督認這事易招物議，仍交那位居間轉致的醫師帶回，還講了一個寓意極深的故事。他說：「從前有一個聖人，有一塊價值很大的寶石，一天有一個名人來拜訪他，他便把這塊寶石獻上。這位名人立即奉還，說：『這塊寶石總是你的了；因爲這樣的寶石，必是素著盛德的人，你才肯送，苟無盛德，你是不肯送的；可是凡是堪稱有德的人，那是一定，決不肯受的。』總督的結語便說：『如今對於你的朋友利瑪竇的這塊寶石，我也是這樣說法。』（註二十一）於是利公只得盡心竭力，給他『用石板製成一具日晷，這日晷儀很大，很複雜，分列着十二時辰，所有時刻，都用中文表明。』（註二十二）

那繼着總督的款接而發動的交際，循環不絕地繼續了好久，以致利公和一班官場中人酬酢頻繁，竟連休養身體的時間都沒有。到了十一月四日，他還記着這種風潮還沒有中止。（註二十三）這在利公一方面，真可說混亂極了。他爲這種應酬所困擾，累得要倒下來了；他所得拜謁的名帖，堆積到七八包。他說：『若非我親眼目視，總不信竟能有這種事情；午前，總沒有空閒，可以吃飯；午後，往往要到黃昏，才能念日課經。物質上，我不能一一領受他們的盛情，可是我不能拒却他們的餽贈，也不能辭謝宴會的邀請，否則我就大失禮體了。因爲却贈辭宴，是不合禮的，便是富貴中人，也不肯這樣做法……那請我去吃一頓飯，或者請我到他家裡作竟日盤桓的人們，也許自認爲有幸的，因爲我往往一天要領受兩餐，無奈相邀的實在多了，我還不能做到一一領情，充分有禮的地步。這地方的人都認吃魚算不得克苦做補贖，所以每逢聖教齋期，我只吃些蔬菜，在封齋期間，雖則筵宴都在晚間舉行，我也必等到這很晚的時間，才吃一點東西。幸而我的胃口很好，要是稍

爲受一點苦，我總忍耐着！」（註二十四）

大家不難猜度，在這些臨時結識的一羣朋友中，總不免有陰謀詭計的壞人混雜其間。這時代中，南昌有幾千喜歡學道的人，常在山洞裡，或是在丹爐邊，徹夜守着，尋求把硃砂變成銀子的秘訣，因而弄得面黃肌瘦，形容憔悴了。他們以爲這個長鬚高鼻，特別是深目碧睛的外國人，「有看見地底裡的本領」，必然知道一種極神奇的秘訣！利公雖會竭力聲辯，說他並不知道這種秘訣的片言隻字，對於這些事情，「好比蠢驢彈琴」，完全門外，却總是徒費唇舌。大家只當他這些推却的話，正是他謙虛的憑據，越發要逼迫他，傳授這種秘訣的要旨。然而其他的人們，也有爲了較爲正經的動機，來找利公的。

在一般文人學士的心目中，那最使利公提高了身份的事情，便是他和那位書院院長章斗津（名潢）（註二十五）結識後的友誼。利公告訴我們，說這是一位出身某州的大儒（章氏爲蠡溪人，大概屬寧都州）因此，大家稱他「州博」。他的年紀已近七旬了。但他從不希冀高官顯爵；兩三年前，他原可入居台輔，却只以教誨正道，專務著述爲己任（他所著的書有三十餘種）。利公去拜訪他的時候，這位老先生，就請他以後要當他兄長看待；利公的事情，他也要當作自己的事情一般看待。後來，他不時到利公那裡去訪問，給他商定善策。一天，他對利公說：「你必須有勇氣，因爲你的苦處正多着咧。你的大名已通國皆知了，既然你懷着極高尚的宗旨，要在敝國傳揚你們的宗教，勢必要遇到許多困難，遭人反對。你要知道一切宗教，在未經中國人接受以前，都是這樣的。只須下功夫，會忍耐，你就能排除小小的障礙。結果，你就制勝了一切。」這位可敬老儒立下了表樣，他的許多門生（他所主持的是豫章書院，今已改立學校，當時約有生徒三百人）便步着他的後塵，信從利公的教義了。當時的辦法，是集合了九人或十人，成爲一小組，用講師的名義，每月七八次，由各組輪

流，分別前往兩處指定的地址開講來聽講的很不少。每當三年大比的時候，總要有幾千人去應試，那時來聽講的人便格外多了。這班道學講師，每以邀得利公來家爲榮，往往率領了妻子兒女們一齊款待他。

一天，（這事發生在八月二十九日以前）有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來見利公。利公請他就座首位，他却遜讓不肯就座。據利公的筆述，說他在談話中，說起他做過香山知縣（澳門一埠在行政上屬香山管轄）「我便站起來，再堅請他就上座，但他依然謙讓，執定不肯。他表示我從極遠方來，有失迎迓，很爲抱歉；接着，他稱頌我舉止高雅，又說我除却容貌，全不像外國人模樣。當下我去答拜他，他留我吃了一頓飯。」在這時期中，有四位進士，對利公的禮遇，勝於一韶州的幾個舉人。這四位進士，一位是知府，一位是侍郎，一位是布政司，一位是按察司。（註二十六）

利公在所有許多友好中，談話時使他感覺最深切興味的，要算那建安王多嬪了。（註二十七）（也許這建安王是瞿太素的親翁，他的媳婦，是太素的女兒。他曾再三請利公到他王府裏居住，但利公爲了免使一般普通訪客裹足不前，個人的自由行動受有拘束起見，始終婉詞謝却了。）利公和他初次會面是在王府中，因爲天潢貴胄，依禮是不宜出訪外人的。所以他使人邀請利公進府相見。他接見的時候，（約在八月二十九日以前）穿了王服，戴上了王冠，排場是極體面的。自從這回相見以後，「他們猶如同氣相求。」這位王爺却「更喜歡聽利公的議論。」他請利公就座，對他說了一篇恭維話，隨即談到身後禍福的大問題，彼此足足談了一句鐘，使他感到絕大愉快。他於是奉上一張名帖連拜帖，又奉贈了一柄由他手繪的扇子。到了有一天，他又設宴邀請利公，雖則不能親自奉陪，却命世子代作主人，宴罷，由世子親自陪送利公回廬。翌日，利公送去了一塊三稜晶和一幀繪得極精緻的聖母像。建安王得了這幀聖像，便命府裏一位親屬臨摹了兩種

仿本，一種是紙本，一種是石刻，幾天就完事，「這兩種仿本都很逼真，要是拿到了印度，就可以混充葡萄牙人的手筆。」不多時，他又命人去請利公暢談各種歐洲科學，見了西洋的書籍、繪畫，以及曆算用的器具，大為讚歎。（註二十八）

又有一次，利公和他談論教理，手頭只有一幀聖老楞祖像，足供講述，便把這幀小聖像贈送給他。（註二十九）這是一幀畫在紫銅片上，很美麗的油畫像，是由省會長巴範濟司鐸從日本寄來的。建安王得了這幀聖像，高興極了，便命人立刻配上一個象牙和紫檀做成的鏡框子，四周鑲嵌着許多翡翠，還加上了金銀的飾品。這樣裝飾了之後，他就辦下了幾樣佳飾，命人送到利公那裏，順便把這鏡框帶去，請他賞鑒。他雖則貴為藩王，未便自居利公門下，却有一天，他曾表示心意，說他與利公的交誼，至少是在「師友之間」，這就是說，「就有道而正焉」的意思，所以他見了利公就稱他一聲「老師」，他待利公非常親熱，使見者個個稱奇，有兩次宴會，由建安王親自奉陪，送客的時候，又替利公開發轎錢，並犒賞隨從僕役。所用桌椅，下至碗盞器皿，都飾着皇室的龍徽，「和我國帝皇的鷹徽一般」或者「和法國皇家的「梨」(Lys)花一般。」

這種真正密切的交誼是以相互的敬重為基礎的，利公每喜歡說：（註三十）「他離天主國不遠啦，即使我不是只爲了他才來，據我看來，我一切的工作，似乎都已獲得報酬了。」利公又於十一月四日記着道：「我剛送給他一個日晷儀，一個用中國字註明的地球儀，一個用以量角度的四分弧，他一看見就加讚歎，隨命人把日晷儀拿去放在他新邸的花園裏。（註三十一）又親自陪我到那裏，陪我同走了足有一里路。他命人用紅石頭鑿成了一個座子；我們於是把日晷儀放端正了。隨後，他又送給我一宗禮物。他的進益雖然不很豐厚，他在社會上的地位却很高啦。他的花園裏造着一座亭子，登亭遠眺，周圍一里以內的景物，如高廳大廈，池沼，林泉，丘陵，園囿，以及種種幽雅悅目的景物，都可以一覽無餘。」這些情形，

正所以表示着一種友誼的開端；這種友誼以後還要亘久不絕，直到他去世時（一六〇一年）依然並不衰替，便是他去世以後，他的世子，也能繼承他的遺志。（註三十二）

他和利公訂交以後，不久，其他兩位藩王之一（註三十三）的樂安王，也來求納交於利公了。無疑地，這是爲一種好勝心所驅使，他和利公的交誼，不及建安王誠篤，也不能一樣持久，但初交時候的情意殷勤，却是令人心感的。這位樂安王也和建安王一般，使人邀請利公到府謁見，接見時，也穿着王服，戴上王冠。隨後，他餽贈利公兩疋很美麗的彩緞，和一雙刺繡很工細的絲履。後來他刊印了一本書，書面上刻着一幅畫，表示他和利公論道時的情狀，有幾棵樹和其他美麗的東西做背景；書的內容是用典麗的文詞，敘述當時所有以道德問題爲目的的談話。利公爲表示答謝起見，便也送給他一部書，書面上飾着幾幀聖像，又寫了幾句勸人修德的格言。

利公教人認識自己的機會正多着呢。他又講述道：（註三十四）「一天，在秀才們聚餐時，我想我對於記憶中國文字的就地記憶法，曾經多次實驗，不妨趁此機會賣弄我這一點本領，因爲我知道這些事情爲奉事天主，光榮天主，是很重要的。我於時教人找了一張紙，接連寫上了許多意義不相聯貫的字句，我只念過一遍，就讀熟了背得出來。在座諸人見我有這種本領，都非常驚異。我順背了不算，還倒背全文，使他們越發駭異。他們更驚奇得了不得，簡直有些目瞪口呆，舌撻不下。大家於是央求我教給他們這種真正神奇的記憶秘訣。我的名譽弄得大極了，甚至每天有秀才們和其他循規蹈矩的人來請教我，要求我收他們做學生。他們竟要照拜老師的規例行禮，送贊儀，但我答覆他們，說我不願受酬，又說我不能爲他們畧効微勞，實覺十分抱歉，因爲我沒有固定的住所，又沒有同伴，這屋子很不方便，我和人來往又極忙。後來，我再設法

使他們滿意。事實上，這記中國文字的就地記憶法似乎成了一種正式新發明，因為中國字原是一種象形的標記。總督聽人講起這件事，就向我的朋友王繼樓醫師探問，後來又和我討論這種記憶法。」

十月二十八日，利公將來訪的各等賓客，重加區別，分作五類：（一）知道來了一個長髮修髯，識得中國文字，懂得中國人規矩禮體的外國人，有心要見識一下；（二）一般尋求丹訣的方士；（三）把他認作「潛刀來美第二」的科學贊助人；（四）有許多人是志尋求立身處世的大道；（五）要學就地記憶法的好奇者。（註三十五）其中真正有志究問身後大事的人，比較少一點，但來訪的，多少總能獲得神益而去。

利公和這些特別的賓客相周旋，處境的艱苦，在所不免，也就可想而知。十八世紀的一位傳教士洪若翰司鐸曾說：（註三十七）在中國傳教，必須「克制天生的性情和傾向，這真正是聖人們所教訓我們的克苦功夫……歐洲人的天性總是活潑，好動，富有熱情，喜歡急進的……他一到中國，就得澈底改變一下，立定主意，要一輩子溫和愉快，諸事忍耐，而又待人接物，必恭必敬；凡是前來相訪的人，必須依禮接待，對他們表示，「得見尊顏深為欣幸」，來客講話的時候，必須耐心，「洗耳恭聽」，始終不懈，對他們講明緣由，必須婉轉陳說，不得高聲，也不得指手劃腳，作出種種姿勢。凡在中國傳教的教士，要是有人見他性情粗魯難近，他就立下了一個令人詫異的壞榜樣。他要是鹵莽忿激，那就更壞了，他手下的僕人們，先要看輕他，背後議論他，說他不好。」

這當兒，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件事本身細微不足道，却使那位道學老先生章斗津嬰然起敬，而且以後每遇機緣，向人道及此事，總必極口揄揚利公的盛德。從前有一個傳教士曾記載過（註三十八）說：「有許多辭令，在別的地方要認為

近乎欺騙，虛妄，文飾，可是在中國却是不足為奇，中國人對於這一類談話的辭令，彼此都不認真，大家都知道有些話必須當真，有些可以隨便說說。假使有人要在外表的行為上，擺出率真誠篤的憑據，不論大小事情都要一點一畫，不爽分毫，那麼，他行得不多時，就要惹動是非，引起糾葛，不免弄得到處碰壁。所以中國人爲避免這種禍端起見，從小就練就提防謹慎的本領，會作推托躲避，却不至得罪人的答覆……他用隱約吞吐的辭令，來掩護自身，正如那墨魚吐出墨汁來躲避自己的仇敵一般。然而利公作事，却不肯這樣做法。「一天，他因爲來訪的賓客絡繹不絕，覺得很不舒服」（註三十九）那位書院院長章斗津便勸他有幾次不如擋駕，回說「不在家。」利公却說這種辦法，在一個專務修德的人是使不得的，何況這是誑話呢。章氏聽了，就微微一笑；在他看來以爲這樣推托的話，原是問心無愧，也不是供人指摘的。利公於是給他詳細解說一番，說我們歐洲人切忌說誑，不但那擾人的人，怕說誑，便是那爲了免傷和氣，或者和人開頑笑的人，也怕說誑。這不但是修道人和一般專心一志，勉爲完人的人們所有的慣例，便是世俗中人和一般正人君子也是如此……這位道學老先生聽了，便覺非常詫異，所以以後他便把這事當作一種奇聞，逢人告訴，稱道不絕。因此，利公便得到不論大小事情，常說真話，和永遠不得罪人的令聞嘉譽；我們講道傳教，大家也就容易相信了。」這當兒也未嘗沒有人秘密查訪教士們的品行和風紀，教士們却因此出了操守無虧的聲名，「好比玫瑰花朶，雖則經過許多人手觸指染，却仍不失其芬芳。」（註四十）

以前，利公所身受的，無非是輕蔑，所領畧的，無非是恥辱罷了，如今却受人非常的景仰，起先未免有些驚訝，繼而怡然大樂。目前的計劃，惟在怎樣使他所掙得的地位趨於穩固就是。他曾於十月二十四日記着道：（註四十一）「要是天主

喜歡，但願這光景，不是虛聲多而實益少。假使我們能在這裏站得住，就不難在一年中，獲得比在廣東十二年所得更大的效果。這是一個穩健的都市，坐落在肥饒區域的中心，遠離着那一濱海的「邊區」，那裏我們勢必受人猜疑。」

在這倭寇猖狂，警報頻傳的時代，這後述的一點，確是極關重要。只因怕受嫌疑，所以利公雖得瞿太素從蘇州來書相邀，還肯親來帶領，却不得不暫時謝却太素的雅愛。利公會記（註四十二）「據我看來，此刻還該以在此立院居住為得計，以後我們仍可前往，那地方和這裏相距，不過半月行程罷了。」同時，陸總督也曾說過可以帶利公到沿海的寧波，再從寧波到北京，但利公也因這種緣由，對於總督的美意，更不敢貿然領受了。（註四十三）

然而為謀鞏固現有地位起見，自不得不有所決定。因此，八月二十六日，利公便托王繼樓居間，轉請總督核准發給一張護照，好教給他作伴的一位司鐸，和名為他的弟子的一位修士同來。（註四十四）他和上峯澳門孟三德院長商妥之後，便召蘇如望司鐸到了南昌——他想進中國內地，已等了四五年。同時，羅如望司鐸又奉派到了韶州，給郭居靜作伴。此外還有一件事，看來實現比較困難，這便是要求官廳發給一張准他們住在南昌的准狀。這張准狀沒有到手，利公只得暫且租賃了一座房屋，把救世主聖像供起來。再則經濟的來源，依然很不可靠，這一點必須由孟三德司鐸和范禮安會長商討一下。那應從摩拉加關稅項下撥付的年款，不能按期支付。這宗款項，即使以前足敷教士四人的生活費用，現在添了兩位耶穌會士，又多了一所住院，兩處住院中，須維持共計十人，以至十二人的生活，那就完全不夠開支啦。（註四十五）

這種種的計劃中，要算那第一步計劃辦得最迅捷了。蘇如望大概是在十一月四日從澳門動身，十二月二十四日聖誕夜，便已到了南昌，路過韶州就帶了黃明沙修士同來。（註四十六）籌指經費這件事，却是頗不容易呢。孟三德院長至

多能籌集一筆過年必不可少的款項，再加上五十元租屋費。至於教士們僑居內地要求官廳頒發正式核准文憑，這件事簡直辦不到；因為那時發生了意外的障礙。利公記述道：（註四十七）「我們想在這裏，建立住院，起先看來容易，以後，却因有人從中作梗，散佈流言，淆惑人心，就有種種困難了，但我們仍能獲得勝利。」蘇如望到了以後，外間又微有議論。（註四十八）另一方面，一般因渴求丹訣，見拒而失望，又受利公斥責的人，便想王繼樓所以和利公這樣要好，無非是因求得了這種仙術的秘方所致。當時，利公決計做了一紙呈文，帶去謁見總督，請求准予立院久居，又附呈日晷儀、地球儀、量角器各一具，再加上幾件東西作為禮物。總督看了這些東西很滿意，便批交南昌府核辦。這位王知府和總督同鄉，是個一好好先生，一十分胆小怕事，不願招麻煩。他起先想把利公等送到這座廟裏居住。利公極力反對，知府就不肯發給准狀；這一下，就够「使圍城人頓時翻了臉，對這些新來的，羣起攻擊咧。」利公於是不得不再去見總督，順便帶去了一篇供諸公子研習的，講論就地記憶法的漢譯論文，這串頸項圈（這是用海馬齒製成顆粒，用線穿好的，因為總督害着這種病症，帶上這項圈，是可以療治的。）此外，還有一具「計時器」，是一種測量高低的日晷儀，夜間用此，窺測北斗星，可以知道時辰。總督問明來意，收了這些東西，便向利公道謝，許即傳諭知府妥當辦理；但利公提起准狀一事，總督就裁定不須發給文憑。利公回後，又製成了兩具日晷儀，一具供本省，一具供寧波應用，雖然出於急就，却值許多銀子。這回他帶了這兩個日晷儀逕去見知府。知府一齊收下，却差人送去大宗銀兩，數目超過這兩具日晷儀的價值。利公只得拜領，因為照中國人的規矩，「長者賜，不敢辭，所以必須領受，否則要被入目為無禮。」利公記述這件事，還用這些話作結束（註四十九）「經驗證明凡是曾經給過我們書面許可的官長，後來都不免惴惴恐懼，好像他們肩上担負着一副重擔一樣，一有危險，或者只怕有危險

時，他們先要設法擺脫這干係。實在，這種取禍的文件，還是不去要求爲妙。這樣，官府可以照顧我們，不致冒着多大危險。至於我們一方面的人，如果執定要這種文件，這就表明我們懷着一種不應有的恐懼因爲如今既然已經和中國人同化了，辦起事來，就比以前穩當啦。」

利公一朝了解自己所處的地位，雖則還不十分確定，却已非常有利之後，便着手尋訪相當房屋，預備租賃。但利公以爲與其租賃一座較大屋院，訂約一年，還不如買一座，便是小一點也不妨。他看過了許多地方，便找到了一處索價六十元的房屋。這屋子的地位很好，是在城裏府署附近。（註五十）這地方雖然不寬敞，利公却決定買下。事情辦得極迅速，又極秘密，講好房價，就付五十元買定，連四鄰都沒有得到風聲。一五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註五十一）利公就突然遷居入宅。教士們決定這樣辦法，辦得真不差，因爲鄰居人家，依例有權反對這宗買賣。事實上，鄰近住戶一知道這件事，便立刻到府署告訴。知府把他們打發回家，說：「這幾個外國人在中國已有二十年，從來沒有妨害過人。」據說皇族中也曾有人向巡按御史控告過，但究竟有沒有這件事情，却是無從証實。反之，這位巡按大人表示願見利公之後，利公便去晉謁，蒙他慫恿款接。再則利公買下了一座房屋之後，又去拜會本城各長官，分贈澳門寄來的尋常禮物，「數量却很細微，庶幾以後，不至視爲定例，而有力不從心之恨。」（註五十二）因此一五九六年十月十三日，利公所發的書信中，可以說得以前的安和，似已回復。（註五十三）教士們此刻已非昔比，不復如在韶州時侷促一隅，株守彈丸之地，却已在一個月中，向前猛進了，多虧利公在這文人薈萃的南昌，設法建立了傳教新根據地，我們才獲親本會四位司鐸和兩位修士，在中國境內分兩處常駐着。

第三章 西學堂

南昌省會和四郊一帶，尤其是那鄱陽湖畔的廬山，的確是山川鍾秀之區，堪稱中國文教之邦。

依實際講，歐洲人所謂人文主義，不只是精神和靈魂的培養，其結果在使人於希臘和拉丁文學有深切的研究，且使於研究時發生興味。人文主義的要旨，是在使文教得乎一切專門教育之上，因為這種文教規定我們活動應有的趨向，以實現人生理想的典型。不論是義國人，或是中國人，不問貧富智愚一個人只要能身體力行，漸漸做成一個更純全，更完善的人，他就更接近這伯拉圖哲學所昭示的理想境界；這種「理想」便是我們現在所謂人文主義。但這普遍的人文主義，所有的方式，也因時代而變遷：十六世紀中，中國人研究「倫理哲學」特別推崇王陽明的學說；南歐各國，却見那所謂「反革新的人文主義」盛極一時，歐洲人和中國人間，除了個性和民族性的歧異不計外，智識上和禮教上却有同氣相求的現象，因而造成了一種精神上的聯繫，既然彼此都是受過栽培的人，就不難成爲一家。利瑪竇神父發見了這種微妙的關係，就把中西文化聯合起來，這功績是不可泯的。他在廣東省內埋頭苦讀，和當地文人，尤其是瞿太素，切磋琢磨，致力於初步工作之後，如今便在這江西省會，南昌的「西學堂」中，開始這種溝通聯絡的偉業了。

「西學」這名稱，不是出於原有文件，這是我們依據教士們所著書籍的名稱而酌定的（註一）這個「堂」字，是當時用以代替「寺」字的（如澳門聖保祿教堂，曾稱三巴寺）除此以外，還用「堂」字用來表明天主教教會的大廈，不過取的意義，和在南昌採用這字時所有的命意，畧有不同。這裏我們要設法恢復他原來的字義。

利公初到南昌結識官場，籌備立院，忙得頭昏腦脹，忙了幾個月之後，才能把現狀向上峯陳報。澳門菲列濱和歐洲三方面的教會當局，接到了他的報告，大都意見紛歧，各持異議，他們據利公的話，說他已做了一「儒士」；這話固然說得很清楚，但究竟是那樣的儒士呢？因此這件事一出中國，就流行着許多謠言，大抵全是憑空臆度的話。

一六一七年中，有人記着道：（註二）「這裏我該把歐洲所有好幾個人的調言加以糾正，他們以為本會諸人，想在這個國家，獵取功名，考得舉人進士的頭銜，須知本會的文人，不是中國的儒士，却是歐洲的儒士，中國人對於讀書人，不管他們是屬於那一國，只要他們到一處便和這一處的讀書人一般舉動，照這地方的風俗，穿着衣服，就都覺得不惹厭。」作者為更求正確起見又說：「我講儒士不是說官僚（有如大家所相信的一般。）因為中國的官僚，在公共場所出動，排場要大得多；再則，凡是文官，的確都是讀書出身，可是讀書人，不是個個做官的。」

所以利公既非官僚，也不是中國的儒士，却是「泰西的儒士」。翟太素在南昌給他揄揚了好幾年，便用着這「西儒」的名義。我們讀了一五九六年五月十九日（萬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註三）太素寫給他的一封信，便可以知道是這樣。這封信上說：「僕與公道別時（一五九二年）曾為公言，公如欲一觀敵國風光則公宜自南前往北方，僕之家鄉（常熟）不足道，故都南京又紛擾不安，情形太錯雜，故鄙見以為公只宜居江西，蓋江西多文士，胸懷曠達，勤於修德，天賦甚佳，可以悟道也。不知公今所與，與僕之所言能盡相符否。七年前，僕道出南昌曾為諸當道述及吾公，言公之才德乃天下罕有，彼等咸極訝異，敝友「奚樂」（譯音）竟欲拋棄功名，不應鄉試，隨僕求見吾公，願聽驅策。僕悉伊母年老，故勸其繼續攻讀以備應試。去歲僕遇翰林院某君，渠聞公能算出點綫端厚薄等問題，不勝驚訝欽佩，公學術之精湛，歎

爲生平未遇。兵部（卽南京兵部某尙書）對公景仰日深，去年曾堅囑前來迎公，並陪送至北京，特是時僕無暇回南耳。今公至南昌，已與我儕相距匪遙，誠爲吾人意料所不及。（南京）同寅中：有聞人道及公之博學盛名者，咸願邀公枉顧。今年僕不能致力於新學，因集公所授之學而整齊之，爲之編纂成書，付印後，上諸太學，太學諸儒，無不欽佩之而讚許之，謂公誠當世「聖人」也。（註四）公所講解，竊嘗有所增益，誠恐不免乖謬：茲特遣价賚呈拙作，請公核閱：卽乞尊裁斧政。此間人士尤重先儒著述（河圖洛水八卦九疇，太極圖等）（註五）是皆使圖涵於一綫者，但公所授之學謂圖（圓周）之限在於綫，而圖乃得之於綫中：太極之理卽爲天主，是固遠勝於我國先儒所有斷章取義之種種解說矣。

這封書信，我們所知道的，只是一篇譯成拉丁文的譯文，其中抄寫的中國字，寫得很不準確。（註六）但我們可以藉此知道當時南昌的讀書人聽了太素的揄揚早就期待着這位西洋博學士的蒞止了。他們所期待於這位西儒的，不但是西洋的學術，還要請教他講解哲學和宗教道理咧。

可是利公却決計把他所奉的宗教暫且擱起不談。他只以「歐洲學說書庫」的資格和人相見，因此他先以「西洋學術」問世。在這一觀點上，中國的智識份子有些使他失望。以前他所居的「肇慶，韶州都在廣東境內」（註七）廣東和內地各省比較起來，算是野蠻不開化的省份，所以那時路過廣東的官僚，往往請我們到他們的家鄉去居住，他們給我們伸說種種理由，其中有一個理由，就是他們不忍見我們在粗魯無禮的蠻子中居住。如果我們要看看中國的文化禮教和光輝，我們就得離開這中華帝國的邊皮，深入他臟腑的腹地。」

聽到了這種切實確定的直言，利公自必和其他許多人一般，要等候着奇妙的遭遇咧。

後來歐爾德司鐸（P. du Holde）曾說：（註八）「我們試看中國許多藏書的樓閣，都是構造華美，陳設精緻，收藏的書籍非常豐富，全國各處都市中，學校林立，翰林進士之多實驚人，欽天監主持曆政悉心窺測，不厭求詳；再想一想，中國人以讀書爲求取功名的唯一途徑，高官厚祿全在讀書通達，中國四千年來的成法，惟有讀書人才能做各省各郡縣親民之官，朝中各衙門中的職位，也都由讀書人佔着；這樣看來，我們勢必要相信，中華民族在全世界各民族中，可算得是最有精神最有學問了。」

然而我們在中國到過的地方雖不多，不久却已覺悟了。中國人的確很有精神，這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但這種精神是不是扶發秘奧，洞燭隱微，精究高照的精神呢？我不說他們缺乏光明，和那深究事理的明智，因爲我們看見他們在別的事情上，是成功的，而研究這些事情，也和我們研究純理科學一般，必須有同樣的天才，再下一番深切的功夫，才能有所成就。只是這種種的學問，却有兩種原因，阻礙了他們的前進；第一原因，是國內外都沒有甚麼情境，可以刺激他們，引起他們的競爭進取心，因而研究進取的方法。第二原因，是有志進取的人即使能有所作爲，也不能希冀甚麼酬報。」

如今一般具有一種創作——也稍帶一點快僻——的精神，像翟太素這樣的人物，一朝獲見新開闢的道路，而專心一志追隨上道的，真不知有幾千人幾萬人咧！

利公有了一番經驗之後，便肯定的說：（註九）「我們不妨說研習的全是算學，中國人所知道的一點算學又是已經失却根據了，因爲他們估計惟有回子和供奉王庭的曆官，才把算學教給自己的子弟；他們究竟能不能預報日月蝕，很

是難說；他們的計算有不少錯誤。大家專究的是星象學，這是極不可靠的，也許竟然是完全謬妄的，他們不懂得物理學和形上學，也不知道論辯法。至於醫藥有一部主要的藥書叫「本草綱目」還有許多實驗的方案。民事法講得不詳細，判案趁問官高興。便是他們那麼講究的文學，也不過是一篇恭順而典麗的文章，和我們的古典文學，和修詞學相彷彿，却並不和引用論辯或是設問的修詞學相等。」

這些話是一種覺悟，在初來時受過了好奇的羣衆尤其是一班下級民衆，挪揄嘲弄之後，再經那性喜燒丹煉汞，怪僻近乎方士的上流人物，追求纏擾之後，（註十）利公便不憚煩地專和一班好學不倦的通儒碩彥相周旋了，他在南昌也和在肇慶時一樣，把那西洋的奇珍物品，陳列出來，供人參觀（註十一）還屢次把這些東西，借給幾個重要人物，拿回去仔細賞鑒，比方「那人稱「寶石」的三稜玻璃，那畫得極精美的聖母抱耶穌油畫像，封而裝釘有花紋，邊上鍍金的西洋書籍，這就叫他們知道我們西洋地方，也講文理，因為他們心目中以為我們沒有讀他們的書，却能做一個有學問的人，這是件極難相信的事。」

這小小的書室，本來似乎並沒多大的增添，在贛江中又翻過一次船，勢必反見減少了。羅明堅司鐸原曾答應寄送一部「羅馬史」和幾本建築學書來，但也許因為價值太昂所以沒有辦到。其他的朋友們也曾為利公的傳教機關供給精神的食糧，可是一路寄來中途的障礙有多少啊！英法或是荷蘭的海盜，常把船舶擄去；到了臥亞所寄的書又遭印度耶穌會當局截留，或者被澳門當局轉寄日本。那位各拉維司鐸仍和以前一樣，殷勤通訊，他的學術著作確是一種有無上價值的聲援（註十二）。那時在韶州的龍華民司鐸也向上峯要求書籍，尤其是須要（註十三）那譯成各國文字裝訂精美

的王家聖經，使教外人士憑着外表的華美，認定這些書籍內容的價值；此外還要聖教法典，聖師列傳，尤其是那十位聖教聖師的行實，因為在中國人看來，中國只有一個孔夫子是明師，歐洲的明師却有這麼多，他們知道了這件事，自必驚奇納罕。再則：歐洲還有絕對神學，和務實派神學，又有哲學：分自然哲學和倫理哲學。」

講到聖像，最受人尊重的是救世主像和天主的母親聖母像。他們稱之爲聖母娘娘。我們特別需要兩本那符爾司鐸所刊印的聖像書（註十四）：使我們可以有機會向儒士們說明我們來華立教的緣起。至於平民：我們需用幾種普通的小冊子附有許多圖像用以說明聖教奧理和天主十誡七罪宗七件聖事等，這是極有用處的，這些圖像不妨粗糙一點，不必精美，用不着藝術的作品，因為中國畫是不分陰陽面的：有一位官員見了一本講述救世主事蹟的小冊子，竟看得出神：我便說這是我們教中的書籍，不便相贈：却送給他一本「伊索寓言」（註十五）他欣然受下好像這是弗拉芒印刷術的精品一般。」

利公在南昌找不到像瞿太素這樣能自動研究算學學理的人，只有幾個對於學術有好奇心因而隨意究問的人。利公爲使他們滿意起見便製造了幾個日晷儀（註十六）題上些「流水光陰」類的警句，又製了地球儀（註十七）渾天儀（註十八）和量角器（註十九）。因此他於一五九七年，出示格拉維氏專論測量的著作，使人見了書中所有測量距離的數字而驚訝讚歎之後（註二十）他曾記着：

「我用石板（黑色）製造了一具日晷儀，每半格分着晝夜時辰，因為他們是用二十四格的，我又在上面註明日出日沒：這使他們極爲驚奇，因為他們從不曾見過太陽的出沒。隨後，我教人把這石板照樣刻好了，又刻上了耶穌的聖名和

兩篇短銘：在第一銘中，我趁着這機會，說明如果沒有太陽，縱有石板文辭種種雕刻，也必全歸無用，藉以表明苟不得神明佑助，使我們的好計劃發生效力，則雖有良法善教亦必勞而無功。我寫這一句是因他們讀書人以爲我們只靠着自己的本領，不肯承認天主是萬事萬物的首創者。另一銘我用「流水光陰，」一往者不可諫來者不可知」的典故來奉勸世人及時行善，勿慕虛榮。我們這樣做法，旨在使我們家裏一切事物，下至頑石都可以給我們傳佈真理。」

曆算的應用，引得許多人前來聽講（註二十一）。那時中國人還相信着天圓地方之說，連地反面的觀念都沒有。利公依據撥刀來美的學說相信諸天是質體，但中國人以爲天只有一層是液體（這就是說充滿着空氣）虛空的列星在空中行動。當時歐洲學者們認原質有四種，中國人却說有五種，除開空氣加上了金和木（註二十二）。太陽比桶底大些，夜裏並不躲在山背後；（註二十三）月蝕並不是因月正對着太陽而失光，也不是因爲月行到了太陽的空洞前面。一五九六年九月間曾有一次日蝕，這在幾個月前已由北京欽天監預先報告過了。到了那天照例發生了一陣援救日月的喧嘩鼓噪；但事前欽天監既然沒預言過甚麼休咎，這回的日蝕就比較不很重要，却仍有許多人作種種迷信猜度，所以利公不得不給他們解釋各處日蝕現象不同的緣故（註二十四）。以前那在華慶印就的世界輿圖，有許多地方錯誤不小，所以這回利公便着手校正由建安王付印，「依照西洋裝訂法，分作兩冊，又照西法刻版印在很堅韌很精美的日本紙上。上冊有宇宙概論，附亞歐非墨和麥才拉尼（即澳洲）五大洲輿圖，又有九天四原質，以及其他算學上的表說這是他們所從未聽聞的。」（註二十五）

利公自從做了一篇中國概論寄往歐洲以來，他的地理學識已增進不少了。（註二十六）一五九五年他離韶北上

沿路窺測太陽的方位，因此得將前人的錯誤逐步加以改正，他說：「有些人把北京的緯度定爲五十度，這是不對的，因爲我們現在這地方，是二十九度半，北京離這裏不過一個月路程，所以不會在四十度以外的，至於馬可孛羅遊記中的中國，據我看來，是出於最好根據，却是爲公共意見所最反對的臆度，竟看不出是中國。」（註二十七）

利公所享學術的盛名，在他自己看來，是過分得令人詫異的。他說：「他們以爲我是潑刀來美第二。假使這有人的世界縮小成爲中國，無疑地他們不妨稱我爲世界第一算學家和自然哲學家咧：他們以爲我是學識的奇人：這真教我好笑極了。」（註二十八）

便是應用的算術和一般科學，都不是南昌讀書人所喜的學業。那導人獲享富貴尊榮，居官授職的唯一康莊大道，便是研讀經史，法律，倫理學，做文章，這就是說一題到手，討論起來，要寫得端端正正，用的詞句要研練老當。讀書人循此途徑，便可以求取功名，成爲進士；一朝金榜題名，就踏進了尊榮的境界，金銀財帛垂手可得，因爲那時準能博個一官半職。這些人即使還在等官做，回到本省原籍，地方官對他們也很恭維。他們一家人的煩惱困苦，就此烟消雲散了；他們在本籍還可享受着好幾種特別權利。但這樣的榮光，對於那專心研究純理科學的人是沒有希望的；研究這種學業不是富貴尊榮的途徑。那麼，中國人忽視這些比較抽象的科學，也就不足爲奇了。」（註二十九）

利公對於這班志在應舉的生員，一再表演他背誦文章的本領（註三十）。他曾說：「人們都稱譽我過目不忘：一本書，我只讀得一遍，便記得了。」幾時我和文士們談論，先問他們研究那一經，然後同他們講論我所要証明的道理：他們於是互相詢問，說這麼一個人，怎能通六經呢？他們自己只讀通一經，也已很不容易了。」利公和人講論一番之後，便向客

告辭，說事忙不能奉陪，有時候答應收幾個人做門生，就此結束談話。他在祖國時，曾為某同會編著一本小冊子，此刻便利用這材料寫了一篇專講就地記憶和視覺記憶的論文，以供總督應用。有些人原以為這篇論說中必有甚麼秘訣，得了這秘訣，就可以不必再費絲毫心力；不料看了以後，大都感覺失望。但總督向利公道謝，却說得很有意思。他說：「這些規則，的確是記憶真法則，可是用起來却非有好記性不行。」後來有人欽佩利公的作品，便把他刊印成書，給他題名「西國記法」。（註三十一）

在利公看來這些作品還只是初步工作，所以他還該急急進行，從事於更高尙的撰著。無奈他自己絕不能刊印書籍，公諸當世；因為在開教時代，似乎一切事情都得特別謹慎，以免增加困難。葡國政府和教會當局定下許多限制條例，不能自由出版，如果事前未得臥亞審查機關許可，則在亞洲甚麼也不能出版。要是把稿本寄去審查，等審查後再寄回來，這麼一耽擱，就得好幾年，還得冒着覆舟飄沒，遇盜被擄的危險。然而利公也和羅明堅一般，深知印刷事業在華所處的地位，確有很好的妙用。（註三十二）第一傳播極廣，因為中國的讀書人多得不可勝計，不但文字統一，官話也可通行全國，而且漢文的寫作，便是朝鮮日本安南的人也能閱讀。再則中國用木版刊印書籍，已成民間習慣，需費低廉，刊印不容易有錯誤，刷印又可以依照每天的需要，隨意加減，要多少就印多少。這種印書法，當印行一五八四年出版的要理問答時，原已用過了，但利公却記述道：（註三十三）「我沒有刊印過甚麼書，我也不能刊印甚麼書，因為要在這裏刊印書冊，必須經過許多手續，先得本會上峯核准，所以我不敢貿然從事。他們要審閱漢文的手稿，這是他們所不知道，不能懂得的啊！日本的教士們感覺到這種不便，已得教宗特准，免送臥亞通過了」（註三十四）所幸在華傳教的耶穌會士們，不難用手抄本

來彌補這種缺憾，這在中國是輕而易舉的。

南昌有許多書院，是文人的集會，又多道學的講師，這便是他的特點。有一個書院的章程上說（註三十五）「本院的宗旨，在使人就其本性所近之學術以求深造，庶所行克肖先賢。欲達此境，務須悉心學習，有恆有則，惟願收其放心，窮究事理，不宜外務虛聲，以期早享學者令譽，博人尊敬。」

這些書院中，有幾個來學的生徒，計有數百人（註三十六）但通常生徒集會，每以九人或十人為一組，由「一位有德的講師担任講學，每月七八次，前往指定人家輪流講授。每當開考時，來聽名儒講學的動輒數千人。」據一位當代的盲教士（註三十七）說：「他們度着法列叟人的簡約生活，像會堂裏佔着首位的經師一樣，恰如聖奧斯定所說自己是盲人，却給盲人引路。」有時候雖則有許多人是老手，可是這種「理學」依然是上流社會的特享物。這種哲學，依着定義講，正如古羅馬開國時代，有人在羅馬所說是「友暗影的哲學」（註三十八）研究這種哲學的人離羣索居，不肯高聲講話，只揀幾個有心人傳達他們所有精微的見解。此外他們研究這種種的道德問題，不只是「遂其性之所好」藉以求精神上的愉快，或者藉以鍛煉其精神，却也要從中覓取一種生活的方向，他們爲了適應這種需要起見，便逐漸拋棄了朱子玄微空洞的理學，而傾向着王陽明的學說，力求易於實行，合於人道應用於日常生活了。利公是義大利人，那時義大利不是正享着一種和中國說辯相仿的文學，即當代人士所稱爲「倫理哲學」的盛名嗎？這種文學，說是指失却創作性的小品說。辯這一類的寫作在使古人的思想言論成爲通俗，那未免過事穿鑿啦。的確其中所有的原理和倫理觀念，佔着一種特別優長的地位，但每每有各種謬論典實，物理和自然史的學識，以及星象丹爐，或是烹飪的要訣，攙雜其間，弄得散漫

零落，有詞意不相連貫之弊。這種文章好比一隻垃圾桶，破爛的東西甚麼都有，而光怪陸離，文詞駁雜的作品，却視為典麗堂皇的佳構。曾有人搜集了幾篇題目相同的文章和幾句同一題材的詞句，再加上不同的議論，便做成了幾篇衛課，有的論酷虐有的論嫉妬，論一切罪惡和一切美德。

所以利公憑着他所得公教文化的全部真傳，的確已有極充分的準備，可以在中國培養一種新文化，和蓋伐拉（Carra）在西班牙加斯蒂格里奧（Baldassare Castiglione）在義大利所發揚光大的一般。他在這文質彬彬，風雅高尚的社會中到處受人邀請，尊為上客，和人暢談一切有關綱常倫教的問題——這社會中却有一件事在西方人看來要詫異的，就是婦女概不參加酬酢，從惟「有男子」一般胸無成見的文人記取他的言論，珍同拱璧。過不多時他的言論在這班「中國的人文主義者」眼裏看來，給他增添了不少光輝，因為這些文人對於抽象的科學不能感覺興趣，也不喜歡依據辯論的方式和人討論。

近代某哲學家曾在某種情景中，發表他對於世界原始和現狀所有的情緒（註三十九）在這種情景中利公和人談論時，更必有同樣的表現了。「在一處鄉野，遠遠裏就看得見幾座華屋的地方，有人在綠蔭深處修築着一楹精舍，每當夏令溽暑之際，常有好幾個同志，在此相聚納涼，高談闊論。偶然有人帶一個外國人——利公——到了那裏，便有人請他進去休息，那裏的人們斷定他正堪助談添興，便請他留下小住幾天；他們急欲聆他的高論，所以請他務勿見拒，他就坦然進去了，不久便引得一羣聽衆，他隨意講論着歷史上和倫理上各要點，講得很開懷，聽的人都愉快極了。」

建安王是南昌首腦人物之一，我們已在前面說過了，他見利公天賦奇才，對於各人心靈上所有各種境況，都能源源

不絕的詳加指導，予以明智的教誨，使人知所趨避，不禁爲之心折。他們初次會談時所討論的是些倫理問題，這就不能不教注重「五倫」，不惜斤斤爭辯的中國人，爲之欣然色喜。

「利公所作的『交友論』是問答體，先叙建安王嘗問他，『西洋人對於交友之道有何意見？』然後作答，就他所能憶及的西洋哲學家，公教聖人們以及古今名人著作中，所有適合中國人情的話，引爲論據。他用羅馬字拼音把這篇文章註出，使人更加注意，又作了一篇序文。凡是願意讀他這篇文章的人，他都讓他們抄錄一份，又隨時謄錄出來，以備有人向他索取。」（註四十）

這篇小文章共計七十六句，被贛州知縣騙去付印了，只是沒有羅馬字拼音。後來「在直隸浙江諸省有許多很著名的作家，竟在所著的書中援引過這篇論文。」（註四十一）

利公自己也承認（註四十二）說「這本書冊給我和給我們歐洲掙得的聲譽，要比我們以前所做的一切事情還要好；因爲別的東西，使我們擅長製造儀器和機械工具的人得了名，但這篇論文却給我們掙得了文士的聲名；文士是精神和道德的朋友，所以大家都要誦讀這篇文章，索取一本大加讚許。」

實在，我們講論到南昌的道學講師，便不禁要重想到帝國時代的羅馬。曾有人說（註四十三）「奢乃格所教的學問，範圍是很狹小的，他過於矯枉，藐視自由藝術。在他看來，幾何學，天文，似乎畧有用處。……真正的學問却在約束自己的意志，抑制自己的肉情。人生的哲學，端在以哲理教人，視爲終身職業，所以人必須竭其歲月，摒絕冗俗，專心致力，終身從事於斯。但便是講哲學，也應知所選擇，因爲所講的事理，並非全是同樣必要的，大家已把哲學擴張得沒了分寸全無益處了。」

哲學本分作三部份，他却把其中的兩部份，就是形學（或是形上學）和論理學刪去了。他的意思只要倫理學。」利公說南昌文士們的特點是這樣：「他們的學理有許多地方是和我們的學理相通的，因為他們不提偶像，只講德業，和立身處世之道。」（註四十四）

然而他們不能避免這宗教的根本問題，始終不談呢？那章老先生所主持的豫章書院，曾好幾次充作開誠討論會場，辯論時彼此都很謙遜地交換意見，這種精神競爭末了總是由主人向這外國賢哲道謝，說些「承蒙賜教，得聆謙論，不勝欣感」這一類的話，作為結束。（註四十五）

這種叩入人心的方法，却和其他在某些國家傳教的教士們所用的方法大不相同。教士們，尤其是在那些妄稱是原始民族的國家傳教的教士們，如果對於這種方法能加注意，未始不是有益的。那就誓反教立場，寫過一篇專論，藉以說明歸化心理的亞列埃（Alicia）氏似乎已能了解那歸化要人的特性了。他說（註四十六）「一個異族的白種人到另一境界中，去住下，那裏的人們，不知道歐洲的文化，也不懂得福音。他所夢想求得的，是一種精神的革新。他從來聽他宣講的羣衆身上，只看見他們的宗教，正是他們品格日趨下流，道德日見淪喪，生活日益腐化的緣由，便想用另一宗教來替代，這種宗教依據他所有的經驗，尤其是依據他的信念，總可以變化他們的內心生活，逐漸見諸外行，使這新宗教放射出革新的光輝。他往往憑着一種憂苦的同情心和他們接近，和他們同受諸般困苦，還要設法終止他們的困苦。他期待著這個目的；可是這個目的，並不是他以後要幫助這些人給他們做些事情，也不是要把他在無意中表現的歐洲文化，傳授給他們，却是要把他所有的思想情緒介紹給他們，這原是他懷着志願要在他們心裏培養發育的，又要這些思想和這些

情緒，在他們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上見諸實行。他在這些人民中辦着這種事業，他的意旨他們必然不能一下就澈悟。但即使他們中很少能了解他，這個白種人，也必對他們毫不隱瞞，決不失却一次機會，給他們說明物質方面的福利，不是他行動的最高目的。他必向他們再四聲明，說他給他們帶來的是新生活的福音。他的宣講，可以用這句話總括說明：「你們歸化吧！」歸化兩字的意義，就是一個人完全改變自己做人行事的趨向，和那啟迪一生成行的動機或是意向。這就是法基多：如今所講的便是基多的教訓，或者說得更切實一點，是在他給予新生命的感召下，再做一個受造的人。」

利公爲使提出這新宗教時，摩擦減到最低限度起見，便就他在廣東所採用的方法，再加深切的琢磨。他引用中國的經書，來說明天主教道理正和中國古代聖賢所有比較完善的道理相符合。也是所以補當代鴻儒碩學心得之不足。所以天主教道理並不是一「外國」的道理，他所頒問答體的要理，無非是一種啟迪人心的文藝作品，使問道的人明心見性，知道該怎樣遵循着歷代相傳，古聖先賢的遺教來約束自己的思言行爲。那從歐洲得來的哲學正所以幫助他做到這一步，效驗極奇妙。西洋人讀書求學，大抵從論理學入手。治學的方法，第一在明理；要讀書，先得學講理，所以重要的功課便是辯論。中國人的習慣，每當舉行這種「會議」時雙方發表言論，總必以引經據典作開場，利公起先常怕聽衆不滿，他所用士林派的論辯法，不久便已看出這種方法，却使他佔着優勝無比的地位。事實上因着受了這樣的訓練，那尋求真理的思想家，才能扼定論題，自去根究，看他有沒有根據。利公自己也總要把一切認爲有價值，而有利於這論題的論據，詳加審度，其中如有可以引人駁詰之處他也絕不忽視，而仔細推敲，必定要辯到使人不能再加非難才罷。辯駁的時候把每一論據，分別加以闡發，務使頭緒分明，不至互相淆混。各種論據，每用數字分清，對於反駁也是一樣，好教人容易看出逐條的價值。

這樣，可使對方的信念不是從全部理論所給予浮泛的印象得來，也不是為情感所支配，却是全憑着清晰正確，專講理智的論辯而樹立，使這種商討，一以論辯為依歸。

利公用這種方法和人辯論，一切論據，都是講得很忠實很有力很清楚，使中國文人所作謙讓高雅的辯道集合為之，生色不少。「這種辯論和我們的人事科學或是修辭學，原不能認為相符；便是我們的修辭學，也要用着論辯，設問詰難，也不能說是相等（註四十七）」再則經過了一番辯難之後，如果利公的優勝是確定了，這也不足為奇。一天，利公講論天堂地獄的道理，結果使章斗津不得不稱謝他的啓迪。章老先生屈了，便用這樣的遁詞作反駁：「如果有天堂，好人就能升天堂；有地獄，惡人就要下地獄；我們還是勉強做好人吧，不要做惡人！」（註四十八）

因此利公就漸漸被迫着講論他心裏最隱秘的事理了。這差不多是不由得他作主的，因為他的本意，原是在未得皇帝許可以前，要力避宣傳新宗教的名義的。他在最初兩月中，慣常不提傳教這件事（註四十九）以後三個月他諸事忙碌，只能在晚間做一點傳教工作（註五十）但最後羣衆好奇的潮流，終於使他破戒了，便繼續「憑談話來做他的傳教工作」不過慣常總是在家裏不出門。

他曾記：（註五十一）「儒家不談鬼神身後之事，所以雖則講了許多好道理，却有大多數民衆感覺不滿。：我一天到晚講論着我們聖教會的道理，便有许多人願意捨棄邪神信奉基督。我們給他們說明了他們的教派種種虛妄以後，他們便承認敬拜偶像確有許多壞處。我整天和人談論；眼前我們雖然還不能給他們講聖教信道中，所有各樣奧理，却不妨先就各項基本要理，順序前進給他們講宇宙間有一個創造天地的大主宰，人的靈魂不死不滅，和有善必賞有惡必罰等

各端大道理：這些都是他們以前絕對不知道不相信的。許多人聽了這些道理，便表示非常欣慰甚至感極下淚，好像這種道理，是我們的新發明一樣。在這開教時代，講解教理，似乎還是從根據理性的事理入手較為合宜。」

利公所有這種見解，正與那葛勒司鐸（P. Louis de Grenade）所見相同。葛鐸所著的「信德標記入門」一書，譯成日文之後，在華傳教的教士們，便奉為圭臬。（註五十一）後來，羅德司鐸（P. de Rhodus）向那文化崇高由文人治理的人民傳佈基督福音，起初也是用着這種求合理的方法，先講倫理，十誡，繼講靈魂不死不滅，天地真主，最後才講降生救贖，和三位一體的奧理（註五十三）但利公辯護聖道的特點，和他所以能闡明天主教道理，與中國儒家不相衝突的緣故却在引據中國經典，藉以闡發各種基本信理，這是他在去世前一年中，所明白昭示的。（註五十四）他說：

「儒教一派，雖然不談超性事理，可是他們對於倫理道德的教訓，差不多和我們的見解完全相符。因此，我已開始利用儒教來攻斥其他兩派，（就是崇拜偶像的釋道兩教）了。我不駁斥儒教的道理，却把其中看來和我教聖道似相背悖各節，加以解釋。：如果我們毅然決然對（儒釋道）三教同時進攻，那麼救們就沒有迴旋的餘地了；可是我對於現下一般不循古道的儒士，所有新創的意見，仍必加以攻斥，不稍姑息。」

現在我們爲要了解利公的戰畧起見，對於這篇主要的文字，自不應擱置不論；不過這種戰畧要經過好幾年才見充分展開，到了那時候我們才可以整個考察一下。目前，我們祇須證明利公的教誨，雖則似乎穿上了中國的服裝，和人相見，却一點也沒有把他來自西方的來歷隱匿起。

他要和儒家的書院或是學堂完全同化，只剩下最後一步，這一步跨過了，便可以完全做到。利公既然決計握絕，一切

足使他和僧道相淆混的事情，他就不得不廢棄公開的小聖堂，因為這使他的住院形式上像一座廟宇。他不是一下就想到建立這種只重精神不重形式的教化的；他初到南昌的時候便在那最華麗的廳堂中，把救世主像在祭台後壁上供起來（註五十五）——也許便在這時候，把天主改稱「上帝」——（註五十六），還想將來可以在這裏公開講道。似乎這是因郭居靜司鐸在韶州不幸遇到了一件意外事變才使他改變初衷。

情是這樣：一天晚上，韶州來了幾個舉動粗暴，又喝得半醉的秀才，（註五十七）要到教士們的住院裏來游玩。爲有人攔阻他們，不讓他們進去，他們便拿磚石拋擲進來了。僕人們就追逐他們，把他們直到泊在河裏的船上。但他們找到了幫手，又來攻打了對屋子裏的人拳足交加。一天，他們或者是因憤怒未平，或因懼遭譴責，便聚衆示威，向官廳控告外國人欺侮他們。他們先告到府縣衙門，都被駁斥不准了，只有那州丞因爲弄不到一座自鳴鐘，和教士們有嫌隙便乘機報復。兩個僕人先挨了板子，鍾巴相修士替他們叫屈抗辯，秀才們便一口咬定他挨了打不算，還在衙前枷號一日。這回的侮辱使教士們大失體面，也沒有人替他們伸冤。郭居靜司鐸見種種飛來橫禍，總是由於住院被人認作寺觀廟宇而來——中國佛寺道觀終年開放，盡可入——便把公開的小聖堂加以封閉，又把西洋的珍奇物品收藏起來表示他的憤懣。鍾巴相修士受了板責，無顏在韶州立足了，便命他前往南昌和黃朋沙對調。

過了幾時，有幾個外來的官員，由本城同僚陪着，來見郭公，只見聖堂空虛，一切東西都已收藏起了。他們知道了這緣由，便對州丞大表不滿。這一位只得承認自己做錯了，請郭公恕宥，在南安橋廟裏設席相邀，替他陪話，又出了一紙保護的文告，命人張貼。那統帶軍隊的兵備道，也來專誠拜訪，請郭公對坐談話；這種待遇是不經見的，因此教士們的聲望才得稍

稍恢復。

這件可爲遺憾的意外事件，就使利公懣前愆後不得不先事預防。一五九六年十月他曾記：「我想以後，我們決不再設聖堂予以開放，只開一所談話的廳堂；我們的聖祭要在另一房中私下舉行，但我們接見來賓的客堂仍可用作教堂。這裏我們仍可用談話的方式來代替講道，傳佈教理，而且收效更宏。……我們既然斥絕了僧道的惡名，不使他沾染到我們身上。在這開教時代，自不宜建立大小教堂，只可設立一所論道堂，和他們最有名的道學講師一般做法。」（註五十八）

這當兒利公的年齡是四十四，却自稱年老了，但身體却很康健。（註五十九）他說：「我忙得連眼都不得空閒，因爲一切事情都壓在我肩膀上，壓得我回不過氣來。神父你相信我這幾天中，有一天我要忙得竟連彌撒都不得做，雖則您可以我得些理由，說我不很虔誠，才有這樣的缺失。（註六十）……您要曉得我在這裏，趕些甚麼事嗎？如今我已變得像狼羣中的羊，却沒有鴿兒的率真，蛇兒的謹慎。」（註六十一）

這種極度的忙碌，便是前面利公和章斗津論「說誑」那回事件的原因；歐洲文化和中國文化內在的不同，因此而大可看出，利公的聲譽也因此而獲得奇特的增高。在一個首重禮教的國家，却該知道率直表示內心的情緒，是件比較不易實行的事；新來的生客，有時不得不循規蹈矩應對中禮，却不知怎樣依照當地的習慣風俗，與人周旋。利公曾記：（註六十二）「我們已有了不論大小事情，概不虛言誑騙，和不妨害他人的聲名，這在我們看來，雖則沒有甚麼了不得在習慣上，言行不甚求確切的國家中，却是非同小可啦。……這正是後來教他們信奉我們聖道的根基和門路，因爲要傳揚聖道必先使他們信任傳播福音的人方能奏效。」

因此憑着和人談論又憑着以身作則的善表，「西學堂」的「令聞嘉譽」就日見廣揚了。到了一五九七年五月間，來省應府縣考的童生有萬餘人（註六十三）十二月間（一九九至二十九日）來應鄉試的秀才有四千人（註六十四）這兩次考試進行時，乘機來訪的儒士，絡繹於途，使利公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以後這不暇應接的情景，更一年壞似一年。」利公在中國各省中足跡所及的省份，實際上雖則只有粵贛兩省，可是全國十五省區中對教士們表示好意的算來已有十省了。（註六十五）這樣看來，他在廣東境內，所度多年，艱難困苦的光陰，實在不是沒出息的；在那裏，給老大中華的舊世界，掘開了一個洞；這個洞一經開掘就關不住了。在爲了要尋覓傳教新園地而棲止的各處都市中，他總能再享着前日的聲名找到幾個有權力的朋友來支持他。當然種種艱鉅的障礙和痛苦的磨難不能一一排除克服；他該爬的原是加爾瓦畧山啊。但總看起來他先在肇慶遭驅逐，繼在韶州抑鬱不得志，這實在都是出於天主上智的措施，使他不得不展開他的行動，遷移到爲傳佈福音更適宜的地帶；他遇到了瞿太素做他的助手這真是再相當沒有了。然而他仍須竭力設法，去求得中國皇帝的正式保護，使這傳教機關，得在穩固的基礎上切實建立起來。

第四章 北上晉京的初次嘗試

十六世紀的教士們每當執筆作書時，不住把天子統治的中華和凱撒時代的羅馬相提並論一再比較。那位於一五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了韶州以後要在本書中佔着重要地位的義國西錫蘭人，耶穌會士龍華民司鐸（註一）便是其中之一。他來華不滿一年，便已向利郭兩公搜集了許多情報，於翌年十月十八日開始就傳教情形草擬一篇非正式的報告，添上了許多自出心裁的評論。（註二）這篇報告中充滿了樂觀的見解，使我們不禁稱奇。我們讀了他的寫作便不難相信中國在十六世紀中的情景比聖教初興時代的歐洲還要有利。關於這一點杜凱納主教（Mgr. Duchesne）曾作如下的記述：（註三）

「基多的教化，在羅馬帝國傳佈時，所有的環境，是便利和障礙兼有並遇的。在種種便利中那些應當放在前列的，是普遍的和平，言語和觀念的一致，交通的迅速和安穩，羅馬的哲學因着他對於舊有神話故事加以攻斥，却又不能創造些新的出來替代那舊的，所以也可以認為一種有利的助力，聖教中諸位先輩司鐸每稱崇拜偶像的異教主義為魯西盎主義（Lucian）最後東方各宗教對於羅馬人的宗教情緒，多少供給一點食糧，使他不致死亡，能期待着福音的來臨，而回復生氣，但除了這些便利以外，種種的障礙是多大啊！不久羅馬帝國便成為仇教國了，好幾次和天主教死命奮鬥。希臘哲學的唯理精神，佔了基多教化教義的原理，因此邪說橫行，異端叢起。講到民衆信仰，即使一般民衆還能保存着某種方式的宗教信仰，却不能希望從民衆方面得到一點助力，來打倒這些自利主義者可恥的私慾，這種私慾無論對於個人，或

是對於整個民族總是救靈工作的最大障礙。

總之在杜主教的節畧中，我們只見黑暗和光明的衝突，但我們讀了龍華民司鐸暢論中國對於傳揚天主教所具有的條件，似乎種種障礙差不多已無存在的餘地啦。（註四）中國的昇平也許要比羅馬的昇平更足令人艷羨。官話通行全國，加之物阜民康，財用充足，不難供應大批司鐸的物質需要，不像在貧乏的日本，司鐸們不得不專靠向國外乞取佈施以維生活。「禮義廉恥不讓於歐洲而且有些地方便是比較修士們，也無遜色。」他說：「我不相信歷史上有和中國人一樣專務求學的民族；有一個城市就有一個雅典。」中國人都守法奉公「假使伯拉圖復生，也必承認他爲自己的共和國精心擊劃，凡是他所意想得到的在中國都已實行了。」我們只就廣東一省計算讀書人卒業的已已有六萬人了，如果我們就照這個數字把全國各省合併計算起來，那麼中國受過教誨的人，數目真了不得啦，而且大家都遵守着一個明師——孔子——的教訓，遵守得確切不移，不容有絲毫假借，所以「他們一旦信奉了基多的聖道，異端邪說，就不容易掀起咧。」

「他們也做着正心誠意的功夫，修着各種倫理的德行……恤貧、救難、濟急、扶危……他們守齋克苦……對一夫一妻制加以稱道，婦女守寡，尤所推崇，又重修省慎獨功夫。書院中人專務潛思默想，「和古時候在曠野中隱修士們一般，但願回復到原始時代的生活。（道士們的修真）……婦女們度着幽嫺貞靜的生活……孝道佔着極重要地位……每逢朔望，要向人民宣讀六端倫理的箴訓，就是孝親、敬長、睦鄰、教兒孫守本分、毋作惡。概括說來，這些都是十誠中對人的誠命其中包括着八、九、十、三誠不難一看便知。」……只有一點真可怪：照通常講，他們是無宗教不信有神的可是他們的古書上，先儒的言論中，以及他們的寺觀廟宇中人，却請着身後事。

這最後一點確是絕大缺憾，但無論如何，我們總可以從這篇簡單的論文看出「中國人是那麼準備着要在這本性光明的基址上，建造這座天主十誠和聖經寶訓的大廈。」他們對這十誠和聖經的寶訓非但不憎厭却還贊助着，更懷着心願咧。

在結語中龍鐸又說：「也許有人要以為我說的是厲言，未免言過其實，要對我說，我寫的全不是實情只是我的心願；我已受了良法善政的外觀和幻景所欺騙啦，尤其是因我到中國來居住，日子還很淺咧。我對他們的答覆是：我既無意也不願，使中國人在未能認得天主實有以前，信奉甚多；我的意思只要說明他們是那麼準備着領受福音罷了。即使他們稱道我們的教理，不過是出於禮貌，由於好奇或者希望有所獲得，才有這樣向慕之心；這也不足使我們稱奇，因為他們還在崇拜邪神執迷不悟咧。這在我們，尤其是在這開始時代，只要他們贊同我們所講的道理就夠了！退一步說，只要他們肯聽我們宣講，只要他們不反對，只要他們肯和我們談話，不跑開就是。可是這一切事情，我們工作的人只有三個啊！這三個人尤其是這傳教教會的柱石利瑪竇神父，現在從事培養助理人才，而在日本，除要理教習不計外，却有耶穌會會士百來人呢。」

這裏還有把中國和古羅馬帝國相比較，講得很明白的論著：鮑雪埃 (Bosser) 在研究偶像主義沒落時代的羅馬宗教時，對這問題曾作深刻的檢討，（註五）他說：「基多教化所得的偉大成效，固然使世界煥然一新，但我們不應因此而完全忘却那在基多教化昌明前所有的努力。一般說來我們每喜把羅馬人所有使我們注目的種種劇烈的衝突，筆之於史書，我們不妨把某一時代看作上一代的反映，假定這世界是在紊亂的過程中，和不能預料的演變中，跳躍前進。因此幾

時我們把十一世紀的羅馬帝國所有相持不下的兩個宗教的鬥爭，加以研究，便不難想見，二者完全處於對立的地位，而且在新興的宗教中，沒有一樣，不是使那受過舊宗教陶冶培養的人民驚奇詫異，目爲世道人心之大患的。……這種意見真是過分極了。新舊兩宗教間，當然有種種根本不同的地方，但也有某些方面，是彼此相接的而且有些幾處，竟是殊途同歸的。聖奧斯定曾說：「惟有天主教能遠適異國，找到那人類所趨向的道路；又說人生的哲理，已遠遠裏瞧見他了，在山頂上向他招呼致敬呢。」慣常我們總以爲這新舊兩社會是背道而馳的。……豈知他們還循着同樣的意識，向前進行，不過一方面，按本性是保守的，懷愛着教宗所尊重的種種紀念和傳說，在趨赴未來的時候要不住回顧已往；這就使他們怯於前進，他們的成功也就沒有把握了。反之另一方面，在他所要征服的境界中是生疏的，對於這些往往要成爲陷阱的留戀是不受拘束的，毅然決然向着他的目標邁步前進，所以他在進程中對於那見了他惶駭的人民，自必更容易達到目的了。」

據我們看來，龍華民和郭居靜兩司鐸，對於明末時代的中國人民諒必也抱着這種見解——利公也是這樣，不過他的意識，畧有不同。但龍鐸所預期的成功未免太速了。須知耶穌死後，差不多要過三百年才見公斯當定頒佈詔諭，令全國人民歸奉聖教呢！這位新來的教士好像是一個建造房屋的匠人，只算到各樣好處，却不曾估量到種種的艱危，利公却不是這樣，他憑着過去艱苦的經驗增進了不少見識，知道照目前的情形估量起來失敗多而成功少。

這種估計的參差，在討論中華帝國政制的意見中最可以看得出來。龍司鐸的寫作中曾說：（註六）

「中國所有治國的一切方法中，那主要的也是最善的方法，便是把各項須加討論的事情，通知全國最清正和最有

學問的人。在北京他們把那些應行商榷的各種問題和各要案刊印出來，發交各省再由總督分發有關各府縣核議。府縣便召集所有中過進士的儒士，選出幾個最博學的人，這些代表便都到省城裏，在太學中會集了，寫出他們的對策。總督和他的屬僚，便從這些對策中揀幾篇最好的刊印了，送到京城裏，或是送到翰林院，由皇帝的宰相們審閱全國的對策。末了，他們開一次御前會議，決定取捨。所以凡是在北京決定的事情，全國就得閉着眼睛一律奉行，好像這是從天降下的一樣。」

報告中國皇帝治國的真實情形，比這再要正確不正確的報道，也就難得看到了。利公對於傳教工作的種種困難情形，所以知道要好得多，他記述道：（註七）「假使你們要知道我們所有的光景，對於中國，能有怎樣的希望，就不應該注意領洗的人有多少，因為在十四五年中領洗奉教的不過百來人，却該考慮到這個國家和世界各國，是那麼大不相同。第一，這是個地大物博的國家，不需要甚麼人，不願意接待他國的使臣，也不要他國的禮物。第二，他們只注意國家的治隆，不甚關心靈魂和身後的事理；他們即使講求着倫理的德行，也無非以安邦定國為依歸。因此我們的作家和我們的哲學家，他們是不了解的，他們不重視這些著作，也不注重科學，或是超性的和基多信徒的德行。第三，他們有三種主要的教派，每一教派又分九流（註八）可以隨意選擇，只因種種學說層出不窮，反弄得一無所屬，這可知他們概沒有救靈魂的思想，即使畧為想到，也是浮而不實，把這件事看得很輕，認人生斯世這等事是無關重要的。實在這種異教好像萊爾納的三頭巨魔，把頭砍下了，會砍一個長一個，再長出三個頭來，必須再出一個歐古勒（Hecate）才能用棍子打殺他。這就是說將來必須吾主耶穌多自己，和他的極聖十字架才能把這異教打倒，假使他喜歡我就願意做他的小工具，能適用於這崇高的大工程。第四，他們專修文事，所以輕視武功，認練武從軍為賤業；對一切事情也都懷着疑懼心理，對外國人更

是常存着疑忌心理以爲外國人如高麗的日本人和華南的葡萄牙人都是存心來奪江山的。第五他們從極久遠時代起，對不問是那一種那一國的外國人便已有了一種厭惡心，成爲天性了。在他們眼裏，外國人無非是蠻夷，中國是世界的首領，說得更切實的是世界的軀體。再則，他們只對極低微的外國人表示寬容，他們即使確實承認有許多地方我們勝過他們，可是當着我們却又不肯承認，也不肯自謙自遜啦，因爲他們以爲只教我們看看他們治國的方法便能使我們知道自己不及他們了。第六，他們治國的方式是出乎尋常的。皇帝不出禁宮，宮外的人和他接近的只是少數，他在宮裏和許多婦女們厮守着度着閉關的生活。一般大官僚享着高貴的地位和極大的權力；他們和專任各項職務的官僚會同辦理各種公務，都是當堂開發例不親去訪問，他們的妻妾子女，以至婢僕傭役，照例也絕不走出衙門，也不到他人家裏。這樣做法就杜絕了我們各種計劃的門路；老百姓是沒有勢力的，皇帝似乎更近不得，官僚接見我們很簡慢，而且總在公堂上，我們還得跪着哪！

這篇文字真叫人掃興，利公在結束的時候，便這樣畧表幽憤地說：（註九）「的確，實在我已分担着一件極艱難的使命啦！那使我最深切感覺的就是外國人進中國的門戶全都閉塞了，如今正有許多司鐸修士們大家聚在一處彼此互相援助互相慰勉；實在這種情景，比死還難受。」

然而利公雖則因心思精細，格外感覺到這種種的痛苦，却仍毫不失掉他的勇氣，（註十）他說：你們且勿問我歸化的靈魂已有幾千，只問初次聽到這好消息的人有幾兆，這消息在我們原已陳舊極了就是說：宇宙間有一個創造天地的真主，許多人聽到了這話，便舉目向天說：「的確有一個造天造地造萬物的真天主。」而且在這廣大的中國，數千年來早

已有了天主的稱呼，如今也不是不知道不認識的，然而我們仍能勸化得少許人歸奉聖教這些人的歸化也足使我們滿懷欣慰的好比作父母的，照顧自己的孩子們，受過一番辛苦之後，才看見他們長大成人，自必覺得十分歡喜咧。」（註十一）

這些受洗的人雖則寥寥無幾，已足使利公不禁油然而生希望之心，希望為聖教會掙得中國。（註十二）他說：「我們彼此自相議論，得到了一種正反兩面的結論，這是我們親眼目視絕對有憑有據的：第一假使我們能獲得許可，准我們在這一國裏自由傳佈聖道福音，那麼過不多時便有幾百萬人棄邪歸正。第二假使我們不能獲得核准，那麼一朝我們正式從事勸化人靈着手付洗，就有連我們目前所保有的區區成績驟然失盡的危險。在這個帝國中到處對異族有極大的猜忌，尤其是對我們，他們說我們有奇才，有心計，也有能力不論甚麼事，都做得到，所以我們只敢用沉重的脚步向前進行。我們但願他們逐漸發覺我們所有宣揚新觀念的意志。」

所以此後利公使用種種方法來尋求機會，一直到北京去覲見萬曆皇帝。有一次總督透露出一線希望的微光，要把利公帶到北京，但這不過是一種幻想罷了。（註十三）那在日本傳教的巴範濟和歐岡蒂諾（Organtino）兩位司鐸曾來信通知，說那教友將軍奧斯定正派一個通曉中國書的若望（Jean Nuijondono）做使臣到中國朝廷來聘問。（註十四）但這時候利公等還不能和他聯絡。再則我們如果回顧到由羅馬教宗遣使通好的計劃，便知這事也已日就消沉了。一五九六年十月十三日，利公會說他們但等傳教教會的供應員郝麥達（Gil de la Mata）回來好決定這件事有沒有可能。但這司鐸於一五九五年九月間在臥亞搭船動身，來時只帶得已告失敗的惡消息。（註十五）因此利公惟有就地

設法進行了。這當兒，利公會肯定說：（註十六）「我們離京都更近了，不但在物質上，便是在形式上，也是如此，這就是說從這裏到京都，要比不論甚麼地方都容易，或者由建安王從中設法，或由我朋友中在京供職的親戚設法。此外還有那勢逼及全國的京兆尹的三個兒子，也可以給我設法安排。然而這事似乎還是做不到。」

後來，依舊是范禮安司鐸給這件事加上了切實的推動。他在一五九六年年底交卸了廿二年來担任着的印度遠東教務總巡閱的重任，便減除了一部份的負擔，由耶穌會總會長克勞特亞瓜維伐改派畢孟達司鐸（P. Pimenta）繼任他的職位。范公便乘機溫理神業，使他的熱忱得有新生氣。（註十七）他原希望能退居下屬獲卸仔肩，却不料重膺簡命專任中日兩省區教務總巡閱，統轄兩屬傳教機關的要職。這回，他對於葡屬東印度和臥亞省區的教務，已無權過問了；因此人力財力，就減少了，可是他對於在華的傳教事業，仍能給子一種新生機。他於一五九七年七月二十日，到了澳門，差不多整整住了一年（至一五九八年七月一日幾天以後）（註十八）辦了幾件有益的要事。

（一）澳門院長對於中國內地的情形，因相距太遠頗多隔膜，每致失却良機。范公見孟三德司鐸年老多病，身體衰弱，便乘機委任利公為中國傳教教會會長——本來這傳教教會，以前差不多是完全由利公負責的。——還給他擴大的權力，可以決定一切事情，也可以開辦他所認為有益的新機關。（註十九）

（二）請求教宗遣使通好這件事，已由祁麥達司鐸探得確訊，知道辦不到了，可是照利公單獨進行所有的成績，看來這件事却又日見迫切，不能不辦。利公便奉到命令，設法取道進京。澳門當局便辦就了許多可以用作貢禮的東西：一幀從西班牙寄來的聖母像，一幀救世主像，一座紫銅質的，大小適中，製作精巧的自鳴鐘，由亞瓜維伐總會長送來，（到了南昌，利

公又製造一座全部裝金，雕刻精細的龍匣，又有一座鐘是由馬尼刺主教送來的，和前一座約畧相同；此外盡量搜集了各種有用的東西供利公支配。（註二十）

（三）如今在華教會的會長，既住在中國內地，關於教士們物質方面的事務，應仍歸澳門院長兼辦繼續供應一切需要；再由日本省區的供應員担任收集年金和捐款，這些捐款是葡萄牙人捐給在華司鐸們的，因着他們慷慨捐輸，始終不懈，募得的捐款已日見增多了。葡籍耶穌會士李瑪諾司鐸（P. H. Dias-Senior）自一五八五年奉派到印度傳教以來，到如今已有十年了；大家知道他關心中國教務，他在印度時歷任各項要職，先在笪那（Tana）做過四年院長，繼和范禮安司鐸共事三年。這時候澳門學院已改作中日兩省區共同的修院（註二十一）耶穌會當局便簡派這位李司鐸來華任院長。

（四）韶州住院常受着瘴癘的侵襲，羅如望司鐸便因此害了病，不得回澳門療養，只剩下郭居靜司鐸和兩位澳門籍修士守院。既而郭公自己也病倒了，羅鐸便回韶州去替代，讓郭公到澳門去養病。不料羅公病後尚未完全康復，到了韶州寒熱又發作了。這當兒，范公雖苦人手缺乏已極，仍決定派遣那「將來要做中國教會堅固柱石」的西錫蘭人龍華民司鐸前去協助，一五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龍鐸偕郭公同到韶州，郭公便和黃明沙修士立即開始攻讀五經中的一經。羅如望却奉命調回，供職澳門學院。那時他已讀罷了中國書，正該開始工作了，所以這回調任，使他格外覺得難受。他親向范公表明心願，范公就命他仍往韶州。因此這小小的韶州住院已有三位司鐸了，有如龍華民司鐸二月五日的書信中所述的一般。這就使利公所說向北京「進攻」的嘗試，獲得了特殊的便利。（註二十二）

事實上，利公如今有了充分權力在南昌繼續耽耽注視着，準備一有機會便要趨赴朝廷，入覲中國皇帝了。他聽得人公開傳說，「宮中失火整整燒了兩天；外人不能入宮灌救，太后就活活燒死了！」無疑的這是指着乾清宮的火災說，不過事出傳聞越傳謠言越大，發「過甚其詞」了（註二十三）。起先利公也和羅明堅在廣西時一般，但從表面着想，以為不妨托皇族如建安王等，設法援助，必然有效。這可弄錯了，因為宗室藩王依法不得干預一切公事，只能在榮華富貴中度着閒散的生活。（註二十四）

這當兒，利公聽得那罷官後回瓊州原籍的前任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已奉召回復原任了（註二十五）便立即差人到韶州通報郭居靜，教他候王尚書路過時前去謁見。（註二十六）郭公就照辦了。王尚書便問利公何在，郭公告以現在江西，並稱願奉陪同往南昌，和利公商議修正曆法的必要步驟。王尚書聽了，自然很喜歡。郭公便趕緊佈置一切，命龍華民代理院長職務（那時韶州住院有兩位初試修士，多明我孟岱（Dom. Mendez）和安東納李道（Ant. Leiras）自己偕同羅如望司鐸啟程就道，於六月二十三日到了南昌比王尚書先到兩天，好教利公迅速預備動身。這時候，王尚書的前程很有希望，也許不久就要擢升北京禮部尚書，或竟入閣拜相，總攬朝綱也未可知。利公和他相見後，便拿出三稜鏡，再請他賞鑒，又送給他幾件西洋珍物。他聽說利公有進貢的禮品，便要見識一下。這些東西，以前在中國是沒有見過的。所以他看了大加讚歎，自願帶領利公晉京過萬壽節（神宗生日，一五九八年九月十七日）那一天，他即是要和許多大臣們晉京參加朝賀的。這正合着利公的心願，因此利公便邀郭居靜同行，「希望得到他的贊助」又帶黃明沙修士和另一華籍初試修士同往，囑蘇如望和羅如望兩司鐸留守南昌。利公臨行時對南昌的友好一概不去辭行，一則行色匆匆，不及走謁；

二則倉猝成行，只怕本城官廳或加攔阻，因此，利公等此行未曾領得護照，但他有禮部尚書作護身符，也就用不着護照。不過利公要保持他的獨立性，不肯趁王尚書的船，寧願自雇一艘到南京。六月二十五日，聖若翰瞻禮一天，利公便離開南昌，他這一去就永不復返了。

不多幾天到了南京，利公便趁着在南京暫住的機會和王尚書家屬逐一相識，上自諸公子，下至差役僕人們，都和他很要好，尤其是王尚書的姓周的舅父。他和利郭兩公交誼極篤，以後常替他們出力幫忙，終身不貳。（註二十七）那時中日兩國又在朝鮮交戰，風聲緊急，人民惶擾不安，而且幾天前，南京還捉到了幾個間諜。（註二十八）所以利公這回到了南京，遭遇還是那麼不幸，竟不能在岸上覓得寓所，只好和同來諸人蟄伏舟中，這樣大暑天，熱得多麼難熬啊！

但利公仍不妨坐着煖轎去拜會那保護他的官僚，不過他一進城，就被巡邏的兵士窺破了。幸而那駐軍司令馮慶厚見這外國人去拜會的都是些大人物，便讓他出入往來，只做不知道。（註二十九）這實在是中國讀書人所享的特殊便利。那時除皇族外沒有享受特權，受大眾尊敬的貴族階級，官吏都由科舉出身，便是已經居官授職，仍須時受考核，作為升降黜革的依據。讀書人却常有飛黃騰達，驟躋顯要的希望，不但做了官，可以大展經綸，便是布衣處士，也有條陳時弊，上叩九重，下求權利的。因此便造成了惟有讀書人才能享受的特殊地位。

除了這些一致尊敬先師孔子，形成一種極堅強團體的聖門子弟之外，還有一種特殊階級，一種成為中國真正禍源的有力份子：這些便是俗稱「太監」的宦官。這時代中，這兩種人物彼此對立互相仇視引起了劇烈衝突，因此利公也被捲入漩渦，不管他願意不願意。事實上，中國皇帝妃嬪如雲，每易荒淫於女色，庸闇的君主就不免要受後宮挾持，不能自拔。

因而先王的法度祖宗的遺制，漸漸毀棄了。宮裏的太監們，於是設下陰謀，詭計肆其伎倆，挑撥離間，乘機竊權弄政，勾結奸臣賣官鬻爵，以搜取財寶紊亂朝綱，莫此爲甚。實在做太監要受閹割，進了宮便得作奴才，本來這種人是下賤極的，因爲官刑原是刑法上所規定的一種極重的刑罰。可是做太監的，一朝竊得大權，他的一家人就直上青雲，非但不以爲恥，反因本家人靠這條路，得了主子的寵，就作威作福起來了。那時皇帝寵任太監，有的司章奏，有的擬諭旨，有的監察朝官，濫加捕殺，這都是破壞先朝遺制的。因爲受刑的人是不祥的，所以中國的古法禁止用這種人充任這些要職。但這時候宦官官得勢，從此朝廷法令，便落在這班人手裏由他們玩弄了；全國要政，也因此被他們把持了。國家的興革，非經他們主持不行。希圖俸進的小人，要謀得一官半職，就得把結他們，納些賄賂，求他們提拔，要謀升遷肥差美缺，至少也得破費許多銀子，請他們赴宴飲酒。甚至有無恥之徒，給他們立生祠，請封贈，爲士林所不齒。他們在閹割以前，如果沒有生下兒女，還可以過繼幾個兒子，繼承他們的財產，因襲他們的爵位。中國皇帝所以許有這種辦法，是因依照中國人信仰，一個人老來沒有兒子，就成爲沒人照顧的孤獨，死後無人承嗣奉祀，就成爲飄泊無依的餓鬼，用意無非使他們老來有人照顧，死後有人奉祀罷了。豈知這就使他們得了種種便利，造成特殊族類，勢力就一天比一天大起來了。（註三十）

明神宗時代宦官的勢力，雖則還有在朝的大臣們和外省的疆吏加以抑制，却不能把這惡勢力打倒。神宗在位的時候，日很久，非但沒有足爲歷史生色的事功，朝廷上反充滿着種種明爭暗鬥，這都是有害而無益的。萬曆十八年（一五九〇）閹臣受了宦官的慫恿，和那比較超脫的御史們，發生了嚴重衝突。這件事便引起了南京方面一般意氣自豪的名士齊流一致抗爭，因而幾年以後（一六〇四年）便開始組織那歷史上有名的東林黨。但當利公計劃晉京的時候，南中士林還

不過私下議論朝政譏評人物罷咧。在張居正當國時（註三十一）御史們屢遭譴責，便「噬若寒蟬」，臺臣漸漸腐化了。居正罷相以後，便接連發生了幾件奸臣陰謀勾結，陷害忠良的冤獄；一般潔身自好的賢臣，大都被擠去職，目前利公的保護人王尙書，便是其中之一。他原以為這回奉召復職，便可制勝奸黨，却不料不久又失敗了。這是後話，權且擱過不提。王尙書勸利公只用一座鐘進貢，留下那一座去送給朝中有權力的太監。利公却寧願把這座鐘送給王尙書，作為禮物。這真是好主意，因為這當兒，王尙書正想自己照料着這外國人，未免太過份了，要擔負極大責任，有些害怕起來，便想擺脫這干係。再則南京通政司對利公的請求狀，也已批駁了，不准轉奏；這張狀詞是由利公特請一位專擅寫狀的文士撰就的，雖則不會寫滿半張稟帖，出的代價却很可觀，要費去銀元八枚。（註三十二）幸而王尙書的親屬，尤其是他的母舅，替利公從中說項勸他不可食言；他又見許多達官顯宦，因夙聞利公盛名，此來帶着珍奇貢品，極願一廣眼界，便都親來拜會，這就更使他不敢輕諾寡信，中途拋棄利公了。以後利公既須處處留神，免為旁人窺破，却又因過於隱匿，反致引起猜疑。如果到了八月底，王尙書還不決定由較近的陸路，起程北上，使利公一行人，乘着他裝載行李的快船，由兩名差役押運進京，那麼日子久了，這樣詭秘的行蹤，就會惹人紛紛議論，難保不因此發生絕大危險。

這當兒，似乎王尙書決定繼續翼護利公那最有效的動機，是出於利公所要進呈御覽的那幅世界輿圖；他從南昌一路到南京時，暇來便已把這幅輿圖仔細觀看過了。他到了南京，便是許多舊時僚屬送給他種種禮物，慶賀他復職，他見這些賀禮中，也有一幅世界輿圖，却没有註明作者的名字。一天，他當着幕僚向利公道：「你看怪不怪，我們中國也知道世界各國，還附着各種說明和你給我看過的圖上所有的一般；那麼你就不是第一個把這種學識傳給我們啦。」利公一瞥眼

就看出這是他作品的抄本『好像做父親的認得自己的孩子一樣。』一經查問才知道幅新輿圖是南京總督趙可懷送來的。趙總督到任時，從前任南雄州丞，現任鎮江府長官王應麟得來。原來王應麟在肇慶時把利公的原圖刻成木版，如今又在蘇州鑄石，題名「山海輿地圖」。(註三十三)又加上了一篇頌揚作者的序文。王尚書見他門下客的作品竟被總督這樣重視，不禁喜出望外，便趕緊去見趙總督，告訴他這世界輿圖真正的著作人，此刻正路過南京，不日要到北京咧。趙總督於是立即命衛隊長押着車轎，去把這位外國賓客請來，無論如何要請到。這當兒，利公等正忙着預備下一天就動身，但王尚書歡他勿却總督的禮請，要結識有益人物，這正是唯一的機會。於是郭居靜司鐸乘船先發，利公却帶了進貢的禮品跟着來人前去參見總督了。

趙可懷也和他的前任一般，認南京百官叢集，行使職務太不方便，決定在南京東南相距不滿一日行程的句容城裏設治駐紮。(註三十四)他接待這位義籍耶穌會教士的態度，可說再懇摯沒有了，如果利公不是急急要追上他的同志們，同舟北上，說不定要留他再作十天八天的盤桓。他和利公相見後，便暢談着曆算和歐洲的事情，利公送給他幾樣小東西，又拿出威尼斯玻璃製的三稜鏡來，給他賞鑒，特別給他瞻仰那裝在玻璃鏡框裏的救世主像。那時中國的畫家還不知道油畫的彩繪，和西洋畫的遠景法，所以趙總督看了這幅畫像，便不禁目瞪口呆，稱奇不已。

據利公講，(註三十五)他拿這幅救世主聖像給總督觀看的時候，他正在房裏臥，起先他一看便發呆，一聲不響，隨後，他用兩手把兩扇蓋門掩上了，掉過臉來。利公不懂得他爲甚麼不願意看，以爲他看了害怕，便說：「大人這是主的肖像，是天地的君王。」總督回說：「不須說得這般像，一看就可知不是凡人的形像啦。但這地方不宜供天帝像。」原來總督

衙門裏有一所高閣，那裏可以看得見青天，趙總督便把這閣樓收拾得非常整潔，依着讀書人的習慣，在閣上祀天。這是一種香堂，畫棟雕樑，裝飾非常講究，堂前開着三道門，中間是正門，東西兩旁是邊門，四週有迴廊圍着精緻的欄杆，向下眺望，可以看見栽花植樹的庭院。趙總督親自捧了救世主像到祭壇上，供着壇前神案上，設着極精緻的香爐，然後穿上公服，向聖像恭行跪拜，四次下跪叩首。拜罷，起來，還不敢對聖像正視，却到旁邊站着，肅然瞻仰聖容，仰慕了好一會兒才罷。接着闔署屬僚，便也一一拜過，其中有一個便奉命担任司香職務，逐月添香。當他們敬拜的時候，利公始終在旁伺候，經過了很久的時間。總督又使人請到了本城的重要人物，來參加這新典禮，特別是本省的提學使，後來做了福建總督，在京裏替教士們出過許多力的秦（Canzain）（註三十六）每次行禮，利公總是在旁陪着，虔誦他的日課經，把前途的事業托付天主。

光陰荏苒，利公盤桓已久，便該告辭了。趙可懷本想留住利公，請他製造渾天儀、地球儀和其他曆算用的儀器，但結果仍決定讓利公動身，還送給他許多銀子作路費，這正合着利公的需用。這位封疆大吏畢竟識不凡，預料利公此番進京，不免要遇到種種困難，人家看來利公這回嘗試，大概總會成功，他却沒有這種幻想。他沒有甚麼囑咐的話，只教人打轎送利公到江邊下船。利公就坐快艇到淮安，郭居靜已在那裏候他了。他在句容耽擱的日子雖則很少，却已留着不能磨滅的印象，便在他去世前幾月中，他還不住想起那備預進貢的聖像，得在句容督署裏供奉幾時而引以為榮。（註三十七）

趙總督對利公優渥的待遇，足使教士們稍釋憂懷，但利公等出了南京，又不得不勉強忍耐，去認識那中國的醜類——太監了。那時南北交通要道的運河被太監們把持着，王尚書此番北上，也就不得不向他們僱下一艘船，叫快馬船。（註

三十八) 利公等爲免受拘束起見，不願和玉尙書的僕役們在一起，便出貲另外包定了一間大房艙，講定出價十六銀元，已預付過半數，交給舵夫了。却不料那船主人——太監——定要他們如數付清，連先前付過的也不算。他正逼着郭居靜連行李一齊搬上岸，恰巧利公回來了，仗着自己和總督交好便使人，和這太監理論，教他明白這種行爲真沒道理，還藉口他如此無禮不肯把東西送給他，也不去拜望他，因此教士們一路前行就同他毫不通問。這個太監只當他們是王尙書一家人，竟不知道他們是外國人。

夏季的暑熱很酷烈，路程又極長，教士們在南京的時候，已苦極啦，如今又蜇伏艙中，絕足不出，便一個個相繼病倒了。但天主護佑着他們，所以結果也就相繼痊愈了。在這種不利的環境下，要專心一志研究地理，那真是不容易啦！便是利公關於此行的記述，也是後來寫成的。(註三十九) 這御用的運河，初看似乎十分了不得，實在並不見得十分特殊，因爲這並不和現代人工開鑿的河道一般，有高低均勻的河身，却是把游淤積的河道和所有的湖沼，低窪，開通了接連起來；高低差不多的地方，用一種形式很特別的水閘來節制水流。所以這條河道差不多處處都有蜿蜒曲折的形勢，而且河身的寬窄，也是極不相等的。船還沒有駛入山東境內的時候，便要進過黃河——大家猜想起來，總以爲這便是運河，或者另外一條相距不遠，恒河所從發源的河。(註四十)

教士們的性情本來是喜靜不喜動的，此刻坐在船裏，更刻刻留神，絕不探首向外，一舉一動，也必力避一切足以使人認爲有間諜嫌疑的行爲，所以他們一路行來，都能安然通過，全沒有遇到困難，便是到了天津有直隸總督調集的防倭的艦隊往來巡弋，也沒有遇到留難。他們沿途窺測太陽的高度，以定各大城市的緯度。(註四十一) 和水道行程的距離。

(註四十二)

一五九八年九月七日，聖母聖誕瞻禮前日，利公等終於到達了北京，城外的水碼頭通州。他們到了那裏，還是小在意，力避引人注意。王尙書由陸路進京，比他們先到；他們便進城去謁見他。承他厚意款留，他們就遵命住下，却教那同來兩修士寄寓城外王尙書的別墅。這當兒，京中盛傳王尙書將陞任北京禮部尙書，這在他個人固然是榮耀的陞遷，對於利公却也十分有利。可是等了好幾天，還不見有諭旨頒下，王尙書便決計去和一個大監接洽，這個大監原是已經答應過替利公郭二公設法代表的。他請這位大監到他城外的別業，檢閱利公的貢品。他到了以後，照例向利公屈一膝請安，王尙書便留他進膳。飯後，他就檢閱那些進貢的東西。他看到一座自鳴鐘，連那裝金精刻的甌子，一憤救世主像，一座八音琴，這是中國從沒有見過的，(註四十三)兩個威尼斯的三稜鏡，這些東西，他看來都是十分出色，便是那尊聖母像，在上岸後，搬運進城的時候，已打破了碎成三段，只得逐段膠起來修補好，却也一點看不出，反教他看了覺得更莊嚴。他看罷了以後，便向利郭二公熱烈道賀，可是他見利公等並不提起點金術的秘方，便有些不樂意起來，說教士們揀這個時候進京真揀得不巧，在這倭寇猖獗的當兒，中國人對外國人分別不出誰好誰壞，一個也不敢招留！

這些話傳到了王尙書耳朶裏，加上他陞遷的諭旨延不發表，他便認原來的計劃已失敗了，便要立即打發利公等回南京，因為照定例他在京裏耽擱的日子是限定的，日子一到，他自己也得動身。 (註四十四) 利公却不肯就此認輸，還想竭力設法，在這首都勾留不去。不料他到處碰壁，他租下了屋子，就得籌款應用。澳門的李瑪諾司鐸，曾給他一張滙票，還北京一家商店支取，利公去找這個商人，却總找不到這樣姓名的人；這張滙票原是假的。以前他在南京時，也有過一張滙

票，拿去兌現時才發覺是偽造的。他的幾個老朋友，此刻在京裏做了官，便反眼不認人，他去拜訪時，都不肯接見；他拿了王尙書的荐書去見幾個官也都遭擯。

利公記着：「皇帝很殘暴大家都害怕他；太監們往往無緣無故被他殺戮，或遭笞杖。外面的事情，除非有機會可以弄錢以外，他都不管。北京的官僚也是一樣，只知道問到京裏來的人要錢，以爲外省的官發了財，要他們「孝敬」，以致這首都真像在混亂狀態中的巴比倫一樣，充滿着種種罪惡，找不到公正誠篤，或是有志自救的人。」

利公因見他多年憧憬着的好夢，一朝煙消雲散懷着一腔幽憤，不禁發出這樣峻刻的批評。所幸這種情形不是一成不變的，不過我們看了他的記載，就可以知道他所以認在京宣揚聖化的時間還沒有來到，決計回到南京免致失却體面，把他全部的功業，弄到無可挽救的緣故了。因此他終於化了極便宜的價錢僱下一艘船啟程南下。

這回到北京走一遭，也不是完全無益的。（註四十五）且不說教士們因此看到中國政治的真相，增進了許多見識，便是測定北京緯度的方位，也可以算得地理學上一種重要的貢獻。此外，他們又從那些偽充貢使來京的波斯人，和四十年前從阿拉伯來京進貢一頭活獅子的兩個土耳其人。（註四十六）那裏獲得種種消息發見馬可索羅遊記中所備的喀泰（Cathay）正是中國的訛名，這也未始不是一種有價值的收穫。

最足稱的，便是他們在往返兩次的長途中，利用餘暇，來完成一種使研究漢學的歐洲人，能以用作基礎的作品。「和他們同行的鍾巴相修士，漢文程度不差，所以他們不難把中國字彙集了，製成一張表，註明每一字的解釋和用法，研究起來，困難就可減少一半。他們講中國字都是單音，所以必須注意聲韻，發音，還得分明輕重，清濁；有許多字都是憑發音來

區別的，除此以外，就毫無二致，漢文所以難學也就爲此緣故。……所以他們把清濁音，分得格外清楚，並註明五種不同的讀音。郭居靜司鐸懂得音樂所以他分辨音韻，尤其是在行。他們便依着這方法規定五種清音，一種濁音，使凡用西洋字母併出中國字讀音的人有所依據，又定下了一律的併音法使讀者咸歸一致。利公便下令以後教士們該一律遵守這種法則，不得隨意譯音；以前弄得雜亂無章正是爲了大家隨意併寫的緣故。這樣規定了以後大家就不難照這編定的字彙——後來又陸續添了幾部字彙——按部就班，完全學會了，還可以利用他人的寫做和註解，得到許多效益。這當兒，利公又乘機修正了他所著四書的譯文和註解，這對於初學的人給予的助力，真是不可勝道啦。」（註四十七）再則，似乎從這時候起，新來的教士們，都得先學言語，後讀書，不是語體文言，同時學習了。（註十八）

現代中國的友邦人士，都知道各國漢學家個個注意到拉丁字母來給中國字作注音的困難問題，因而對於利公和他同志們首創的注音法，雖則未見完備仍不禁要向他表示感謝；這種效果，便是利公初次嘗試晉京的最大收穫。

第五章 重到舊都漸入佳境

自利公毅然決定擯棄迹近佛教形式的外觀，先從精神方面入手以後，他一路前行，便隨處都能遇到儒士中的優份子，準備接受天主教的初步教義；但惡思想的灌輸，又因地方官員不時調任，中國十五省中，他所結識的朋友，也算得是同志——算來已佔着十省了，那具有同情，或因胆小怯不肯急明白表示的人更不必說啦。（註一）然而利公要求得中國皇帝許可的心太急了，所以只顧向前急進，忽視了許多可以叩入人心的途徑，不去從那裏謀發展。現在他是有經驗了。知道這時候去探皇帝的意旨，總嫌得太早啦；因此他決計改向那可以容納天主教人文主義的中心去開發；他原已感覺到，也已知道，這些地方是可以傳揚基督教化的。瞿太素不是曾經再三要求他到蘇州一帶去住下嗎？似乎一切環境，容許他在這一帶地方建立一處傳教新機關。

在北京南下的歸途中，「因着船主人的貧乏，舒適的航行，就變得方便了。」（註二）化的錢果然不多，但水手既少得多物質上的需要又很缺乏，船行駛了一個月，還沒有過臨清。他們啟行的日子是十一月五日（註三）已在很晚的季節了；這當兒，河裏已結了冰，這艘船就不得不在封港期間，勉強行駛着。利公不願虛耗四五個月寶貴的光陰，又恐路上還有危險。（註四）便決計讓郭公守着行李，自己帶了兩個僕人，捨舟登陸，取道宿州揚州南下。他在這麼大冷天，騎馬趕路真苦極啦！竟凍得下了兩次赤痢，病勢來得十分厲害。「他所以能再度痊愈，真是吾主的靈蹟」因為他除了下馬踏雪步行外，更沒有其他治療的方法。過了揚子江，天氣暖一點他原可以在鎮江僱船再上水路。無奈這一段河身極狹，來往的

船隻又很擁擠，利公怕被阻塞，便僱了一輛小車向前進發，坐在一邊硬板上，雖然省力，却頗得苦。（註五）到了蘇州城他已乏極了。太素不在那裏，却在丹陽。利公找到他以後，他款接利公的殷勤懇摯，簡直想像不來。那時他奇屈在一座廟裏住的地方很簡陋。利公同他盤桓了有一個月光景，他待這位老師，竟如待父親一般，把床讓給利公，自己睡在地板上，又被費了許多錢，款待他照應得十分周到。利公知道他心愛着三稜鏡，便拿一個送給他，作為酬報。他得了這東西如獲異寶，便定做一個銀匣子裝起來，匣子兩頭，還用金鏈條繫着，又寫了一首詩，記述這件事。後來有人願出五百金換這一寶物，他却拒絕了；至少在利公沒有進貢以前，他是決不肯賣的，只怕被人買去了先去進貢，這東西便失去價值了。結果過了兩年，他才肯出讓，把賣得的錢償付了不少債項。（註六）

在這般勤待客的鄉邦，又有情真意摯的朋友從旁贊助，利公就可提出原有計劃隨意討論，不必有所顧忌了。這山明水媚的蘇州，的確是建立新住院的理想境界。中國俗諺有句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可知這地方是人世間的天堂了。果然蘇州地處最富饒區域的中心，握着中國經濟的樞紐。（註七）便是蘇州一府每年入貢的錢糧綢緞等物，要值一萬二千萬元，足抵某幾省全省的賦稅。這便是馬可孛羅遊記中所警奇艷羨而詳細描寫的一偉大華貴的蘇州。當時的蘇州城仍和從前一般，周圍不過六十千步，一那六千步的環洞大石橋，可以容大龍船通過的已不得看見了，但在這「中國的威尼斯」中人煙稠密，依然擁擠喧鬧，船舶往來，也仍絡繹不絕。

蘇州向來不受政治勢力的支配。這地方文風鼎盛，常保持着前進和開放的姿態。據說，凡是美的東西如書畫雕刻銅羅錫器綢緞綾羅等，都出在蘇州，便是人物的雅麗也要推蘇州，一府為第一。也有人說：「一個人要有福氣，便該生在蘇州，

活在廣州，死在杭州。因為蘇州人長得最標緻，廣州人活得最好過，杭州出得好棺材。再則，中國人要算蘇州一帶最聰明，嗜好最精審。這地方的風俗，把讀書看作最風光的事，在這裏刊印的書冊試卷，全國風行，爭先傳誦。丁文江氏估計蘇州一屬精神方面的價值，曾說十六世紀後半世紀中這正是全國首屈一指的人才淵藪，文化中心。這時代中，清代翰林共計六千二百人，江蘇一省佔六份之一，（實數一千零十二人，在前五名的一百八十三人。）其中二百八十三人是蘇州籍。（元和一縣已有一百八十人。）（註九）現代藝術史家還保存着一五七〇年四月間，江南四大家聯合舉行古董展覽的遺跡，其中有一座據說是文王用的周鼎一張，白玉古琴一個，宋代官爐此外，又有現由英國博物院保存的願懺之的「訓誥」。當時有某名士曾記：「余於一日中得親如許稀世奇珍，真乃三生有幸！」（註十）

利公的德學，已由瞿太素向這地方的名流誇耀過了，我們讀了他前述的書信，便知當地羣儒亟願和利公相見啦。（註十一）那時歐洲人每有一「冥頑亞洲」的成見，我們看了亞洲的這一角，便知這種成見，是沒根據的。當然揚子江口這一帶地方的有名人物不知道十九世紀中歐洲各國的動盪，以及經濟發展和社會革命的情形，却絕不像歐洲某作家所描寫的一般，是這大陸上昏昏沉沉睡感覺麻木的人民。恰是相反，而且這正當利公來到的時代，那裏知識界正呈現着極大的變遷，不難一看就見，所以就哲學觀點講，說中國人凝滯不動，這簡直是無稽之談。只是種種原因確使進步受了阻礙，而明末宦官的專橫，滿清的入寇，尤其是為害不淺。但無論如何，利公專心一志，對於中國文化要繼續下一番深切研究的大功夫，希望經過澈底研究之後，就可以着手把西方的人文，深深印入這東方世界的人心。他認定除蘇州外找不到更適宜的地方了。瞿太素和他的親友們一致勸他切勿到南京住下說這地方雖然很相近，却很不可靠，「那裏大官僚這

麼多只要有一個不樂意，就有遭受驅逐的危險。」大家於是決定利公要到南京必須先由蘇州官廳請得王尙書，和別的友好們出書保舉才可以去得。否則即使有幾個大人物供給房屋，要久居南京也必不能獲得當局許可。

這當兒已近中國新年了，（一五九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這正是諸事進行極不方便的季节，大家都忙着拜年送禮，預備宴會。」利公便和瞿太素僱船先到鎮江，去會會那位好朋友鎮江知府王應麟。王知府留他們過年，設宴款待，邀請許多名流陪席。他們盤桓了好幾天，王知府便預備一艘官船聽他們使用，利公見這艘船可作保障便領受了他的盛情。二月十六日，利公就從近運河的城門，進了南京城，在白天大踏步來往行走着。（註十二）

奇怪哪！他一進城便認出這是在鄱陽湖中所夢見的境界。（註十三）此刻在這大都會中，大家正在慶祝昇平，因為日本軍閥豐臣秀吉死了，以後（一五九八年九月十五日）日本軍隊便放棄了高麗狼狽回國，倭寇的侵擾已完全解除了；民間盛傳中國軍隊打勝仗，稱讚着將士的忠勇，南京政府當局也因從此可以免却催解餉銀，供應大軍而一彈冠相慶了。

利公只知教宗西斯篤五世以前的羅馬，人口減少得只剩幾萬，街道狹隘，路面圯裂，兩旁只見破陋的房屋。所以他以前讀過一篇記載南京的中國文章還不敢十分相信，如今眼見了這南京城，便覺目眩神迷啦！（註十四）的確明代的南京城是一座雄偉的都市，可以比得十九世紀中歐洲各國的大都會。朱洪武開國後，定都南京，便把這座城市整治得成爲一種奇觀；東方各國的大都市沒有一個可以比得上他。

當十四世紀的末葉，南京正是繁華富庶的首都，是明初皇朝的駐地，強有力機構的主腦；是明太祖征服全國後軍旅

的大木營，行政的中樞，財富的總庫，華廈如雲，工場林立，人煙稠密，市廛喧騰，車馬絡繹，摩肩接轂，爲文人學士，商賈工師，四方藝匠，齊萃之區；文武滿朝，居民有增無已，生氣蓬勃，大有蒸蒸日上之勢。（註十五）

到了十五世紀初葉，明成祖遷都燕京，南京的政治地位，就一落千丈，可是在中國文化上的重要性却並沒有多大減損。但看那彼此互相掩護的三座城垣，已足引起遊客的幻想，感覺中國文化的偉大了。利公曾記：（註十六）「第一座城，周圍約四五『羅馬』里，便是圍繞皇宮的宮城，宮城外還圍着三重城牆，築得和堡壘一般，牆頭很高，裏面還掘着灌水的城壕。第二座城，周圍約十二里，圍繞着皇宮和大部份南京區域。進城的地方有十二處，每一處分着四個城門，彼此相距擲石之地；城門包着鐵皮，城頭上排着炮。第三座城是不連續的，築在保護比較鬆弛一點的地方；那裏，沒有天然的屏障，山或是河，據說周圍約四十里，『三十八公里。』果然在這廣大的城圈裏，不是完全有人住着，但到處都有田野，山林，池沼，園囿，還有佔地極廣的果園蔬圃；便在宮城裏也是如此。

拱衛南京的軍隊，常有四萬多官兵。他的位置是緯度三十二度又四分之一，正當全國的中區，便做了中國的銷輪，和心臟。東北的揚子江，不但造就了他龍蟠虎踞的雄姿，還給他增加了大宗財富，因爲城外的河道縱橫，四通八達，商貨的運輸，食糧的接濟，真是便利極了。」

南京在地理上既佔着那麼有利的形勢，政治上，還配合着一種特別的大權，所以接着利公便說：「中國人以爲這是全世界最偉大最壯麗的都市，實在他在世界各大都市中並不多讓，因爲許多規模宏大的公私華廈，到處可以見到；寺院浮屠，也頗不少，橋樑多不勝計；田土肥沃，更極有名；氣候溫和，人物高尚，舉止文雅，言語嫻習；最後一點，就是人口繁盛……」

不但在中國是首屈一指，便在東方各國中也應站在前列。」

利公看了中國人的建築術，（註十七）就知道分析出各種的優良。他一路走去，就隨處見到了種種最稀罕的建築遺型，如那著名的瓷塔等。（註十八）但引他特別注意的，便是中國人的精神，尤其是儒士們的精神，這便是中國文化基本特點最好的表現。

他說中國政府遷移到北京以後，（註十九）南京尊嚴的地位，所失不多。因為朝中百官仍舊保留着，照常行使職權，不過是有名無實罷了。有一位世襲的國公代替皇帝留着，總理南京政務，下設六部九卿和北京一般。南京城裏，也像中國各城市一樣，所有市房都很矮，也看不到雕琢的節孝坊，因為這裏的官僚要比別處謙謹些，出門坐涼轎，用旗牌喝道的人很少。」

這幾句話，把明代政制上南京所有的特別地位說得很準確，因此我們不妨略為伸說一下。一般說來，假使我們信任歐爾德司鐸（Olecring）綜和教士們情報的話（註二十）便知「中國」為政治民」的要道全從父母對子女，子女對父母的天職得來。天子稱為全國的父母，總督稱為全省的父母，各地方的府縣官，稱為民間的父母官，這是一種極簡單的普通原則，中國百姓所以對那幫助皇帝，分担当國重任的官員這樣恭敬，這樣唯命是聽，便是根據這種原則。

在這君主政體最初制定的時代，便已把百官分為九品，這種品級的尊卑上下，統屬極為嚴密，下屬對於上司的尊敬恭順，真是甚麼都比不來的。」

翟太素只是個秀才，王應麟是鎮江知府，趙可懷是督撫，這些人比了南京的朝廷大臣簡直是卑微不足道。這班大臣，

有志實現「聖門子弟」的理想，就是凡屬讀書明理的人，都有參加治國的主權，依着他所有那無窮複雜的立身處世的大學問，整飭他的公私生活，他們以為治權的原則，不是重在個人的意旨，——這種意旨，越不肯虛心下問，就必越發一意孤行，——却重在集思廣益，博採眾議，使庶政公諸輿論。所以在理論上，治國應任賢士，人君但有統制權以保障這原則的經常運用而已。天子所有真正的任務，不在乎躬自為政，却在為國求賢；任用百官的方法便是考試制度。（註二十二）

南京雖不是中國的首都，却因留着一種不可思議的體制，設置六部九卿，仍不失為中國第二首都。可是在這裏皇帝的勢力，尤其是做他耳目的太監們的勢力，比在北京要薄弱得多，除了那些只享尊榮，毫無權力的貴族階級以外，只有一班沒有實權的大官僚統轄着各級官吏裝場面；却因一切要公，都得候北京方面核奪施行，這些人員差不多都是虛應故事，不能有所作為。名義上，南京的最高統治權，屬於北京皇帝，實則一切事務都由六部處理。

為使讀者們易於明瞭起見，我們不妨把六部的情形概述一下：（註二十二）各部有一位尚書主管，這是一品大員；尚書以下有左右兩侍郎，是二品官，附設各司，共計四十四司，各司有郎中員。王管，下設主事十二人。六部的名稱：一、吏部，是管轄文職的最高機關，各級文官的遴選，委任，升遷，黜降，考績等，都歸吏部主管。二、戶部，管理賦稅，鹽權，漕糧，戶口等事。三、禮部，主管祭祀，禮典，喪儀，曆政，考試，等事。四、兵部，統轄武職，管理公郵驛站。五、刑部，審核刑事案件，覆按用刑當否。六、工部，管理建築修繕宮殿，陵寢，衙署，官舍，城堡，要塞，疏治河道等事……

這六部中，利公最關心的是禮部，因為那招待外國人的迎賓館和專管曆政的欽天監都屬禮部管轄，巧得很，如今王忠銘正做着南京禮部尚書。（註二十二）這真可說是出於天主上智的安排。南京官場中都談着王尚書帶利瑪竇上北

京，給皇上進貢奇珍異寶，却因那時倭寇猖狂，只落得空走一遭，因此，便有許多人要看這些進貢的東西，特別是那一「自鳴」鐘：至於那畫像和八音琴，「他們都說妙極，不但出神入化而且竟是神奇莫測。」

利公和瞿太素到了南京，便在承恩寺寄寓。這座寺院是在舊城中區內橋東南，離內橋只幾步。（註二十四）太素的朋友們就都來看他了。他照常介紹利公和他們相見，有人問說，便給他一一說明。他不住向人揄揚利公，每說：「他憑着自己的學問，使我們中國讀書人豁然開朗，因此，讀書人到處要留住他。」過了幾天，利公便去謁見王尙書，受到熱烈歡迎。王尙書的雅意，幾乎使利公進退兩難，他勸利公在他公館附近買一所屋子住下。利公本來決計要回蘇州，却又覺得盛意難却，因此默然不答，却不料他立即命人去找屋子啦。王尙書隨即擺下全副排場，去答拜利公到了廟裏，受他管束的那方丈和尚便下跪獻茶。尙書對利公表示格外親熱，請他到自己公館裏盤桓兩三天過元宵節。他在正月裏「大放煙火大約一個月用去的硝磺火藥，要比在歐洲連續作戰兩三年用去的還要多。」（註二十五）這位一品大員，南京六部尙書之一所有這樣優異的待遇，頓使利公備受官場尊敬。王尙書的同僚和屬員們，於是爭先結識，都對利公客氣非凡，不讓王尙書專美於前了。當下，便有三個貴顯人物前來求見利公。第一便是那世襲爵位，那時年紀只有十四歲的開國公，常坐着八人轎出入。他托他的叔父作先容，目的在賞鑒幾樣西洋物品，他爵邸中的花園，在南京城中要算第一，「有各種天然大理石做成的假山，用人工鑿成許多山洞，洞裏有臥室，廳堂，石梯，魚池，樹木，和其他種種的點綴，都是窮奢極侈的技工……花園的構造是迷宮式，必須費兩三小時，才能走遍全境。」（註二十六）

在這位貴人以下的第二人物，要算那駐軍統領馮慶厚了，前番利公到南京時，他只做不聞不問，這回却和利郭兩公

做了好朋友：「這就使教士們以後的安全有了保障啦。」（註二十七）第三人物，是太監的老總管。太監的總數有幾千，除在皇宮裏當差外，其餘派在城門上服務，有許多還佔着重要職位。這是一個衰廢的老人，「照他們的習慣，是不懂得客氣的，」要利公稱他「千歲。」利公憑往日的經驗，知道中國讀書人對權貴的態度應該「不亢不卑，」平時和尙書們周旋，晉接總是侃侃而談，無所顧忌，所以這回一定不肯遷就。好在這老太監年邁耳聾，利公進見的時候，照例，幾句客套，可是他身邊的人，到他耳朵邊大聲叫喊，却把話變換了，叫他「老千歲，」但著他送給利公一份厚禮，便知他非凡得意咧。他先曾教人示意利公，要他送一個三稜鏡；利公沒有答應，所以此刻利公不肯受他這份禮。後來，利公答應了，不過要他設法弄一張合法的護照，好到北京。末了，只見他只答應，不見他辦到，便告辭了，就此絕足不再去看他。（註二十八）

這件事，教我們看得出在一班清正的官員和那醜類的太監拚命奮鬥的當兒，利公是始終站在前者這一邊的。當十六世紀末年，在朝賢臣，力求整飭吏治，銳意革除引用私人的積弊。那時大臣如趙南星、顧憲成輩，便首先把本家親族的官職分別解除，一切差缺都量才錄用，可是到了他們要想這把種辦法普遍推行的時候，便和閹黨大起衝突。歷史昭示我們，顧憲成曾爲了這事和大學士王錫爵力爭不得，憤權奸竊政，朝綱失墮，賄賂公行，便辭官回籍。（無錫）從事講學。（一五九四年）到了一六〇四年便產生了那所謂東林黨。（註二十九）那幾位和利公交好的南京大員中，至少有一位在奸閹魏忠賢竊政時代被人目爲東林黨的主要代表人物出了名這一位便是後來入閣的葉向高相國如，今正做着南京禮部侍郎。（註三十）其他大臣們如刑部尙書趙（註三十一）侍郎王（註三十二）戶部尙書張孟男（註三十三）侍郎葉（註三十四）等也和利公來往。王尙書（忠銘）待利公的情誼，始終不渝。（註三十五）又給他介紹了一個姓顧

的湖廣人（註三十六）和一個姓般的福建人（註三十七）這兩個後來都做到北京禮部侍郎。利公對刑部趙尙書，王侍郎，戶部張尙書，是備了禮先去拜會的。他們都很客氣地接見他，說他們願意他在南京住下，臨別時，還直送出大門，願殷兩人却是由王尙書帶領到利公寓所來相訪的。

兩月前，利公本已決定住在蘇州了，想不到這回到南京官場中待他竟這麼客氣，就不得不把他決定的主意重行考慮一下：「天主的聖意不是正表示着，相反的意思嗎？」六個月前誰也不肯招留他，便是過一夜，也不行；如今，他的朋友們一聽到他想買屋子便都踴躍捐輸，天天有人餽送財物啦！現在他在大街上公然來往，各衙門隨意出入，誰也不來盤詰，不必再像從前那樣遮遮掩掩，忽忽混過了。

過不多時，有一樁奇遇，使利公和太素兩人的懷疑得到了最後解決。那時，在南京求功名的志士中，有一位著名的文士，叫李心齋（註三十八）他的父親做過總督，他應過兩場鄉試，文名極盛，官場中都要請他寫壽屏，做祭文，輓聯等，一切祝賀祭的文章，因此，很受人尊重。他除了憑着文藝賺得許多財物之外，還應幾個大官僚的聘請，給他們的子弟授課講學，又曾指導他的兒子編纂了一部不留名的算學書，却是一部大著作。他一見利公和太素二人，便知這兩位，尤其是這位西洋人，正是他的勁敵。太素也就看出了這種敵對的形勢，只怕將來利公要因此受到妨害，便決計親自出面拉攏，把利公托他照顧。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了一個知交，便說：「我有一隻羊養了好幾年，現在送給別人去受用了。」他們於是到李心齋府上去拜訪，談話中，太素便乘機說起他到南京來，不想常住，不過給朋友幫幫忙，過後還是要回去的。他想朋友中能照顧利公的，誰也不及李某好，所以他要求他給利公吹噓保護。這位文人聽太素這樣恭維他，不禁心花怒放，樂不可支；當下

便發表他對於利公僑居南京的意見，說，甚麼地方都不及南京好。他聽利公說南京對外國人十分猜忌，便加反駁說：「那蘇州更容易惹禍啦。因為這地方離海不遠，捐稅繁重，有一種自然的趨勢，要起叛亂。」再則在別的地方，只要有一個官府不和意，就够使利公遭驅逐，在這裏要反對一個不合意的人，必得有十個官和他做一黨才行。這篇大道理就消釋了他們倆最後的疑慮；因此利公決計放棄蘇州在南京住下。

他如今有了王尙書、瞿太素和李心齋這三個誠摯的保護人做後盾，只須再得一個人贊助，就萬無一失了。這人便是主管南京城的應天府府尹 祝石林（註三十九）他是江西 德興人。這當兒，兼攝着八九種職務，所以有很大的權力，這位府尹寫得一手好字，各種書法都極有功夫，便是在南京七八行的立軸，要賣一兩銀子。」他印了一本勸人行善的書，也不時到書院裏高談闊論，他從王尙書一班人那裏，得到了利公的交友論，讀來漸覺有味。大家於是商妥了使利公和他相見；在會晤的時候，他就這樣定了案。他說：「我知道利先生在本國江西等處住過多時，所以他已不是外國人了，如今他也和其他許多人一樣到南京來居住，還有誰來阻當呢？」他還引南京城裏有許多回子們証實他最後一句話，這口頭的核准就把利公以前所有的疑慮完全打消了。

利公於是着手找寓所，先向人租屋暫住，看有沒有誰出來阻撓，過了幾時，才想定主意買一所屋子，用郭居靜（這時在臨清等處）所帶的錢支付第一批房價，再向澳門方面借款找清。利公把這計劃通知王尙書，尙書便想把某侍郎的住宅讓給他，那時這座宅院正沒人住着。利公怕招物議，只願借用宅裏的傢具。這樣他的新住院就成立了，便有許多人來拜訪，而且越來越多。南昌的教士們得了信（註四十）莫不萬分快慰，當下，便把舉祭應用的東西，趕緊送到，又竭力設法湊

集了一點錢資助利公。

和利公往來的有名人物中，有一位是狀元（註四十一）做過了幾任長官之後，便退隱還鄉，安居度日，受人尊敬。他對儒釋道三教，都有極深切的研究，在文人集會中不時和人辯論三教道理。他家裏供養着一個門客，便是那名震一時，行年七十的李贊（註四十二）這一位官做到知府，不知怎樣勘破紅塵削髮棄家，做了和尚自創一種教派，却有不少信奉他的子弟。利公和這兩位名士周旋晉接，是值得記述的。那位曠傲王侯目空一世，不肯輕易晉謁達官顯宦的李贊和尚，竟不惜紆尊枉駕先來拜訪利公。利公前往答拜的時候，他帶了許多隨侍左右的子弟們簇擁着出來相見，彼此暢談宗教，談得很久，但他不肯討論也不辯駁，只說你們的天主教是好的。他送給利公兩把扇子上面寫着兩首小詩，是他親筆寫作。這兩首詩後來有許多人抄讀，還收入他的詩集中，刊印出來。末了，他命人把利公的交友論謄錄了好幾份，加上幾句推崇的話，寄給他湖廣一帶為數很多的門生。因此這新任住院甫經成立，便已開始向全國傳揚天主教道理了。

利公一方面，也想把那有國教性質的儒教澈底研究一下，很願意升堂入室一窺奧秘。他曾講：「（註四十三）舉行祀孔大典的上一天，禮部尚書王忠銘領他到大禮殿參觀演習下一天的典禮，殿裏道士們和太常寺的樂官們駐守，與祭的人都穿戴着很珍貴的裝束。利公和王尚書的子弟們及隨從們站在第一行。各種樂器多得數不清，有許多惟有舉行這大典時，才取出使用，有的是銅製的，（如鐘鈴鐃鈸等。）有的是石器，有的是皮製的，（如各種鼓類）有張弦的古琴，也有簫，笛，有幾種憑空氣發音的管樂器，吹的時候不用簧，只用嘴；還有幾樣獸形的樂器是用細棒敲在齒牙間發音的。這些樂器一齊奏起來不能令人肅然起敬。因為說句老實話，這種音樂不是和諧奏，却是雜亂的混奏，甚至中國人自己也不否認，

承認古法已經失傳，以致有了古樂器，却用得不得其法。」

利公趁此機會，還把這大禮殿的偉麗描寫一番。他說：「殿的建築宏偉壯麗，真是大國風光。殿在園林——大概是松林——內部。松林四周，圍着高牆，周圍十二里（羅馬里）。除了牆垣用磚砌外，這偉大建築物，是用木料構造然而的確很值得見識一下。大殿分五間有四排柱子，這些柱子粗極了，兩個人還不能合抱，不但這麼粗還相當高。屋簷在殿前正面屋頂上的水便從那裏瀉下，這就和我們的大廈不同啦。屋頂上有許多裝飾，蓋的都是玻璃瓦，雖則造了二百多年，却仍煥然如新，一點沒有失掉當初鮮明的色潤。而且二百年來皇帝也不再到南京來祭祀了。大殿中間，立起一座高台，是用極名貴的白石造成的，台上設着兩個寶座，也是白石做的。一個是那主祭的皇帝坐的，另一個空着是給那享祭的留着的。（庶幾他不致因有人坐着而不悅。）殿外有廊廡，所有木質的裝飾，都雕刻得極精雅。殿外像皇宮一樣，護着銅絲網，防鳥雀飛進去，做窠下糞。門都包着銅皮，裝上各種銅製鍍金的獸形飾物。廟外有各種祭壇，是幾塊紅石頭，代表日、月、星、辰，和中國的山嶽；有一個池子代表海。（註四十四）所有樹木，絕對禁人攀折，犯者要處重刑，所以都是年代久遠繁榮暢茂的大樹。四周有幾座房屋和浴池，從前皇帝來行祭祀便在那裏沐浴。」

如今這座奇偉的大廈也和南京所有古代遺蹟一般，已完全成爲廢墟了。（註四十五）我們到了那裏要想把這位歐洲第一觀光客所有的回憶，重現在眼簾前已是不可能了。（註四十六）可是北京的天壇至今還在那裏矗立着，凡上去瞻仰這理想美的古蹟勝境，徘徊不忍去的人，就會發生一種深刻的感想，知道中國人自古以來，崇敬唯一真神的確是信而有徵的。新近蓋伯烈主教（Mgr de Guébriant）曾記着道：（註四十七）「我曾在天壇上，站在教宗欽使（剛恒義

總主教）身邊，和他同念天主經……這當兒，我才明白這天壇的神秘偉大這是我從來不曾懂得那麼明白的。」

近代某作家論及這事也曾想把他所有的衷情分析一下。（註四十八）我們不妨把他的話摘錄出來。他說：「大家知道中國皇帝每到冬至節，便到這裏來恭行祀天大典。這在一切祭祀中是最神聖的。中國最初宗教崇高玄奧的精神，因着這祀天大典而永存弗替。我們一走進這神聖的圍牆，便到了一個大園林裏……有這北京的光明燭照着這廣大精緻合於理想的北京似乎是爲薰沐賢士精神而建設的。我一路前行但見夾道松槐葱翠可愛……我走到幾處圍着紅牆的廂屋裏……這些屋子，從前作爲祭祀用的廚房宰作庫房等，如今却都空着，門戶大開，只剩下那些琉璃瓦算是富麗的遺跡。我隨意遊行，末了才望見了那有三重圍頂的屋子，給他吸引了過去。這便是那建築在三層白石台上的祀天壇，每到春季，皇帝便到這裏來祭天，祈求豐年，一切服用，如祭服，碗盞，珠簾等，都從藍色……四周屋院門庭，規模狹小，正是極相當的陪襯使全部建築更顯着莊嚴氣象……足見中國人也像古人一樣，不喜歡無謂的鋪張……屋頂上都蓋着琉璃瓦，有的碧綠有的深藍和蔚藍的天空相映成輝有溫和仁愛的意義……於是我便去瞻仰那聲名素著的祭壇。這和鄰近的先農壇一般底盤全用白石築成。這是一座圓形石台，共分三層，最上層最小，四面八方都有石級可登，並有石欄夾護着。石台最上層中央，建着一座圓形小殿並不很高……皇帝祭天大典便在這殿中舉行：每當立冬上一天，皇帝就擺駕出宮扈從儀仗，備極繁盛；但這決不只是物質上的鋪張，却是隆重的典禮，一舉一動必須悉尊古制。他穿着一件黑羊皮面的白狐裘，外罩龍袍，繡着日月星辰，進了這神聖的宮牆，先到供着先皇牌位的地方祝禱一番，請過祖訓，便進便殿收歛心神，齋戒沐浴。下一天一早，這祀天大典便在冬季天氣清寒的晨光矓微中開始舉行。皇帝向天奉獻太牢，絲麻，有一頭完全無缺的公牛，

一盤青石。可是這些祭獻，要安排下一片至誠心必恭必敬的奉獻上天，才算有用。……中國的古禮更沒有和這祀天大典同樣莊嚴盛大的了。（註四十九）利公參觀了這回典禮後感到的印象，在他所有對於中國儒教的見解上，發生着深刻的影響。

第六章 進入中國思想界的中心

天壇的建築並不那麼崇高，可是在象徵上，却高出任何崇山峻嶺。如今，利公在一處故事上天的地方，懷着拯救清新世界人靈的宏願，要深深叩入中國思想界的中心；那麼，他所揀的地方，真是再好沒有了。他此番從北京南下，重入這大會的南京，也就把聖道眞光帶到了這裏。

當然，他還不知道在那粗鄙而又混合着佛教信仰，成仙得道，種種迷信的道教教義之外，還有一種思想極高，遺世絕俗，玄微精奧的道德學說，這便是純粹的老莊學說。（註一）假使他能研讀墨子的著作，認識他所有對神的衷情有，力的論辯，尤其是他兼愛理論，定必歡欣踴躍，十分欽佩啦。（註二）墨子的學說，也和當代諸子一般，都包括在儒教名下。

他在這混稱儒教的名詞下，已漸漸知道分出兩三種派別了。那對「孔子之道」認識最眞，研究得最細到的儒家，便是他在南昌時候所結識的一班朋友們，他們自稱屬於那一五八四年入聖廟的王陽明一派。陽明曾說：（註三）聖道不在書中，却在各人心裏。……眞道理不當在外界的閱歷中尋求，只問良心平安不平安就是；不在乎斷章取義，只問自己的良知。」良知從人心裏發出來，良知的默導是不會錯的；唯有良知的默導是眞理，使人心安。又說：「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再教之靜坐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一再漸漸消滅他驕奢淫佚，富貴功名的慾望，把這些病根盡行除却，使他們永不復發，然後教他悉心注意那初步的工夫，好像貓兒豎起耳朵，睜開眼睛，捉老鼠一樣。一有慾念立即把他熄滅。渾渾噩噩，返其天眞。」

這些話，够教利公聽了滿意，只是他如果純就哲學觀點，向陽明學派人究問起來，就看出他們和精神生活，還相離得很遠啦！他們的一元論，雖則趨向唯理一方面，却和宋儒朱熹等所講的，具有唯物觀念的理學，不甚懸殊。

朱子的學說，旨在於孔子的實驗哲學以外，加上一種基本哲學，一種形上學。他把古聖先賢所不敢討論的返本推原的觀念，反覆探討，更進一步作深奧的推求……他和日本的神道教，中國的道家，以及其他種種類似的教派，一樣推想，研究到首原因和種種結果的大問題。可是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之後，却就此含糊過去了，不給他解答。他一開門，就把他關閉了。他承認太極，一種最高原理，是萬有之原，至善的歸宿。這種概念，本來可以大加開發，可有極大收穫的。無如他提出了這最高原理之後，便把「理」和「性」混為一談，就此鑽進了物質的圈子裏，給他因定了，不得出來。他似乎剛剛發見了超物質界的存在，却立即把他的形上學變成了一種物理學。一般懷有最大善意的評論家所要昭示我們的一種中國黑智爾學說，無非是一種物理學……一種主張定命論的和進化論的天地形質學……（註四）

利公批駁這種學說的話嫌太軟弱。他說：「這不是孔子之道。」接着便想引經據典，加以駁斥。他只覺得朱子的理學對於中國人的心理，根本上大有影響。這種理學，講的形上學理，講得固然不對，可是中國儒家却當他至論名言一般看待。他們以為世界來歷，和人生真詮，如今已有了完全的解說，便欣然接受了宋儒的理學，依着傳統的思想上的習慣，加以確認。這樣，儒教智識上的地位，就給朱子確定了。孔子的哲學，是只重實行的倫理哲學，沒有憑空臆度的理論，如果能切實遵行，還不失為一種期待解決的過渡辦法，一種臨時的態度，不妨礙將來形上學的灌輸。可是朱熹的理學，就不同了。以後的門路，不免要給他堵塞啦。朱子自己雖則有種種修身克己的功夫，可是他的學說，總得認為中國人思想凝滯的表現。

中國有才學的人常有一種墨守成規的傾向，這是大足令人悵惘的。唐宋以後，七百年來，中國讀書人限於研究孔子之學。惟有憑疏註四書來發揮他們的天才。那時，思想界所起的轉變，無非是因受了宋儒的影響，才放棄了孔子注重現實的人生哲學，轉入朱子玄虛的理學。朱子的理學，已成公開確認的學說，和孔子的教誨並重了，成爲一種國有的物質主義。甚至一般提倡理學的士大夫，竟說離開了理學講儒學，是有玷名教的。陽明先生能獨排衆議，另創新說，那真是不容易得很呢。

所以利公要使他的讀書朋友們擺脫這種濃厚的物質主義，就該先把理學和孔道的聯繫，予以打破。這種聯繫，已經過了極悠久的歲月，而牢不可破了。十九世紀的中國人士，也曾遇到了這個難題，不過要謀得解決，已沒有那麼困難了；因爲那時候，可以運用近代思想，把中國古代各種哲學，重行解釋了。（註五）可是要教利公依着一種考証和核實的方案，作精微的分析，以求得解決，那顯然是辦不到的；教他的朋友們聽了，誰也不會了解的。又如老莊、墨子等諸家學說，是他們所攻斥的。所以他如果一定要幫助他們脫離這種壓得他們透不過氣來的理學的氛圍，無論如何，非從儒學的本身求出路不可。所幸利公評論歷史，和詰難駁辯的方法是慣熟的，憑他西洋人新穎的眼光，來研讀中國經書，便發見了那後來在十八世紀中，一般主張復興漢學派所目爲常經正道的，「漢儒學說」，看出了宋明經學家，已把自己的思想，替代了孔子的思想啦；只要擯棄程朱的註疏，便不難就四書的原文，尋繹他的真意義。（註六）於是一位簇嶄全新的孔夫子，就顯現出來了，這位孔夫子，看來是縮小了，不錯，可是比了那全國讀書人一致頂禮膜拜的，「至聖先師，文宣王」，却要近情得多啦！（註七）

孔子並不是哲學家，却是一位道德學家，一位博學士，兼是一位正人君子。假使我們一定要從他的教誨中，尋出一種哲學來，那無非是一種好意識，好容儀，規矩進繩的哲學，是一種蘇格拉底的哲學，可是這個蘇格拉底不會有伯拉圖或是亞列斯多德這樣的門生，却只可以做芝諾芬（Xenophon）的老師。而且孔子的學說，不有出於一種創作的精神，因為他總是一位編纂人，就是我們現在所謂教科書籍的作家。事實上，他認為禮樂（這在中國是不能分的）退化得要失傳，古代的詩書已被遺忘了，才考定禮樂，剛訂詩書，使不致絕滅。他根究禮儀的本原，搜集史料，編成一部書經，撰著一部紀年體的春秋，在古代詩篇中，選擇了三百多篇，配各上適當的音韻，編成一部詩經，給他的學生們彙集了當代的文學，編成容易學習，容易記得的章句。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讀書人都要整理從前的學業，可是除了這些教本，老人們還記得，因而能漸漸恢復舊觀以外，甚麼都搜尋不到了，孔子的作品，除了後來從藏匿在牆壁中，陸續發現外，當初都是憑那些小時候讀過的人默寫出來的。因此，孔子的榮譽，就一天比一天大起來啦。因為他是先王禮教的唯一傳授人了。他做了先王的喉舌，在這全國人民重視師傅的國家，這位承前啟後的大人物，當然要享着極大的尊榮啦。他既然把古聖先王的大道傳給後世，就做了教誨後人的明師，兼做着綱常倫教的權威者。他傳這種道德學問，當然要運用他的才智加以範鑄。他既然做了萬世師表，他的思想就沈浸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因此標明了他的特殊人格。

這樣，便說明了利公着手研究四書——孔子的教本——的時候，中國學術界所處地位的大概情形。這種情形，利公雖能明瞭，却不能和二十世紀的史家一般，明白表示他所有的見解，可是他心裏對於有幾種特點，却起了一種深切的感覺，這就是說幾個形上的基本問題。孔子對這些問題所宣示的意見，是和官場中人一樣，一種折衷的意見，而且依着內心的信

念，是認爲不可知的（天道不可知）按國策是保守的，選傳的。綜觀經籍，孔子所述古聖先王的宗教教義，說到「天理」、「天道」、「上天之載」、「蕩蕩上帝」，說到「鬼神之爲德……」都很忠實地記載出來。對於一切超性事理，和對於神的本身（天和上帝）孔子的遺教完全是正確的，也是正宗的。他敬事上天，敬鬼神，恪盡一切應盡的本分，可是他講道德，說仁義，教人怎樣立身處世，却又拋開了鬼神不談。這有些和薛舍羅奢乃格輩心中所有對於奧林匹克神仙們的觀念相仿佛。

這樣認定了以後，現在我們便可以給那人稱「利瑪竇的儒教」劃定一個界限了。（註八）他在有些地方表現出他的孔道要比當代許多讀書人，如未歸化前的瞿太素輩的孔道，切實得多；那時，他正和一種奇特的混雜信仰竭力奮鬥，這種信仰使儒士們對於真道真理大都漠不關心，立身行事，好像趨向著一種若有若無的無神主義，實足爲身心之大患。

利公會說：（註九）「目前，最普通的意見，以爲儒釋道三教原屬一體，不妨同時兼奉。這種意見是由那些自認絕頂聰明的人倡導宣傳的。真可怪，他們這種見解，誤了自己，却又誤了他人。他們心目中，以爲神道設教，派別越見紛歧，國家也就越能得益。可是結果使他們大失所望；因爲這些人自以爲信奉了各樣的宗教，却因信奉得一概不誠心，就弄得一教也不教。所以有些人竟老實承認一教也不信，有些人信教本來不認真，就趁他們高興，信到那裏是那裏，以致全國上下，大多數人民，都在無神主義中度著生活。」

我們只須翻開性理大全看一看，便可以看見這書中，一切的迷信全給駁倒了。這部書裏說：（註十）（以下須錄原文）

在這道學家攻斥民衆迷信釋道兩教的當兒，歐洲的科學便給他們帶來了一種支持的力量。這種力量，十九世紀中，進步的中國人士認為極關重要。（註十一）可是那時候，便在利公的同志們中，却有幾個當初也看不出科學的全部效用。其中，如龍華民司鐸曾以為利公給人教授天文、算術，所有的光陰多半是浪費的。（註十二）但利公對於中國實在情形要明白得多，所以他誨人不倦，不肯改變初衷——這便是所謂聖教會在遠東國家灌輸高深學術的行動啊！而且他所有一般見解卓越的朋友，還鼓勵他繼續努力作此貢獻呢！

事實上，利公一到南京，瞿太素便給他引進了兩個學生，其中一個曾為李心齋的兒子編著過一本算學書。（註十三）此外，名翰林王肯堂（損庵）也給他介紹一個專喜歡研究算學的讀書人叫謝仰年（？）這人天分極高，經過多年的研究，覺得中國所有的算法是靠不住的，他殫思竭慮，想歸納到一種方法，使成一種確定的科學，却不能如願以償。起先，利公因為忙於應客，授課一事，不得不暫為延擱，過了幾時，才給他講解幾何學原理。這個學生雖則「生性倔強」，可是聽到了歐幾里德有力的論証，就十分帖服，竟也像比筮谷爾（Pythagore）一樣說法，說：「先生說是了，誰敢說不是？」他知道利公要攻斥敬拜偶像的釋道兩教，便勸他不必直接辯駁，說：「只憑老師曆算的學問，就可以破除那虛妄的神話，比方我們說一到黃昏太陽就落到山背後躲起來；日月蝕是因仙人何老漢作怪等，這些鬼話，一下就可以戳破啦。如果大家知道和尚道士們對於今世的事情，還完全不懂得，他們講的來世的事情，那是更不該聽信了。」（駢十四）

因此，現代的新中國，以為要根除這些根深蒂固，積重難返的迷信，除了設法廢除陰曆，改用陽曆之外，找不到更好的辦法了。這就可知科學正是真宗教的直接輔助啦！（註十五）利公因為沒有多大餘暇，教過了歐幾里德的第一冊幾何

原理以後便不能再繼續教授。這本書已由羅太素譯出了。那姓謝的學生讀完了這譯本，便回到王肯堂家裏，給他講起利公的生平行事。因此，王氏的「鬱岡齋筆塵」中，頗有關於利公道德學問的記載。（註十六）

利公的聲名從此日盛月增，南京城中到處可以見到他自製的曆算用的儀器，使北極閣山上的欽天監監官，曆士們感覺不安。（註十七）利公說：（註十八）「這欽天監是個學府，屋宇建築，高大堂皇，却不料監官的學術，卑淺不足道，只是些思想狹隘，學問平庸的人。他們只會依照古法預報節令，推算日月星辰的部住，要是算得不對，發見預報和事實不符合說，他們算得原不差，如今一有此災異，無非是皇天示警下民，」便隨意造出種種的虛話來文飾。」這班昏憤的監官，只怕打破飯碗，便私下去找利公的弟子們探消息。弟子們給他們說明這位有大學問的老師，不是來奪他們的起碼官職，搶他們所有極微的俸祿的。他們聽了就放心去了，以後，他們也和教士們來往；因此，利公得有機會，去賞識那元代曆法專家郭守經製造各種精妙的儀器，可是那時候，已沒有人會用了。（註十九）

那時所有的世界圖，和佛教中人所想像的一般，在一座山四週，繪着許多同心圓周，和利公的世界輿圖比較起來，真看得出是不對咧。那時，利公的輿圖，已由江西大員吳左海撥付公帑，僱工刻板了。（註二十）中國各省和澳門，都已有了這幅輿圖的印本，便是日本也得到了一份。當時，如貴州巡撫郭青螺等，更用利公的圖作根據，翻刻印成縮本。（註二十一）

另一方面，走江湖賣藥的道流，也想冒認利公做朋友，會和他們來往，哄人相信。（註二十二）有一個姓王的野道士，自稱已活了三百年，精擅占土術；又有一個叫李仙道自稱九十歲，（其實至多只有六十歲，）能用神術療病。因此，一般平民竟以為利公瞞着年歲，有意少說。他們說：「我們要是不能婚，無非是求長生不老啊！」可是那些真正的儒士們，却不能

充分看出他和以前到中國來傳佈一種宗教的外國人，是多麼大不相同而加以稱道。這些外國人（註二十三）譏評孔子和讀書人，專說敬拜神仙菩薩，有種種好處，利公却專心致力於攻斥釋道兩教，既不反對儒教，也不反對孔子，雖則儒教道理絕不涉及身後禍福，却因他教人立身處世，修身治國之道，而加以稱道。一般名人學士，如後來做南京禮部尚書的王治昌等（註二十四）不時提到教士們這種態度，相與談論，都說：「利公是真正的讀書人，是真正的儒士，因為他一反那時多數儒士們的習慣，絕不肯和釋道兩教同流合污，敬拜仙佛。」

只是利公的「孔子之道」，不僅要排斥釋道兩教，不肯有半點含糊，便是在儒教中，也把性理和超性學理分別得清清楚楚。他欽佩王陽明淺易的學說，駁斥朱熹傾向物質主義的學理。四書五經中，有些地方，如講靈魂不死不滅等，幾端主要道理，講得模糊不決，如果照全部原文的意旨講，「似乎已很堅決地否定了。」（註二十六）這層，利公未嘗不知道，也不否認；可是他還是要用那些不敢斷定的詞句，來証他自己的論題。因為利公認定要說服中國的讀書人，非援引中國聖賢先哲的言論不行。他曾記：（註二十七）「我大費心思，從那儒教先師孔夫子身上，覓取我們的見解；我援引着書中所有意義不明的章句，作有利於我們意見的解釋。」

我們說明了利公的「孔子之道」之後，便可以把他的言論畧記一二，我們只要注意其中的要旨，不必再加伸論。利公會說：（註二十八）「中國人注重孝道，雖則有些人，道德頹敗，或竟不以為然，但一般人的見解都是這樣。我們要是追溯本原，便知中國人從前謹守性律，要比我們歐洲人完備得多。一千五百年前，佛教流入中國以前，中國民族對於佛陀等偶像，素來不甚關心。那時，他們所恭敬的人物，可沒有埃及人，希臘人，或是羅馬人所崇拜的神道，那麼壞，不過，大家認

他們是極有德行的人，說他們的功業是極可稱頌的罷了。不但如此，儒家所有最大，最有權力的書籍，只許敬拜天地和天地的主子。我們如果把這些經書仔細查考，便見那違反理智光照的事情，確是極少，符合理智的却極多。這些書籍，不亞於我們（註二十九）衆哲學家的任何書籍。我們可以盼望因着天主的仁慈，他們的古代賢哲中，有許多人要憑天主的全善賜以佑助，因而謹守性律，救得靈魂。佛教流入中國後，便有了偶像，但我們知道這些偶像，在遺裏是不甚受人尊敬的，有些人對他們竟一點都看不起。」

因此，在利公眼裏看來，是這樣（註三十）：「在我們歐洲所認得的一切異教民族中，我知道除了上古時代的中國人以外，犯的錯誤算是最小的，一個也沒有。不幸已經敗壞了的人的本性，如果沒有天主的聖寵予以支持，總不免要自趨下流而墮落啦。這不幸的人民，就讓從前燭照他們的光明漸漸熄滅了，以後，就沒人管教；以致如今一般人民，大都放僻邪侈，任意妄行，不稍顧忌，一部份人，幸而避免了崇拜邪神，却鮮有不陷於無神主義中的。」（註三十一）

利公從事於辯護真道的工作，便是向着這最後述及的一班人進行。他正設法借助他們的經書，和他們辯論。所以他又說：（註三十二）「中國人常常崇拜着一位至高無上的神明，就是他們所講爲「天帝」或是「天地」的神；因爲似乎他們也許以爲「天地」是靈明的，合成生活的一體，神便是天地之靈……這一派是儒教中人，不信仙佛，不拜偶像，只敬天地或是天帝……因爲在他們看來，天帝掌管着這下界的一切。他們也禮敬各處名山大川，和四方的神明……可是他們不認他們和「天爺」有同等的權力。儒士們從不談及世界在何時創造，由誰創造，怎樣造法。我說「那些是真正的儒士們」，因爲有幾個學問淺陋的人，不管確不確，便信口胡說，那些話都是無稽之談。便是儒家也大抵認爲不足信的

【這是指道家關於盤古開天闢地的神話而言。】儒教中也講上天譴責世人，和賞善罰惡的話，不過大概以為這種賞罰是在今生，不在身後。至於靈魂不死不滅的道理，似乎古人們的狐疑，要比相信身後賞罰好一點，而且他們也明瞭人死了以後，要在天上住許多年，却從沒有說過有人在地獄裏。只有近代的儒士們（程朱派人）主張人死後沒有靈魂，身既無天堂，也無地獄。這道理，有些人似乎很難相信。他們只說惟有善人的陰功積德，死後才能使陰靈不泯繼續生存；但惡人沒有這種福分，靈魂一出肉身，就四散消滅了。可是目前最流行的見解，據我看，是脫胎於五百年來流行的偶像教派的。【這是說受到佛老影響的程朱理學】主張世間萬物都是一物所化成，造物主和天地人，以至禽獸草木，五行四象，共成廢續的一身，萬有為其肢體。他們便從這物質的合一，推想出入與人間有相愛的天職，人人有肖似神的可能。這些謬說，便是我們所要竭力駁斥的，不但憑理智來駁斥，還要根據他們古代賢哲的言論來駁斥；因為這和中國古書上所講的道理，明明是大不相同的。】

在利公所著的要理問答，天主實義一書中，正是用着這種方法，旁敲側擊，反駁他人的詰難。（註三十三）比方書中論身後賞罰的話是這樣：「問：我們古書上不講天堂地獄啊？答：孔子恐當時的人懂不得，也許沒有說明一切；也許有許多事情他說過了，却没有記下，而且原來的碑刻散佚了；也許後來傳經的人記錄得不很忠實，把這些話刪去了。再則，同一的事情，在不同的時代，便有不同的說法。沒有這樣的話，不應該斷定就沒有這回事，沒有這意思。現在的讀書人，果真恪守古書的教訓嗎？有多少人，不違反古訓呢？」

這位「信奉基督的讀書人」更引經書上的話來證明自己的理論。他說：「在天上，便是在帝側，這句話豈不是等於

說「到了天堂上」嗎？那麼，有了天堂，就得有地獄，這是彼此相連的。要是因為經書上沒有說，到這一層，就可以作為否認的根據，那真是錯誤了。

利公這樣堅決地站在孔子哲學的立場上，宣揚聖化，無非要使天主教道理在這中國的文化城中，獲得穩固基礎罷了。所以，他以為不妨就孔子的原文，尋繹真義，想從這位中國人公認為聖哲一般的人身上，覓得聯繫。這在從前聖西里爾（亞力山特利）（S. Cyrille d'Alexandrie）對於潑洛打（Plotin）也曾這樣做過的（註三十四）如今利公用這種方法來折服中國的文人學士，當然沒有甚麼不對。孔子果然是真理的保證，不過這些道理，是屬於人生的外行的。利公和孔子的聯繫，究竟正當不正當，他自己心地坦白，知道一點沒有弄錯。

那時，南京有一位耆宿叫李求新（L. J. Girard）年紀已在七十以上，只因他做過幾任大官，儒學佛學都極淹博，尤其是因他稟性慈善，待人和藹，是一位著名有德行的道學家，所以南京人個個都尊敬他，奉作泰山北斗。他的門弟子多到有近千人，都是品學兼優之士，所以他不得不規定時日，給他們更番講學授課。他間得利公大名，想和利公談談。利公就定期和他約會，囑羅太素轉達，希望能勸他歸化。他和利公相見之後，漸漸就談到宗教上了；利公一起頭，就說釋道之教好像半爛的西瓜，他把那腐爛的一齊丟了，只把那不爛的留着。這些話攻擊得太厲害了，教這老頭兒和他的弟子們聽了，很不高興，大家因此不歡而散。過了幾時，在某次講學會上，這位李老兒答覆人們疑問，竟講出和孔子的解釋相背悖的佛老的道理來；當下便把那學問淵博，生性率直的工部尚書劉斗墟（註三十五）出來，大聲責斥，說現在竟有人敢駁斥孔子，信從佛老之說，這真是我們聖門子弟，全體讀書人的恥辱！他聽人說起那位泰西大儒，利西泰先生，曾因此大為詫異；這

位西泰先生是外國人，却盛讚孔子之道，當衆指斥佛說的謬妄，且說西洋各國敬佛的很少，而且給人家瞧不起。」

「當下，李求新還想答辯，說他曾和利公談論過這些道理，覺得利公所知道的不很確實。可是劉尙書雖則從沒有和利公見過面，還是那麼怒氣冲天，他的話，一句也不肯聽信。過了幾天，利公還沒有知道這件事情，李求新便很恭敬地，設宴請他。中國人每借吃喝的機會，高談闊論，較量長短；利公猜到他的用意，便托詞忙碌，又因這天恰是齋日，向他辭謝。他不願在這時候和人爭論；因為他要在南京常住，房屋還沒有買好，只怕惹動是非，不免要受妨害。無奈李老兒再四堅邀，差人傳說，有許多人等候着，要和利公相見；他只教人給他預備素食就是。瞿太素見他這樣殷勤，知道推却不得，便勸利公答應下來，說，如果再推却，那就太不客氣了。利公沒法，只好勉強一行。」

他於是答應去赴宴了，預備再和他們辯駁一場。李老兒一方面，却請到了一個極有名的佛教禪師，和許多儒俗做陪客。這個便是那博學能文的三槐和尙，是個中翹楚。利公到的時候，他早已先到了，正和一般文人談天說地，大有目空一切的氣概。被邀的賓客共有三十餘人，在主人請客入座，彼此互相遜讓的當兒，這個和尙，便已揀着傍近利公的座位，露出一種傲慢不屑的神氣，岸然坐下來了；等喝過了幾巡酒，就表示願和利公論道，談談宗教事理。

利公聽他一開口，就回說：「在討論別的事理以前，先請你說說對於那第一要義，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就是我們所稱爲天主的，——這端道理，據你想來是怎樣？」三槐回說：「這個主宰果然有，但有沒有，無關緊要，不論那個人，——他自己當然也在內——同他一樣相等，絕不稍遜。」只看他回答得非常倨傲，也許他竟自以爲比天主還要勝過一籌。

利公便問：「他自己不能造成萬物，像造天地的造物主所造的一樣；如果不能，那麼他的話，未免大言欺人了。」三槐回說：「能造，他能造天地。」利公就逼緊他說：「我且不教你在這裏別造天地，只請你造一根木炭，要像那在炭盆裏的一樣。」這就使他急起來了，急得只叫喊，說利公原來問他的不是這樣。利公理直氣壯，說話更響了，喊得比他還要鬧，逼着問他：「既然做不到，爲甚敢答應下來。」衆賓客聽他們談得熱鬧，便都走過來，問講的是甚麼事。瞿太素便把上面的話照講了一遍，大家就一齊說利公講得有理。

三槐於是想賣弄他的玄虛幻想了，聽說利公是天文大家，便問利公是否懂得算術。利公回說，畧習一二，他就詰難道：「幾時你談論日月，你是到了這有日月的天上去的呢，還是日月降到你的心神上？」利公回說：「我不到天上去，日月也不到地上來。不過我們看見了一樣東西，我們的心神上，就留下了這東西的形像。以後，我們要想起這東西或者講論到這東西，就可以在明悟裏看看這留下的形像。」三槐聽了，就站起來，說：「你看，這便是你自己另造了日月啦！所以，你能創造其他一切的東西，也正是這個道理。」他說這句話，自鳴得意，以爲他先前說的話，如今已獲得证明了。

利公於是給他明白解釋，說心神上的形像，並非是日月本身，不過是日月的形像罷了；這兩者是大不相同的，而且便是這形像，要是沒有先看見日月，原是不能形成，不能想像的。比方一面鏡子，反照出日月，凡是有明悟的人，總不會說這面鏡子能造出日月，或是其他一切的鏡子裏看得見的東西吧。

這些話，講得使聽衆個個佩服，他們越見三槐亂喊亂叫，對答不來，越覺得利公的話句句是真，聽得十分暢快。這當兒，主人怕彼此言語衝突，有傷和氣，便請三槐另談他事，好結束這番辯論。」

這開場的小接觸，已把那詰難者辯才的低劣暴露無遺了。接着，他們便討論到廣泛的人性問題，這原是中國哲學家所由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而視為極難解決的難題。

「被邀的來賓是分幾桌就座的，利公是異邦的遠客，便佔着首位。宴飲到半酣，儒士們便談到了那中國各學派所幾經討論的大問題：（註三十七）「人性究竟是善，還是惡？或是不善不惡？如果說是善的，那麼，惡又從那裏來？若說是惡，又往往有善發生，這善又從那裏來？若說是不善不惡，那麼，又怎會有時為善，有時却作惡？」他們不懂得理論學的前提，不知道區別「倫理善」和「性律善」，「求得的善」和「固有的善」，至於人性因原罪的負累而敗壞，天主的佑助和聖寵等，各端道理，他們更理會不得了。那天，他們紛紛爭論，各自提出各種例子作證明，有的說性善，有的說性惡，足足鬧了一個多鐘點。

這當兒，利公靜聽着，一言不發，便有許多人以爲這問題太精微了，他懂不得；或者，至少大家想他不注意他們的談話。只是大家都要聽聽他的意見，所以他做個手勢表示有話要說，於是大家肅靜了，都懷着好奇心要一聽他的高論。

利公先把他們說過的話，概括講述一遍，這就够使他們詫異了，接着，才說：「天地的主宰，無疑地是萬有中，最美至善的，但是如果人性是這樣虛弱，教人懷疑他究竟是善是惡，那麼，剛才三槐師怎麼說過人的本性，和創造天地的天主的本性，並無不同呢？這樣，這個本性是善是惡，還成問題嗎？」那時，利公對面正有一位舉人坐着，這句話，他聽得痛快極了，只怕有些人還不能完全理會得這話的力量，便把利公說過的話，再說一遍，又添上了許多典雅的解說，把他引伸闡發；隨後便轉向三槐，問他：「這句話你怎麼回答？」

趙先三槐還想用幾句俏皮話嘲弄利公，來躲避他的責難。但利公等定要他正式答辯，他於是引經據典，滔滔不絕地說了一篇，他對佛經原是很熟的。利公就止住他，說不相信他的佛教道理；要是自己帶着佛經，和天主教經典，也能這樣背一背；不過今天的討論是講理性，不是講經典。無奈三槐只是閃避，說些花言巧語，作遁詞。他口才辨給，很會說話，翻來覆去，總想獨佔上風，却不料被逼得這麼緊沒奈何，結果只得說：「天主不善不惡，意思是說，一樣東西，能是善，也能是惡。利公聽了，就作一個譬喻來駁斥他，教那便是分辨不出事理的人，也能留着深刻的印象，一輩子忘不了。他說：『太陽原是光明的，就不能成爲黑暗，因爲他的光明是出於本性啊。』」

三槐聽了這些話，和其他的理論，還不肯認輸，可是在場的衆賓客，聽了利公的至理名言，都已心悅誠服了。以後幾天中，他們還談論着這問題，有的談了幾個月，因爲佛教中人，大家都抱着一種目爲第一原則的見解，就是一萬物的大造和入，是屬於同樣原質的。一換一句話說，就是：「天主是宇宙的靈魂；」而且，這種謬理，已漸漸侵入儒教思想中，爲儒教們所採納了。以後，李求新的弟子們，有許多還來謁見利公，提出種種疑難問題，向他質問。利公便利用這些材料，編著一篇論文，（註三十八）使其中的一個十分佩服，說：「不信利師父所說的話，無異於不信太陽發光。」王尙書見利公這回得勝回來，更覺十分快慰。

我們從利公這回的辯論，便可以看出他對於儒教中人所持的態度了。他一方面盡力排斥虛妄的佛說，一方面設法灌輸合理的原則，和天主教的信道，來代替佛說，給他們建立道德基礎。有人評論拉丁和希臘的作家們，（註三十九）曾說：「異教人不懂得人生宗向奧妙的大道理；他們不知道我們第一代老祖宗當初怎樣有福氣，後來怎樣開了知識；不認

得那救贖我們的基多，也沒有聽到過聖道，惟有這種神聖的話，才能啟發愚蒙，知道這樣是眞，是善，只因天主仁慈，給他們留下一線眞道的微光，好引導他們達到這高深的境界；這一線光明，便是人的良心。這樣看來，利公在中國所發起的這種運動，正可看作那時蒙戴月（Montaigne）等一班人在歐洲努力從事的運動的反映。蒙氏的主張，傾向着使倫理道德脫離中古時代的基本信道，只限於精究人心，使他成爲世俗化的教育；利公却主張要導人趨善避惡，不應再依賴着人的良心所啓示，教人怎樣盡本分的，飄搖不定的微光，却該啟發一種崇高卓越的思想，知冥冥中自有主宰，雖欲不信而不可得。所以，他也像聖奧博羅削一般，不擯棄那斯刀意克（Stoique）派所有崇高的倫理學說，也不在基多教義和異教教義中間，劃着一道極深的鴻溝，却孜孜不倦地，力求在人心以外，覓取修德立功的根基，使這種高尚的倫理道德，盡善盡美。（註四十）十六世紀末葉的一般公教人文學家，正是依據着這種心傳，來對付新發現的民族。那從羅明堅司鐸獲悉詳情的包式文司鐸，（註四十一）曾說：「中國人修着（仁義禮智信）五德，如果我們要把那足以引人趨向基多聖道的一切情形，加以考察，那麼，他們所有的程度，眞是再高沒有啦。……我們不難好好帶他們到基多的大學裏，因爲他們憑着固有的教育，好像已經給自己完全預備好，可以進這大學了。」

新近曾有人作關於公教哲學的辯論，題目是：「基多的教義，是不是眞個影響到人類的知能？如果確曾影響到，有怎樣的切實意義？這種影響究竟有多大？」這原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難題，討論起來，要涉及形上學理，所以更見複雜啦，而且各方面的意見，也很紛歧。（註四十二）可是，如今我們看了利公的所爲，便見他對於這個問題，所有的貢獻是多大了。他暫且丟開了這純粹的哲學問題，全憑他所持的態度，和衛護眞道的論辯看來，已經有意思要憑實驗，來指示出超性的啟

迪對於純粹理智所有的效益了。他對中國讀書人所提出的學理，是作爲一種極高的智德，和一種純全的道德律，特別創
造出來的；可是他爲要攻斥那些向慕佛老，公然遵奉的偶像主義起見，一方面利用那不容佛老的孔子以相抵制，一方面，
却又引經據典，力駁程朱學派所有傾向物質主義，桎梏後世思想的理學註疏。這樣，他就得在中國思想的核心，放下了
的活胚種，期待着最可慶幸的發展。

第七章 南京城中福音的酵母

利公鑒於在南京立足不易，因此，立定主意，要隨處留心，諸事謹慎。然而他已不能再晦迹幽居，獨善其身了；他辦的事情，大都獲得成功，使他聲名日盛，就引起了公衆的注意。以前，他注意着三件事情，似乎要早早辦妥，辦得越早越好。這三件事情，就是：第一，建立永久住院，第二，求得皇上保護，第三，避免惹動民衆攻擊的惡名。這當兒，郭居靜司鐸還在船上，守着行李，滯留在臨清，遲遲不來。

利公講（註一）「目下，時勢還不很平靖，因為中國和日本在高麗交戰以後，國庫空虛，皇帝便用種種方法，聚斂民財，來充實內庫。據說，中國有許多金鑛、銀山，因恐招引盜匪，向來禁止開採。皇帝便決計開掘好幾處鑛山；同時，又令全國各種貨物，一律納稅二釐。這道詔諭一下，便有一班貪婪橫暴的太監們，奉旨前往各省督辦，每省有兩三個權力很大的太監，率領着一班小太監作護衛，橫行不法，誰都管不得。這班太監，大都是愚蠢無知，粗鄙倨傲，沒有良心，也不講道理的，做起事來，十分暴虐。不久，全中國便都起了叛亂來反對他們；那時的情勢，真比征倭時代還要壞得多。一般無賴小人更趁此機會，和太監們串通勾結，竊盜民間財物，肆無忌憚；民船經過關卡，不啻遇到了殺人越貨的大盜。最可恨的，這班人掠奪民財，大都飽入私囊，繳解國庫的，不及十分之一。奉旨開鑛的太監們，不到山上去開採，却到城市裏去敲詐，找到了大戶人家，就說住宅下面有鑛苗，逼着那家拿出一筆鉅款來孝敬，否則就要拆屋毀宅。因此，各省各府縣的官紳，大抵不得不同他們成立一種妥協，付給他們一筆銀子，作爲「鑛稅」；結果，弄得民食枯竭，物價高騰，因而民不聊生了。」

於是南北兩京的大臣們交章論奏，痛陳釐稅的弊害，中使的專橫，不料神宗不肯納諫，他們便鼓勵各省疆吏自動制裁。有幾個強項的司道府縣，更公開把這些稅監加以裁抑了。無奈，神宗貪得這幾十萬銀子的微利，竟聽宦官的讒言，把進諫的臣僚大加申斥；有的黜革，有的下獄，監禁多年。因此宦官的勢燄，一天大似一天，越發胆大妄為，橫行不法，毫無顧忌。百姓們遭稅監的茶毒，死於非命的，更一天比一天多啦。『這當兒，利公的行裝還在臨清，所以他和王尙書都覺十分憂慮，只怕在路上要被太監劫奪。如果竟被沒收，不但利公要大受損失，便是王尙書也要得到包庇的罪名，大失顏面，照理，似乎利公的行李，總逃不過他們的掌握，但利公却安慰王尙書，說只要依靠天主，天主就會使他的同志們，和聖像等物，不落到他們手裏。』等了好幾個月，直到一六〇〇年四月二十一日，郭居靜司鐸和鍾巴相修士終於來到了，路上一點沒有受到阻礙，而且竟全不知道沿途有那麼大危險，就不知不覺地，逃過了太監的毒手。王尙書見他們無恙歸來，不禁嘖嘖稱奇，因而對於我們的宗教，更加愛重了，雖則他因為有大阻礙（納妾的阻礙）至今仍不能皈依。」

這回逢凶化吉之後，教士們只見在南京希望無窮，便把以前爲了讚美天主所受的艱辛困苦，完全忘却了。利公於是繼續進行籌款購屋那一件要事，天天打算怎樣獲得官廳正式核准，許在南京永久居住。這裏，也像南昌一樣，官場中誰都不肯担负這重大責任，利公越堅請，他們中，有好幾個，就越要仔細斟酌了。幸運好得很，郭公未到期，那位戶部尙書劉斗墟給利公說，他曾爲戶部屬僚造了一座官舍，不料屋子裏有鬼怪出現，符籙禳咒，都不能驅除，因此，空閉了二三年，沒人敢居住，也沒人敢買下。（註二）劉尙書又說：『既然西泰先生是著名有德行的聖人，不怕邪魔，我情願把這座屋子讓給你，講到房價，請你隨意給，我決不論。』利公便回說他奉事天地真主天主，邪魔一見天主聖像，慣常總是要逃走的。隨後，他就同

劉尙書去看那屋子。這座房屋位在皇宮附近，地勢高爽，受不到水浸。他覺得這座屋子要比別的房屋便利得多，大出意料之外。屋分三棟，畧加修改，便可把第一棟改作門房，第二棟作爲客廳，第三棟正屋，當然要用作聖堂；兩邊的廂房，可供近十個教士工作臥室。這座房屋既然是由戶部尙書出面相讓，那就用不着甚麼官府准許啦。利公於是決計把他買下，因爲在他看來，似乎「這屋子正是天主給他安排下的。」所以郭居靜司鐸一到南京，他就繳付了房價的半數，餘數約定來年付清。過了三天（註三）教士們進宅了，劉尙書便頒發了一張交割文書，又出了一張保護的文告，蓋上戶部官印，命人掛在大門口。這樣，利公所有的心願，就很順利地實現了。司鐸們進宅後，先到正屋裏，祭台脚下，恭念幾遍經，又捧了救世主聖像，到各處灑灑聖水。廊柱上和牆壁上，還留着道士們驅魔捉鬼時所用寶劍的斬砍痕。他們的法術不靈驗，可是如今却不消說得，這屋子祝聖過了，一切妖魔鬼怪，就逃得踪影全無，不敢再出現了。這就使劉尙書驚訝不小。後來，有一天，他承認說，當初造屋的時候，一切迷信的法則，原曾一一做過的。官場中和文場中大家講着這回事，講得津津有味。王尙書起先因爲利公不會同他商量過有些不樂意，後來，知道鬼怪竟不出現了，便又欣然如故。

入宅安居以後，利郭二公便考慮應否把所有預備進貢的禮品公開展覽。這件事，教士們諒必答應過幾個好朋友，而且他們想後來再進北京城，還少不得要請幾個大官僚幫幫忙，可是展覽一舉行，來賓勢必擁擠不堪，只怕清靜的住院，要受很大的擾亂。然而利公等仍決計舉行展覽，不過陳列的時期，限定只有幾天罷了。貢品開始展覽後，來參觀的真是人山人海，本城不必說，便是鄰近各府縣，也不知有多少。一連十天，教士們累得實在乏極了，却還有許多人源源不絕而來，都爭先恐後，潮水般湧進來，幾乎把大門都擠塌了。利公不得已，才命人恭恭敬敬，抬着那兩幀聖像，捧着三稜鏡，送到那負有守

贖貢禮專職的祝石林府尹那裏。這位府尹起先不肯担負這責任，但終於答應把聖像供在靜室裏，還派人專司焚香，不得間斷。

教士們見民衆對自己已有好感，便認定來年必須再到北京，設法覲見萬曆皇帝，進呈貢禮。「如今他們，已有經驗，知道該用怎樣的方法去辦理了；種種環境，也比以前改變得多，因為朝鮮的戰役業已結束，官場中對他們的優待，也比以前可算得多了。可是無論如何，教士們如果見不到皇上，如果不能設法在北京立足，那麼，便是南京的住院，也不會穩固；而且他們要入京進貢這件事，已弄得通國皆知，所以他們以為既然來往南北兩京的太監這麼多，這件事就不能不傳到皇帝耳邊邊。皇帝大概就要下諭旨，着官廳把貢品傳解到京裏；這樣，教士們的計劃就弄得一場無結果啦，白送掉許多東西，却得不到一點好處！倒不是趕緊設法，由他們親自入貢，讓皇帝見情要好得多。」

因此，利公就決定派郭居靜司鐸先到南昌，順便把那座自鳴鐘帶去，暫為寄放，免得多惹大眾注目，然後到澳門，和同會諸鐸商議籌集款項，徵募西洋物品，以供應用。這是在七月底，或是八月初辦就的。郭公和鍾巴相修士同行，到了南昌，便獨自前往澳門。不幸，那時澳門人正因得到了那從日本開來的商船遇險失事的惡耗，担着極大驚憂；這艘船和澳門葡人的生計問題，大有關係呢。不久消息傳來，這船連人帶貨，都沉下海底了。葡國人遭了這樣大災，神，籌款就很難啦，然而李瑞階院長依舊不灰心，還是盡力籌募財物，供給在中國的教士們。（註四）

這當兒，利公和黃明沙修士以及幾個華籍初試修士，在南京繼續宣揚聖教道理，使基多福音的酵母漸漸發生作用，大批好奇的羣衆，終於絕足不來了。這些人大都是平民，「像傻子一樣」只想看看那稀奇的貢品。一般達官顯宦，和文人

學士，却仍陸續來訪，有些來請教算學，或是倫理學。「惟有這兩門，他們是知道的，却知道得很不完備。」（註五）這班人，一天到晚，川流不息地，絡繹往來，利公因為情面難却，只得一一酬應，顧不得自己受累。他還提早吃飯，預備應接來賓；有時，竟連吃飯的功夫都沒有，往往就此不吃飯，當守齋，却也不生病。可是據他說（註六）：「他想只活得幾年了；因為事情這樣煩劇，他這樣辛苦，衰老的餘年，就不能長久啊。」

同時，他也漸漸放棄他以前保持着的沉默，公開宣傳一種新宗教了；他一方面把天主教道理漸漸灌輸給中國的智識份子，一方面就使天主教的外觀，漸漸擺脫佛教的色彩，因此又結識了許多人士，養成一種力量，漸漸發展起來。

以前，范禮安司鐸曾力言天主教對於維持公共治安，確能大有裨益，促教士們加以注意；利公却因目視中國的治平而心懷欣羨，只能建議傳揚基多福音，作為政治民的協助。可是那驕矜的儒士們堅信本國文化昌明，無庸討論，也就不加討論了，何必再求這種協助呢？

中國民族素來有一種傳統的道德學說，所幸這也是天主教所昭示激勸，奮勉力行，不可勝道的。教士們原想在孔子學說中，覓得那有如基多信友們所講求的愛德，而知儒學中的，確每有這樣的教訓。儒家所奉為金科玉律的「仁」字，就却定了人與人間的聯繫，有些話，說得非常動聽，譬如說：「仁者愛人，」「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的確都是克己功夫，却因在外行上要加限制，如「勿瞞」……「勿輕信」……「毋以怨報德」等，這些教訓，而大為削弱了。不過這種種的格言，都很入耳，照着做起來，也未嘗沒有許多好處。

魏格爾司鐸曾論（註七）：「仁並不是基多信友們的愛德，熱心和捨己之德，也不是佛教徒的慈悲。這是民間的禮

讓殷勤；是同樣賢明，有節制，有善意，却也休戚相關的人士間，所有使人愉快的關係。孔子教人待己如己，也教人勿以怨報德。孔子的仁心，仁術，旨在不願意做易受欺騙的人。

「容易受欺的只有平民，賢明的人士就不該如此。假使這是一種使著經者知所戒懼的心理，那麼，這便是懸虛的理想主義。一切事情過度了，就不好，便是修德行，也如此。智德的最後要訣，是節制，斟酌，審慎，鄭重。總之，是守着中庸之道，這就是真理。一個人如果受過好教育，有良好行為，對自己能行其志，這樣就算是完人了。」

魏格司鐸的論斷雖則不見得十分切當，但中國人的仁愛，和基多的博愛不同，也就不難看出。利公每和他的朋友們談博愛，便是所以彌補這種仁愛的缺憾；博愛不在空言，重在實行，尤其是要身體力行，就是凡屬基多信友，都該像兄弟姊妹一樣，彼此相親相愛。利公會記（註八）「那使人尊奉我們天主教道理最容易最妙的方法，莫如給他們講奉教國家的好風俗，好習慣，比方設立醫院，給貧民施醫給藥；設立孤兒院收養棄孩，撫育孤兒；設立殘廢院，麻瘋院，收容患着殘疾惡疾的人；招待朝覲聖地的教友，供給食宿，創辦各種慈善機關，專辦賑濟貧窮，慰問疾苦，矜恤鰥寡，勸化罪犯，援救流浪兒童，和被壓迫婦女等種種善舉。」

這樣，天主教就先顯出慈母的容顏，和人相見啦！一切人生疾苦他都件件關心。可是天主教的愛德，便是最微妙地推廣起來，仍必不脫羅馬理想的特點，就是絕對智德，有毅力有恆心的紀律的理想。對於那富有治人才，和側重現實主義的道德學家，却少形上學家，或是原始思想家的中華民族，要是給他們提出那希臘人所欣賞的，一種過於深奧的精神學說，和審美學說，那必然是徒勞無益的。天主教道理，恰是相反，他的特點，在有嚴守紀律的精神，有絕對的和真實的意識，他

在這種意識下，發揚基多的教義，最容易贏得明末士大夫的同情。

利公又對朋友們講天主教中有各種修會，入會的修士修女們，一方面求自身修成全德，一方面也幫助他人好好過活。每逢瞻禮日，大家到教堂裏參與彌撒聖祭，聽講天主的聖言，好教自己恆心修德。善盡教友本分，教友們不住慷慨施與，救濟貧困，有時候，一給就幾千元，不稍吝惜；有高級神長管轄着各屬教務，不使稍有失錯；一切書籍必須經過審查，方可付印；一切無益閒書，或是有傷風化的圖畫文字，一概不准刊印；凡是拾得，竊取，或是劫奪來的東西，必須歸還補償，方可赦罪。他講的時候，也並不諱言，西洋地方一般有志澈底效法天主教教友的人，心裏要起怎樣的衝突；異教人任情縱慾，沈浸在不道德中；目前歐洲社會，尚有諸般缺點，仍認不得人世的準確觀念；基多的教義，也沒有澄清那許多人的道德生活，使趨高尚，這些人仍不肯悉心皈依他。

「有一端道理，大家一致讚美，把他捧到天上，（註九）可是有志效法的却很少。這便是天主教只許娶一個妻子，而且便是不生育，也不得休妻別娶。上帝王，和公卿貴顯，下至士庶人，這條定律，誰都不能寬免。我們知道中國人家所有種種顛倒錯亂的情形，大概都因休妻納妾而起；必須這樣，才能加以糾正。再則，婚嫁須待成年，童年早婚是不對的。」

利公講這端道理來攻斥孟子所主張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原則，（註十）（這種原則對於天主教是大有妨害的）旨在及早啟迪人心，使大家明瞭，這正是以後能使天主教教會和中國統治階級發生衝突的主要原因，而早作準備。

前面，我們講起古羅馬時代，（註十一）曾說過那時天主教所以遭受極大艱難，無非是因教友們不肯朝拜皇帝所

致。如今在中國，皇帝稱爲「天子」，朝拜皇帝似乎也是中國社會組織的一種主要條件。所以利公又給他們講教宗的尊位，在歐洲奉教的各君主之上；聖教元首的職位不是傳給他人，却是從博學明智，德高齒尊，自幼立誓守貞，專心奉事天主的人們中，選舉出來。所以教宗管理普世天主教教友，能十全十美，萬無一失。大家也一致公認這樣選舉出的人，必然是個大德不凡的聖人，應在其他一切人物之上。他們聽了這些話，真覺得聞所未聞，不勝驚奇納罕。

利公講罷關於教宗的種種情形之後，便聯想到目前正該籌備一切，請教宗派遣使節。這件事本來不會辦不到，却漸漸冷下來了；看來教宗不豫肯遣使，「如果中國皇帝能先派使臣去聘問，聖教會就可以因此獲得大大的進展啦。」（註十二）

利公要透露這些消息，曾用盡種種的方法。他慣常所用最普通的方法，便是談話，每當和人深談暢論的時候，便乘機把天主教的真面目逐漸揭露。有時候，他和生客寒暄，來客照例問他，「府上是那兒，」他便回說，「敝鄉就是那天神們把救世主母親住宅搬到的所在。」（註十三）還有一種較爲簡接，却是更有效驗的方法，這便是利用文字的方法，在那刊印的世界輿圖上，或者在他朋友們所爭執的手抄本上，都可以看到。那世界輿圖的總序中，和圖上關於羅馬的特別附註上，多少講着些天主教的詳細情形。他往往寫些對聯，扇面，送朋友，在中國字旁邊，添註着羅馬字拼音，說：（註十四）「因爲中國字音難讀，才這樣；」又說：「我用筆達意要好得多；我只把我們的書翻譯幾節，便可以使他們知道在各種學術中，有許多在他們簡直是聞所未聞咧。」大概便在這時候，利公開始編輯一本格言錄，這本書後來題名「二十五言」刊行問世，正是他在中國文字上，一種最大的成功。（註十五）以後，他也漸漸想和他的同志們聯名呈請教會當局，予以核准，刊

印幾本譯成漢文的書籍。（註十六）

利公慣常辦的各種事業中，有一種是分贈歐洲寄來的木刻和彩繪的聖像，有許多是在日本翻版的。（註十七）據說：（註十八）「中國人見了聖像書本，不勝驚訝，以為這總是雕刻，不相信是畫像。」伯希和氏論及此事，曾說：（註十九）「我們不妨想一想，那最先來華的教士們，是不是多少受着藐視，他們受了有禮貌的中國人自情自願地再三稱頌，是不是可以認作十分欽佩的憑據；」但我們也知道十七世紀中，曾有一位藝術評論家，批評道：「利瑪竇帶來了一幀西洋的天主像。這是一位婦人抱着一個嬰孩，眉目和衣服的褶皺，好像明鏡中留着的影像，筆致生動，栩栩欲活，畫得莊嚴瑰麗，實為國畫家所不及。」

這裏，我們也得像以前利公的肇慶、韶州、南昌時一樣，提提他怎樣應用各種科學，（註二十）憑着口講筆述，曆算，儀器，精巧的製作，在南京的智識界中，灌輸天主教道理；他努力活動的結果，那福音的酵母，已在這廣大異教羣衆中，開始發生作用了。在他一五九九年八月十五日寄發的函牘中，利公會把他對於種種正面的效果和傳教工作上潛伏的危機，所有的感想，昭示我們。（註二十一）他說：「至於您告訴我，羅馬方面想聽聽中國人有沒有大批歸化一節，您得知道，這正是我自己，以及留住在這裏的諸位司鐸所日夜禱求的；我們正爲了這種心願，才捨棄家鄉，拋親別友，來到這裏，穿着中國人的衣履，講着中國人的言語，起居飲食，樣樣都照中國人做，但天主的聖意還不要人看到我們的工作大著成效。然而我們以爲我們的成績，還比得過別處的傳教機關——他們在表面上，似乎是大著奇效——而且也許要比他們強。因爲眼前，我們在中國不是爲收穫，也竟不是爲播種，只是在森林中掃除榛莽，搜捕其中的毒蛇猛獸。憑着天主的恩佑，後來的人可以記

述他們勸化外教人歸正的成績，講講中國教友怎樣熱心；可是你須知道，起先必須如我們所做的一般做去。只要我們憑着適當的愛德，恪盡我們的本分，人們也必把大部份的勳勞歸於我們。此外，爲使您對於我們的事件，得到愉快的印象起見，我得說明中國和其他各國，各民族，大不相同；因爲他是一個重文輕武的文明國家，中國人很聰明，現在更非昔比，對他們自己的教派和迷信風俗已起懷疑，因此，我看得明白，過不多時，不難使無量數的中國民棄邪歸正。只是他們很少和外國人往來，而且很少願意和外國人往來，這就使我們受到限制了。人民對外國人有恐懼心，皇帝的戒懼更甚了，因爲他是個獨裁者，他的祖先用武力奪得了皇位，所以常怕別人奪他的江山。再則，在中國最足惹人疑忌的舉動，便是聚集了大批信友們，跟在我們左右。因此，我們以爲最穩固的成就，和最賢明的決策，便在設法漸漸獲得中國人的信任，祛除他們的疑懼，然後和他們來往。這件事賴天主恩佑，還得再過幾年，才能做到，據我看，只怕非經過多年不行，因爲要等中國換了一個副面目，大家不記得曾有一個外國人，在中國的處境，和我們現有的境况相彷彿時，才行。從前，到中國來的外國人——來華的外國人向來總不多——往往做了中國皇帝的臣民，或者歸化了他們的宗教，否則就得淪爲賤民，給人瞧不起；再不然，只教皇帝看重，不得士大夫尊敬，我們却不然，我們帶着自己的宗教住在這裏，大家都極尊重，而且——我提這一點爲天主的光榮——有些人，還把我當作中國從來未有的大聖人，能從世界的極端，來到中國，這簡直是靈蹟。中國人原不是那麼不識不知，沒有人明白懂得我們的來意，只是他們不敢冒着危險，幫助我們揭露我們最後的心願罷了。」

「今年，我們能在這全中國最大，最名貴，差不多是全國中心點的都市中，建立這座住院，這不是一種平凡的成就呢。在這地方，我們的信譽繼續增高，可說得我們在一年中，已把以前的成績加上了一倍。因爲我們雖則只成立了這個機關，

同時，我們也已開闢了一條道路，通達其他許多城市。這些地方，正有人要我們去咧。可是爲了上述理由，我們在未能覓見皇帝以前，決不再作新的進展，否則，我們就不免要惹中國人疑忌，反教人獲有機會，使我們在未得正式保證，准在這裏安穩居住以前，先遭驅逐出國的禍害。」

這封書信寫給他小時候馬賽拉宜的老同學，現任耶穌會要職的高斯大司鐸。書中的語氣這樣堅決，高司鐸接到了以後，會有怎樣感想呢？既然他曾和利公同窗共讀，又素來知道他適應環境，有特殊的精神，他的話自必加以信任啦。可是，假如別人接到了這種消息，我們就得問一問這受信人要怎樣想法，這位在華的傳教士，費了十五年光陰，更不知費了多少心力之後，受洗的人數還不滿兩百名，却以爲他所立的住院，要比那雄偉的印度大堂，有更好的姿態，比那擁有數萬信衆的摩六甲教會，和那經一五九七年榮光的致命後，生氣蓬勃的日本教會，更有意義。這豈不是怪事嗎？然而將來的事實，就證明這位渺小無名，被扔在這廣大中華帝國中的利瑪竇司鐸，所見誠爲不謬。那位傳教印度的諾比利司鐸，惟有踏着波羅門人的足跡，才能和他們接近，叩入他們的心坎。安博納（Amboine）德那特（Ternate）和松特（Sonde）羣島的傳教機關，經不起馬來的回教徒和荷蘭的誓反教徒勾結作祟，不久便歸消滅了。（註二十二）日本到了一六一四年，採取了絕對閉關政策，便把外國教士們概加驅逐，不稍顧恤。（註二十三）暹羅、安南，在十七世紀的前半世紀中，傳教事業，果然迅速發展，但這種結果，正因羅德司鐸（P. de Rhodes）採取利公的方法，毫不猶豫，才能見效。（註二十四）惟有斐列濱的教務蒸蒸日上，似乎使在華的教士們無以自解，殊不知西班牙當斐理伯二世，法蘭西當亨利四世時代，歐洲人還不知道中國的文化，比了歐洲的文明國家並不稍遜咧。（註二十五）

歐洲人誤會利公的心意，也須經過許久，才見消釋。前面我們已提起過某史家的話了：「這裏，我必須糾正歐洲方面許多人的謬言，以為本會同志們要在這一國獵取儒士的功名；因為我們的儒士，不是稱為中國的儒士，却是歐洲的儒士。」（註二十六）如今，到了我們的時代，一般見解轉變得真奇特，大家都責備他們還不够中國化，特別是在藝術一方面，却不願慮他們認為和僧道相混，是極端的危險；可是他們教堂的屋頂，聳起成角，祭台上供的一尊聖童貞像兩眼下垂，便以為這有迹近佛教的嫌疑，這種近似是最危險的。至多，他們的鐘櫃上，可以刻幾條龍，或者赤着腳傳佈福的人；可以穿上鞋，然而這些事，有時候，仍有人加以反對。（註二十七）

十六世紀末年的歐洲人所目為更堪詫異的事情，便是教士們所有不是純屬宗教範圍的種種特別舉動。這一點，一般代教士們答辯的人，仍替他們伸說這種行動，確屬必要，只是他們的論據，和我們的見解微有不同。比方，某史家曾論：（註二十八）「天主不是數千年來，常用一樣的方法，引人歸向自己的。所以如果本會同志們利用這種『魚餌』來引『魚』入網，也就不該視為足怪。因為，凡是主張在這個教會中摺斥算學，物理，和倫理哲學的人，就沒有充分認識中國人精神上的煩悶，要是不用這種勸誘的方法，來維繫人心，甚麼救靈要藥，是不能使他們領受的。」

「魚餌」「勸誘」這種種的字句，似乎在伸說業務上的策畧，利用各種巧妙的方法來贏得人心，使加注意，可是這種說法却與利公的心意，和所為，全不相符。實則，利公在南京住院的大廳中，正如他在南昌，韶州的斗室，和肇慶的住院中一般，時時處處，努力進行，無非要在中國智識界中，引進基多信道的酵母罷了。正因为他已經着手拉攏一班確有高尙精神的人，和他來往，才能表示他對於前途，是那麼有把握，那麼樂觀。總之，利公目擊歐洲各國的紛爭擾攘，已惹起了文明國家

彼此互相衝突，便想丟開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蘭人、英吉利人，而在遠東從事於一種和平有益，彼此諒解的工作，來代替這種衝突。那最足使人驚訝的，便是他在這素稱閉關自守，不容外人插足的中國，却能覺得聲氣相投的好朋友，和志同道合的熱心人。

這種光景，一般人對於遠東方面演進情形，素極隔膜，未免太不明瞭了。這裏我們加以伸說，未始不是有益的。晚近一般中國史家，聽到中國多少依賴着宇宙間其他的民族，便要認爲這些話，對於中國人是一種侮辱。那位著名學者丁文江博士，曾把這種成見，加以糾正，我們不妨摘錄他的偉論如下：「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在禮教一方面，常受到隣邦的影響，有所增益。可是行起來，總會設法把從外國得來的東西加以同化，依照自己的方式把他發展，如果不能同化，往往就捨棄不要。那煉紫銅的技術，一定不是中國人所發明（有史以前的時代）可是紫銅的製作物，中國人却做得很精美。周朝時候，人民用過七日一來復的星期制，但二百年後就廢棄了。同樣，土星往復的周期的確也會用以制定日期。漢時，便有玻璃輸入，却不曾自行製造；這外國來的東西，使中國人得到了在陶器上加釉的觀念，因此便發明了磁器的製造法。佛教流入中國，表面上似乎使中國人完全受到影響，可是參禪的宗派，却是出於中國；末了，道教中人就竊取了佛教的儀式，宋儒又竊取了他的哲理。無疑地，中國所有天文、曆算，有許多是從外國得來，却已幾經修改，一再增廣，教人認不出本來面目了。久居中國的外邦人，不論是佛教僧侶或是回教信徒，大概都已同化，變成中國人了。這種趨勢，便是耶穌會教士們也不能完全避免；凡曾讀過湯若望、南懷仁輩所遺的公文函牘，或者賞鑒過郎世寧所繪山水人物的人，就不容易看出他們是外國人啦。中國文化所以縣延不絕，和米索包坦米，或是埃及的文化根本不同，正是由於這種同化異族，適應生存固有的能

力。」（註二十九）

且不管中國文化和中亞洲或是埃及比較起來究竟是怎樣——因為討論起來未免離題太遠了——我們在丁氏的論斷中，只記取耶穌會士們——現在不妨說就是利公——知道避免中西文化的衝突，這一點。這裏，我們以為文化兩字，依照目前公共的見解，就是做着社會一份子的人，所有的知識信仰道德，學術，法制，風紀，和其他種種的慣例，或是習俗。利公個人，非但毫不放棄他所有的歐風，還想把自己的所有傳給他的中國朋友們，憑着他們的合作，移花接木，把他按在東方文明的軀幹上。他所有這樣的志願，在他一六〇一年作於南京的世界輿圖的序文上，（註三十）說得再明白沒有了。那裏，有一班中國的智識份子，（就是後來似乎都加入了東林黨的士大夫）同聲稱道着這位泰西儒士，西泰先生的才高學博。那位當代大人物，主持稅務衙門的吳左海，在他所作的序文中，對利公尤極推崇。他說：「我確知他所繪的地圖，都是以本國所印的原本作根據的。我們的先哲，一定是不尚左道，不重迷信的。他朝朝暮暮，敬事上天，又在思言行爲中，誓不稍失忠誠；至於推算天象，示日月星辰的距離，這原是很不容易準確的，可是這些，看來確已証實了。」（註三十一）

在這前進的智識界的核心中，有一位使我們緬懷追念，遠過於這高官顯宦的賢儒，這便是後來以「進士良」的名稱聞於歐洲的李之藻先生。他是杭州人，生長禮義之邦（一五六六年生），一五九八年成進士。（註三十二）這位不平凡的先覺，至今被正史蔑視着。便是那些對他的朋友徐光啓相國不得不多少給予一點地位的史家，也不肯提一提他的生平事績。（註三十三）然而要是沒有他，十七世紀末葉和十八世紀初葉的幾位博學鴻儒如顧炎武輩，就不能發揮他們的思想，他的功績，又怎可泯滅呢？這的確，我們不得不歸咎於明儒學案的作者黃宗羲咧。他傾向佛教，偏見太深了，就故

意把他遺忘啦。實在李之藻的確是個翻譯家，不但翻譯了好幾種科學書，還譯了幾部神哲學作品。難道這些不是他的創作，算不得是有價值的作品嗎？然而比了四庫全書中許多空洞浮泛，讀了令人厭倦的集書，却要高明得多咧！幸而公教教士們崇功報德，已給他立起了歷史的紀念碑，永垂不朽；因而我們不難用中國文字給他立傳，和徐光啓楊廷筠等一班賢哲的傳記一般，寫他活潑的精神，正可以使那正史中所有乾枯無味的列傳相形見绌！

我們對於李之藻，並不說他如徐光啓一般，可以稱得是聖人，可是他總不失爲正人君子，確實是個聰明穎慧，愛國心極深切的人。他的脾氣，很有些像瞿太素，却有一點和太素不同，就是他肯去應考；可是八股式的制藝，仍不能磨滅他創作的個性。他於一五九九年中了進士以後，便分發到南京做個小官，便在這地方，和利公相識了。（註三十四）他善於酬應，也像他的多數僚友一樣，不辭酒食徵逐，與世浮沉。他喜歡博奕，竟成嗜好；下棋打麻雀，誰都沒有他那麼高興。（註三十五）

看來，起先，他爲了研究輿圖學，才去見利公。當一五九四年他年紀還輕的時候，他曾依照當時流行的方法，做了一篇中國十五行省記，對於外國民族知道得很少，只得約畧說幾句。利公的世界輿圖使他大開茅塞，他把緯度的圓圈，經度的子午綫，仔細研究一番之後，便明白這方法的確極正當，從此他就做了歐洲各種成法的介紹人啦。（註三十六）據魯德照司鐸的記載。（註三十七）自從他認得了教士們時候起，直到他暮年去世時候止，中間共有三十多年，這三十餘年中，他所有最重要的任務，便是翻譯西洋的書籍。這件事，他做得十分認真，十分用心，不論在城裏，或是在鄉下，出外訪客，或是參加通常宴會，他的衣袋總帶着一兩本書；便是坐在轎子裏，由轎夫抬着出門的時候，也常見他手不釋卷，筆不停揮。他雖

則瞎了一隻眼，一隻眼也很近視，看書寫字，總得把臉貼着紙，却仍孜孜不倦地看，寫着。可是他研究各種科學的，確都有很大的進步，講論起來，很能頭頭是道，比歐洲的博學士並不多讓，不懂的，確乎很少。」金尼閣司鐸也會記着他的事蹟。（註三十八）說：「本會某教士新從歐洲來，不會說中國話，和人交談，便用舌人傳譯。他曾在一位如今已歸奉聖教的有名進士（大概這便是李之藻）家裏，住了二十天。這位名士好學不倦，就陪着他，消磨這二十天的大半光陰，究問我們的神哲學，修會（耶穌會）的概況，以及所有學術上的意見。某教士便一一對答，他聽了很覺滿意。某日，他就發表了這樣的言論：「現在我和你相對，實在覺得慚愧。」某教士不禁莞爾，問他爲甚要說這樣的話。他說：「因爲我想你看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正如我們看那無信的韃子和蠻夷一般咧。」某教士謙謝不敢，他却說：「我想總不能不這樣，因爲我看我們算是做完了，你却剛正做起。」他又聽講雄辯的研究，便十分嚮慕，以爲我們歐洲人從小就學起，所以他直到老，還不肯輟學。」這種見解，在曾國藩、張之洞，尤其是十九世紀中的王（註三十九）這些人看來，簡直是有玷名教，可是經過了一九一七年的文字革命以後，便成爲普通的見解了，不過有這一點不同，就是如今依着近代方法來形成的新中國的智識界，很有許多以爲便是不比老師強，却總不見得不及。（註四十）這種結果是由利公憑着他做前驅的熱忱，始終不懈，努力從事於開啓後人的工作得來，一朝如願以償，自必要感覺無限欣慰咧。

利公在南京時候，（註四十一）常去訪問他的文人學士們中，雖則當時不會見有名公鉅卿開道版依，却已有些入準備歸化了，（註四十二）如李之藻、徐光啓等，（註四十三）便是其中的例子。然而那時也未嘗沒有學習教理預備領洗的，最著稱的是一位年紀已有七十歲的老頭兒。他姓秦，是承辦轉運皇糧，管轄着五百艘糧船的世襲指揮。（註四十

四）他的妻室，兒子和孫子，已先領洗了；他自己還沒有，因為他心懷疑慮，以為做了教友，便是應該法辦的事，也不能嚴厲用刑。（註四十五）後來他領洗了，取名瑪爾定，他的兒子是考中了武解元以後領洗的，洗名保祿。接着，他闔家十二人也逐漸領洗了；後來，領洗的，又加到十八以至二十人。（註四十六）於是南京第一座私堂，就告成立。（註四十七）秦指揮搜集了一筐子偶像，交給利公換得一幀美麗的救世主像。利公便把這些偶像作為在南京初次得勝的戰利品，送到澳門。

如果我們要在歷史上，覓取一種堪與中國儒士們的勢力相比擬的辭令，那麼，最好，惟有求之教耶穌在世時候，法列奧黨人所表現的好高務遠的行動了。他們兢兢業業，泥守着傳統的禮法，捨本逐末，妄加詮註，拘泥着經書的字面，依着狹義的解釋，斤斤於細行，還要吹毛求疵，來指摘他人。中國的宋儒一派，也正和他們相彷彿，一貫地循行「攻斥異端」的遺教，頑梗不化，墨守朱子斷章取義的註疏，把程朱學說奉作天經地義，却不料門戶洞開，各種學說的勢力都能侵入。且不說那慈悲為本的佛教學說，便是幾種溫和的主義，如王陽明注重良知的倫理哲學，已給許多讀書人立下根基，使他們聽了利公的高論，就有心領受基多的福音了；便在一般推崇宋儒理學的士大夫中，也像那猶太教中的法列奧黨一樣，也有渴願求得真知的。

第八章 二次進京和太監馬堂的威脅

利公自己當然要預備再作進京的嘗試——他自己說是向北京二次進攻——這是毫無疑問的；不過這回不像第一次一樣，倉猝成行，貿然上道了。（註一）他先以為不妨請南昌的建安王居間，和那派在江西監收錢稅的太監接洽，便命蘇如望司鐸就近晉謁商懇。建安王就發給了一張執照，教利公帶了貢品來見他，由他與利公共同出面，奏聞皇上。他派了一個差官到南京，不料這人在路上竟失蹤了，就此音信全無；大家想他在路上遇盜被害，屍身拋在江裏。（註二）後來這件事，南昌的教士們仍繼續進行，辦了好久，但利公已改變了主意，不再想靠太監的力量，便向建安王表示感謝，不再煩勞他。

這當兒，郭居靜司鐸在澳門也很忙碌。日本來船的失事，使澳門葡人損失了四十萬元，但澳門耶穌會當局仍殫心竭力，為中國的教會籌款接濟。（註三）澳門方面，有一封兩百元的匯割信，寄到南京，不料這是空頭匯票。這筆錢，後來雖則仍舊能追回，可是利公約定償付第二批屋價，到期就不能履行啦，這真教他非凡着急，萬分難受。劉斗墟知道了這回事，却慨然允許他再度展期。澳門當局的努力，多虧葡商的慷慨無比，終於獲得成功，一共捐募得九百元，除了供給三處住院的生活費用，償還南昌的債務，付清南京的房價外，還够利公到北京的旅費。至於徵募貢品，不揀價值高貴的東西，只求較為奇特稀罕——就是（註四）——其中計有總會長亞瓜維送來的一座小時鐘，是鍍金的紫銅做的，只有二三寸高；一座鍍質鍍金的大時鐘，不及那小時鐘珍貴，只是敲起來，要響得多，鐘擺垂在外面，因此頗為名貴；三幀畫像，兩幀大的是聖母像，有尺半高，一幀是根據路加聖史繪的（這是從羅馬寄來，畫得極好）；另一幀繪着聖母耶穌，和聖若翰，第三幀比較小一

點，是救世主像，還有兩個威尼斯三稜鏡，有銀鍊穿着，裝在錦匣裏，銀鍊錦匣是在日本定製，價值比匣子裏的東西高；一個看戲用的望遠鏡；一本日課經，附着題銘：「真神的道理都在這裏，神像附呈。」此外，還有幾面鏡子，羽毛的冠飾，精緻的細麻布，幾種計時的沙滴漏和玻璃器皿，許多書籍，以及其他幾件稀罕的東西。「這些，都是有如輪軸用的油，塗上了，好使事情順利推進。」郭居靜司鐸另外又募得了兩隻銀聖爵，預備供北京和韶州兩處的教士們應用。後來，澳門方面，又製造了幾座風琴，寄到南京，只是到得太遲了，趕不及由利公帶到北京。

這當兒，西班牙籍的龐迪我司鐸正在澳門候機會，和其他十來位同志同到日本傳教，却不料突然奉到了上峯的命令，教他和郭公同行，（註五。）他的上峯便是李瑪諾司鐸，這件事情，所以這樣決定，是因：（註六）（一）龐鐸的年齡，才德，能力，都合格，學習中國語文，也並無困難；（二）他曾向范禮安會長表示願到中國傳教，如果不是因為聽人說起過不肯派西班牙人到中國，他早已請求派遣了；（三）其他候派的教士，都是葡國人，日本方面需要正殷，再則耶穌會當局不願派西班牙人到中國的傳統政策，亟應廢除；（註七）（四）到北京的司鐸應該有兩人，帶一位助理修士同行，這就使三處住院的教士，只剩得三位司鐸，一位修士了，以後勢必有兩處住院，僅有司鐸一人，連作伴的修士都沒有，所以郭居靜司鐸會告范公，說他身患疾病，南京職務繁重，萬不能單獨主持。

到了一五九九年十月底，（註八）郭居靜龐迪我兩人便同趕市的葡國商人到了廣州。十一月一日，諸聖瞻禮晚上，他們換上了中國衣服，（郭公已把鬚髮留長了，龐鐸却還不能完全學會本地習慣）（註九）悄悄兒僱了船，向南京進發，於一六〇〇年春初，安然到達。利公只怕他們錯過這有利期間，等得已有些不耐了；再則，他們在這時候來到，未免有欠審

慎，因爲再往後，南京的教士太多了，怕要惹人注意。他們於是大家商議一番，好決定教誰跟利公同行北上。（註十）結果大家議決郭公在南京，已很熟悉，就教他担任留守，派南昌來的羅如望協助他，接應來訪的賓客；龐迪我跟利公進京。又因須等四個月才動身，就教他和郭公同學彈古琴，到了北京，自有用處。利公自己，却利用餘暇，把新帶來的貢品細加斟酌。這時候，瞿太素在鎮江，利公便請他來盤桓幾天，好和李心齋共同計議。他們倆商定應請一位大員，發給正式護照，便同去謁見祝石林府尹，商辦這事。祝府尹一口應承，毫不推諉。「這個辦法真是再好沒有了，因爲這件事情，正該他主管；但教士們只怕他不答應，討沒趣，不敢出面向他請求。」這當兒，禮部尙書王忠銘因謀不到北京禮部職位已，於一五九九年年底辭官回籍了，但他也像其他的官僚們一樣，出幾封介紹信，交給利公，托京裏的朋友們代爲照料。

恰有一個太監叫劉步仙，押着裝運貢緞的五六艘快船，北上進京（註十一）便讓利公一行人趁船同去，不收川費。利公爲答謝他的盛意起見，替他向官廳方面說妥一件事，價值要比川費加上一倍；又把寄存官庫的三稜玻璃，留下一枚，送給祝石林。教士們找得南京的巧匠，給那鐵質的大時鐘，製造一個四脚櫃，兩面開門，好校準時刻，鐘面上用美觀的中國字標明時刻，有一隻鷹做計時針。櫃子上面有一個四周開洞的小型圓頂，裏面安着那報刻的小時鐘。櫃子的外面，雕着花葉，和許多皇帝御用的龍徽，雕刻得極精細。「便是在歐洲，這東西鍍金彩繪，也可以算得是珍品咧。」

「利公的好友們，都依着中國風俗，爭先給他設宴餞行。那熟奉教的秦家，也送給他一桌筵席。一六〇〇年五月十八日，（註十二）劉太監押運的船舶，便離開南京，向北京出發了。和利公同行的，還有幾個晉京授職的官員。這回教士們入京進貢，一路上和前番北上時大不相同了。以前，他們遮遮掩掩，只裝做矮人，免得教人窺破；如今，却大模大樣，裝做要人，帶

着到京設立新機關所需一切設備的東西，連小堂裏的裝飾品也都帶着，分佔着兩個房艙，舒舒服服住着啦。每當船行駛到大碼頭停泊的時候，他們便上岸去拜會地方官和紳士們。劉太監也同朋友們講起教士們入京進貢的事情，往往中途停泊，教士們上岸遊歷，劉太監因為護送貢品，教幾艘船先開，別的人却要等四五天，讓他們遊罷歸來。他們一路前去，很得各方面人士的協助，因此利公得乘機和人暢談天主教道理，和教士們來華的宗旨。

教士們乘船北上，暇來看看運河裏船舶往來，絡繹不絕，便說這人工造成的河道，簡直是世界奇觀之一。（註十三）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傳教士，外交官，和商人們，描寫運河的彎道和水閘，視為奇觀，但如今可惜有幾段已完全淤塞了，比了現代工程師所開的河渠，真是差得遠咧。利公所見的運河還在全盛時代，所以他記着說：「經過這條河道，運糧到北京，船舶約有一萬艘。來來往往的官船，和商家私有的船隻還不算在內，不過商船到北京怕遭麻煩，所以不過黃河。有時候，船舶擁擠得把河道堵塞了，要等好幾天，才能通行。這大概是因運河有幾處河水很淺，而且有許多地方是斜面的石底，得先用閘板闔住，等水滿了才開閘，讓船通過。因此，過了一閘又一閘，過閘時候，船夫很費氣力，還得教乘客們齊來幫忙，上岸拉絛。（註十四）上帆行駛，是很難得的。船進閘的時候，閘門一開，水勢就很急激地沖進來，有許多船給他沖翻了；因此，每逢官船，或是糧船進閘，總得有許多民夫候着，拉住他，由官廳發給工資。這就成爲人民受壓迫的一大原因，加以治河費用，每年總得化上百餘萬元，更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教士們不解中國人何以不由那行程既短，行駛又較迅速的海道運糧載客，却不知中國人既怕風浪險惡，又怕海盜攔劫，素來視海道爲畏途，所以雖則有許多人建議，也曾一再試行，却總認爲不妥，不願冒此大險。」

沿途經過江南、山東和直隸三省的大城市很多，兩岸屋舍毗連，好像是個連繼不斷的大市鎮。這一帶地方物產豐饒，食用富足，米，穀，黍，稷，牲畜，鱗介，果蔬之類很多，又很便宜。公家需用的木材，都得經由這條河道運到京裏，而且自從宮中發生了大火災以後，焚燬的宮殿屋宇，約有三分之二，這當兒正大興土木，需要的木材更多啦。（註十五）因此，利公等此番北上，一路遇到了許多巨大的木排，由幾千人拉着前進，每天至多行五六里；從四川起運的木材，必須兩三年才能運到。這樣估計起來，有幾根做正殿大柱子的木材，每根要值三千餘元；最大的木排要拖長到兩里多。木材以外，還有石頭，用特別打造的船隻裝運，要行一千里以至一千五百里才到。教士們一路所見的木石，不但够造皇宮，便是造一座城市，也儘可以够用。

依照定例，南方各省還得逐年進貢水果，鮮魚，衣服，綢緞，茶，米，以及菜蔬等物，而且這些東西都得依限運到，否則那押運的太監，就得重重受罰。裝運貢品的快船叫「馬船」，以八、九、十來艘為一組。起運貢品總在夏季，所以這些食品，若不用冰保存，必然有許多要敗壞。因此，各處大城市，都得設立冰廠，預備每到一處，可以隨時更換。

運河在長江和黃河間的一段，最足令人感覺興趣。這時候，黃河河道，在山東南部，經過徐州入海。（註十六）「河水污濁得竟像是泥漿，不像是水，又時常泛濫，釀成可怕的水災，所以地方官府，祭河已成定例，把黃河當作活的神靈一般看待，再加上許多迷信。這道河稱為黃河，是因河水裏常常帶着黃土。據說，黃河每隔一千年才清一次，因此，有一句俗諺叫「但等黃河清。」黃河一清，就有三分之一的泥土沉到了河底裏啦。

船到了江南和山東交界的台兒莊（註十七）有一個地方官到船上來拜訪利公。利公就乘機拿出救世主像和聖

母像給他瞻仰，談到末了，這位官員便說：「假使你得蒙皇上召見，你千萬要把你們的教理講給他聽，勸他對臣民待得慈愛一點。」他見龐迪我司鐸害着胃氣痛，下一天，便命人配製了一張膏藥，親自帶來贈送。

教士們沿途經過的地方，最受歡迎的，要算是濟寧了。這是山東境內的一個大商埠，那官階和督撫相等的漕運總督，便在這裏駐節。那時，做漕督的名劉心同，是山西人，曾屢次聽他的兒子和李贊講起利公。這兩位是利公在南京結識的朋友。李贊篤信佛教，極關心身後事，這當兒恰在濟寧，住在督署比鄰，有暗門可以相通。利公到了濟寧，向李贊投帖拜訪，漕督便立即派人帶了護衛，押着轎，去迎接利公。他和利公談了很久，末了，他說：「西秦，我願和你同上天堂。」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他寧願捨棄富貴尊榮，只要救得靈魂。他知道利公抱此宏願，才不辭勞瘁，不畏艱辛，來華傳道。利公一回到船上，濟寧城裏便大起謠言，說總督排出全部儀仗，親自去看貢品。當下，就有許多人跟他學樣。劉大人，翻開利公的日課經，見了一幀救世主像，便向利公乞取了。下一天，利公到他衙門裏去回拜，同他的兒子和李贊，盤桓了整整一天。利公曾記着說：「他情誼殷勤，令人有除了歐洲熱心教友外，在異教國中，走到天邊無覓處的感情。」那在南京擬就的奏表，看來措辭不見得十分貼妥，所以利公就在這裏，請一位辦稿專家，重新擬撰。劉心同又出了幾封荐書，托北京的官紳代為照料。這些書信，後來却有絕大效驗。總督夫人曾夢見「一位菩薩模樣」的人，身邊有兩個孩子，聽他丈夫講起那聖母和耶穌聖若翰的畫像，便要教本城畫家臨摹，但時間偏促，不及摹繪，利公就送給她一幀很美麗的仿本，「這是教中某青年摹繪的。」（必然是日本青年）總督非常感激，便命一位親信人員護送教士們，趕上那大監的船，免得到了有幾處難通過的地方，發生周折，因為這當兒劉太監見看熱鬧的人多，怕有甚麼意外，已先自開船，去得遠了。這回之際遇，結果，大出利公所望；以後，相隔不

到三年，這兩位有名人物都死了，沒有領洗奉教；劉總督死在任上，李賢奉旨拏辦，下北京刑部獄，論斬，棄市（註十八）。教士們從南京直到濟寧，一路平安無事，可是四十天後，七月三日（駐十九）到了臨清稅關，就出了岔子，開始遭遇艱難了。

「皇帝派一個極奸滑，極殘暴的太監叫馬堂，在這裏監收稅款。他一到差，就凶惡得在全國出了名，沒有一個不怕他。上一年，曾有一羣兵起事，反叛他，燒了他的衙屋，殺死了他手下許多人；他改裝易服，才逃得性命。可是經過了這回事變以後，他還是那麼橫暴，不知斂迹，不戢凶威。」

劉太監和馬堂接洽過兩三次，答應付一筆捐稅過關，加了又加，却總講不通。他怕耽擱日子，誤了欽限，便決計出賣利公的秘密，暗地裏通知馬堂的親信，說有幾個外國人帶着許多中國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要進貢，還當作一樁極重要的機密大事，把進貢的禮品，一一洩露。這就够燃起馬堂貪財的慾火了，想弄到一塊「希世奇珍」的寶石，還要借這回進貢，向皇帝討功勞。利公知道自己處境危險極了，便已打定主意，立即去拜訪一位朋友，商量求救。這便是在肇慶時候結識的那位廣東人嶺西道鍾槐樂？“Gimtalho”（註二十）他得到利公北來的消息，知道要經過這裏，幾天前便已派人在埠頭上守候了。那人一見利公，便飛奔回去，向他報告。他便請利公上岸，到他衙門裏小住兩天，一聽說馬堂要干涉，就搖頭歎氣，替利公十分擔憂，因為太監橫行不法，大臣們尙且爭不得，一個沒依靠的外國人，更不用說了。他就勸利公對馬堂要諸事隨順，謝他照料，這樣才能少受一點禍害，要想推諉躲避，是不中用的，而且許有危險。這種勸告，實在是最合時宜。

事實上，利公還不會出得衙門，便有一個報信的差役，突來報告，馬堂已在船上等着他了。鍾道尹就命回報，說要是別

人，他就決不肯放走他的賓客。後來，利公會記：「這真是出於天主上智的安排，使這位官員恰在那裏，教那太監明白知道他是教士的朋友，因為在這個城裏，惟有這一個光明正大的人，敢反抗這太監的橫行不法。後來，地方上給他造了一座廟，立碑刻像。」

那時，馬堂坐在一艘用堅木打造，全身髹漆的大船上，向着利公的船，行駛過來。利公就出來迎接他，過船到了他客艙裏。彼此極客氣地寒暄一番之後，利公便命人把貢品搬過船來。馬堂見了聖像，便跪下拜了幾拜，對聖母像許願，要送進皇宮裏供奉，又立即命人把利公的奏本遞送進京。利公知道他的殷勤是惹禍的根苗，便竭力設法擺脫他的羈絆，很委婉地說到有幾位官員，曾許下他，定必出力協助。馬太監却鼻子裏嗤了一下，說這班官，皇上向來不理會；他們的事，儘攔着不辦。利公聽了，便很謙遜地向他表示感謝，說想不到深蒙關愛。接着，馬堂說他的衙門已造好了，不妨把這些貢品放在那裏。利公一想不好，便推說自鳴鐘必須常有人照管，至於聖像，他更須隨身供奉，求神護佑，聖像本身已很美妙，也不必再加修飾。」

於是那押運貢船的劉太監，不納分文捐稅。開船過關了，他省却三十餘元的破費，賣了利公，又把那在南京買來的小奴才讓給利公。這孩子說得一口好官話，後來就用他教龐迪我，教得很不差。教士們就搬到了馬堂的一艘大船上。再過一個月，這艘船就得開到天津衛，繳解六個月來所收的稅款。（註二十一）在這幾星期中，來訪問的絡繹不絕，往往由鍾道尹親自引導而來。他一有機會，就向人誇耀利公等的才德，使馬堂知道教士們怎樣受到全中國人的尊敬。

馬堂也會向利公等獻些小殷勤。一天，他在衙門裏，設宴邀請教士們和其他太太監們赴席，席間，他召優伶演戲，和江

湖實解的，獻走繩索、轉缸等技藝，「這些都是歐洲印度所從未見過的。」「有一個角兒耍着三把兩掌長的尖刀，連續拋接，不會失跌。又有一個，朝天仰臥，伸起兩腳，起先托着一根很長的管子，旋轉舞弄，接着，要一個大石鼓，又要一張四隻腳的檯子。隨後，有兩個人戴着大面具，穿着奇形怪狀的衣服，出場耍雙簧，一個講話，一個裝腔做勢。壓軸戲是一個孩子，跨下裝着一個同樣的假人，用手抵着地當作腳，把腳當手，顛倒行走，翻來翻去，跳着舞着。」

將近七月十五日，馬堂依照習慣的儀式，擬具申奏皇帝的奏本。他在兩三天前，便已不出來見客辦公了，這當兒，又把奏本中的詞句，細加斟酌，審慎推敲，才命兩個專門寫奏本的書吏，繕成了正副兩本，註明確實的字數，用黃絹裝訂，又用黃袱包封。他差人資送到京，呈進宮闕。差官起程的時候，他得穿上公服，直送出大門，當下，又放了一聲响砲，把這件大事通告闔城官民。

「這奏本很簡單，只說有一個西洋人名叫利瑪竇，剛從臨清乘船來到，據稱，帶着幾件東西，要去貢獻給陛下。馬堂查得這西洋人是個好人，只怕在糧船上有人欺侮他，便在他手下的船中，給他撥派一艘，護送他到天津，在那裏專候皇上早賜批示等語。」

從這時候起，利公的事情，非但不能迅速進行，反而只得緩緩前進了。馬堂本想利公送他一塊「寶石」，此刻他見這事越等越無希望，他的熱心就冷下來啦。然而他還坐着八人轎，擺着全副儀仗，銅鑼敲得震天響，前來拜訪利公。這是因為教士們在七月十八日左右，同那送奏本的差官一齊動身，他此來算是送行告別，差官和教士們同船出發，好教他們逃不了，船上還派了四個兵日夜看守着，帶着警鐘，做信號。（註二十二。）船行駛了五六天，就到了天津。（約在七月二十三、四

日)一路的供應「和做官的一般」有魚肉果酒。馬堂的差官等繼續向北京進發；教士們在他們去後三四天中，便一天到晚，專等皇上批示，可是等過了兩星期，(約八月七八日)馬堂自己，解入萬兩稅銀，也已到了天津啦。北京方面却依然音信全無，便又派了一個人前往探問。後來，大家就知道耽擱的緣故了。照例，這件事情，應該申奏朝廷，由禮部衙門轉奏；但馬堂的心腹人貪圖獨得好處，做了手脚，所以這件事，皇帝或是代擬諭旨的朝臣，就不管啦。日子一天一天過去，馬堂又爲了別的事情受到申斥，便追悔這件事不該多管。他不再請教士們去見他了，又派了六個人留在他們的船上，推說給他們當差，實在是來監視。這當兒，真教利公束手無策！向前進發吧，沒有皇上聖旨，萬萬使不得；回到南京吧，這也不行。所以這當兒，教士們惟有把自己托付於天主，懷着憔悴的心神老等着。

這樣等過了三個月悠久的光陰，那渴盼着的中使，終於來到了，(算來已到十月底。)龐迪我司鐸說：「我們的呼吸就透過來了。」皇上的聖旨當衆開讀的時候，利公穿了布衣，戴上頭巾，跪着恭聽宣讀。天津的一班文武百官，各依品級，穿着公服，一齊到場接旨。皇上的諭旨中，着馬堂把外國人帶來的東西一一查明，再行申奏，「因爲上次的奏本說得好像不知道的。」馬堂奉旨，便立即到教士們的船上，教他們親筆開具清單：還再三說：「珍貴的東西，你們勿隱瞞。」利公就聲明決沒有這回事。不料馬堂覆奏以後，又和上次一樣，爲了同樣緣由，被擱下來了。這回，北京禮部主管人員，和閣黨暗鬥很劇烈。天津方面還不知道這種詭計。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朝廷的覆文還不到，馬堂就越想越懊悔，不該管這閒事啦。十月過去，十一月開始了，冬季漸漸臨近，河水二冰凍，船就到不得臨清了。他於是差人通知利公，索回那借用的官船，又派了許多人，護送教士們到「本城一處花園裏」居住。利公等雖則明知這種處置，表面上算是優待，其實不懷好意，却也欣然。

忍受了，因為照羅馬典禮的規定，不得在船上舉行聖祭，如今住在陸地上，就可以天天舉祭了。他們的書信中曾說：「這樣，我們便可加強我們靈魂的神力，好教我們將來能忍受一切艱難。」

馬堂始終懷疑着，教士們把所有重價的東西瞞着他。他將到臨清前兩天，帶着兩百來兵士，教天津兵備道（他已做了教士們的朋友）陪着同來，到教士們廂房中，「滿面怒容，大肆咆哮，像要殺人一般。」他一到，就暴跳如雷，大聲叫嚷，說北京有人寫信來，說利公私藏許多寶石，不肯進貢，屋裏又藏匿多人。利公便坦然回說，他只須親眼一查看，便不難明白。這些事情都是出於虛構了。馬太監就命人搜查行李，把四五隻箱子都搬到了庭院裏，又教屋子裏所有的人，一齊走出來，站在一起。隨後，他就詳細檢查，不住嚷着，發怒着，要是看見了一樣新東西，或者有一樣東西漏掉了，沒有給他看得，他就大發凶威，嘮叨不絕，好像他失竊了東西，提到了賊贓一般。他揀喜歡的東西隨意拿，另外放開。可是他查了好久，找不到貴重的東西，就越發發怒，沖天了，那所謂妖術厭勝的事件，便在這裏發生（註二十二）。

「他在龐迪我司鐸的一隻小鐵匣裏，找見了一個木刻的苦像，着色十分美麗，血色鮮明，和真的一般。他一見這東西，就扮起鬼臉，裝腔作勢，瞧了一回，接着，便突然說道：「好啊！這就是你們弄的妖法，要咒死皇上啦！凡是有種種妖法的實在都不是好人。」又說，他現在才明白，這真是一件危險的東西。這些話就使旁觀的人們大起騷動，使教士們大起惶恐。利公一方面，不肯就說這便是我們的天主，因為他見自己處於這種境地，當着這班不識不知的人，講不來這樣極神秘極奧妙的大道理，便是說了，馬堂也必不肯相信；一方面，却見在場的人目覩馬堂用這樣粗暴的手段來對付他，都有些憤憤不平，所以他就不慌不忙，向那兵備道和其他代抱不平的人們慢慢講解，說：這是我們西洋地方一位大聖人，他願意為我們受

死在十字架上的苦難，因此，我們畫他雕刻他的像，常常放在眼前，感謝他這樣的大恩。（註二十三。）那兵備道就說：「無論如何，把這人刻得這樣怪形怪狀，總是不好看啊。」至於那大監，他非但不息怒，還要謾罵着，大聲叫喊，說這班人，非辦不可。但這當兒，他們又搜出了別的苦像，有的是畫像，有的是木刻，於是他們的猜疑就漸漸緩和下來了。他們彼此就互相詢問，這些東西究竟是不是爲厭勝詛咒用的。

搜完了以後，馬太監和那兵備道便進屋坐下，也教利公等坐了。最足令人痛恨的事，便是馬堂竟掠奪了兩個烏木的聖骨匣，一個是美麗的十字，另一個是像書本一樣的小方匣，——尊澳門教友捐贈的鍍金銀聖爵，是教士們舉祭用的。他先交還了一隻口袋，內中有兩百多銀元，便自以爲這是他的恩典，正如做賊的以爲不會偷的東西，算是奉送了。教士們便向他道謝，只怕不這樣，這袋銀子就永遠拿不到。他們力請交還聖骨，可是無論怎樣說，總是討不回來。他們又竭力解說那聖爵是祭獻天主所用的聖物，惟有祝聖過的人才能動得。無奈這些話全是白費。馬堂伸出他污穢的魔手，拿起聖爵翻來倒去，看了一回，却說：「你們怎說我們動不得呢？」末了，利公實在耐不住了，便聲色俱厲地對他說：「你不妨在那口袋裏拿兩倍重的銀子，再多一點，也不妨，却把我們職務上應用的這東西，還給我們。」兵備道見利公這樣不願意，覺得很感動，便勸馬堂道：「你知道他們要這東西，不是因爲是銀子做的，却是他們看重他罷了。所以既然他們肯出兩倍銀子換，你就還了他們吧。」教士們見這大監把聖爵交還，讓他們拿回，才覺得十分欣慰。」

經過這回極痛苦的演出後，馬堂便把他揀出放開的東西，連那兩個聖骨匣，一齊收拾了，這些是水紋衣，印度棉布，幾個玻璃盆，日晷儀，和沙滴漏，以及其他種種的東西，共計四十來件。他把那大時鐘和大聖像留在教士們所住的屋子裏，其

餘的都送到天津衛的官庫裏，封鎖起來。末了，他懷着一腔忿怒，到了臨走的時候，還說要向皇上參奏，教他們受皇上處罰，至少要把他們驅逐出國。從此，教士們除了一心依恃天主，靈魂上充滿着神慰外，再沒有可以依恃的人了。他們的腐所既極黑暗，又很污穢，住得很不舒適，屋子裏外，常有人監守着，便是僕人出外，也必有兩個人陪着。過了兩天，馬堂動身，回臨清去了。這當兒，教士們雖則和外界隔絕，却仍能每天在救世主像前，舉行彌撒聖祭。

不消說得，他們所以受到這樣奇特的待遇，當然是因突然被人發見了幾個苦像所致。在這一國境內，赤身裸體是不行，而在藝術上是禁止的，除了考驗針灸的銅人，或是用邪法厭勝的木人，蠟人之外，人體的模型是從來不用的。那麼，這個手足交叉，懸在十字架上的屍身，究竟是甚麼意思呢！天津的兵備道，就得把這些話告訴利公，和他要好的別的官員們，對他也是這樣說法：中國人要傷害一個仇人，就做一個肖像，貼上他的生辰八字，教會邪法的人，念着咒語刺這人像，刺在那裏，那仇人就傷在那裏。如今一個外國人，若不是存着最惡毒的惡心，何以再三再四，要覲見中國皇帝呢！

這就可知那時候中國人正和那退化時代的羅馬人一般，有一種頑固的心理：這種心理，和宗教正理最相背悖，也最容易流於迷信。當天主教初從澳門傳入廣東內地的時候，一起頭就和舊有的宗教接觸，鬭爭；最先歸化的異教人，和迷信釋道兩教的羣衆相處，仍不免疑信參半。那洋式樓房的肇慶住院，造在花塔附近，他們便說破壞了本城的風水，便是南京的聖堂，當初忽忽造成，後來利公一去，鄰舍人家便說堂頂上十字高聳，沖了他們，因此遭到了惡運。利公在南昌時候，因為不肯拜許真君像，幾乎被南昌人打死。後來他對新教友，不得不孜孜訓誨，說泥塑木雕的偶像，本身不知不覺，毫無能力，可是你們敬拜他實在是敬拜魔鬼，把他們的誠心通了魔，就做了魔鬼的奴隸！

凡是新到中國的歐洲人，都可以逐漸體驗到中國所有迷信的民間傳說；龐迪我司鐸來華後，不久就有經驗了。一六〇二年，他曾記：（註二十五）「因為我的眼睛是深黃色，他們從沒有見過，便紛紛議論起來了，有些人說這樣的眼晴，看得見地下隱藏着的金銀財寶。」這種妖言邪說，不但壞了人的思想心術，更使宗教正道大受妨害。

這裏，我們得把這普遍活躍的迷信心理，詳加研究，才教我們明白當時中國人見了那些釘在十字架上的怪人像，何以會有這樣的感想。我們且不必講釋道兩教所有的神話，以及種種迷信事理，只看他們中要是能超然物外，只敬神明，不重仙佛，和某些名儒一般見解的人，他們的宗教思想，大抵也總十分薄弱，最大的缺點，便是不知道宇宙真神的偉大，聖善是無窮的；因此，便在表示最尊嚴的昭事典禮，如祀天大典中，也差不多全沒有朝拜愛慕的精神。在這樣的情景中，怎能理會得降生救贖的奧理呢？所以，利公一起頭，便已感覺到極大困難了。他起先做的要理問答，便已毫不隱諱地，把耶穌自願被釘架上，甘心受死，以救贖衆人的基本教理，坦白說明了，便在送給皇帝的貢品中，也有一個十字形的聖骨匣。可是如果更進一步，使這種觀念見諸實行，特別是把救世主受難的聖像分送給他的朋友們，那麼，他還認為（一五八五年十月二十日）這種聖像「還不宜供應用」（註二十七）。後來，他想至少該使已經領洗奉教的人，知道這苦像，是教友信德的主要標記——只看他後來請歐洲方面多寄些苦像便可證明。我們知道聖教會當初興的時代，也遇到了同樣的困難：「公教藝術所摒棄的不是耶穌被釘的觀念，只是像真的表現罷了。有一時，教友們大家都見過一個被詛咒者的屍體，在十字架上釘着腐爛了。一個人見過了這種慘狀，一想起來，總不免要發生一種厭惡的情緒，如果再讀到古代作家的傳記，或者僅僅提起這件事情，便要使人悒悒不歡。一幅描繪耶穌受難，真情實狀的圖像，就得勾起這些痛苦的愁思，激動人心厭惡

的情緒。這和教人對救世主應加尊敬的道理，未免背道而馳了。（註二十八）

中國人並非絕對不知道有十字架苦刑，可是苦像的形狀，天然有和妖術厭勝相淆混的危險。但看教士們在天津所不幸的遭遇，我們便已明白了。這便是以後，他們在中國境內傳教，對這一點所以格外審慎的緣故；有些人不明白，却以為是怯弱。然而那在暹羅，安南傳教的羅德司，却以為在這中國文化的勢力深入民間的地方，雖則不宜引起無謂的摩擦，使一般聽他講道的人民，自然發生厭惡的心理，可也不必有許多顧慮，採取種種防患未然的措置。到了一六五二年，他宣稱：（註二十九）「別處地方（先該注意日本）大家以為要是不能審慎辦理，還不如先從駁斥迷信謬理入手為妙，不宜先講聖教會的信德道理，以致天主聖三的奧理，總得等到將要領洗時候才講明白。我憑着多年的經驗，學得了一條似乎比較好一點的道路，因為這是中庸之道。這便是一起頭不要就公然指斥種種迷信行為，不如先揀那真光沒有全滅的人，抓住他們心靈上幾種固有的主要知識，站定了地位，比方給他們講世界的創始，世界的創造者是誰。……這種方法（和在中國一般）不但給他們打好根基，將來不難在這基礎上建立信德，也可以不致激動人心的惡感。……然而我不能贊同那些人的意見，以為在領洗以前，不應該就講天主三位一體，從而講到降生救贖，受難復活的基本大道理。（這便是在華教士們的審慎他，却視為過分）我沒有見過一個異教人，爲了這三位一體的奧理就失了信德；這時候，我先使他承認天主的明悟，超過我們的明悟。……至於降生的道理，慣常這總是使中國人失却信德的難關，我以為必須毫不遲疑，跟着把那受難救贖的道理立即提出，可是要注意下列三事：（一）再三伸說甚多死後的靈蹟，使他的死是出於自願。（二）乘機說明天主對我們的愛情，講罷，不時供出十字，（或是苦像）使信衆恭敬朝拜，再用尊敬的表記作陪襯。（三

〔拜過苦像，立即接講耶穌受難被釘後，第三日復活的聖蹟。〕

我們看了以上的解釋，便不難明白遠處地方，對於那天津事件所以要起這樣的反響，要把審慎的措施認為過分了。這種訓練法，到了十七八世紀，才見某些歐洲人巧妙運用。眼前，利公所以在天津衛城吃了虧，無非是因中國人有了誤會所致。可是從此，他的處境就危險極了，不但不能獲得許可，留在北京居住，便是他以前在中國所有的成就，也必悉成泡影。他正如一個人被逼到了懸崖，知道一失足，就要跌下萬丈深淵一般，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除了祈求天主護佑外，別無他法。所以利龐兩司鐸惟有祈禱做苦工，獻彌撒，求天主矜憐中國億萬靈魂，看來他們能否得救，大半全靠此行能否成功。

（註三十）

年底近了，教士們還在黑暗中，不見有一縷光明透進來。利公趁防守稍懈的當兒，便寫了兩封書信，差人送到臨濟，一封給馬堂，一封給那嶺西道鍾槐樂。馬堂一見來人，便破口大罵，叫人揮拳打出。那嶺西道看了利公差人來到，大為震驚，教人偷偷摸摸，把他引進衙門，對他說這件事凶多吉少。因為馬堂要上奏皇帝，誣教士們邪法厭勝，要咒死皇上；如今臨濟城裏爲了這件事，大家議論紛紛，謠言叢起，正鬧得滿城風雨。他於是寫了回書，又對來人鄭重說明，勸教士們趕快逃回廣州，便是要失掉行李也顧不得，還得粉碎他們的苦像；他們要是不願意這樣丟臉偷跑，至少該奏請皇上准予回國。這樣惡劣的消息，使教士們感覺自身處境的窘迫，更非他們利料所及。他們也會差鍾巴相修士進京，向京裏的友好求救。這些人都不敢出頭招禍，却把奏請准予歸國的主意，加以批評，說不得太監幫忙，這是毫無效用的。據他們的見解，還不如直接求馬堂解救，犧牲全部行李來買命。這麼說，教士們的厄運是註定了，鍾修士便在北京發信給南方各處的司鐸們，報告利公等

一人所遇的危難情形。

利公講述這件事，用一句動人的話作結束，顯着他的剛毅堅忍，有宗徒的真精神，一生只求光榮他被釘的師主。他說：「同志們見人力的援助，已絕望了，便更專心一志，求天主護佑，準備應付一切危難。他們一心只願為那所以惹起馬堂磨難的緣由，捨身致命。」

天主不但給四位教士（利龐兩司鐸，和鍾貝兩修士）也給四個僕從（兩個教友兩個保守）充滿着神恩。這些僕人們，為要證明自己的信德，大家決定不把主人們丟下。那奉命到臨清送信的僕人，聽了嶺西道勸教士們粉碎苦像的話，便直捷痛快地，回說：「這是真天主的聖像，為了尊崇他的緣由，不但那些外國人，便是他們做僕人的本國人，也準備捨身致命。」據說，這些話使那惶恐怕死的大官僚大為驚訝；他也和他的同僚們一般，一想到要死，就驚惶失措啦。（註三十一）

這樣，利公等就在天津被困在那冰冷寂寞的廝所中，懷着順聽主命的衷忱，表現英勇的氣概，度過了這十六世紀的最後一年。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震旦大學
史學研究所
利瑪竇司鐸和當代中國社會第一冊

Le P. Mathieu Ricci

et la société chinoise de son temps t. I

每冊定價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版權
所有
必究

原著者
Henri Bernard

譯述者
王昌社

編輯者
東方學藝社

上海蒲石路二三一號

天津法租界十二號路

上海徐家匯

土山灣印書館

印刷所
發行所
東方學藝社

Cathasia

E

117322